

THE  
GREAT  
FAMINE

人相

中國的大饑荒

沒有足夠多的糧食吃，人就會餓死。  
讓一半人死去，這樣更好，另一半人就能吃飽。  
——毛澤東

食

年代的

勞改基金會 編著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2012年2月15日，勞改基金會的執行主任吳弘達（左）與傑斯珀·貝克（Jasper Becker）在華盛頓討論大躍進問題。照片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FA）

---

# 人相食的年代

---

# 目錄

序一 我是大饑荒的親歷者	吳弘達	11
序二 對暴君毛澤東的缺席審判	余杰	17
第一章 地獄開門：大饑荒的起源		
一   大饑荒的地獄之門是如何打開的？	姚監復	24
二   中國人是怎樣變成「餓鬼」的？	傑斯珀·貝克	38
三   大躍進是一場戰爭	高王淩	45
第二章 大饑荒與中共的統治模式		
一   執政者怎樣應對危機？		
——大饑荒期間中國領導人的作為	楊繼繩	62
二   大饑荒的始作俑者和犧牲者	馮客	77
三   大饑荒對文明的毀滅		
——讀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有感	李銳	101

---

### 第三章 餓殍遍野：大饑荒的重災區

- 一 | 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 宋永毅 108
- 二 | 1958-1962：四川省大饑荒 丁抒 129
- 三 | 貴州事件始末 張再興 151

### 第四章 回憶與見證：個案研究

- 一 | 寒春——我在 1960 年 李世華 200
- 二 | 母親——新中國的叫花子 依娃 216
- 三 |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  
——我母親所親歷的河南信陽大饑荒 張大軍 231
- 四 | 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恐懼和敗筆  
——追憶親歷大躍進大饑荒的歲月 茆家昇 238

### 第五章 大饑荒問題在中國研究中的缺席

- 一 | 意識形態高於真相  
——中國研究中對大饑荒問題的迴避 郭建 254
- 二 | 民主抑或獨裁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共產黨 艾利·史密斯 262

- 附錄 是大饑荒，也是大屠殺 丹·薩瑟蘭德 294
-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 尹曙生 298

序一

## 我是大饑荒的親歷者

文 | 吳弘達

### ——大饑荒 50 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開幕詞

我的名字叫吳弘達，也是大饑荒的倖存者。

我於 1937 年出生於上海，我父親是一家銀行的高級經理。每天中午，我父親的司機都會來到我的學校，給我帶來我們的廚師所做的幾罐熱氣騰騰的可口飯菜。我與其他幾位受到特殊對待的學生單獨在一個房間裡用餐，其他學生則在食堂裡排隊進餐。

在我的孩童時期，我幾乎完全隔絕於上海大部分地區的貧困狀況。我從未瞭解到，在離我家半公里的地方，黎明時分會有車子來拉走那些在夜間餓死之人的屍體。1949 年 5 月，上海被共產黨佔領；1952 年，我的父親開始因他銀行經理的職位而受到新政權的懲治。他被撤職，重新分派工作，很快，我的父母就開始為我們一大家子的學費和食品開支費盡心思。

1955 年，我離家到北京地質學院學習。在我讀大學期間，毛澤東於 1958 年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他確信，他只需 15 年時間就能夠讓中國實現現代化。在山東農村進行實地調查期間，我看到農民們為了種糧食將地挖了幾英尺深。這是共產黨的幹部們命令他們這樣做的。有些村民認為，突然之間，他們能夠畝產萬斤小麥，而不是之前的畝產 500 斤小麥。不過，大多數人只是聽命而行，因為他們不敢反對共產黨的幹部。

在大躍進期間，我開始因自己的獨立觀點而被同班同學批評和騷擾，並上了黑名單。我想著要逃離中國。我看不到自己在國家的未來中能有任何地位，因為每個人都不得不支持大躍進的政策。毛澤東讓人們在自己的家庭作坊裡以他們的農具和炊具煉鋼，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荒謬的，可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會受到懲罰。

在我大學時代，飲食條件不好，肉或食物油都很少，但不算最糟糕。饑荒始於鄉下，而我們大學生卻不瞭解情況。

1960年，我還在大學讀書，我的同班同學指責我為反革命右派分子，於是我被開除，被判進行勞動改造。我被叫到一個會場上。在那裡，我受到了嚴厲批判，一位警察迫使我簽署了一份文件。我沒能看清文件的內容，然後我就被扔進一輛吉普車，帶到了勞改營地。在接下來的19年裡，我沒能從那裡出來。

到了勞改隊之後，我才意識到中國發生了饑荒。勞改隊中的我們每天只有兩頓飯。每頓飯只有兩個小窩頭，即用高粱做的一種饅頭。由於加了粗糠，它們味道苦而且口感粗糙。我們還能喝上一勺湯，上面有幾片漂浮的菜葉，偶爾還有鹹菜。

這時，大饑荒正在中國各地肆虐，就連忠誠於共產黨的工人們也在挨餓。所以，勞改隊的犯人們只能勉強活下去。我總是感到餓，我開始從警察的菜園裡偷黃瓜和白菜。我最好的朋友邢先生的狀況更糟——在吃飯時他還自在其他犯人的眼皮底下偷吃他們的食物。他曾一度逃脫掉，可是，在處於一片大饑荒狀況的中國，他無處購買、也無法乞討或偷盜到食物。於是，他只好回來向勞改隊自首，以便靠定量的食物供給活下去。

我在偷食物時被抓到，於是被送到另一個名為清河農場的勞改隊。這個勞改隊很大，接受蘇聯專家的指導，蘇聯專家們把它分成了幾個部分。饑荒變得更嚴重了，犯人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食物上。在睡覺之前，我們大夥輪流描述自己最愛吃的食物、以及自己過去所吃的美

味飯菜。漸漸地，我們開始挨餓。由於缺乏食物，身體開始支取儲藏在我們骨肉之中的熱量，因此變虛弱了。我們開始偷取和搜尋山邊的野菜和野草。我們甚至找到了老鼠窩，那裡有它們儲存的過冬食物。我們都寫信給自己的親戚，要求寄食物來。他們只能把自己省下來的很少的食物寄給我們。

饑荒是如此嚴重，以至於饅頭都是一半用穀物、一半用碾碎的玉米穗做成的。我變得虛弱不堪，在醫生檢查之後，我於1961年8月被送到585分部。在勞改營的這一所謂「康復分部」裡，所有的犯人都在死亡線上掙扎。這部分勞改營裡的犯人無需勞作；他們都在等著死亡。

我走進585分部後，立刻就感到一陣窒息。院子裡滿滿地坐著幾千人，沒有人交談，只是安靜地坐著。他們形容憔悴、臉色蒼白，看起來就像僵屍。宿舍裡躺有更多的人；他們不說話、不叫嚷、也不哭泣。裡面只有靜默。夏天時他們赤身露體。冬天時他們有時也從不起床，只是微微睜著眼。

每天早上，廚師都會來用勺子給我們的碗裡盛上用玉米粉和碾碎的玉米穗做成的稀粥，另有一小袋豆粉做調味品。我們小心翼翼地數著每一勺，每一勺就意味著活命。每次吃飯時，都有幾個人臥床不起。這是我們知曉他們已死的唯一辦法。他們瘦弱的軀體被抬走，等夜晚降臨時，新的犯人就會填充進來。

有一天，我最好的朋友陳明先生沒有起床。他被送到了墓地，可是，當他們正要埋掉他時，他竟然恢復了知覺。接著，他被送回緊鄰我的床位的鋪位。我告訴保衛人員，他錯過了一餐飯。於是，廚師給他帶來兩個熱騰騰的、用真玉米做成的饅頭。這些饅頭通常只是用來供應警察頭目的。他張開大嘴，吃掉饅頭，可是接著卻用力抓他的肚子，痛苦地大喊大叫，然後死了。他的腸胃非常脆弱，所以無法消化那些饅頭。直到今日，我依然有負罪感，覺得是自己殺了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585分部。

只是借著捉青蛙和蛇，將它們的頭咬去，剝去它們的皮，在暗中用我的夜壺將它們煮熟，我才得以活過那個冬天。1961年，我被奇跡般地認定為健康程度恢復到足以轉移出勞改營。很快，我就開始在北京附近的團河農場勞動。這個勞改營是一個葡萄園，我在那裡可以偷葡萄。從偷取的葡萄中攝取的營養有助於我從挨餓狀態中恢復過來，並熬過大饑荒的最後年月。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創痛巨深。崩潰中的王朝、混戰的軍閥、無能的中央政府、日本的侵略、以及殘酷的內戰——所有這些政治災難導致了社會的混亂和多場小規模的饑荒。1949年，毛澤東許諾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強大的、人人有飯吃、繁榮和平等的中國。1958年，他許諾將在15年之內讓中國在工業產出方面超越英國。但現實情況則截然不同，中國深受大饑荒的折磨和打擊。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僅僅十年之後，中國就遭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各行各業的人們相互偷竊求生；父母們將自己餓死以為孩子提供食物；母親們開始拋棄他們的嬰孩；家人開始吃死去的家人。沒有了食物，社會就徹底崩潰了。人們不得不問：這就是毛澤東承諾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嗎？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未來嗎？我對此非常懷疑。

以前的饑荒都是地方性的，由非正常的天氣引起，而且人們能夠移居到其他省份尋找食物，他們也可以在街頭乞討度過飢荒。可是，這次卻沒有什麼富人來幫助乞丐。饑餓的農民在鄉間遊蕩，然而共產黨的官員們卻強迫他們返回故鄉，以致餓死。人們沒有活命的自由，他們甚至被禁止在垃圾中尋找食物。整個的村莊都消失了，可是共產黨人卻不在乎。他們只接受來自北京的命令。

中國共產黨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少數幾個站起來反對毛澤東的經濟政策的人之一。他告訴毛澤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並不在乎。過去50多年，中共一直在試圖掩蓋這一罪行，並遮

蔽它血淋淋的歷史。對那些出生於大饑荒之後的人，中共教導說，那場全國性的餓死人事件是由一系列自然災害引起的，且只持續了三年，而不是四年。倖存者們別無選擇，只能忘記過去，並讓他們的孩子接受這一謊言。

這就是我們召開大饑荒 50 周年國際研討會的理由。我們召開研討會的目的是，記住中國政府一直努力企圖忘記的過去。今天，我們從與會的專家那裡學到很多，他們為了發現並披露真相而犧牲了自己的安全。我對你們每個人都表示歡迎，感謝你們的與會。我們將一道探明真相。

序二

## 對暴君毛澤東的缺席審判

文 | 余杰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2012年10月，河南鄭州四位青年公開撕毀毛澤東畫像，他們是藺其磊、姬來松、文刀以及曹小東。他們被人肉搜索後收到恐嚇電話，甚至有人威脅要殺死他們全家。而更多線民表示，毛澤東是獨裁者，撕毛像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表達方式，稱讚四名青年「有勇氣、夠膽識」。線民「我愛飛翔」說，將在近日發起大規模的撕毛像活動反擊左派，並以此為主題拍攝一部紀錄片。這一事件意義重大，堪稱80後、90後年輕人精神覺醒的信號，必將在中國尚未完全展開的「非毛」運動中留下了重要一筆。

2005年，我在中國的大學所作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是在北京航空航大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當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我在回答中同時指出，毛澤東曾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3000萬無辜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一個殘酷的暴君。有學生激動地站起來反駁我說：「你說3000萬人餓死，你有什麼證據？南京大屠殺死難30萬人，後來發現好多萬人坑；但你說餓死3000萬人，怎麼沒有發現一個萬人坑呢？你是公然說謊！」後來，左派學者楊帆去校方告密，致使邀請我的學生社團受到查處。

如今，這本只能在海外出版的《人相食的年代》就是對這些質疑和反駁的擲地有聲的回答——這本書收入2012年春在華盛頓由傳統基金

會和勞改基金會聯合舉辦的「大饑荒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文章近二十篇，與會者或是這一領域的權威學者，或是大饑荒的親歷者，從各個側面論述了大饑荒的起源、發生以及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暴君毛澤東的缺席審判。有一天，這本書會成為中國大學必修的通識課程的參考書。

### 「3D版」的當代流民圖

北宋時期，地方官鄭俠畫成《流民圖》，與上書一起送達朝廷。其流民圖描述百姓在旱災中扶老攜幼、疲夫羸老塞道、憂愁困苦、身無完衣的情形。「神宗反復覽圖，長籲數次，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下令開封府發放免行錢，司農發放常平倉糧，停止王安石的新法，又下《責躬詔》。民間歡呼相賀。

而《人相食的年代》一書堪稱一幅「3D版」的中國當代流民圖。所謂「3D版」，就是立體的、讓人身臨其境的畫面。在這本書中，既有對大饑荒發生根源的宏觀分析，也有對大饑荒重點災區的研究，更有大饑荒倖存者個體化的證詞。在德國，大屠殺的歷史無人敢否定，否定大屠殺是不受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乃是犯罪行為；而在中國，大饑荒的歷史仍然是官方媒體和教科書的禁區，否定大饑荒的左派常常大言不慚，研究大饑荒反倒要冒巨大的風險。在此背景下，這是一本瞭解那段被遮蔽的歷史的最佳入門讀物。

歷史學者是客觀、冷靜、嚴謹的，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習慣用證據說話，以推理服人。學者宋永毅多年來研究「文革」、「反右」、「大饑荒」等課題，在搜集原始史料方面貢獻甚大，甚至為此付出入獄的代價。本書中，宋永毅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中指出：「現在的網路上，常常有一些善良的年輕人不相信當年有過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禍』。看了本文所列舉的『人相食』的案例，應當開始直面這一由白骨和屍體構築的血淋淋的史實了。設想一下：如果在一個共『82戶491口』的生產隊裡（四川省崇慶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

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 48 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 90%；83% 的家庭有吃人史』；如果在一個大隊——『安徽省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 29 個自然村中，有 26 個（約佔 89.6%）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如果在一個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公社）就發生詳細記錄在案的 16 起『人相食』的事件；如果僅一個省（安徽省）就有過因饑餓造成的高達 1189 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們便不難想像，當時整個中國農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間地獄，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絕對不是隨意杜撰出來的『天方夜譚』！」魯迅以「吃人」一詞隱喻中國文化和制度的本質，即便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評估專制之惡，但他做夢也想不到，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吃人」由一個象徵變成血淋淋的事實。在這裡，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統計材料中的資料，而不是所謂「海外反華勢力」的「造謠污蔑」。對於這樣的鐵證，那些強詞奪理地否認大饑荒的毛派們還有什麼話說呢？

### 毛澤東是「形而上學的殺人者」

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有言：奧斯維辛「不僅是一個政治事實，而且是一個文化事實」，是「非理性的蔑視與仇恨的頂點」。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 2008 年 12 月入獄之前寫的最後一篇文章，就是為楊繼繩的《墓碑》一書所寫的題為〈毛澤東怎樣殺人〉的書評。劉曉波寫道：「大躍進餓死幾千萬，首要禍魁毛澤東之所以不受追究，『三面紅旗』之所以不倒，不僅在於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和封鎖災難資訊，更在於當時中國的主流民意認同『趕英超美』、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在這樣的主流民意之下，餓死再多的人，與大躍進所要實現的偉大理想相比，也不算什麼。如果沒有主流民意對共產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縱使毛澤東長出三頭六臂，也無力把他的絕對權力維持到自然死亡。」半個多世紀之前，毛通過洗腦的宣傳教育和深入每個村莊的專政機器，使得數千萬人餓死而社會仍然大致保持穩定；如今，薄熙來數年之內就在重慶掀起「小型文革」，胡錦濤以「反日」為幌子在全國數十個城市上演義和團和紅衛兵式的打砸搶，中共當局以意識形態殺人的統治術一以貫之。

《人相食的年代》收入了學者楊繼繩的〈執政者怎樣應對危機——大饑荒期間中國領導人的作為〉一文。作者指出，大饑荒的根源不是「自然災害」，實際上那幾年「風調雨順」。大饑荒不是因為糧食匱乏，就在數千萬農民餓死之時，當局的糧倉中堆滿糧食，而且，當局還源源不斷地向「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出口糧食，甚至無償援助「小兄弟」們。換言之，這場大饑荒，百分之百是人禍而非天災。毛將中國當作他私人的實驗室，而億萬國民主動或被動地成為其試驗品。《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的作者、荷蘭歷史學家馮客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實驗的最終結果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殺戮，至少 4500 萬人因工致死、餓死或被打死。」古代的皇帝聽聞民間災荒的消息，尚且心痛自責；而毛無恥地宣稱，糧食不夠吃；餓死一半的人，其他人就夠吃了。

中央有一個毛澤東，地方上則有千千萬萬個小毛澤東。在本書中，有多篇文章論述四川、河南、貴州、安徽等大饑荒「重災區」的情況。每個重災區，必定有一個縮小版的「毛式土皇帝」。他們對毛忠心耿耿，對下級和農民則心狠手辣。大饑荒過後，不僅毛澤東紋絲不動，這些執行毛政策的大小官員也都安然過關。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實行激進政策，導致四川一省便死亡 1000 萬人。面對遍野餓殍，他無動於衷，心如鐵石，照樣打麻將、玩橋牌到深夜；還跳舞、看舊戲，看內部電影，特別喜歡看香港電影；出門必帶私人護士同行。「文革」中李井泉受到衝擊，兒子被打死，妻子在獄中自殺，川人對其恨之入骨，咒之為報應。「文革」結束後，李井泉因與鄧小平的密切關係，復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並未受到法律制裁。

### 「去毛」是中國「憲政大開張」的第一步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的「戰爭之王」，他一輩子都處於戰爭狀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在擊敗了國民黨以及黨內的競爭對手之後，毛將矛頭對準對他俯首貼耳的、並未威脅他統治的農民階層，用學者高王淩的話來說：「大躍進是一場『戰爭』，是建政後農民和政府間的最為慘烈的一場惡戰——一方有著全副武裝，從武裝力量到

意識形態，一方則幾乎一無所有。」結果，當然是毛大獲全勝，而農民被餓死數千萬。

在這個意義上，毛的邪惡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但是，不同於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和史達林，毛在西方仍然是一個中性的甚至帶有浪漫色彩的符號：在波普藝術中，毛的頭像被使用的頻率僅次於格瓦拉；毛家菜館在許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中都可以看到；在尼克森圖書館中，毛的銅像也與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們放置在一起。為什麼會這樣呢？

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饑荒等慘劇的真相仍被掩埋，或被故意視而不見。《人相食的年代》這本書中引起我最大興趣的，不是貝克和馮客等少數說出「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真相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的文章，而是艾利·史密斯所寫的〈民主抑或獨裁：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共產黨〉。這篇長文以西方人對延安時期的共產黨和大躍進的報導及評論為重點，探討了這種「鏡花緣」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指出，美國和歐洲的學者、記者和政治人物們一直將中共的意圖看得比其本來面目更為仁慈，而將他們行動的結果的破壞性看得比實際情況要低。原因更多地是對已有的資訊視而不見，而不是資訊的缺乏。「中國共產黨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共產黨，毛澤東不是史達林。」在這種掩耳盜鈴式的想像之下，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成了多愁善感的東方哲學家和詩人。作者引經據典、思維敏銳，是一名剛剛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的 20 多歲的美國年輕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8、90 歲的季辛吉和傅高義們依然在為中共的屠殺辯護。

對大饑荒的研究，是恢復當代中國歷史，在意識形態領域「去毛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去毛化」乃是中共開明派元老李銳所憧憬的「憲政大開張」的第一步。中共不會主動「去毛」，對十八大「去毛」充滿憧憬的人們終於失望了，十八大開幕式上首先就是為毛默哀，胡的講話多次提及毛澤東思想。所以，「去毛」有賴於民間的奮鬥，比如每一位見證者勇敢地講出真相，每一位歷史學家嚴肅地面對歷史。中國人已經覺醒，從「八九」民運期間墨染天安門上的毛像的三勇士，

到如今撕毀毛像的四青年，人們追求真相、真理和正義的鬥爭「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勞改基金會，經過多年的努力，使得「勞改（LAOGAI）」一詞載入英文等多種語言的辭典。近年來，勞改基金會也致力於研究「土改」、「反右」、「文革」和大饑荒等中國當代歷史的「禁區」，並主辦多次國際學術會議。《人相食的年代》這本書，正是勞改基金會推動的大饑荒研究的成果之一。願這份來之不易的成果為更多的學者和讀者所分享。

第一章 地獄開門：大饑荒的起源

# 1-1

---

## 大饑荒的地獄之門是如何打開的？

文 | 姚監復

### 一 | 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大浩劫始於 1958 年

1958 年承前啟後，上承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下啟 1959 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是毛澤東開始製造大饑荒的關鍵之年。

在中共黨史中，1958 年是黨內高層尖銳、激烈、複雜政治鬥爭的一年，但是在官方黨史、國史中，均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年的政治鬥爭，只著重描述了荒唐的大躍進。實際上，毛澤東在 1958 年初的南寧會議，春天的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和秋天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發動了高層的反右傾鬥爭，批判了黨中央的領導人周恩來、陳雲和劉少奇，軍隊的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將、肖克、宋時輪上將，以及地方上的潘復生等一批省委書記。毛澤東提出了總路線，正式推翻了中共八大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性質的決議，重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的錯誤論斷。因此，1958 年是承先啟後的一年，繼承了 1957 年社會反右派鬥爭的運動氣勢，鬥爭的主要矛頭由廣大知識分子轉向黨內高級幹部，並為 1959 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從而為把全黨全國領向大饑荒的地獄之路打開了黑暗之門。

馮客教授打破 1960-1962 年三年「自然災害」、「三年大饑荒」的定見，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的大饑荒」實質上應看作從 1958 年至

1962年歷時五年的中國浩劫史，將造成大浩劫的開始年度定位於1958年。我認為，馮客教授的判斷，是正確的符合史實的科學結論。對此，我做一點補充論述。

## 二 | 毛在1958年反右傾鬥爭之後，迅速實現農村人民公社化，逼使農民走上大饑荒之路

### 1 | 1958 毛澤東從政治思想上首先向周恩來開刀， 在最高層發動反右傾鬥爭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廣西南寧召開有十位省市第一書記參加的南寧會議，批判「反冒進」，矛頭直指周恩來，逼使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的要求。毛澤東從政治思想上發動了最高領導層的反右傾鬥爭。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的發言中針對周恩來提出的「反冒進」的口號進行駁斥：「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認為十個指頭，只是一個長了包。「當時不要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並且，把「反冒進」同右派進攻的政治聯繫起來上綱批判：「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五十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毛澤東還認為，反冒進是洩了六億人民的氣，採取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論，使用的辦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公開讚揚柯慶施1958年初在上海市黨代會的報告〈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認為「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過，是不多了。」

在1月16日的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文章，當眾出周恩來的洋相，

他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在二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了群眾。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在三月成都會議上說：「反冒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冒進則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要和冒進對起來，反對慢的路線。」他還強調，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毛澤東還提出，要用「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不給反對者提供口實。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點出「快是總路線的靈魂」。這樣，馬克思主義的大冒進、大躍進成了全黨必須執行、遵守、貫徹的總路線。

反冒進的周恩來被毛澤東狠批以後，只有不斷地違心和逐漸馴服、順從地做檢討，改變過去還敢於實事求是地提出不同意見的做法，1956年6月起，周恩來壓縮過高的預算和計劃指標，提出「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的建設方針，對於毛澤東堅持增加預算的意見，周恩來親自找毛澤東，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使毛澤東非常生氣，不久就離開了北京。

1958年，毛澤東終於對周恩來的反冒進口號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上綱到「非馬克思主義路線」，「右派差不多的邊緣」，被柯慶施的文章壓倒了，並明確表態「我是反反冒進的」。周恩來在不斷檢討中，還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辭去總理職務的要求。雖然，鄧小平主持的會議，未同意周恩來辭職的報告，未上報。但是，從1958年受到毛澤東嚴厲的政治性警告以後，周恩來再不敢向毛澤東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只能成為毛澤東得心應手的馴服工具，善於體會、理解毛澤東內心意圖，並加以具體貫徹落實、實施的「大丫頭」（李銳的評語）。

這樣，1958年，毛澤東用政治批判壓服了、降服了周恩來，整個國務院系統，就成了毛澤東具體推行大躍進一大躍進的執行機構。黨的系統，原來劉少奇支援和同意周恩來的反冒進口號，到八屆二次會上做工作報告，也跟著毛澤東的調子批判反冒進，認為影響了群眾的積極性和農業發展、生產建設。劉少奇、鄧小平領導的黨的系統變成了毛澤東大躍進的指揮部。因此，1958年，毛澤東通過幾次會議，收降了反冒進的周恩來，並使周恩來及國務院各部委站到大躍進的第一線，不斷提出具體的各方面的高指標。就這樣，毛澤東從政治思想上批倒了周恩來，將反冒進的領軍人物改造為大躍進的帶頭人物，這就為全國的大饑荒準備好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條件。

## 2

## 1958

毛澤東從組織上將一批左派調入政治局和省委，  
批判、整肅一批省級幹部，打下執行極左路線的組織基礎

1958年，為了推行大躍進極左路線，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及省級幹部隊伍構成中進行了重要調整，以反右傾保守主義的名義，批判、整肅、打倒了一批實事求是的高級幹部，在許多省打出了「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同時將一些跟風趨勢的極左派調入中央或擔任省級領導。這樣，毛澤東在1958年已經為大饑荒打下了必要的組織基礎和基本幹部隊伍，以貫徹落實他的極左政策。

1958年5月，毛澤東首先把帶頭支持農業合作化、提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右傾的」極左派柯慶施，從中央華東局兼上海市委書記提升為政治局委員，另一位老左派，中央西南局兼四川省委書記的李井泉也成為政治局委員。他們接替被毛澤東批判為「小腳女人」的鄧子恢、譚震林而掌握了中國農業的實權。曾被打入冷宮、賦閑養病的康生，也重新復出，插手於文化和教育戰線。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也擔任國家計委、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要職，為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極左文件進行起草工作，把毛澤東的烏托邦幻想和浪漫的詩歌式語錄，轉變為正式的、規範的可以操作的政策，成為形成大浩劫的重要文件、法規

和章程。

同時，毛澤東支持各省左派造反，進行反右傾鬥爭，不斷揪出反黨集團，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動突然襲擊，未經省委討論就公開指名攻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主持會議的毛澤東竟然拍手支持。毛澤東的反右傾、大躍進的副帥鄧小平奉命到地方點火反右傾，1958年1月，鄧小平說，「甘肅對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梁大均的鬥爭不能含糊。」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很快就宣佈省委內部揭出了孫、陳、梁反黨集團。從1958年到1960年，甘肅有19萬人挨批，四萬名幹部被開除出黨。包括多名省級幹部。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安徽省副省長張凱帆、雲南省組織部鄭敦、河北省副省長胡開明以及廣東、內蒙古、新疆、青海、遼中等省的一部分領導人，都在1958年落馬。這樣，毛澤東從組織上、高級幹部結構上完成了大躍進的佈署。

### 3 1958

**毛澤東在軍隊高層批判劉伯承、葉劍英的軍事教條主義，並剝奪了粟裕、肖克、宋時輪的軍權，獲得軍隊對毛澤東及大躍進極左路線的堅定支持、絕對效忠地保駕護航**

1958年，毛澤東在解放思想，反對教條主義的口號下，在軍隊高層發動了一場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鬥爭，矛頭直指劉伯承和葉劍英元帥，迫使劉伯承這位在革命中屢建戰功，建國後主動放棄西南軍政大權，投身南京軍事學院建設，為培養高級軍事幹部默默奉獻的老實人、獨眼戰將，抱病到軍委大會上作檢討。此事還牽連了軍委軍事總監訓練部的多位領導人，著名的戰將肖克、粟裕、宋時輪等人的實際軍權被剝奪。1958年批判、整肅、清算劉伯承等軍內高級幹部的鬥爭，進一步樹立了毛澤東對軍隊的絕對權威，保證了軍隊任何高級幹部對毛澤東及他的路線、思想、講話的絕對服從，真正做到極左派柯慶施的名言：「對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對毛澤東思想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雷鋒講過「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

士！」決心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毛澤東就熱情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這樣，就能使毛澤東掌握整個解放軍，軍方調動任何一支小部隊、發出任何一個重要文件，都要經過毛澤東批准，因此他可以放心大膽、高枕無憂地發動大躍進，製造大浩劫，因為有可靠的絕對忠誠於毛本人的解放軍保駕護航。因此，在 1958 年曾領導批判劉伯承之軍事教條主義的彭德懷，一年以後在廬山會議上又遭到毛澤東批判時，高級軍官們又一邊倒向毛澤東，狠批彭德懷。在 1959 年負責彭德懷專案組的是賀龍元帥，在 1966 年毛澤東又拋出賀龍，說他是大土匪、叛徒、製造「二月兵變」，高級軍事幹部又一邊倒地按照毛澤東的號召狠批賀龍。這都證明，1958 年毛澤東批鬥劉伯承的策略，在軍隊內部是極有成效的，毛澤東得到了最高統帥的絕對權威，有軍隊的保證、臣服和保駕護航，毛澤東無所顧忌地開展了大躍進，加速啟動了大浩劫。

#### 4 1958

*毛澤東在制度建設上完成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化，開始實行他的「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的共產主義，大浩劫啟動了*

毛澤東從政治思想上、組織上及軍隊內部開展了高層反右傾保守主義的鬥爭，奪取了黨內路線鬥爭的領導權、話語權和最終決定權，從周恩來到劉伯承都對毛澤東絕對服從，於是毛澤東更為武斷地推進人民公社制度的建設，不到幾個月，全國農村 90% 實現人民公社化，驅趕農民走進大饑荒的絕境。

根據對中國基本矛盾的判斷，於 1958 年召開的八屆二次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總路線，這一總路線實際上在 1957 年 10 月 9 日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若干講話中已經體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及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

矛盾。」「『八大』決議中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毛澤東的這種極左理論，實際上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根本原則。

但是，毛澤東對陳伯達、吳芝圃在河南進行的人民公社試點，做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判斷。因此，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甚至還認為，「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毛澤東的頭腦發熱到極點，他不僅發誓要更快地在經濟上超英趕美，而且還想在政治上比蘇聯更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成為世界偉人，重建中華帝國，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在1958年幾個月內，就全國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對於毛澤東瘋狂的大躍進，即使看清了這是偉大的空話，多數人還不敢戳穿，都採取周恩來逆來順受、唯命是從的態度。個別敢學海瑞的高級幹部，如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所遭到的悲慘下場，教訓了所有的幹部，左比右保險。這樣，在毛澤東的威逼淫威下，具有個人迷信思想，以及具有顧全黨的團結、大局為重思想的黨的各級幹部，都自覺不自覺地、被迫或自願地貫徹建立人民公社的方針，領導全國農民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陷阱中去。

大饑荒的罪責，毛澤東是主要的責任人。試舉一例。在建立人民公社的過程中，毛澤東又發動了全民煉鋼運動，工業以鋼為綱，鋼產量要在1958年一年中由535萬噸翻一番到1070萬噸。由於洋法煉鋼不可能完成這樣的高指標，全國又發動土法煉鋼，農民砍樹、砸鍋、煉出燒結鐵，濫竽充數。據李友九向石山講過，1958年秋，李友九隨同譚震林見過毛澤東，反映農村勞力過多投入大煉鋼鐵運動，糧食可能

會爛在地裡，收不回來。毛澤東的回答是：「爛就讓它爛吧！」由此看來，大饑荒確確實實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是毛澤東及其幫兇們製造的大浩劫。一方面，毛澤東號召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是張魯五斗米道一樣的共產主義，放開肚皮吃，支持大放高產衛星的浮誇風；一方面，又不讓農民收回地裡的糧食，讓它們爛在地裡。這樣，出現餓死人、人相食的悲劇就是必然的結局，編劇、導演就是毛澤東。

總之，1958年是毛澤東製造的中國大饑荒這場大浩劫開始之年。

### 三 | 在中國出現大饑荒的社會基礎

為什麼中國出現了罕見的人為大饑荒，而其他國家（除了蘇聯）卻罕見？為什麼幾千萬農民坐以待斃，不反抗、不起義？因為，中國除了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壓力外，也有毛澤東反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強大政治壓力，以外，還有中國特殊的社會基礎和群眾思想條件。

#### 1 | 發瘋的和沉默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應當是有良心的先知，是受難者的代言人，但由於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把幾百萬名敢於講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因此廣大知識分子陷入沉默，變成了政治啞巴。更可惜的是，在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狂熱中，不僅領袖發瘋了，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也帶頭跟著發瘋了。郭沫若、周揚主編《紅旗歌謠》，收集了最狂熱的豪言壯語：「喝令三山五嶽讓路，我來了！」《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胡績偉在反思1958年的歷史時，認為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把中國引進了瘋狂時期，人民日報也進入了「瘋人辦報」的階段。

不能說當時是「眾人皆醒一人瘋」，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瘋狂。當時瘋狂的人，有一些是看風轉舵，一些是溜鬚拍馬，假報高產，更多的是「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壓出來的人，明知不對，說謊為上。但也有很多相當清醒的人，只是被「反右派」鬥爭鎮住了。胡績偉

承認：「我也有些看風使舵，甘心當馴服工具。總的來說，在整個瘋狂時期，我也是跟著發瘋的。」《人民日報》老記者李克林回憶1958年：「當時人的思想，真實與想像，現實與幻想，紛紛然交織在一起。我們是在辦報，又好像在做詩；是在報導事實，而又遠離現實。」「1958年人民日報的七一社論說，帝國主義說我們人口多是『不堪重負的壓力』，人多能生產糧食，只要我們需要，我們是想生產多少，就能生產多少。」當年的共產黨人、許多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入了「全民皆瘋」的瘋狂歲月。在發瘋的年代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畢竟出現了思想家顧准，以及敢於隱晦地指出大躍進是「偉大的空話」的鄧拓，這些極少數公共知識分子，很可貴地保留了中國知識分子有傲骨、講真話、捨生取義的品格。但是，他們遭到打擊，也未能扭轉領袖和黨的瘋狂，未能阻止全國走向大饑荒的悲劇。

## 2

## 1958

*中國人之所以默默地承受苦難，源於民族主義狂熱、個人迷信和奴性心理的悲劇性化合*

我們不僅要問，非正常死亡的3700到4500萬人，在悲劇產生之前的1958年和以後的饑荒年月，為什麼沒有像歷史上不斷重複爆發的農民起義那樣，出現有組織的反抗？是什麼社會心理因素，使幾億勤勞勇敢的中國人默默承擔了大饑荒的災難而未做抗爭？

主要原因是：中華民族幾千年遺傳的民族主義狂熱根深蒂固。在近幾百年來，中國受到列強欺凌，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奪取了政權，敢於同最強大的美國在朝鮮進行武裝對抗，敢於同蘇聯比誰先進入共產主義，這喚醒了中國人被壓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狂妄自大的自尊心。為了超英趕美，在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美麗幻覺中，他們願意犧牲小我，承受苦難，並自以為這是一種高尚而壯麗的獻身精神。

同時，在革命、建設、對外戰爭各方面，中國共產黨比起國民黨蔣介石的腐敗政權都有明顯成就，使許多老百姓從內心歌唱毛澤東像太陽、

共產黨像爹娘，強烈的個人迷信心理使人們無條件地信任領袖，真心相信「人民公社是走向天堂的金橋」，絕不懷疑此乃是走向地獄的絕路。他們相信領導人講的「蘇聯修正主義逼債」、「三年自然災害」等謊言，不去追索真相，稀里糊塗地告別了人間。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魯迅指出，中國人不僅是奴於身者，更可悲的是奴於心者。也正如沙文漢所講的那樣：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不論統治者是皇帝、總統、主席或總書記，實質上還是奴隸社會，是奴隸主與奴才或奴隸的關係。在大災荒出現先兆的1958年和成災期間，可憐的奴於心者的奴隸，寧肯自己餓死，也不願、不想、不敢反抗奴隸主。正像白音恂《中國的政治精神》所說：「在歷史上，中國人總是喜歡單一的、明確的權力。」「中國人對混亂有一種古典的反應，就是去相信一個統治者、一個政黨和一種思想。」「他們總是信任最高人物，從而也易於相信：皇帝是好的，但被貪官污吏搞壞了。」

### 3 | 共產黨員、各級幹部不敢為真理而鬥爭，是由於「愚蠢的忠誠」和「忠誠的愚蠢」

在追悼張愛萍的文章中，張勁夫反思到，他們在1959年會議上都舉手同意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是出於「愚蠢的忠誠」和「忠誠的愚蠢」。這個結論，深刻地剖析了廣大黨員和各級幹部的真實心理和可悲處境。為了不至於遭到批判鬥爭和嚴厲處置，黨員、幹部被迫選擇舉手贊成毛澤東：寧肯政治路線上犯錯誤，絕不能在組織路線上犯錯誤，不敢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思想路線。這確實是「愚蠢的忠誠」於領袖個人，也確確實實是「忠誠的愚蠢」。其結果是三、四千萬無辜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實際上，正是這些沾滿了鮮血的數字，無情地粉碎了丁關根的「共產黨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定義。但即使在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仍舊有大批黨員幹部敢於講出真話，有365萬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重點批判就是證明。

總之，毛澤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和 1958 年高層反右傾鬥爭及 1959 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使黨員、幹部和普通群眾屈服於殘酷無情的政治壓力、屈從於被打擊的暴力，或被蠱惑，或被宣傳所蒙蔽，幾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主動或被迫地捲入狂熱的大躍進，一起滑向大浩劫，在大饑荒年代，4500 萬人跟著共產主義的紅旗走向地獄。

#### 四 | 為什麼「人相食，要上書」？為了歷史教訓不被遺忘，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2008 年，紐約，在討論大躍進 50 周年的會議上，楊繼繩等人講到大饑荒時，提出那時中國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相。會上一位老華僑質問道：「我們原來在美國抬不起頭來，現在祖國強大了，我們揚眉吐氣了。你們為什麼在會上講人吃人的事？為什麼要給祖國形象抹黑？」我和朋友們向他作了解釋，他似乎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也許還有一些人有類似的看法，特別是一些極左派，根本否定死於大災荒中的估算人數。甚至在中國國內左派一次集會上，有位河南聽眾發言反駁，講他的老家村裡就餓死了人，結果被驅逐出會場。因此，我認為，楊繼繩、馮客等學者關於大饑荒的論著是極有價值的，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

因為，從中國歷史上看，史官必須有史德，即使是官方修史，也要敢於承認和記錄「人相食」的慘劇史實，留下後人必須汲取的教訓。劉少奇向毛澤東講了很重的話：「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最大心病。因此，他必須打倒可能追究他製造大饑荒罪責的所有領導人，發動了反右傾鬥爭打倒彭德懷，批判 365 萬各級幹部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發動四清打擊農村基層幾百萬幹部，再發動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面內戰」，鬥死了劉少奇、彭德懷等人。在和平時期正常年景下活活餓死 3700 到 4500 萬老百姓，這樣的事件如此悲慘，古今中外罕見，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景，難道不應該寫進歷史嗎？為了讓幾千萬冤魂的亡靈得以安息，讓後代記

住歷史教訓，我們必須以歷史上有史德的史官為師，忠於史實，如實記錄，而不能象中共黨史二卷的作者那樣迴避史實，人相食，竟然不上書。

歷史上，只有真正敢於發出罪己詔、承認人相食之事實的人，才能繼續當皇帝。但到了二十世紀，毛澤東卻聲言「我們絕不發罪己詔」。後來的接班人則只善於美化黨史，認為承認人相食、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是醜化黨史，因此迴避、隱瞞了大災荒的史實。事實上，不敢於同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思想、作風劃清界限者，仍然在掩蓋與粉飾，這是在繼承、發展毛澤東的錯誤。中共的接班人高唱自己是三個代表——「始終是廣大人民利益、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如果不能正視史實並吸取大饑荒人相食年代的歷史教訓，這樣的領導者，早已異化到廣大人民利益、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對立面了。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事實。但是，大饑荒的事實證明，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也可以集中力量辦天大的壞事。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壞事，就是證明。鄧小平認為，文革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問題，應當進行政治制度改革，改什麼？如何改？胡績偉在《胡趙新政啟示錄》新書中，認為應當改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只有進行這樣的政改，才可能避免大饑荒、文革這種浩劫在中國重演。

一步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些名言完全適用於大饑荒時期的領導人和執政黨，也適用於今天的和明天的中國領導人和執政黨。編寫、出版大饑荒的書，研究、討論大饑荒的學術會議，都是為了讓健忘的中國人、特別是讓健忘的領導人尊重歷史、從中吸取教訓、防止遺忘歷史慘劇，並防止歷史悲劇重演。這不是為了醜化個人和政黨，大饑荒的真相和罪責還有待繼續揭露。

反思大災荒、大浩劫在中國出現的群眾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給我們的啟示與教訓是：中國人必須樹立公民理念、拋棄由領導人確定某一

個中國人是「人民」還是「人民的敵人」的特殊政治權利，每個公民都有捍衛自己生存權與憲法賦予的自由的權利。知識分子必須站在捍衛公民權利的最前列，體現出公共知識分子的良心、正義，以及捍衛真理與人權的高貴品格。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在人民性與黨性、真理與紀律、群眾與領導的矛盾與鬥爭中，應當站在群眾與真理一邊，不能助紂為虐。

毛澤東講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他在發動重大政治運動、打倒政敵之前，總要先造輿論。1958年批判高級領導人右傾保守等思想的運動，連同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和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結果製造出1960至1962年的大饑荒。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國際上批蘇聯修正主義，在國內先從文藝思想戰線上反對修正主義，並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都是先造輿論，接著便打倒了劉少奇，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副帥鄧小平照此辦理，1980年代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先造輿論，再打倒胡耀邦、趙紫陽，製造六四慘案。到了二十一世紀的2012年，新的領導人又一次重唱毛鄧老調：「反對西化、分化，加強思想領域的鬥爭」，又要按思想分敵我，強化階級鬥爭，這不是為十八大、十九大製造輿論呢？是否又想發動什麼大型政治運動，又將製造新的大浩劫、大饑荒或者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民主化、現代化的新時代。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苦難是沒有國界的。那些受難者，及其所承受的苦難與浩劫，均不可能從人類和歷史的記憶中被抹去、被消失。4500萬大災荒、大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善良無辜的中國人，以及幾千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死難者，不會被有良知的人們遺忘。他們的每一個人，都是大歷史的一部分。作為歷史見證人，我真誠地感謝所有研究大饑荒的學者和支持這種研究與討論的基金會。華

盛頓建立了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雖然沒有刻上大饑荒的逝者姓名，但卻是紀念他們的墓碑。這次學術會議正是紀念這些無辜的、沉默的、悲慘的死難者。中國和世界上的正直而善良的人們，永遠懷念這些受難者。我希望在祖國也能夠儘早地出現大浩劫紀念碑、博物館，並召開相關的研討會，從而使得幾千萬遊蕩在天安門上空的無數個冤魂、亦即大浩劫中的逝者，能夠真正安息！

# 1-2

---

## 中國人是怎樣變成「餓鬼」的

文 | 傑斯珀·貝克 (Jasper Becker) / 翻譯 | 張大軍

如果將中國、蘇聯（列寧和史達林時期有三場大的饑荒）、柬埔寨、北韓、埃塞俄比亞、莫三比克等國的共產黨領導人所造成的饑荒的死亡人數加在一起，總數會接近 9000 萬。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國家領導人犯錯造成最慘痛巨大損失的例證。

我們來看看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 教授的論述，他憑藉對饑荒和發展問題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研究了孟加拉 1943 年的饑荒，當時處於英國人統治之下的孟加拉有多達 300 萬人死去。他還研究了 1960 和 1970 年代埃塞俄比亞和非洲薩菲爾 (Sahel) 地區的饑荒。然後，他得出一種結論：「饑荒都是因為人們普遍沒有獲得應有的權利而導致的。」換句話說，饑荒和貧困的原因，不是政府強制性地奪走農民的糧食並關閉市場，而是政府無法進行足夠有力的干預，並保障農民的應有權利。

後來，森和其他學者一起出版了三卷本的《饑荒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書。這本書沒有討論毛澤東的大饑荒或任何其他共產黨政府執政時的饑荒。不過，我們在 1980 年代就已知道，中國有超過 2000 萬人死於大躍進時期；蘇聯也存在著飢荒，羅伯特·孔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 曾出版了描述蘇聯饑荒的書，即讀之讓人毛骨悚然的《收穫悲傷的季節》 (Harvest of Sorrow)。

最為奇怪的是，有人不願將共產主義和大饑荒聯繫起來，更不要說去研究這種聯繫了。關於戰時的印度或海爾·塞拉西一世的埃塞俄比亞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沒有人曾熱情地加以鼓吹，但毛澤東主義以及第三世界農民的集體化卻被聯合國機構及許多國際援助機構在全世界推廣，並得到很多知名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支援，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蜜雪兒·福柯（Michel Foucault）、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儘管毛主義的全盛期已過，它卻絕沒有消亡。信奉毛主義的叛軍仍在撕裂許多國家，從秘魯到印度、尼泊爾和菲律賓。

森教授是上一屆工黨政府和許多其他政府在發展政策方面的顧問。他認為，「顯然，中國從其威權領導體制的平等主義信念中所獲得的益處大於印度從其民主體制獲得的益處。」他說，這是因為中國人在改善衛生保健和提高預期壽命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我們現在來澄清其中的一些問題。

1949年之前，中國被稱為饑荒之地。不過大部分饑荒的原因都是軍事將領們強行徵用農民所儲存的糧食用於打仗。在1920和1930年代，中國農業的狀況相對較好，中國成為食品出口國。中國的糧食產量在1950年代確實下降，幾十年內都沒有達到戰前的水準。就像約翰·巴克（John Loss Buck）教授的研究所證明的那樣，所謂的增長都是靠操縱統計資料取得的。他證明1929到1933年間的農民的狀況好於1950年代的農民。在1970年代，大部分中國人還處於接近挨餓的食品配給水準。

毛並不是具有原創性的思想者或理論家，相反，他生硬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俄羅斯人在付出代價後發現，這些理論是毀滅性的。當幾千萬人被餓死之際，毛拒絕改變他的觀點，他甚至拒絕聆聽蘇聯專家對他的警告。

比如，《共產黨宣言》提出要「取消土地所有權」，並「特別為農業

生產建立工業化大軍」，這就是中共的所作所為。中共宣傳的 1949 年之後的分地，只是個幌子而已，甚至在中共建政 60 年之後，農民們仍舊沒有獲得他們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中共自 1921 年建黨之後的全部宣傳活動就是徹頭徹尾的、有意識的欺騙。中共從未告訴農民，它在奪取政權之後，會剝奪農民的小塊土地、取消所有的農民市場（事實上是全部的市場）、廢除商品交易、並有效地禁止貨幣流通（代之以勞動券）。

它也未告訴農民，它會拿走他們的房屋、農具以及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一旦人民公社型的集體農莊建立起來後，農民再試圖交易或者出售任何東西都是犯罪行為，並可能被處以死刑。在中共建政的前 30 年，農民們的工作不會獲得金錢的報酬，只分到一些工分或者所謂的勞動券，這恰恰是馬克思的提議。勞動者憑藉這些勞動券，到政府倉庫裡領取所需的物品。在蘇聯，這些工分被稱作蘇維埃代用券。實際上，這意味著他們沒有獲得任何報酬。

如果毛及其他中共政治領導人坦白地說出他們的意圖，他們就絕不可能獲得農民們的任何支持。請記住：中國 50% 以上的農民都是土地的所有者。這一欺騙的嚴重後果無論怎麼誇大都不未過，這也是中共嚴格保密其所做的任何事情的一個根本原因。

中共的許多領導人於 1930 年代在蘇俄受訓。當時，蘇俄正推行集體農莊，食品被充公，幾千萬人死於饑餓或在勞改營裡被迅速處決。在二戰之前，俄羅斯的共產主義就已失敗，而且俄羅斯人只是由於美國的援助才倖存下來。因此，中共非常明白他們意欲何為以及由此而來的後果，但他們不在乎，並拒絕公開這一點，把它藏在自己的心裡。這讓中共成為有意識的大規模屠殺的劊子手。

共產黨的政策絕非受到農民的歡迎，反之，它一旦開始付諸實施，就受到強烈的抵制。因此，中共不得不開展一場大規模的恐怖運動，包括在土改期間未經審訊就公開處決多達 500 萬農民。毛澤東於 1927 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已經說過：「我們必須在所有鄉村

開展短期的暴力統治。」拒絕實施這一命令的幹部們會被殺死。

在 1950 年代初，中共一開始禁止糧食交易並強制徵購食品時，大規模的饑餓現象就隨之出現。首先在中國南方出現飢荒，接著在四川和其他關鍵的糧食富餘省份也出現了。在第一批合作社建立之前，就已有至少 300 萬農民餓死。

隨著集體化計劃的深入實施，農民的反抗力度也增強了。農民們不再種植食物，或者將糧食藏起來，或者將他們的牲畜屠宰掉而不願把它們交給國家。

依據馬克思和列寧的想當然的區分，中國的農民們被分成貧農和富農。事實上許多這類做法都帶著階級鬥爭的偽裝，而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現實都相距甚遠。首先，大部分中國農民的組織形態是家族，而非階級。因此這些區分只不過是殺戮農民領袖，並摧毀所有反抗力量的藉口而已。貧民最終都失去土地，後來像其他人一樣被餓死。

不同尋常的是，在 1949 年之前，散播這些謊言的領軍人物是像陳伯達和康生這樣的「極左人士」。陳伯達在 1945 年寫作了《近代中國農業與中國農村各階級》一書。毛後來就依靠這些人，並分派給他們任務，對毛的黨內對手發動恐怖運動。因此我們必須記住：所有這些政策和想法，早在 1958 年之前，甚至早在 1949 年之前，就已被付諸實施了。

中共在 1950 年代有目的的大肆宣傳的另一個謊言，則是蘇聯集體化的成就。但事實上，在 1950 年代，許多蘇聯民眾就因配給制而忍饑挨餓，其農業產量也從未達到革命之前的水準。甚至在 1980 年代，俄羅斯人還不得不在他們的私人田地裡種糧食以求生存。

因此，關於 1958 年之前的中共統治取得了成功或者受到民眾支持的看法，我們應該放棄。中共的統治實際上是一場災難，只有通過發動類似反右那樣的新恐怖運動去鎮壓異己，毛澤東才得以戰勝抵制他的力量。至於說毛是有原創性的思想者，那純粹是胡說八道。毛只是簡單機械地照搬史達林的一切做法，包括諸如戶口管理之類的關鍵控制手

段。我想，很難說毛有什麼發明創造；當赫魯雪夫試圖擺脫史達林時，毛有的只是模仿和超越史達林的慾望。

在饑荒肆虐橫行之際，出現很多反對毛的活動，如我在書中寫到的在中共的廬山會議上提出不同看法的彭德懷和劉少奇等人。可是我們也要記住，這些人從來都不反對中共的目標和意識形態；相反，他們一生都投身於黨的事業。他們只是希望用稍微不同的方式去做事，也許是步子慢一點。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等其他人士，也一樣都是罪惡累累的協同犯。他們從來都沒有因為幾百萬民眾的死亡而受到觸動，從而拋棄中共，加入反對力量；也沒有人試圖殺死毛，而在德國，至少有些人確實嘗試去刺殺希特勒。這就是為什麼在毛死後，中共從未承認其錯誤或為此道歉的原因。

實情是，黨員們之所以不會反叛，原因在於他們及其家人幾乎總是受到其黨員身份的保護。即使在坐牢時，他們也有獲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特權。雖然在安徽和其他地方的某些村莊，中共的一些低級官員確實餓死了，但整體上，中共為它自己的成員提供保障，其中許多人在饑荒期間過得非常好。

從統計資料上看，所有人都是窮人，因為沒有人有錢，只有分配的票證。然而，若要把中共稱為獻身於某種理想主義的民主平等理念的黨，則是胡說八道。在以特權獲得食物與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並餓死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人們獲得食物或任何其他東西的機會，決定於他們的政治忠誠度。根據各自的階級出身和對黨的忠誠記錄，人們被分成不同的等級。這就是所謂的同甘共苦。

中共至今仍指責達賴喇嘛，說他是所謂的藏族人叛亂的肇因。這也完全是胡說八道。事實上，中共在1956年開始實行、並於1958年進一步強化的一項政策，即摧毀佛教聖地、寺廟和寺院，沒收家畜、珠寶和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其他物品，並將之用卡車運走，這導致了藏族人的微弱抵抗。而抵抗被認為是一場叛亂。

可能有人認為，這一事件的動因是民族仇恨和種族主義。無疑，將藏人種族群體視為猶太人那樣的被毀滅的目標，是巨大的罪惡，是種族滅絕行為。但我認為真相是：中共其實是以相同的方式對待每一位中國人。藏族人之所以覺得他們受到特別對待，那是因為中共在侵入西藏後曾向他們許諾過特殊保護。與此同時，也沒有道理認為，以種族或宗教理由所進行的屠殺，比以階級出身為理由而殺人，是更大的犯罪。

請記住，毛澤東不僅對付他的對手，也轉而對付自己的一些跟隨者，尤其是在大饑荒之後。在饑荒時期，即持續存在著黨內鬥爭，隨後的文大革時期也是如此。一種看法是，中共在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迥異於之前的所作所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這樣的歷史是編撰出來的。在文革之前，曾試圖將毛的政策淡化處理的中共官員就受到迫害，1966年之後的事只不過發生在更大的規模之上並觸及到更高的官僚而已。而毛能夠依賴的，唯有那些對農村所發生的飢荒及其原因一無所知的人——也就是城市裡的學生。儘管受過教育，這些學生是中國最蠢的被愚弄的對象，他們的理想主義，就是對那些被懷疑幫助農民熬過饑荒的人施以報復。這就是我對那些因被送到農村而悲歎失去青春韶華的人少有同情的原因。

更為駭人聽聞的是，中共領導人花費鉅資向柬埔寨、越南和世界上的許多國家輸出毛主義。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麼做，原因是，即便在毛死後，中共還保持著「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以掩蓋人為的災難。即使中國中央氣象台的資料證明，1960和1961年的洪災和旱災少於大多數年份。

同樣令人震驚的還有西方觀察者的表現，這不僅包括在饑荒時期對毛表示擁護的斯諾和密特朗，也包括後來的人。在史達林死後，歐洲和美國的知識分子熱情地崇拜毛，因為他們對蘇聯領導人的道路感到失望。他們希望重返被鮮血浸泡的史達林主義和列寧主義，而非修正主義。對毛主義的狂熱在1968年席捲歐洲（尤其是法國），學生革命領

袖，以及很多人戴著毛的像章、發言時引用毛的語錄，出版以他的照片為封面的報紙（獲得與戈達爾、薩特、福柯、阿爾都塞等人一樣的待遇），還有很多其他的類似做法。美國和歐洲的大學裡，仍然滿是在學生時代是毛主義者的學術人士。許多政黨也是如此，比如法國前總理若斯潘或者歐洲委員會現任主席、葡萄牙的巴羅佐。歐洲的整個新左翼運動基本上都是由前毛主義分子領導的。

如果關於毛及其大躍進的真相當時就為人所知，我不相信這整個運動能夠開展起來，也不相信像胡志明那樣的毛澤東盟友會獲得支持。如果人們知道毛澤東應該對幾千萬農民的死亡承擔責任，那麼這些人就不可能獲得任何道義上的領袖資格。

此外，關於大躍進、大飢荒的災難程度的理解不足，我們還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後果：如中共的現任領導人中，許多人本是狂熱的毛主義分子，但卻掩蓋了其真面目。薄熙來曾是一位熱衷暴力的紅衛兵，他所在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在文革期間曾被打死。由於毛和他的忠實信徒李井泉，四川有將近一千萬人餓死（譯注：重慶在大躍進時期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像薄熙來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在重慶位居高位，並要求民眾唱紅歌、回味過去的金色歲月呢？

# 1-3

## 大躍進是一場戰爭

文 | 高王凌

關於大饑荒發生的原因，目前已有許多說法，例如「災害」、「高徵購」、「吃食堂」等等，對於若干局部的或地區性的問題也有了不少分析。但是大躍進作為一個整體，一有全有，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不是可以孤立對待、可以忽略的。研究它的關注點應該集中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既不能只盯著政府（政策）的一面，也不是僅僅關注其下面的層次（如村莊內部）；它既不是純政治史的，也不應僅僅是純社會史的研究對象。作為一個「事件」，它不是偶然出現的，而自有其來龍去脈。

本文即是對大躍進和大饑荒研究的一個「綜合」，雖不能「一視同仁」的分析各種因素，但希望予以梳理，把它們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為其後的研究提供一個框架，藉此瞭解大躍進「是什麼」，和大饑荒「何以」發生？

單單講哪一兩條，可能都不足以說明問題。歷史學家黃仁宇曾經指出：研究中國，在分析之前應該先有一個綜合。我相信它也適用於此，否則，還不知道大躍進「是什麼」，一上來就陷入一些具體的分析之中，可能正是研究的大忌。因此，我們或有必要做一個初步的嘗試，展寬視角，看看究竟都發生了一些什麼，把事情最終推到這一地步？

大多數學者都同意，大饑荒的發生泰半是由人為使然。譬如劉少奇提

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說；也有人用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論」提出「天災皆人禍」說。儘管二者間仍存在重大區別，但已足以構成我們立論的一個基點，使我們把目光集中於所謂「人事」上來。

## 1 | 新政府的「道義經濟」

提出這一問題的原因是，事情怎麼會在「一夜之間」忽然變了？過去革命鬥爭的對象是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現在卻指向了普通勞動人民，幹部們也都轉了性，變得「窮兇極惡」起來，這到底是因為什麼？

有國外學者指出，歷史上一向存在著所謂「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或「道義經濟」。如果我們借用這一名詞，可以說中共建政以來的新社會也有它的「道義經濟」（任何朝代如果沒有一定的「道義經濟」，恐怕都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在最初一個時期，道義經濟曾達到了它的顛峰，當然，它的對象是不包括所謂「地富」、「反革命」等「階級敵人」在內的。

不錯，共產黨一向宣稱自己是為勞苦大眾打天下、坐天下，新中國建立的又是一個工農聯盟國家，勞動人民前所未有地成為了國家的「主人」。「不餓死一個人」，成為當時一個響噹噹的口號，及爭取和維繫人心的重大措施。這種強調也許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當時國家權力的急劇增長，以及宣稱即將建立的新的社會藍圖。如1953年的「統購統銷」政策，把一切「餘糧」都掌控在政府手裡，即為歷來傳統統治之所無。顯然，在這個新社會裡，並沒有「私人社會」的位置，因此政府就不能不負起更大的責任，承擔更大的義務。

在一些早期的地方檔案裡，我們發現，當時，農民的每一次「非正常死亡」都有詳細報告，包括其過程、原因、結果，而死亡如果與政府有關部門或個人有關係，涉及到政府責任，則必做出相應的處理，即便是省級官員。如廣西第一書記陳漫遠就因為荔浦、橫縣等地發生飢荒而被撤職處理，但這種情況，到了1956、1958年以後，幾乎就見不到了，等到了大饑荒年代，就更是沒有任何記錄。

例如在 1958 年大躍進的高潮中，事情的處理方式就完全改變過來。1958 年 10 月，毛澤東曾針對雲南發生的「陸良事件」（前後死亡 39712 人）寫批示說，這是「一個教訓」，警告「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但大部分關於飢荒的報告則無下文（如九月份安徽靈璧縣關於餓死不下 500 人的報告則查無下文，不了了之）。最近有文章披露說，在廬山會議以前，河南東部等地已發生餓死數萬人的重大事件，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北、山東，也有類似的情況。

當時的地方幹部對死人這件事情的態度已經無動於衷。在山西的調查中，一些地方的農民反映說：「大躍進以來，人不值錢了」；聽說大兵團作戰的社員病了，某鄉長說：「打仗還怕死人？死幾個不要緊。」某地淹死了兩個人，從鄉裡反映到縣裡，幾次都沒人搭理。在湖南，有的縣委則提出：「搞大躍進死幾個人沒有問題」或「搞民主革命都死了人，搞社會主義革命死幾個人是難免的。」有的公社書記經常「教育幹部」說：「強迫命令比不幹好，搞大躍進是要死幾個人的。你們不要做膽小鬼！」還有的公社主任常拿著槍，比著群眾喊槍斃；或在幹部會上佈置：為了完成任務，可以損兵折將。……在湖北等地的調查中，我們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

據當年國家公安部的統計數字，建政後幾年內，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一直下降，但在 1958 年的上半年卻有了增長，當年的死亡率約近千分之十三。由此可見，1958 年將比前一年多死亡 300 餘萬人。然而這一統計報告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1959 年初，河南、湖北的死人事件亦未被重視，也許還有許多類似的事件，但尚未見於報導。這些事實，將導致我們重新認識廬山會議。

就這樣，從有災必救、不死一人，到造災、諱災、不救災，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也可以說，共產主義制度，無論是它的意識形態，還是它的政治結構，其中存在著兩重性，一方面說「為人民服務」、「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宗旨」，另一方面，在政治，尤其是經濟上，又大幅度地

削減人民的個人權利。二者之間似又互為依託。這個過程貫穿於從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並最終導向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所以毛澤東曾說，這個制度最可怕！如果不警惕，共產黨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

即便是這樣，在隨後幾年的時間裡，「共產黨政府不會餓死人」的宣傳說法再度出現，從內部報導上看，農民又一如既往地把它作為一種主要的訴求（奇怪的是，這時正有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餓死）。就在這種背景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村從大饑荒中走了出來。這種「自以為是」的某種「感覺」，或許可以解釋，農民對「人民政府」的態度，以及他們為什麼「不反叛」？

## 2 | 1955年的集體化高潮

上述變化有其機制上的原因。一項對農業集體化的研究指出：對於集體化的「成功」，原來人們以為，農民是在「高潮」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入社，跟上黨走的。現在看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實際上，有大批農民是在「高級化」和「並社」的「高潮」中做出入社的決定的。這個決定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入社會（指社會主義）」、「吃官飯」！他們的態度就是：不是非讓我入社不可嗎？那我就「入」，我就給你「抗長活」了！……就這樣，入社的農民就由1955年初的14%，達到了1956年的幾乎100%（而且是「高級化」了）！

這樣的「國營化」（或曰「長工化」）恰是一個「不祥之兆」，甚至可以說是「兇險無比」。黨沒有想到，農民的態度是給政府當「長工」了，而且比長工還消極；農民也沒有想到，政府既沒有給他發放一定的可靠的「工資」（有如往日的雇工或現下國營農場的農業工人），而且在對農民實行了全面控制之後，卻出現了一個由「承擔後果」到「不承擔後果」的轉變（或者政府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後果的可能發生）。舊社會的長工尚能夠勉強糊口，通常情況之下也並不至

於陷入饑災，但到 1958 年大躍進，這一特殊因素卻終於使得大饑荒無可避免。

也可以說，集體化運動的高潮，使農民進入了「道義經濟」的邊緣狀態，而不僅僅為以後的「躍進」提供了一種制度保證。這時，在對立雙方之間，什麼是能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那一條重要的「界線」已經不復存在。也許，「集體化」和「長工化」本身還不足以把中國農村推向災難，而這種不瞭解（或互不瞭解）及建立在它上面的「莽撞實驗」，卻終於達到了這點。處於這種情況下的農民，只怕就要「大難臨頭」了。

### 3 | 1956 年的小躍進

我們本不奇怪，最初的農村革命為什麼不能停止在土地改革，但很少有人想過，合作化為什麼不能停止在「初級社」、「高級社」，是什麼邏輯非要導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不可？

一項研究發現，1956 年，中國各地曾出現過一個「小躍進」，1958 年大躍進中發生的所有事件，在這一年裡差不多都出現了（除「大煉鋼鐵」這一件事之外）——如並大社、政社合一、高指標、瞎指揮、虛報數字、大辦農田水利、社辦工業商業、濫伐樹木、作物棄之任其霉爛、生豬等生產下降、平均分配、擴大留糧和社員福利、鋪張浪費、開支過大、起伙房辦食堂、組辦「共產主義農業社」、拆房併居、大搞掃盲等文化建設、分配不兌現、糧食高徵購、拚命苦幹和勞動強度過高、出現傷亡事故和非正常死亡、出現饑災、疾病並餓死人、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罵社員、「一平二調三收款」、「挖底財」、收「金銀銅鐵錫」、沒收個人生產生活資料、扒墓平墳、控制錢款和個人消費、城市供應緊張、出現「盲流」，等等不一而足。儘管在規模上尚無法比之大躍進，但二者在性質上卻是相同的。

這就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全盤集體化」之後，就會「自發」或「半自發」地出現一個「躍進」？它們之間有著怎樣的邏輯關係？

不難看出，發動大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的不盡人意，初級社保留土地分紅，勞動所得即已下降，收入往往不如單幹農民；高級社取消土地分紅，並未解決這一問題，因勞動力增大投入，工分「貶值」，所以只好講「平均主義」、「不計代價」……直至後來開始講「共產主義」。另一方面，50年代中期，隨著城裡幹部和工人待遇的大幅度增加，一時之間，反差顯著，這更刺激了農民提高生活水準的願望。這些都產生了巨大的壓力，由此來說，大躍進帶有明顯的「還願」性質。也可以說，就像蘇聯當初曾經過的那樣，有多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國在集體化之後拿出一個令人目眩的「成績」。可能正是這一原因，再加上體制上的變化，終於使集體化最終邁向大躍進。

就在這次農業「小躍進」中，農村勞動力在政治力量的要求下，大數量、超負荷、高強度地投入生產，因此出現了眾多的傷亡事故和非正常死亡。同時，也出現了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各種後果。其中之一，就是農業大減產。但就像人們多知曉1956年國民經濟的「冒進」（及「反冒進」），而不太瞭解農村的「小躍進」一樣，1956年的農業大減產，以及次年農業的繼續減產，都被掩蓋住了，也或多或少與後來一樣歸罪於「自然災害」。一項研究表明，1956年，中國糧食減產數量當不少於400到500億斤，約合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幾，這是共產黨掌握政權六年以來糧食生產的最大下降。無疑這是「小躍進」的結果之一。

也許是由於各方面條件的不夠成熟，以及當年「反冒進」的結果（也包含蘇共二十大的影響），「小躍進」被制止了。但直到1957年反右派以後，它又捲土重來，並終於在1958年形成了所謂的「大躍進」。

#### 4 | 1958年大躍進

我們不能不將事情追溯到1955和1956年。1955年中，毛澤東在「集體化大風暴」中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提出了在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面的許多宏偉目標。1956年初，發表《高潮》序言，在序言提出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於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通

過)、「多快好省」方針(見於1956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和「促進委員會」(以上被並稱為三個口號)。同期,還討論了「十大關係」問題,打算在蘇聯道路之外,尋找一條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用毛本人的話來說,即: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

1956年的「冒進」及「小躍進」的被制止,使毛大為光火。因此在1957年發生了整風、反右事件。毛說,反冒進在前,右派進攻在後,與右派相距大概50米遠。隨後,在八屆三中全會毛批評了反冒進,通過「四十條」,從而奠定了大躍進的思想基礎。毛說: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八屆三中全會上作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隨即各地以「四大」形式(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批判「右傾保守」思想,並掀起了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建設中投入的勞力,最初有幾千萬人,最後發展到一億人。人民以為,只要像戰爭年代那樣,動員群眾,大搞群眾運動,什麼事情都能辦好。接著,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號召說: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提出「苦戰三年」的口號。二月,政治局擴大會上,毛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利害。五月,八大二次會議確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將「四十條」規定的十二年任務一下子縮短到三年,並把它與超英趕美聯繫起來。繼1956年的小躍進之後,再接再厲,終於發動了1958年大躍進。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大躍進帶有「偶然性」,似乎是「可有可無」的。我自己過去也曾持有類似的看法;由於1962年實行「隊為基礎三級所有」之後,農村制度大體退回到公社化以前的高級社階段,就更增強了這種印象;甚至在不少有關集體經濟的研究中,「省略」了大躍進(及大饑荒)這段歷史。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都值得重新考慮。

粗看起來，1958年與1956年的不同之處，即在於1958年建立了人民公社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形式。這當然是重要的不同，但「大躍進」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它是所謂「共產主義（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驗」嗎？這一說法儘管在知識界仍佔有主導地位，但據我們調查瞭解，並不符合事實，也並未說到點子上。

1958年8月，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毛澤東提出：「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幹呢？」這表示，大躍進要像戰爭年代一樣，不計代價、不計報酬、不怕犧牲，甚至不顧生命的代價和犧牲，來實現一個生產上的大躍進。毛隨後又說，「當然，死人也不要過多，例如中國死一半人，或三分之一、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就不好了。」他還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特別加寫了一段話，說：「我們現在就是要建立農業產業軍。」有證據顯示，這正是毛在中國農村集體化問題上一以貫之的想法。

什麼是「農業產業軍」呢？這在經典著作中很少有進一步的解釋。如果我們不把目光只局限於文字資料，而到鄉間去走一走，就會發現它到底是怎麼回事，並瞭解到農民的思想感受和他們的看法。就會瞭解到「大兵團作戰」是產業軍，「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等三化是產業軍，「供給制」、「吃食堂」是產業軍，「打破罐頭罐頭」、「留個箱子好行軍」也是產業軍——所有這些，都不是指向所謂的「共產主義（實驗）說」，相反，只能以「產業軍」來解釋，也就會發現，正是「產業軍」製造「瞎指揮」，製造「高指標」，製造「浮誇風」，製造「共產風」，製造「強迫命令」、「幹部特殊化」……通過這些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而不是什麼「教義」，就會發現，「產業軍」製造大混亂、大饑荒。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即「大躍進」、「產業軍」是否打破了「蘇聯模式」呢？在這個問題上，恐怕也存在不同的意見。實際上，類似的做法在蘇聯「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就開始實行過（即所謂「軍事共產主義」），只是沒有把它運用在農村而已。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毛很多方面是

學習蘇聯的，而且，他好像還是《共產黨宣言》的一個忠實執行者呢！

因此人民公社成立不過二個月，用毛本人的話講，就是「天下大亂」，不得不「降溫」，開始了一個不斷「糾偏」再「糾偏」的過程。毛說：「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在內，是個冒失鬼。」到1959年3月他又說：「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結果卻不幸而言中……

中共建政以後，政府接管了太多的權力和責任，而並未考慮到自身能否承擔。在大躍進中，中共又通過公社化、軍事化、共產、並居、大兵團作戰、消滅家庭等手段，這些做法不啻為是對農民的一場最激烈的戰爭，將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毀棄殆盡。其結果是消除了原有的社會保障機制。

經過長期的誤解之後，人們可能終於發現，「傳統社會」及其各種機制機能被嚴重貶低了。傳統社會本是一個非中央集權、非統一劃一的社會。這個社會裡，成為現代生活一大主角的政府還遠遠沒有後來那麼強大有力，人際關係也沒有發展為日後的那種金錢至上和惟利是圖。它是一個有著更多人情味的，重視親戚、鄰里、同鄉、朋友關係而非高度政治化一元化的社會。這個社會裡也存在著形形色色因地而異的鄉俗、慣習、各種各樣「貓兒匿」，可以實行一定程度的社會救濟和多種互助。那時的人，也可能比「金錢至上」的現代人道德高尚……但徹底反傳統的結果，這些特點都被一掃而光，只剩下唯一的一家——政府，平日無事尚可，一旦出了問題，就可能是一場大災難。

相應地，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反行為」也進入了新的階段，一句話，他們「不幹了」。其結果，自然是生產的進一步下降和出現另一種人為的「天災」。藉此，我們也可以回答——為何一些當代研究認為那「三年」並無什麼自然災害或災害不大，而當時各地卻有大量嚴重的災害的報導？——這一令人困惑的問題。

最後，我們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糧食問題上來。因為正是對它的處理，直接導致了大悲劇，因此糧政不能不成為問題的癥結和關注的重心所在。

對於糧食生產這一老大難問題，到合作化後，毛澤東的態度卻是十分樂觀。1956年初，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提出：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1957年10月，又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說：「現在一人三畝地太多，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盡夠吃。」這留下了一個「伏筆」。儘管1956年和1957年連續兩年減產，若干省份都發出了糧食緊張的資訊。

大躍進發動後，隨著「高指標」的下達，「浮誇風」開始出現，1958年8月毛在視察途中，聽說徐水縣能打11億斤糧食後，他說：「你們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開始考慮生產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他還稱讚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園田化的口號。隨之在北戴河會議上便調集專家，研究怎樣消化糧食，並提出了「三三制」的設想，即在全部耕地中，以三分之一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閒和種植綠肥，三分之一植樹種草。

話說回來，早先「統購統銷」的提出，本是糧食緊張的一個產物，在主觀願望裡還保存一個隨著糧情好轉，逐步提高農民消費水準的企望。因此，1957年4月，毛曾說：「統購統銷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準備除經濟作物區以外，大多數合作社的糧、油、肉由合作社自理」；1958年8月，毛在安國指示：「糧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當年年底，中央也批准了「1958年糧食增產較多，完成了國家的徵購任務以後，可以分一部分糧食給社員，使每戶都有三到五百斤儲備糧」的意見。可見，中央並不是要一味地「高徵購」到底。既使當年徵購數字高達1500億斤，與當時報告的糧食產量（7500億斤）相比，還是

一個較低的數值（約佔 20%），從帳面上看，尚給農民留下了較大的餘裕。

但是到 1959 年初，毛的態度卻有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他要求制訂一個「嚴格」的糧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萬年」不變。這看似不經意的一個改變，對當時的糧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此開始的一場嚴重的糧食爭奪戰，徹底打破了原有的「道義經濟」，把農民推到空前無助的地步。

導致毛思想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可能就是當時的農產品收購和調運出現問題，導致城市和工礦區供應緊張。無疑，這正是大躍進所造成的局面，類似的情況在 1956 年也出現過，只是程度不等罷了。1958 年裡，中國城市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長，而在國民經濟全面「躍進」的形勢下，國營糧食部門的低效率更是暴露無遺。因此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指出：「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存在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最近四個月內（指 58 年 11 月到 59 年 2 月），全國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時提出，關於糧食問題，應「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制，一萬年還是如此。」並說：今後幾年內不要宣傳糧食問題已「解決」了。

於是，政府在農村推行了一種新的制度之後，卻不再承擔它所帶來的後果。隨後，為了掩飾它在政策上的失敗，開始諱災、匿災、不救災，而不顧農村的實際情況。所以才出現了 1959 年初的豫東事件和 1959 年底的信陽事件。廬山會議即是這種態度的一個最為明顯的表現。據說，直到 1960 年，中央政府才開始改變態度，但「三年困難」中最大一輪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已經發生。

從 1955 年到 1959 年這五年之中，中共發生了三次重要的黨內鬥爭，並導致了黨的重大危機。第一次是 1955 年的批「小腳女人」，在一次黨的全國會議之後，又召開中央全會，三個月內連開兩次大會批鄧子恢；第二次是 1956 年的「反反冒進」，矛頭指向周恩來，1958 年初再

次發作；第三次就是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反右傾」，批彭德懷（再以後就是「文化革命」了）。從表面上看，在廬山，彭德懷如果不寫那封信，也許就不會發生毛那樣激烈的反彈，以至於產生一系列嚴重後果。但實際上，在 1959 年上半年，問題已十分嚴重，很多情況至今仍未有披露（也有待於我們去挖掘），彭德懷的信僅只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廬山會議早期的「糾左」，是遠遠不足以解決大躍進「下馬」的問題的。

這樣看來，這些爭論圍繞的就不是什麼「速度」和「快慢」問題了。在這背後，還有很深刻的問題，如體制問題、政策問題等等。也許，這就可以理解，1958 年周恩來的檢討為什麼那麼苦澀和艱難了。

話說回來，從 1959 年初到其後的多次反瞞產運動，從糧政史的角度來看，就是要查清建政以來歷年都沒查清的糧情。政府最後發展到挨門上戶地去搜索，結果，糧食的底子是「查清」了，可農民的家底也就「光」了，從而不得不走上大饑荒的道路（在沒有了糧食的情況下，即使還存在某些機制，政府也沒有能力來履行其職責了）。這打破了農民「生存條件的最低界限」；政府也不再為此負責。擺在大家面前的，已不是一般的負擔輕重問題，而是留給農民的那點東西，還能不能讓他們活下去？在這種情況之下，諱災不救和繼續高徵購，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待到大饑荒之後，政府不得不改變政策，重新實行「三定」，即有一部分糧食即便搞不清楚也不再追查，並把相應的一定數量的「儲備糧」留給農民，使他們改變在生產上的「不合作」態度——為此劉少奇甚至表示：「單幹總比不幹好。」（也許毛可以說：「讓步總比不讓好」）——這是政府做出的又一次妥協和讓步，當然不止於在糧政一個方面，直到「農村包產到戶改革」更大的讓步為止。

在這一過程中，食堂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近年來，有海外學者特別強調食堂的作用，甚至把它列為大饑荒的「元兇」、「罪魁禍首」，或至少把它與「高徵購」等同看待。不錯，食堂的存在確使農村的情

況更為惡化，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把剩下的那一點糧食交給農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儘管仍不夠吃，卻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相應的它也可減少甚或避免幹部的貪汙）；反過來說，正是在食堂裡，幹部才能掌握社員的「吃飯權」；食堂的存在，在毛的心裡恰是一個能夠維持「勞動軍」表面形式的重要措施，所以一直堅持不願更改……

但我認為，並不能因此就把食堂的作用過分誇大了。例如，在那些食堂辦得最多的省份中，除河南、四川、安徽之外，湖南、雲南、上海等地死人並不特別的多；在一些食堂辦得很多的省份（如安徽），其不同地區死亡情況也大相徑庭。這一個例子即表明，在不同地域（省、縣、村）之間和同一地域之內，都可能存在頗不相同的情況，這就為各種「偶然」、「例外」、小區域的個案研究留下了很大的「餘地」。它們當能回答許多不同層面的問題。

## 6 | 小結

就「大饑荒的發生」來說，本文只是一個初步的「綜合」，也可以稱為一個大略的研究綱要。它的關注點仍集中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既不是只盯著政府（政策）一面，也不是僅僅關注其以下一層，如村莊內部這一層面的問題。不錯，過去的研究太偏重於上層領域，現在則有必要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下層，進行現場的、口述歷史的調查研究，但這也帶來了所謂「地方性知識」的「自足性」問題，反而忽略了我們研究的並不是什麼孤立的鄉村事件，而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這樣一個大的問題。

顯而易見，大躍進是「一整塊」，一有全有，在相應的綜合之前就把它細碎分割，是不合適的。我們看到，如果說中共建政以來曾存在著一種「道義經濟」，那麼從 1956 年起，這種局面被打破了。從此直到 1961 年前後，進入了一個「超經濟強制」的時期，頗像蘇聯早期曾推行的那樣，只是把它進一步推廣到了農業方面。所以，可以說大躍進

是從 1956 年開始，前後經歷了約五年左右。探討大躍進及大饑荒的前因後果，也許更應重視其發生——並不僅僅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首先瞭解它是什麼，然後才是以後的一切，以及它在各方面的影響，等等。因此，研究計劃的一個重心，當是面對政府一方的「制度安排」，農民在本能意義上的直接的反應和行為，比如面對大躍進和大饑荒時，他是怎麼想和怎麼做的？他「出手」過嗎（1959 年初毛稱之為「反抗」）？還是什麼也沒有做，只是呆呆等著事件的結果或躺著等死？他都有過怎樣的一些想法？即便他們什麼也沒有做……為此，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政府方面到底都做了什麼，才知道「外力」從何而來，性質如何，「反作用力」又是怎樣，它朝向何方而去？以及在雙方關係上，它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和影響？經過政府和農民的「兩敗俱傷」之後，關係又是如何「修復」的（或是經過某種「互動」將制度修改）？……我相信，這些研究是必要的，而且，只有更深入地瞭解後者，才會進一步瞭解前者，反之亦然。

也許，我們應充分地認識到，大躍進是一場「戰爭」，是中共建政後農民和政府間的最為慘烈的一場惡戰——儘管它是不對稱的，不是發生在敵國之間，而是發生在政府與它的人民之間，一方有著全副武裝，從武裝力量到意識形態，一方則幾乎一無所有。這類似於是兩軍交戰，儘管沒有硝煙瀰漫的戰場，但它仍成為一場特殊的戰鬥。

但從目前的狀況來說，大躍進研究連 A、B、C 都還沒有搞清楚（我在調查中就多次感受到這一點）。如仍有人堅持認為，大躍進是一場共產主義或所謂平均主義的試驗。其實「共產」是有的，但何來什麼「主義」呢？

「大躍進」又不同於一般的歷史問題，它是一個「事件」研究，涉及面很寬，相當全面，決不能只考慮農民一個方面，其上下左右，包括「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以及「意識形態」，甚至不同地區間的異同等等，都不能不顧及到。

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有幾個事件，如「文化革命」和「大躍進」，可

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化革命研究正盛極一時，但在我看來，大躍進可能更為重要，更具挑戰性。這樣說有幾條理由：大躍進是因，文化革命是果，可以說沒有大躍進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沒能實現的目標，文化革命在跟著追求，如「五七指示」，可見大躍進並非事出偶然，而已成為一種理想的代表；文化革命多在上層，大躍進及於上下；文化革命主要是在城裡，大躍進卻不只是在農村，在農村裡發生的一切，在城裡也有相當的表現（我見到過不少有關的材料）；而且，大躍進也不是沒整幹部，反而整得很多，包括高級幹部……

面對如此具有挑戰性的一個任務，我想，我們還應該下更大的力氣。它是那樣的嚴肅而艱巨，因此，從研究一開始到以後很長時間，我們可能都需要追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為什麼要研究它——大躍進和大饑荒？

## 第二章 大饑荒與共產黨的統治模式

# 2-1

## 執政者怎樣應對危機？ ——大饑荒期間中國領導人的作為

文 | 楊繼繩

任何一個政府，不管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只要有一點理性，面對全國大饑荒的嚴重危機，總得採取措施應對。以毛澤東為首的執政集團怎樣處置危機呢？

他們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他們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一，在所有制上退讓，將一度實行的「公社所有」甚至「全民所有」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二，糾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甚至要求退回刮「共產風」時掠奪的農民財產，但真正退賠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三，下放城市職工 2000 多萬，減輕城市糧食壓力，但實際將部分壓力轉到農村；四，他們認為大饑荒的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通過「整風整社」的政治運動，在農村大搞階級鬥爭，把大饑荒的責任推給基層幹部；五，1959 年春天允許農民私養家畜和擴大自由地，1961 年開始允許搞責任田，但遇到意識形態障礙，這些擴大農民自由的措施後來都當作右傾加以批判。

當時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

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其中最主要的是「責任田」（即分田到戶，也稱包產到戶，當時稱為「救命田」），在饑餓的逼迫下，責任田在各地的推廣面很廣。但是，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選擇。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

在兩個方面執政者還執迷不悟，繼續堅持錯誤：一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 1 | 農民餓死的時候，糧庫裡有大量的糧食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並沒有像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那樣「開倉放糧」，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只採取兩項措施：一是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三天內送到這15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是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澤東認為這是「暫時的（兩個月）緊急危機」。對這麼大面積的危機，毛澤東沒有採取全局性的措施，還是當作局部問題交給地方自己處理，特別是沒有在減少糧食徵購上鬆口。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1959年4月23日）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

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還在發展。其實，當時饑荒正在迅速發展。26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閒時少吃，忙時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實際上餓死了一百多萬人），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一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徵購問題上鬆口。

1958-1959糧食年度（即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徵購數達1125.44億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在全面出現大饑荒的1959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徵購，徵購數反而比上一糧食年度高出88.85億斤，高出比例為7.89%（從生產年度看，1959年的徵購數比1958年高出103.18億斤，高出比例為9.45%）。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1959-1960糧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1959-1960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67.56億斤（見表1、表2）。在饑民口中奪糧，是一件十分殘酷的事，而且也是很不容易執行的事，因而才出現了鮮血淋淋的反購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饑荒發生了一年半以後的1960年秋，中央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徵購數。1960-1961糧食年度，糧食徵購數從上一年度的1214.29億斤，降低到780.84億斤，降低了433.6億斤（從生產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164.4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269.2億斤。

表1 大饑荒時期國家對農村糧食的徵購和銷售（單位：貿易糧，億斤）

徵購與銷售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從農村徵購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銷售給農村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資料來源：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表 2 生產年度的糧食徵購數（單位：貿易糧，億斤）

年度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數量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資料來源：同表 1

1960年1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執政者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一份報告說：「糧食徵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經收到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計劃1075.8億斤超過了6%，按糧食季度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億斤，完成計劃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1959-1960糧食年度，收到1200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在批轉這個文件時，一條批語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可見，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3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是在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的情況下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59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4億斤，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可見這個制度何等僵化！官員何等冷漠！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1960年6月30日，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和表3中的297.71億斤差不多。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佈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河北1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內蒙5.49億斤；遼寧7.89億斤；吉林5.08億斤；黑龍江20.41億斤；陝西15.96億斤；甘肅4.81億斤；寧夏0.72億斤；青海1.25億斤；新疆4.45億斤；山東22.44億斤；安徽7.05億斤；浙江

12.37 億斤；福建 2.72 億斤；河南 25.07 億斤；湖北 13.22 億斤；江西 7.14 億斤；廣東 7.40 億斤；廣西 2.84 億斤；四川 41.61 億斤；貴州 11.49 億斤；雲南 17.43 億斤。

表 3 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57-58 年	58-59 年	59-60 年	60-61 年	61-62 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資料來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的一百多萬人死於饑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 25.07 億斤糧食存在庫裡，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 13.22 億斤糧食存在庫裡。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800 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 50 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地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 2 | 農民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食品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中國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 1957 年相比，1959 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 2500 萬噸，而 1959 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 415.75 萬噸，比 1957 年的 209.26 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 4）。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 415.75 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 1.2 噸原糧。415.75 萬噸貿易糧相當於 500 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1959-1961 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 164 公斤，1957 年為 204.5 公斤。按 1957 年的標準算，500 萬噸原糧足夠 2450 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 1960 年，還繼續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1959 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1960 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 5）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1959 年 4 月 19 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 2.6 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 3、40 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品質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突擊收購運動」的「斷然措施」造成了各地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璧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 1960 年 4 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

表 4 1956-1965 年間中國的食品出口

(單位：活畜：萬頭，活禽：萬隻，紅棗、香菇：噸，其他農產品：萬噸，啤酒：萬箱)

種類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糧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鮮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豬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凍豬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凍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凍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產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5	9.25	12.00
蘋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柑桔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豬肉罐頭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頭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頭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紅棗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1981年內地版) VIII-47到VIII-50頁，《中國經濟年鑒》(1982年海外版) VIII-47到48頁，花生仁出口數比內地版多一些。

管雞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繳，全家七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六個雞蛋上繳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准買鹽、煤油、菸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1959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303000萬元，佔出口計劃的110.8%。比1958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28.9%，其中，豬肉供應出口23.3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二萬噸，為出口計劃的125%；鮮蛋出口5200多萬斤，冰蛋出口6208噸；活家禽出口954萬隻，凍家禽出口7022噸。此外，還出口蘋果10.2萬噸，桔柑9.1萬噸。

表5 1956-1965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數（萬噸，原糧）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糧食合計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麥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資料來源：同表4。

除了出口食品以外，執政者還慷慨地支持「兄弟友好國家」和「兄弟黨」。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給那些生活水準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61年2月2日，中阿雙方在北京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貸款協定》的規定，交換了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糧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換文。根據上述議定書和換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設化學、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25個項目方面，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供應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糧食和其他商品。這些，都是從中國人的牙縫裡擠出來的。1962年，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劉少奇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 3 | 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繼續大搞大躍進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1960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

1958年大煉鋼鐵全面搞亂國民經濟以後，十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佈1800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3、4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又提出了鋼產量1800萬噸的指標。到了經濟嚴重困難的1960年，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除鋼以外，1960年，在反右傾的政治氣氛中，其他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1960年，固定資產投資達416.58億，不僅高於1959年，還比大躍進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資產投資中，93%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見表6）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這個會議批准了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

表 6 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年份	總計	基本建設投資
1954	102.68	99.07
1955	105.24	100.36
1956	160.84	155.28
1957	151.23	143.32
1958	279.06	269.00
1959	368.42	349.72
1960	416.58	388.69
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301頁。

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0萬噸，糧食產量6000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風等「五風」又刮了起來。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不得不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對1960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8月和12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1860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拚消耗、拚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但是，這次全會還堅持「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1900萬噸，比上年增長1.6%；原煤產量43100萬噸，比上年增長2.6%；糧食產量要求達到4100億斤，比上年增長10.8%。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準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準。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工業生產中的被動局面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9月15日），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廬山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因此，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 4 | 極權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面對全面危機，糾正錯誤卻十分遲緩、波折、低效，決策者拒不認錯，官僚們只求自保。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何況他們的人格並不完美。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

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演成全局錯誤。

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資訊很多是假的。用假的資訊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一切資訊，控制了一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資訊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沒有橫向資訊的參照，縱向資訊就難辨真假。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資訊，只反映上級愛聽的資訊。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資訊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資訊，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撿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的資訊不全面、不確切，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困難是暫時的，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1959年的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三月，杭州會議號召：要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一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裡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餓死人的情況已很嚴重，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的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1960年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

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彙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一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佔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彙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麼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你站在天壇圓丘的圓心大喊一聲，一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麼資訊，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資訊。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一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導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導，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一些地方還用紅鉛筆畫了杠杠。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儘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一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一位市領導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麼！」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裡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

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麼？」這是毛澤東明知自問還是無知？極權制度下只有千人的諾諾，哪能容一人之諤諤？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 1958 年 1 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瞭解情況，但聽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 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 40 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德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不容易糾正錯誤。在極權制度下，不讓別人指出錯誤，誰指出錯誤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連彭德懷地位這麼高的人那麼溫和的批評都不能容忍，還有誰敢指出錯誤、批評錯誤、深入分析錯誤？還有誰敢提出扭轉局面的政策？在極權制度下，只有錯誤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才會有糾正的轉機；或是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改變政策；或者通過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改弦更張。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統治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誰為這場災難負責？現在幾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當然，作為國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是「始作俑者」，他的霸道作風都是造成災難的原因。但是，僅停留在追究他個人責任這個層面上，是膚淺的。在當時的制度下，沒有民主決策機制，沒有暢通的資訊傳送管道，沒有制度性的糾錯機制，如果把別人放在毛澤

東的位置，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對執政集團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一段精闢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癒出愈多……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 1848 年的資本論，解決 1958 年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1956 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掛帥、大躍進、人民公社。」

這些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1959 年 7 月 19 日，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將羅隆基的這些話「印發各同志」，作為反面教材。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才是真正的遠見卓識！

## 2-2

# 大饑荒的始作俑者和犧牲者

文 | 馮客 (Frank Dikötter) / 翻譯 | 張大軍

### 一 | 灰色地帶

從 1958 到 1962 年，中國陷入到一種無法想像的地獄式的悲慘境況，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將整個中國拋入大躍進的狂熱當中。大躍進的目標是在 15 年內趕超英國，當時的英國仍被視為工業強國。毛澤東認為，憑藉中國最大的資產——數以億計的勞動人口，他能夠讓中國超越其競爭對手。

為了追求一個烏托邦式的天堂夢想，集體化在各個領域內得以推行。村民們被納入到巨大的公社體制之中，這預示著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躍進的開始。農村人的工作、住房、土地、財產和牲畜被充公。在集體食堂，食物按照各人的表現用勺子分配，公共食堂也成為官員用以迫使民眾遵從中共所有指令的工具。水利運動強迫全國各地半數的村民連續多個星期為大型蓄水工程勞動，這些工程常常遠離農民們的家鄉，他們也沒有足夠的食物和休息時間。留下來耕田的人被命令從事富有爭議的農業創新活動，比如深耕密植。

由於私有財產的取消和盈利動機的喪失，這些實驗導致了糧食的大減產。然而，地方官員們非但沒有發出警報，反而被上級施壓，被迫在彙報時作假，提交的資料說，糧食產量越來越多。為了保住他們的職位，官員們相應地將更大比例的收成上繳國家，從而讓村民在饑餓線

上掙扎。這一實驗的最終結果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殺戮，至少有4500萬人因工致死、餓死或被打死。

「饑荒」甚或「大饑荒」一詞，常常被用來描述毛時代的那些災難性歲月，不過，該詞無法描述（除無數個人生命之外的）貿易、工業、住房、社會以及自然環境等等在激進的集體化運動中所遭到摧毀的各種不同方式。鍋、盤和農具被扔進自家後院的爐子，以提高中國的鋼產量——它被看做帶有魔力的進步標誌之一。牲畜的數量急劇下降，不只是因為被宰殺而賣到出口市場，而且因為它們大量患病和挨餓——儘管言過其實的肥豬計劃許諾說，要讓每一家餐桌上都有肉。由於原材料和供應品的配給狀況很糟，而且由於工廠廠長們故意違規增加產量，浪費問題浮現出來。由於所有人都偷工減料，以無止境地追求更高的產量，工廠生產出的劣質產品零散地堆滿工廠專用鐵路的沿線。腐敗侵入生活的各個層面，侵蝕著從豆漿到水壩的一切物品。運輸系統緩慢低效，後來更完全癱瘓，無法滿足計劃經濟的要求。價值數億人民幣的貨物堆積在食堂和宿舍裡，甚至大街上，其中的許多存貨腐爛掉或銹蝕掉。人們很難設計出比這更加浪費的體制；在這一體制中，農村塵土飛揚的道路使得糧食無法被收上來，而當時的民眾則四處搜尋樹根或吃泥土。

企圖跨越進入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後果是，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對財產最嚴重的毀壞，遠遠超過二戰期間的所有轟炸行動。多達30%或40%的房屋變成廢墟，許多房屋被推倒，以造肥料、建食堂；遷移村民、將道路修直，以為所謂更美好未來騰出空間；或者只是懲罰房屋的主人。自然世界也沒有逃脫傷害。我們將永遠也無法瞭解大躍進期間森林覆蓋率減少的程度，不過，在有些省份，對自然持續和高強度地掠奪使得高達50%的林木消失。河流和水道也受到影響；在全國各地，數以億計的農民付出很大的傷亡和經濟代價而修建大壩和運河，但基本上都被廢棄不用，甚或變成危險之物，造成滑坡、河道淤積、土壤鹽化和毀滅性的洪水。

漫不經心地採用「饑荒」一詞，可能會支持這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死亡現象之所以出現，是一個未經深思熟慮且執行得不好的政策所意想不到的後果。大規模的殺戮通常不會與毛澤東和大饑荒聯繫在一起，而且，在與柬埔寨和蘇聯的災難相比較時，中國總是受益於它的比較正面的形象。不過，正如新的檔案材料所顯明的，強制、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基石。

由於許多人為的原因，人們過早地死去，這些原因包括酷刑、隨意處決以及故意的餓死。很多人年齡太大、太虛弱或者病得太重，以至於無法工作掙口糧，因此死去；但有人是被選擇地殺死的，因為他們或是富有，拖了政策的後腿，或者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或者只是不受食堂裡掌勺人的歡迎。更有無數民眾被遺棄不顧，從而被間接殺死。地方官員們被迫重點關注數字（而非民眾），以確保完成中央計劃者分派的目標。

我們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會看到，有許多人在經歷過各種艱難和曲折後生存了下來，從而駁斥了一種看法，即大饑荒中的人們只是被動的受害者。中共當局試圖在海內外炮製出一個中國社會井然有序的形象，但事實上，中共在施行其偉大計劃時，不但沒有成功，反而遇到一定程度的反抗和破壞，這些反抗和破壞是在任何民選政府國家都聞所未聞的。人們原有的印象是，中國是一個受到嚴格管制的共產主義社會，高層所犯的錯誤讓整個社會機制陷入停頓，但通過檔案和訪談，形成的印象與此不同：中國社會處於解體狀態，人們只能各盡所能地追求自己的生存。激進的集體化運動產生了非常大的破壞效果，以致於在各個層次上，人們都試圖規避、削弱甚至是利用中央的那個所謂的偉大計劃，中共試圖取消人們的盈利動機，但暗中，這些動機完全獲得人們的認可。隨著饑荒的蔓延，普通人的命運越來越需要依靠其撒謊、獻媚、隱瞞、偷竊、欺騙、竊取、搶奪、偷運、榨取、扭曲或以其他方式騙過國家的能力。

羅伯特·塞維斯（Robert Service）指出，蘇聯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不

在於讓整個體制陷於停頓的障礙，而更多在於那些讓體制無法完全停頓下來的力量。「完美的」共產黨國家不可能為人們的合作提供足夠多的動力，而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認可盈利動機，它就將自身毀滅。除非不停地觸犯黨的路線主張，沒有哪個共產主義政權能長期執政。

有些歷史學家可能解釋說，這些求生手段就是人們「抵抗」的證據，或者是「農民」用以反抗「國家」的「弱者的武器。」不過，使用這些求生手段的人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在饑荒時期，差不多從上到下的所有人都偷竊過，這些現象是如此嚴重，以致於如果將它們算作「抵抗」行動的話，中共早就崩潰了。初看起來，那些人的抵抗似乎具有道義上的感召力，有人可能會對此發出讚美之聲。但是，在食物非常缺乏之際，一個人的所得常常即為另一人的所失。當農民們將糧食藏起來時，村外的工人就會餓死。當工廠工人往麵粉裡混沙子時，便會有人吃到沙粒。將常常是徹底絕望的求生手段加以浪漫化，就是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事實則是，集體化運動迫使所有活下來的人在某一時刻都曾做出嚴重有損於道德的舉動。因此，日常的墮落與大規模的毀滅攜手同行。普利莫·列維（Primo Levi）在其有關奧斯維辛的回憶錄中寫道，活下來的人中很少有英雄：當某人在一個由生存法則支配的世界中將自己置於他人之上時，他的道德感就會發生變化。在《淹死的和獲救的》一書中，列維將之稱為灰色地帶。

## 二 | 死亡的方式

### 1 | 悲劇不只是三年

首先，在大災難過後，共產黨廣為宣傳因而被長期接受的一個謊言是，令人恐怖的饑荒只持續了三年時間，即從 1959 到 1961 年。然而早在 1958 年初，由於高強度的勞動，加上飯食供應無法讓人吃飽，就已有 人死去。大躍進一詞首次被採用，是在 1957-1958 年間冬季開始的節水運動。毛澤東認為，民眾是中國真正的財富，在春耕之前的冬季農閒時節，他們應該被動員起來改造鄉村。在貧瘠北方的許許多年的窮苦村莊，表層土壤微薄，需要將水引來灌溉；而處於亞熱帶的南方則

多水患，需要用大壩和水庫控制住洪水，如果能夠做到這些，糧食產量會大幅增長。因此，整個中國有幾千萬農民參與到灌溉項目中來。官方宣傳說，依靠集體的力量，他們能夠在幾個月內實現其先輩用幾千年才完成的目標。人們被分組派到遠離家鄉和親人的建設工地，被指派連續多個月從事讓人精疲力盡的勞動，有時甚至整夜勞作不得休息。他們的飯食很差，衣不蔽體，承受著風霜雪露寒暑的考驗。在擔心被貼上右派標籤的官員們的催促下，有些人被推到饑餓的邊緣。

早在1958年2月，雲南就發生了首批餓死人的事例。據報導，到那年夏天時，僅在陸良一縣就有大約13000人死去。當地領導陳勝年固執地堅守黨的路線，甚至組織軍事武裝，帶著皮鞭，在鄉村的街道上巡邏，確保村民都外出到田地裡或西沖水庫上勞動，連患病的都不放過。死亡開始時，屍體還可以裝在棺材裡下葬，幾個月之後，就多到只以席子遮蓋，扔到建設工地附近的溝渠或池塘裡。在中國各地，為節水計劃所展開的群眾動員持續了幾年，幾十萬因饑餓而虛弱不堪的村民被奪走生命。但這一切並沒有在1961年結束，直到1962年年末（如果不是更晚的話），還有村民持續死去。在處於李井泉鐵腕統治之下的四川，公安局自己於1963年整理出統計數字，確定前一年度有1.5%的民眾死去；這意味著單單四川一個省份，就有大約30萬人非正常死亡。

## 2 | 「先下手為強」

另一個普遍的錯誤看法是，政府錯誤地從農村拿走了太多的糧食，因為它假定農業收成遠高於實際收成——這一虛假認知最多只是在1958年秋季才部分符合事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共非常清楚，它正在將其治下的民眾餓死。在1959年3月25日於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命令中共收取三分之一的糧食，遠超之前的數量。毛在會議上宣稱，「沒有足夠多的糧食吃，人就會餓死。讓一半人死去，這樣更好，另一半人就能吃飽了。」

中共無情搜刮糧食的原因之一是，在大躍進最初的狂熱中，中國開始到國際上大肆採購。由於到 1958 年底時需要付款，在毛的支持下，周恩來及其同僚毫不手軟地催促農村完成越來越高的征糧目標，以便滿足對國外的付款要求。他們處心積慮地設計出一種方法，在農民將糧食儲存起來之前，就將糧食拿走。正如毛在上述錦江飯店會議上所命令的，「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譚震林被中央書記處安排負責農業工作，在幾個月後（六月），他在一次有關徵購工作的電話會議上澄清了這句話的含義。他解釋說，糧食應該在農民能夠吃上之前就拿走，速度是關鍵，因為各方都試圖先拿到糧食。「不過，『先下手為強』的說法只適用於縣和地區級黨委書記，如果應用於比此更低的級別，它就很容易會導致誤解。」一年之前，譚震林在 1958 年 10 月對中國南方的一些領導人講話時，就已清楚表示需要採用強力手段：「必須與農民做鬥爭。如果害怕採取強制手段，那就說明思想意識上出了問題。」

### 3 | 毛澤東政策的執行者

在中央領導的鼓動下，由於害怕因過於軟弱而受處分的地方官員們，便開始採取越來越有力的強制手段。因為沒有勞作的動力，結果，暴力肆虐的局面變得更加惡化。在 1959 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之後，黨內進行了大清洗，之後出現了更多的暴力以及大多數的非正常死亡。當時，彭德懷以及其他對大躍進政策表示不滿的人，被毛及其附庸者斥責為陰謀反黨、叛國和反人民。每一層級，無論是省、還是縣、鄉、隊，都進行了殘酷的清洗，用強硬、毫不留情的幹部替換了表現不佳的幹部。前者會見風轉舵，順應從北京刮來的激進風，以從中謀利。在 1959 到 1960 年見，雖然黨員總數從 1396 萬猛增至 1738 萬，卻有大約 360 萬名黨員被貼上「右派」的標籤或因此受處罰。在一種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道德氛圍中，許多人時刻準備，心甘情願地成為毛主席的工具，將所有是非對錯的觀念擱置一邊，以實現毛所設想的目標。

不論 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是何等重要的轉捩點，但許多黨員其實在早先的一場清洗運動中已經被替換，這場清洗恰巧發生於 1957 年末大躍進發動之時。眾所周知的是，1957 年夏天，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結束後，有 50 萬人——其中很多是學生和知識分子——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從事繁重的勞動。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幾十萬名批評經濟政策的黨員遭到了鎮壓。其中，有幾個省級領導人被處分，其職位被毛的忠實擁護者所取代。到了 1958 年的前幾個月，幾乎各處都發現了「反黨」集團。在 1958 年 3 月，毛澤東向省級領導施壓，他引用列寧的話宣稱，「最好是我來做獨裁者。各省的情況都類似：是江華還是沙文漢做獨裁者？在浙江，沙文漢受江華干擾，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廣東、內蒙古、新疆、甘肅、青海、安徽、遼寧、河北與雲南，還有其他省。」

因為不允許批評糧食徵購政策，黨內的反對聲音被迫沉默下來。在雲南，當局的查究導致大約兩千名黨員在 1958 年夏季之前就被解職。在高級幹部中，每 15 人中便有一人被撤職，包括 150 多名縣級以上的有實權的幹部。陸良縣的領導人因為在前一年遷就於「農民對糧食的右傾要求」而受到嚴懲，接替他位置的人是忠誠毛的人陳勝年。上面已經提到，陳則裝備武裝力量，用皮鞭確保所有農民都參與到大躍進中來。

#### 4 | 暴力

各地都有無數個像陳勝年這樣的官員，把使用暴力作為常規的控制手段。在這場運動中，暴力的使用並非偶爾為之，以懲罰少數人來恐嚇多數人。相反，暴力被有系統地採用，普遍用來打擊那些所謂的遊手好閒、礙事或者發出抗議之人，更不用說那些偷盜之徒，然其實針對的正是大多數村民。一方面，種田人的所有積極性都被摧毀，因為土地屬國家所有，種植的糧食常常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收走，家畜、農具和工具不再屬於種田人，甚至有時連他的住房也被沒收；另一方面，地方幹部面臨著更大的壓力，他們被要求完成甚至超額完成計劃，因此不得不無情地施壓給勞動者。在這種結構下，有些地方的村民和

幹部都變得非常殘忍，隨著強制的範圍和程度不斷加大，導致暴力不斷升級。有無數報導表明，全國範圍內有多達一半以上的幹部拳打或棒擊人民群眾，那本是他們要服務的對象。

毆打普遍存在，地方官員發明了各種恐怖手段以侮辱和折磨所謂的「掉隊」的人，棍棒只是其中一種。隨著鄉村滑向饑餓的深淵，為了讓農村中挨餓的人去地裡出工，只得對他們施加更嚴厲的暴力。製造痛苦和羞辱方面的手法似乎層出不窮：人們或被扔進池塘，或被捆綁，或被脫光了衣服。冬天，村民們赤身裸體地站在寒風中；夏天，人們被迫雙臂伸開，站在耀眼的日光之下。另有人則被迫跪在石子或碎玻璃上。從南方的四川到北方的遼寧的廣大地區之內，這種事均發生過。

「掉隊」的人們被熱乎乎的針灼傷，或者像牲口一樣被發燙的鐵棒烙傷。在四川，還有人在被澆上汽油後點著，其中的一些人被活活燒死。至於用滾燙的熱水澆向民眾，也較為常見。由於燃料短缺，更為普遍的做法是向人身灑糞便。由於偷竊了一個紅薯，劉德生（音譯）滿身都被灑上尿液，他和妻子與兒子都被迫鑽進糞堆裡。由於他拒絕吃屎，人們用鉗子撬開他的嘴。三周之後他死了，耳朵和鼻子被人砍掉。報到中央領導人那裡的還有王子友（音譯）的案情：他的一個耳朵被削掉，大腿被鐵絲綁住，重達十公斤的石頭壓在他的背上，隨後有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這些懲罰乃是因為他挖了紅薯。在湖南的報告裡常常提到這些事：有時，夫妻之間被迫互相毆打對方，有些人被毆致死。有人被模擬處死和模擬埋葬嚇住。自然也有人被活埋。據粗略估計，非正常死去的人中有 6% 到 8%，也即兩到三百萬人被活埋、折磨或毆打致死。

## 5 | 食物被當做鬥爭的工具

幹部們有做出選擇的空間：他們可以選擇改善村民的生存境況（雖然會有各種攔阻），也可以努力實現中共的目標。然幾乎沒有可能二者得兼。多數人都選擇了阻力最少的路徑；一旦做出了選擇，暴力就開

始按自己的邏輯展開。在普遍貧困的條件下，讓所有人都活下來是不可能的。村裡留存的食物都不夠可靠的農民吃的，而且在 1959 年廬山會議後大規模打壓的氣氛中，食品短缺問題似乎沒有馬上解決的希望，因此增加食物供給的一個方便法門是除掉病弱之人。計劃經濟已經將個人貶低為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或者是為了實現更大的目的而可資利用的資源，就像煤炭或糧食一樣。國家涵蓋一切；個人則一無所有，其價值一直由工分來估定，並取決於其挖土或種稻穀的能力。鄉下的村民們受到牲口般的待遇：他們必須要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所有這些都是集體的負擔。這些冷酷計算的邏輯結果就是將那些被認為不配活下去的人犧牲掉。對散漫之人、體弱之人以及其他沒有生產能力之人的有針對性的殺戮，就有多餘的食品供應給那些通過勞作為當局做貢獻的人。暴力是應對食品短缺問題的手段之一。

不過，最常用的鬥爭工具是食物。因為在 1958 年夏之後，隨著人民公社和集體食堂的推行，所有食物都在幹部們的控制之下。由於幾乎所有地方的鍋和盆都被拿走，幹部們對食物供應的控制就更嚴了。饑餓成了首選的懲罰方式，甚至超過了毆打。于文明（音譯）是楚雄縣的一個公社副書記，他曾用棍棒將六人打死，可是他主要的懲罰工具卻是讓人挨餓。他的兩位桀驁不馴的兄弟被餓了整整一個星期，最後，他們瘋狂地在森林裡找樹根吃，不久餓死在那裡。他們中一人的妻子有病在家，她也被禁止到食堂吃飯。整整有 76 人被處以挨餓 12 天的懲罰，許多人因此餓死。

同樣的事發生在更大的範圍內。一位檢查人員在描述四川幾個縣所發生的情況時寫到，「病重得不能勞作的社員被剝奪吃飯的權利，這加速了他們的死亡。」在第一個月，配給的食品減少到每天三盎司糧食，接著在下一個月又減少到兩盎司。最後，那些要死的人被剝奪了一切食物。在江北和永川，「幾乎所有的人民公社都扣壓食物。」在一個為 67 人服務的食堂裡，有 18 人在被以疾病的理由禁止吃飯後三個月內死去。

雖然可靠的資料很少，不過一組檢查人員在仔細考察過四川內江縣的很多村組後認為，餓死的人中有 80% 曾受到剝奪食物的懲罰。事實上，就連那些在食堂就餐的人，他們所得到的食物供給也常常少於他們所應得的。正如一位農民所評論的那樣，鍋裡的勺把子能夠「看人行事。」很多受訪人都憶及這一種現象，即掌管食堂的人故意歧視那些他眼中的「壞分子」。如果碰到好工人，勺子就深入到鍋底，而對於那些他所不待見之人，勺子就只稍稍掠過鍋面。

很多報導都說病人也被迫到田地裡勞作。一名叫趙學東（音譯）的幹部曾迫使 24 名患水腫病的村民參加勞動，除四人外其餘的都因此而死了。在金昌公社，那些能夠幸運地得到醫療的村民，在出院後立即被當地的黨委書記驅使去幹重體力活。全國各地都有人因為病重無法工作而經常被剝奪食物供應，官員輕易地做出這些決定，他們認為患病就是對當局的抵制。在最差勁的地方，甚至那些當日完成任務的人也只有一碗稀粥喝。

## 6 | 自殺

自殺成為一種四處蔓延的現象。除被殺害的人之外，還有不計其數的以某種方式受苦受難的人，他們中的有些人選擇終結了自己的生命。通常，疼痛並非促使一個人終結其生命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村民面前遭受羞辱或難堪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對此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是，某某由於偏離了黨的路線，「因擔心受罰而自殺。」「被逼死」或「被逼到牆角」也是用來描述自殺的慣常說法。在上海的奉賢縣，在 1958 年夏的短短幾個月內，在被殺的 960 人中有 95 人「被逼無奈，選擇自殺」。與此同時，另有他人死於疾病得不到醫治、酷刑或精疲力竭。據非常粗略的估計（同樣，相關的統計數字極其不可靠），本可避免的死亡中有大約 3-6% 死於自殺，這就意味著大躍進時期有一到三百萬人自殺。

狂熱分子和遊手好閒之輩共同塑造了當時當地的氛圍。為了實現更高的生產目標，狂熱的中共人士開始偷工減料，降低標準，忽視安全並濫用設備。另一方面，在工廠和田間，普通人則試圖以集體偷懶的方式抵制每一次新的生產運動。漠不關心和怠忽職守的工作態度無所不在，儘管這緩解了來自上級的壓力，卻也對生產安全產生負面的影響，因為人們對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毫無責任感。集體化導致了日益嚴重的食品、衣服和燃料短缺，隨之出現了危險程度高很多的自救方法：包括在茅草屋裡燒爐子和偷竊安全設備；這又進而導致出現更多的事務。工人的極度疲勞問題只能讓問題更加惡化，因為有人在鍋爐或轉動的輪子旁就能睡著。

另外還有這樣一個簡單冷酷的計算：無法達標將毀掉管理人員的職業生涯，而違反勞動安全標準則只會帶來輕微的懲罰。人命不值錢；與安裝安全設備或落實勞動法規的成本相比，人命要賤得多。畢竟，在爭取更美好未來的戰鬥中，死幾個人算什麼？外交部長陳毅將大躍進比作戰場，堅持認為少量的工業事故不應拖革命的後腿；他不屑一顧地說：「這不算什麼！」

由於安全問題被視為「右傾保守主義」所關注的事，工業事故便大量增加了。貴州省黨委估計，在1959年初的事故中，死亡數量比一年前翻了17倍。精確的事故資料不得而知，因為很少有檢查人員會談及死亡問題，給大躍進潑冷水，與此同時，企業則經常隱瞞事故。廬山會議後被整肅的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後來估計，1958年致人死亡的工業事故總共達五萬起。

每一次死人的事故中都有多人僥倖逃生。可是在饑荒時期，甚至輕傷也可能置人於死地。工人們很少能得到工傷補償，並經常被醫療費用壓垮或者被開除工作。在鄉下，食品可能會被強盜式的幹部用作懲罰工具，即便因患病而缺工也會受到縮減食物配給的懲罰。傳染病、營

養不良或者局部的病痛相互強化，使得病人們在求生鬥爭中處於劣勢地位，這進一步又常常將他們陷於食品匱乏，從而不斷地惡性循環。

## 8 | 疾病

在饑荒中，並非所有人都死於饑餓。最初，諸如腹瀉、痢疾、發燒和傷寒這樣的普通病症就會致人於死。每一種疾病的確切影響是很難確定的，不僅因為中國幅員廣闊，各地的情況多種多樣，而且還因為衛生部門的檔案是最成問題的——在幾百萬人被貼上「右派」標籤的恐怖氣氛中，很少有什麼事比疾病和死亡更敏感了。另外，衛生部門本身也遭到集體化的重創，接著又因饑荒問題而不堪重負，隨後便告崩潰。即便大城市的醫院都缺乏資源，更不要說鄉下的醫院了。到1960年時，醫生和護士都在為各自的活命而苦苦掙扎。比如在南京，多達三分之二的護士和醫生都患了病。他們之所以患病，是因為醫院成了傳播疾病和死亡的催化劑。一份報告指出，食物中「經常」能發現蒼蠅和其他寄生蟲，導致工作人員和病人患上痢疾。

雖然我們獲得的資訊有限，可是卻發現中國的大饑荒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即流行病的發病率低。傷寒（也被稱為斑疹傷寒）雖然被提及，不過似乎沒有讓很多人喪命。通常，大約10-15%的饑荒受害者可能會感染上傷寒和回歸熱（relapsing fever），可是中國的情況卻並非如此，這很可能是因為當局迅速地將傳染病者隔離起來。一般情況下歷史學家們所發現的與饑荒相連的其他重大傳染病，在中國的檔案中也沒有記錄。雖然資料表明，中國的飢荒中，天花、痢疾和霍亂的發病率要高一些，但到目前為止，很少有檔案材料能證明成百萬的人被重大傳染病所擊垮，而且饑荒過去幾十年後，由地方黨委發佈的官方公告也沒有頻繁提到它們。相反，凡提及疾病的地方，固定的句式總是：「營養不良所造成的水腫導致多人死亡。」

檔案記錄顯示的情況是，中國並沒有單單受困於過去通常只與饑荒相連的兩三種傳染病，反而是被各種各樣的疾病所折磨。疾病普遍增多

的原因是集體化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包括人滿為患的幼稚園、骯髒的食堂、危險的車間以及設備不足、過於擁擠和人員不足的醫院，同樣重要的原因是人們普遍在挨餓。1958年，湖南有約7500人死於麻疹，是前一年的兩倍，因為家長們被迫將他們的孩子留在人滿為患的幼稚園。1959年，小兒麻痺症患者的數量比1958年高15倍。腦膜炎的發病率翻了一倍，原因同樣是寄宿幼稚園極其糟糕的條件。肝炎患者數量飆升。奇怪的是，它感染的是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而非鄉下的窮苦大眾。河北省各城市有五分之一的人在1961年患上此病。瘧疾到處肆虐。1960年夏，無錫部分地方有四分之一的村民患上此病。血吸蟲病也到處流行，這種病由一種生活在血液和肝臟裡的寄生蟲引起。儘管缺乏可靠的統計資料，鉤蟲也普遍存在，它們大量吸食人血，致人患上貧血症。問題非常嚴重，以至於湖南的衛生部門在1960年設定一個目標：僅僅在八個縣，就需要治癒300萬患病的人。

集體化的毀滅性後果加重了多種病情，包括中毒，因為人們饑不擇食。村民們到樹林裡挖植物、果子和果仁吃。他們吃光山上的樹根和野草。絕望的村民為了填飽自己的胃四處尋找腐爛屍體，翻遍垃圾堆，扒下樹皮，並最終盯上了泥土。他們搜尋到的有些野草、蘑菇和樹根有毒。村民很少真的明白他們吃的是什麼，因為常常是孩童們夜間溜出去找野草吃。一位倖存者回憶道，「那時根本不可能出去找自己知道可以吃的野生植物，所有的草我們都吃，凡是綠色的植物我們都吃。只要知道那些植物沒毒，我們就不在乎。幾乎所有的東西我們都吃。」富含澱粉的樹薯粉成為絕佳的含醣食物，可是其葉子含有劇毒，並不能生吃。由於沒有正確地浸泡和烹飪，廣西約有174人在吃過它後一個月內便死去。雜生植物蒼耳子也有毒，會導致噁心和嘔吐，以及頸部肌肉的扭曲，此後還會出現脈搏跳動過快、呼吸困難等症狀，甚至最終會導致死亡。這種毒草曾經在十天之內奪去北京160人的生命。就在首都的郊區，飢餓至極的人吃掉了染病的牲畜。在懷柔縣，餓壞了的村民經常吃染上炭疽病的綿羊。

當沒有其他東西可吃時，人們就開始吃一種叫做觀音土（以觀音菩薩命名的泥土）的軟泥。一旦吃進肚裡之後，觀音土就變得像水泥一樣，將胃吸幹，並吸盡腸道裡的所有水分。於是，吃了的人就無法排便。四川省渠縣的每個村莊都有幾個人痛苦地死去，因為他們的結腸被泥土阻塞。

在許多其他饑荒中，疾病才是死亡的主因。與之不同的是，大饑荒中確實有人是餓死的。中共雖然嚴密地監控傳染病，然而，集體化也導致了組織混亂和農村衛生保健體系的崩潰，而且即使從最低標準看，農村的衛生保健體系也是粗陋不堪的。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農村人比其他地方的人餓死得更快，這減少了病菌侵蝕已經遭到破壞的免疫機體的機會。唯一的食品都在集體食堂，而地方幹部控制著這些食品的分配。由於面臨完成具體目標的巨大壓力，許多地方官員就將食物當作鬥爭的一種工具。我們上面已經講到，不工作的村民領不到食物，那些無法繼續工作的人常常變得精疲力盡，死亡很快就尾隨而至。

### 三 | 活法

#### 1 | 饑荒期間的歡宴

與饑荒的深化並行的是，享有特權之人急劇增加。儘管清洗一直在持續進行，黨員的數量則增加了 50%，從 1958 年的 1245 萬人增加到 1961 年的 1738 萬人。黨員們知道如何讓自己享受優待。饑荒時期歡宴的辦法之一是頻繁地開會，因為開會的一切需用都由政府提供。另一個小伎倆是組織「產品測試」會。1960 年 3 月的一個上午，遼寧營口的 20 多位幹部在開會時有條不紊地享受當地的一系列產品，先從卷菸開始，然後是罐頭、土特產、水果和餅乾，同時還喝了大量的白酒。等到一天結束時，他們酒足飯飽，其中的三人更是嘔吐起來。

在饑荒期間城市和鄉村黨員會議的大吃大喝問題受到普遍詬病。胃口大開的官員們常常被稱為「豬八戒幹部」，這個稱號來自於中國的小說名著《西遊記》，其中一個主角豬八戒半人半豬，而且以其懶惰、

好吃和貪慾著稱。不過，農村裡的村民們對此並不總是袖手旁觀。1958年的農村出現一股屠殺牲畜的潮流，農民們殺死雞和牲畜，以表示對人民公社的反抗。在恐懼、謠言和榜樣的作用下，他們沒有上繳他們的財物，反而選擇將自己的勞動果實吃掉，或者將肉儲存起來供將來之用，或者在黑市上賣掉他們的財產並存下部分現金。

普通人有時也能夠大吃大喝，因為他們非常幸運，得到幹部們的照顧，後者利用其所有的政治手腕，讓自己的部門變成在饑荒中保有豐富供應的獨立王國。另一方面，有些城市的某些部門對食品供應的監管不善，這意味著工人們偶爾會有足夠多的東西吃。河北省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工人們有時從一個食堂轉移到另一個食堂，一路下來會連續吃幾頓飯。食堂大廳裡的一張桌子上，經常堆滿農產品，東西甚至都堆到地板上。另一個令人尷尬的場景是，有些工人將食品帶回宿舍，但其中很多食物還是都浪費掉了，地板上有一層黃黃的黏糊狀的東西，那是人們踩踏過的被遺棄的饅頭。

## 2 | 瞞天過海

不管其社會地位如何，從上到下，幾乎所有人都人為地破壞分配體系，暗中完全認可中共試圖消滅掉的人們的盈利動機。比起黨外人士，黨內人士更能利用這個體制為自己謀利，他們想出無數個具有創新精神的手法欺騙國家。比如，武漢石油採購站以幾百噸油氣煤為代價，換取一場為其領導幹部舉行的豪華宴會。這些做法遍佈中國各地，到各地採購的代表們繞過僵硬的供應體系，形成了單獨的業務體系。採購代理人建立一張複雜的社會關係網，與當地官員宴飲，贏得他們的支持。代表們為了完成其服務對象所提出的採購清單，時時刻刻都在做交易。賄賂很普遍，沒有人知道在這一影子經濟體中藏有多少交易。不過一個調查團認定，僅只1959年4月，未經官方批准從南京運到其他地方的物品數量就達850噸，有幾百個部門參與其中，有些部門偽造了運輸許可，為了賺錢，他們使用假名字，印製虛假的證件，甚至以軍隊的名義運貨。

弄虛作假的記賬方法能夠隱瞞挪用資金的行為。會計們發明出根本沒有發生的支出項目，有時虛假報賬的金額高達一百萬人民幣。河南洛陽的一家軸承廠建了一個體積為 1250 立方米的游泳池，在記賬時把它作為「減熱裝置」。從國有銀行無節制的借款也是一個慣用的伎倆。李富春在 1961 年夏天提及一筆 30 億元人民幣的赤字時指出，許多部門從銀行借款用於吃喝。另有人直接從國家那裡偷，連取巧的會計作假都不需要了。南京東站的一個大型會議廳就是在車站主任杜成亮（音譯）的領導下完全由偷來的材料建成的，它成了有組織盜竊的見證。

所有人都在做交易，就連普通人也做交易，這形成了計劃經濟的悖論之一。然而，隨著饑荒變得日益嚴重，饑餓問題日漸侵蝕日常生活的社會機體，人們開始盯上自己所珍視的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拿來出售，沒有什麼東西不能出售的，就像磚頭、衣服和燃料被拿來交換食物一樣。在河北省的一家大工廠裡，三分之一的工人靠借貸過活。有些人深陷債務的泥潭之中，只好賣血求生。農村的情形比這還要糟糕無數倍。僅就湖北黃陂的一個區，就有大約 3000 個家庭將他們多餘的衣服拿到武昌賣，同時他們也在那裡乞討食物。在河北的滄州縣，三分之一的村民賣光他們所有的傢俱，有些人甚至將賣掉自己的房屋。在四川長壽縣，人們拿自己所有的一切做易貨交易，包括身上的衣服。

還有人在死之前賣掉他們的子女，常常是賣給那些自己沒有子女的夫婦。吳景喜（音譯）將自己九歲的兒子以五塊錢賣給一位陌生人；這五塊錢只夠買一碗米和兩公斤花生。他的妻子為此傷透了心，哭得如此厲害，導致她腫脹的雙眼失明。兩個孩子的母親王偉彤（音譯）將其中的一個兒子賣了一塊五毛錢和四個蒸饅頭。當然，還有很多人壓根就沒有為他們的孩子找到買主。

### 3 | 偷偷地幹

在集體化的偽裝下，中共官員憑藉民兵力量，採取各種措施赤裸裸地剝奪他們所有能想得到的人民的財產，特別是在農村，因為農民通常

無力反抗如狼似虎的幹部。這是對一場對人民的消耗戰：隨著每一波新的掠奪浪潮，私人擁有財物的微弱希望都在萌芽狀態時被碾得粉碎。大多數人對公開的搶劫很少有什麼應對辦法，不過他們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受害者。許多人想出一整套求生戰略，最常見的策略是怠工，即完全按照自然的慣性行事。高音喇叭裡可能正在高聲讚美勞動，宣傳招貼畫可能在吹捧超額完成計劃的模範工人，然而漠不關心才經常是工廠廠房的主流情緒。在北京一個普通的 40 人車間裡，有半打人在冬天會經常性地圍坐在爐子四周取暖，同時其他人則在大白天離開工廠去採購物品或看電影。幹部們沒法掌控住所有的工人，並懲罰每一個違規行為。

在農村裡，因為每天都必須拚盡全部精力過日子，怠工是農民能夠生存下來的重要因素。農民們要在幹部們監視的眼光下下地幹活，不過，一旦幹部們走出視線之外，他們就放下農具坐在路旁，等著當天的收工。在有些鄉村，農民們整個下午都在睡覺，並在田野的主要路口安置放哨人員。在有些鄉村，由於領導層比較寬容，有的全家人抱在一起連睡幾天，就像整個冬季都在冬眠。

盜竊現象很普遍，其發生頻率取決於需要和機會。在盜竊國家財產方面，運輸工人處於最有利的地位，因為成百萬噸的物品都要經過他們的手。在武漢港的第六碼頭，全部 1200 名員工中有超過 280 人曾有系統地盜竊過貨運火車上的物品，同時卻裝著在從事維修和維護工作。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鐵路站，864 名雜務工裡面有一半會偷東西。學生會從食堂偷東西。在國營商店，櫃檯店員們會小心翼翼地篡改收據，或者以劣等次品的名義將東西據為私有；商店後院裡的幫手們則全力搜羅儲藏室的物品。

城市裡的機會最多；農村的需要則最大，那裡的許多農民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熬過饑荒。在生產周期的每個環節，村民們都試圖留住一些糧食，躲避國家的徵購。這種做法首先出現在農田裡，甚至早在麥子或玉米完全成熟之前就已出現。村民們借助於「吃青」的傳統做法，

在民兵們不在現場時悄悄地從田間割下麥穗或玉米穗，用手攆掉穀子並搓碎，然後將青青的麥粒或玉米粒生吃下去。在糧食成熟前就吃掉的做法在北方更為普遍，因為躲在濃密的玉米地或者密密麻麻的麥地比躲在稻田中要容易一些。玉米的成熟期也更持久，能夠留在地裡的時間更長，這就使得人們能夠更多地偷食它們。

一旦糧食被收割並裝包之後，不管有沒有當地檢查人員的配合，它們就被摻上水分後賣給政府。但就廣東一省，150萬噸國家糧中差不多就有三分之一的糧食水分過高，在亞熱帶南方簡陋的儲存條件下，這無疑會導致糧食的腐爛。糧食賣給國家後，在運送過程中也可以成為許多人的偷竊對象。廣州的運貨人會用竹筒取走糧食並裝進沙子，看守國有糧倉的門衛也偷糧食。當糧食經過這麼多人之手而最終到達公社食堂的飯桌時，人們不僅會問，這時到底還剩下多少。蘇州當地檢查人員估計，一磅大米在抵達最終目的地時只會剩下大約一半。在食堂做出一碗大米之前，大米已經在穀倉和運輸過程中被偷走，會計人員、幹部以及最後的廚師也都會從中揩油。

當地方官員與農民合謀時，就可能出現集體的偷竊、謊言和欺騙，從而讓農民免遭饑荒最惡劣的影響。有些村莊保存有兩套記錄，一本真實的資料留在村裡；另一本的資料是假的，為了應付糧食檢查人員。然後，糧食必須要藏起來，這在從農民手中搶糧的瘋狂而血腥的國家運動中並非易事。就拿其中的一個例子來說，在湖北的義堂（音譯）公社，大約有110噸糧食藏在假牆後面，棺材裡或者衣櫃中。有些地方的當地官員在糧食收割後立即將其分發，並敦促農民們在民兵到來之前盡可能多地吃掉這些糧食。村長們悄悄地將糧食分給農民，幫助很多人活過大饑荒，這種事情全國各地都有。在河北易縣的一個公社，每公頃所收的糧食中大約只有150到200公斤被分發出去。不過在現實中，與之相反的情況居於大多數。許多鄉村幹部害怕被視為落後分子，他們更願意降低農民的糧食消費，而努力提高產量以滿足上級需求。

當食物最終耗盡時，人們就開始互相傷害，從其他村民、鄰居甚至親戚那裡偷東西。在南京的鄰里矛盾衝突中，大約一半與食物有關，因為人們互相從對方那裡偷東西，有時會導致拳腳相向。在農村，激烈的求生競爭逐漸毀掉社會原有的凝聚力。長沙市外的廖家村（音譯）偷盜成風，以致於幹部們束手無策，不得不讓自己的村民們去偷竊其他村子，而且不會因之而受到懲罰。一旦鄉村裡的社區紐帶解體，家庭就成為爭競、嫉恨和衝突的舞台。大部分暴力都是由男人施加到婦女和孩子身上的，雖然受害者也包括老人。有幾個案例表明，更弱小的家庭成員被故意餓死。比如在柳河（音譯），王久昌（音譯）就經常吃掉本該分給他八歲女兒的食物，他還在寒冬臘月拿走她的棉襖和棉褲，最後她只能落入饑寒交迫的境地。

#### 4 | 「親愛的毛主席」

有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村民有足夠的勇氣去求助於法律。不過一般而言，訴訟毫無意義，而由於司法體制在政治重壓下變得癱瘓，訟訴就更加無意義了。於是很多人轉而採用傳統的信訪辦法。由於黨內資訊傳遞失靈的情況越加嚴重，每一官僚層級都向上一級提供虛假的報告和誇大的統計數字，國家安全部門就試圖繞過官方體系，逕自與人民大眾建立聯繫。它非常關注民眾的意見並鼓勵提交匿名的控告信。確實，階級敵人可能會滲入到黨內，同時間諜和破壞分子也隱藏在人民內部。人民必須保持警惕，將他們揪出來：人民要監督黨。就連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也有權力拿起紙筆，將某位有權勢的幹部、怠忽職守的地方官員或者濫用權力的官僚扳倒。隨意控告能夠隨時抵達任一權力層級。

人民滿懷憤怒地寫控告信，每月都寄出幾袋信件，表達哀求、抗議、控告或埋怨等各樣訴求，有時態度躲閃謙卑，偶爾則理直氣壯。有些人因瑣事控告他們的鄰居；其他人只是求人幫忙找工作或搬家；只有少數人會長篇大論地攻擊整個體制，在信中寫滿反共口號。他們給報紙、警察、法院和中共寫信。有些人直接給最高領導人寫信。他們這

樣做只是在複製一個源遠流長的向皇帝告狀的帝國傳統，同時他們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權力濫用問題只局限在地方，不是毛澤東本人發動的集體化運動所造成的。「毛主席如果知道，就不會這樣了。」首都肯定是正義之地，寫信給人以希望。湖南有一位可憐的姑娘叫向先志（音譯），她把一封寫給毛主席的信縫在她外衣裡面，整整一年之後才將它交給湖南省委派下來的一個調查組。可是，很多信件從未抵達目的地，因為郵局和公安局經常拆郵件，這使得很多控告信的作者被以從事「反黨」或「反革命」活動的理由抓捕。因此不奇怪的是，有人轉而使用暴力手段。

## 5 | 強盜與造反者

暴力是最後才採取的手段，絕望的農民們攻擊糧倉，襲擊火車或者劫掠公社。有些鄉村是沿著縣或者省的邊界而形成的規模很大的聚落，他們就越界搶奪東西，所到之處都遭到蹂躪。

不過，農民暴力最多針對的是國家糧庫，其攻擊的規模令人嘔舌。在1960到1961年間冬季的兩個月裡，僅湖南一個縣的500座國家糧庫就有30座受到攻擊。對火車的襲擊也很普遍。農民們集中在鐵路沿線，搶奪貨車上的東西，並靠人多勢眾戰勝火車上的保衛人員。從1960年末開始，這種情況變得越發普遍，當局開始意識到大規模饑荒的嚴重程度，並開始清洗一些濫用權力問題最為嚴重的黨員。在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被解職之後，僅只1961年1月這一個月內，各地警察就彙報了大約500起火車搶劫事件。其中一起事件是4000多名村民集體胡作非為，迫使一輛火車停下來，並從火車上拿走能夠取下的所有東西。在另一起事件中，一節車廂上的軍服也被偷走。幾天之後，這群四處覓食的村民被負責看管倉庫的保衛人員誤認為是特別武裝人員，沒有任何抵抗地將他們放進糧庫。

暴力導致了更多的暴力。有時，村民們撕下了被外人誤以為被動和順服的面具，狂怒漫無目的地爆發出來。在企圖制訂更高指標的會議上，

農民們亂哄哄地指責幹部們將會把他們餓死，有些怨氣更大的農民甚至用切肉刀攻擊幹部，將他們殺死。不過這樣的案例並不常見，普通人可能會揩油、偷竊、撒謊並偶爾縱火搶劫，但他們很少施用暴力。他們必須想辦法「吃苦」（中文說法，意為忍受苦難），忍住悲傷疼痛，有再大的災難也要活著。

在饑荒的最後兩年，地下組織紛紛冒了出來。其中的大多數組織從未對中共構成真正的威脅，並輕易地就被鎮壓下去，不過它們卻體現了民眾不滿的程度。1960到1961年的冬季，長沙附近少數心懷不滿的農民組建了一個「愛民黨」，提倡自由耕種和交換農產品，但他們絕不可能有任何活動的機會就被取締。更加有力的挑戰來自邊遠省份。雲南省宣威縣的村民在1960年秋季開始叛亂，這一顛覆活動很快蔓延到幾個公社。運動受到當地幹部的支持，包括上一級的黨委書記。叛亂者搶走武器，幾百名不滿的村民團結在「承諾取消人民公社、推行自由市場並將土地歸還農民」的口號下。很快，軍隊進行鎮壓，逮捕並處決除一人外的所有領導人。公安部長謝富治在給周恩來的報告中提到，當年西南省份發生了十幾起類似的事件。

然而，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也沒有任何事件可以顛覆中共政權。與發生在孟加拉、愛爾蘭和烏克蘭的其他饑荒一樣，等到人們明白饑荒會長期持續下去的時候，多數村民已經虛弱得無法走到鄰村那裡，更不要說找武器組織起事了。無論如何，甚至溫和的反抗形式都會受到殘酷壓制和嚴厲處置，騷亂或叛亂的領頭人會被槍決，其他人則會被判無期徒刑、送勞教。

不過，能夠有力挑戰中共統治的組織之所以沒有出現，是因為其他原因，即大饑荒時期最常見的一種被稱為希望的東西。這種希望就是，不管村裡的情形如何糟糕，毛主席心中裝著的都是人民的最高利益。這是帝國時代的一個普遍信念：皇帝是好的，他的僕人則可能會腐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更是如此。民眾必須將媒體所鼓吹的烏托邦願景與各地的悲慘現實生活協調起來。普遍的看法是，幹部們濫用權力，

沒有執行想要造福於民的毛主席的命令。幹部們是壞的，但一個虛無縹緲的被稱作「政府」的組織和一個被稱為「毛澤東」的半神半人是好的。如果毛澤東瞭解情況的話，所有的一切都會迥然不同了。

## 6 | 流亡

饑荒時期最有效的求生戰略是離開村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躍進對幾百萬農民而言意味著進城，而不是加入公社。由於工業生產的目標一再被向上修正，城市裡的企業開始從鄉下招募廉價的勞工，從而造成了一股移民潮。僅就 1958 年，在美好生活前景的吸引下，超過 1500 萬農民進城了。

儘管對人員的遷移有正式的限制，鄉村還是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員流出現象。村民們借鑒更早期的移民模式，並利用關係網移居到城市。那些在春節期間回到鄉下的人鼓勵鄉民們也這麼做，然後就有一群人來到工廠企業裡（在那裡，先來之人已經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也沒有人問這些農民的來歷）。進城的人給家鄉寫信，還送去金錢以及如何加入移民大軍的詳細指令。有些公社同意照看孩子和老人，支持年輕人的連帶移民，因為在城市做工的人的匯款有助於整個村莊的生存。許多人在半夜跑掉，另有些人藉口探訪城鎮裡患病的親戚，在光天化日下走掉。幹部們有時自己寫推薦信，並提供介紹信（當時的一種旅行證件），鼓勵村民跳槽到城市裡碰運氣。有人通過出售帶有公章的空白介紹信來謀利。在其他地方，比如遠在南方的廣東，地方幹部都較為寬宏大量，因為他們認為更多的人員流動可以緩解饑荒。在藍塘（音譯）公社一個農場的工人中，只有七分之一參加集體勞動。其他人都幹私活，或者參與鄰縣貿易，有人甚至跑到沿海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海豐。

在抵達目的地後，許多移民會被朋友或者招募勞工的探子接走，其他人會在黑市找到一份工作。這種市場在北京被稱為「人市」，一大早就在亂哄哄的場景中開門營業；一旦有潛在的雇主出現，那眾多的無

業之人就互相推搡，努力爭取雇主的注意。多數人住在暫時的處所，少數人和朋友與家人住在一起。有些人被國有公司暗中雇傭，另有人被私人雇來幹零散的工作或者做家務。

儘管有用來讓城市居民絕緣於農村饑荒的緩衝地帶，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出的累積效應也可能將城市壓垮。每個月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南京；到 1959 年春為止，大約六到七萬名難民要麼已抵達南京，要麼從該城中轉出去，這使得該市匆忙搭建的臨時住處不勝負荷。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年輕男子，多數來自南京周圍的各縣，也有很多人來自安徽、河南和山東這三個受饑荒影響最嚴重的省份。廠礦秘密地雇傭他們，按件付給他們報酬，但報酬水準低於有城市戶口的工人。有些企業甚至製作假文件，給他們安上當地的戶口，不過大約 90% 的工廠只是虛報工人的數量，以便謀到足夠多的食物給非法的工人們吃。

另一方面，隨著饑荒的持續，在極度缺乏勞力的黑市上，年輕移民所享有的所有優待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提供食物。到 1960 年時，蘭州有大約 21 萬名勞工移民不領報酬地為工廠勞動，他們的報酬只是吃飯和住所。在這個省會城市之外，領導們的默許導致了奴工的出現。通渭的一家鋼廠將移民們鎖了起來，迫使他們勞作至死，並拒絕給他們飯吃，以至於當年就死了一千人。工廠廠長們確信，找工作的無業遊民和離家出走者不絕如縷，誰知道到底有多少工廠在這麼幹呢？

隨著饑荒歲月的流逝，移民的動機發生了變化。簡言之，雇工的吸引力換成了躲避饑荒的無奈之舉。在絕望感增加的同時，有人偷偷跑進山裡，希望靠野果、昆蟲和小動物活下來。不過很少有人能夠心遂所願；有人衣衫襤褸、頭髮不整地從森林裡跑出來，被迫回到村裡，有時他們赤身裸體，眼光怪異，變化很大，以至於村民們都認不出他們了。另一方面，一旦災難來臨，人們就成群離去，拖家帶口，背上馱著他們少得可憐的財物；當地政府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們離去。有時候，整個村莊的人一起離去，包括幹部、男人、女人和孩子，沿途他們以

衣服交換芋頭，最後許多成人和大多數小孩都變得赤身露體。全國各地都有人死在路邊上。

## 2-3

### 大饑荒對文明的毀滅

#### ——讀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有感

文 | 李銳

發生於 1966 至 1976 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非是中國「史無前例的浩劫」，因為在 1958 到 1962 年間，中國已經出現過 4500 萬非正常死亡者的大饑荒，那也是場真正空前的浩劫。兩次浩劫都源於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政策，他的土改、鎮反、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和四清運動，違反人類進步的普世規律，消滅異己，最後造成全體中國人的大浩劫。極左路線之因，造成大饑荒第一次大浩劫之果；大饑荒又成為因，釀成文革第二次大浩劫之果。這就是出生在荷蘭的香港大學馮客教授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 至 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向我們提供的新思路。

1 | 馮客認為，大饑荒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浩劫。但是，黨史有意迴避、隱瞞這次大浩劫

在官方編著的《中共黨史》第二卷中，記載的大饑荒死亡人數仍然停留在 20 年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的說法，即 1961 年死亡一千萬人，作者的理由是沒有檔案資料。但是，馮客這位外國教授查閱了十個省、幾十個縣的一千多份檔案，以及國內外的有關資料，採訪了一百個人，從而估算出，在 1958 至 1962 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是 4500 萬人，從而證實這是一場發生在和平年代正常年景下的大浩劫，為古今中外所罕見。

找到檔案資料，並估算出整體數字，這不僅僅是史識，更是史德問題；儘管現在估算出的不同數字既有三千幾百萬的，也有四千萬的。

馮客發現，在大躍進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無處不在。在河南信陽，官方調查 1960 年死了一百萬人，其中 6-7% 是被打死的；湖南道縣 1960 年死了幾千人，其中 90% 死於疾病和饑餓，10% 是被幹部和民兵打死。馮客推論，1958 年到 1962 年大饑荒期間，至少有 250 萬人是非正常死亡的，也就是說，死亡人數的 6-8% 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李井泉把四川死了幾百萬老百姓的大躍進比作「長征」，他說，「我們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我們保留了骨幹，還會更強大起來。」這些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得以鍛煉的幹部，以暴力為榮，習慣了大規模的死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 2

**毛澤東和赫魯雪夫追逐烏托邦，以政治運動、殘酷鬥爭脅迫幹部和群眾參與大躍進，真理死了**

馮客認為，「1953 年，史達林死了，毛澤東解放了。」30 多年來，毛澤東原來只能替這位共產主義的世界領袖當個跟班。史達林死後，機會來了，可以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領袖群倫了。赫魯雪夫不甘落後，他在 1957 年提出，15 年內蘇聯要趕上並超過目前美國重要產品的產量。毛澤東隨即應戰說：「將來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15 年後我們也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從而宣佈大躍進的開始。

毛澤東繼續採用建國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批判了中國高層領導人、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因為他們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冒進的，並對之加以懷疑、抵制和反抗；他接連不斷地發動了反右派、反右傾鬥爭，打倒了彭德懷，批判了周恩來和陳雲。馮客分析說：「周恩來學會了在毛主席手中接受侮辱，保住烏紗帽，在主席的陰影底下討生活，像傭人一樣千方百計地去慫恿和幫助他的主人。毛澤東在做夢，周恩來則是催生婆，把毛的夢魘變為現實，由於老在經受考驗，他必須在大躍進中不懈努力，表現自己。」連周恩來這樣的領導人都不得

不向毛澤東低頭認錯，積極參與這場瘋狂的大躍進，更遑論全黨全國各級幹部和群眾了，都被迫地或自願地捲入這場追逐烏托邦的狂潮中。

因此反右傾鬥爭在全國各地得以開展。從甘肅的的檔案中，馮客查到1958年1月15日鄧小平在蘭州的講話，鄧說，「針對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和梁大鈞的鬥爭不能含糊。」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隨即宣佈，這幾個人組織了反黨集團、否認社會主義高潮、詆毀社會主義、提倡資本主義。浙江省長沙文漢、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以及雲南、廣東、內蒙、新疆、安徽、遼寧、河北等省、自治區，其有的領導人在當年就被批判、鬥爭。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逼迫彭德懷承認自己犯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周恩來從幾十年的政治鬥爭中發現，效忠於毛是保住權位的關鍵，他決定永遠不得罪毛主席。毛澤東耍計謀，鼓勵大家發言，鼓勵大家敢把皇帝拉下馬，但沒人敢直言，因為害怕挨整、撤職、開除黨籍和坐牢。因此馮客的結論是「真理死了」。

中國老百姓將「穿越死亡谷」，由於領導人的專橫和政治制度的僵硬，大躍進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危險。在中蘇兩國領導人急於誰先進入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競逐，中國的受難者是4500萬人。大饑荒非正常死亡的主要責任人是毛澤東，但是其他領導人也難辭其咎。

## 3

大饑荒、大躍進毀了農業、工業、貿易、住房和自然，而且毀滅了道德和文明

馮客教授在書中詳細地闡述了大躍進、大饑荒所毀滅的一切：毀了農業、毀了工業、毀了貿易、毀了住房，毀了自然，而且還毀了文明古國的道德。他不僅研究上層，也研究基層，把權力中心的事件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結合起來，從中共彙編的大量文獻中，展示出老百姓不僅是受害者，也出現了加害者。在大饑荒期間解體的社會裡，人各自為戰，憑著本能求生存，他們不擇手段，為極度自私自利的利益所驅動，採用各種反常的手段，如撒謊、欺騙、偷盜、巧取豪奪、玩弄權術，

跟國家周旋。

馮客從檔案中發現，在大饑荒年代，中國農民並不是餓死也不搶國家糧庫。湖南湘潭地區在 1960 至 1961 年間發生了 800 起糧食盜竊案，懷化農民強行打開了幾個倉庫，搶走了糧食。1961 年 1 月，甘肅發生了 500 例列車搶劫案，損失了 500 噸糧食，在武威火車站，先是出現幾十人、繼而幾百人，到了一月底，最後有 4000 名膽大包天的農民截住了列車，連車上部件也拆走了；張掖有 2000 名農民夜襲糧倉，還殺死了一名警察；還有一次是，農民偷了軍裝並進入倉庫運走糧食，警衛以為他們是特種部隊。另外還有破壞性的縱火案，在湖北省松滋，一位市委書記的房子被人縱火，還有農民把毛澤東塑像澆上汽油焚燒。在廣東翁源縣，農民在燒毀糧倉後，在牆上寫下標語，表示糧食反正不是他們的了，不如一燒了之。

馮客還發現，幹部們為了完成任務，不惜使用暴力。紅旗最多的村、社、隊，也是害人最多的地方。他們擔心紅旗被拔走，故用無情地毆打迫使饑餓的農民超負荷完成分配下來的任務。湖南耒陽縣長張東海說：「運動不是繡花，打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在大躍進前從不打人的幹部易少華，也變了，他出手狠，把農民打傷流血不止。何以如此？壓力來自他的上級，他的領導告訴他：「你要是不打死他們，任務就完不成。」「上面的人壓我們，我們就壓下面的人。」暴力通過一連串命令一級級傳遞下去。幹部為了不當右派，選擇一方，就要犧牲另一方。來自四川溫江的調查顯示，80% 餓死的人是因為被罰不得吃飯，生病的人也被迫下地工作。就這樣，累死、餓死、被打死的人在大災荒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還有 3-6% 的人承受不了苦難，選擇了自殺的死亡方式。在大饑荒的歲月中，幹部和民兵採用各種暴力手段對付農民，這一做法源自於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些手段和刑罰，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重演，規模變得更大、也更為殘忍，大饑荒的暴力是文革紅色風暴的預演。

大饑荒中最殘酷的事件是人吃人。在山東、甘肅、雲南、廣東等省，

都有吃死屍的檔案資料。個別的比較具體的關於人吃人的文件被保存下來，馮客公佈了一份1961年3月臨夏市民政部門整理的材料，裡面記載，在76名受害者中，被謀殺後吃掉的12人，死後被吃掉的有16人，死屍被挖出來吃掉的有48人。1960年1月9日，在買集公社張灑麻村，康尕麥用斧子砍死了同村人焉哈馬吉並煮了吃。1960年3月15日，在紅台公社趙家大隊，趙香香殺了小孩來吃。馮客哀歎道：「人性在這場由國家發動的暴力中淪喪了。」

當然，人吃人絕不是最常見的，也不是最廣泛的。」這種人性淪喪，在文革的大浩劫中，又一次更廣泛、更殘酷地再現了。文明古國在二十世紀出現的人吃人的慘劇，證明了人民公社的制度絕不是共產主義的天堂，證明了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絕不是人類進步的方向，這樣的大浩劫的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絕不是光榮的、正確的、可向外國推銷的貨色，而是絕不應遺忘、忽視、掩飾的極為重要的史實，值得認真總結其教訓。中共黨史忽略了，而馮客填補了、充實了這個空白。1960年到1961年，我在北大荒農村勞動時，親眼目睹幾十年老農民餓死的情況，有的臨終前講了一句話：「我想喝一碗稀飯呀。」我自己也差一點餓死，是田家英找到李富春幫忙，1961年11月將我調回北京。1963年又下放到安徽勞動時，我聽見農村公社書記同我談到父親殺兒子煮了吃的案例。

## 4

**大饑荒是真正的史無前例的大浩劫，黨史、國史不應也不能掩飾真實的歷史事實**

大饑荒中人性淪喪、道德墮落的悲劇，預示著文革中再次出現群眾性的大規模暴力屠殺，乃是必然。第一次大浩劫必然引發了第二次大浩劫。馮客教授這本分析如此深刻的大饑荒專著，獲得英國2011年度撒母耳·詹森大獎，是名至實歸。他在困難的條件下，搜集到翔實的檔案材料，寫出了這樣一本書，又分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因，致使出現大饑荒之果；而大饑荒之因，再釀成文革之果的因果關係。因為，大饑荒中出現了對毛澤東不滿的幹部和派系，尤其是1962年的七千人

大會上，劉少奇的報告引起毛的憤怒，他為了維護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領袖地位，牢牢把握住政權，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命，將劉置於死地，把他心中的對手都打倒，最終將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可以說，毛發動第二次大浩劫，以維護第一次大浩劫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正象馮客所說：「把國家干預當做解決社會矛盾的良藥，實在是錯上加錯。」以新的錯誤掩蓋已發生的錯誤，是更大的錯誤。

我們的黨史工作者，如果掩蓋、繞過大饑荒這個中國現代史的核心問題，就不可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2年歷史、中國共產黨的90年歷史，作出公正而準確的判斷，更不可能作出符合實際的歷史評價。如果加以掩飾，也不是一個黨承認、分析、繼而改正自己所犯的歷史錯誤這一應有的誠實態度。諱疾忌醫、掩飾錯誤的結果，只能是重犯同樣性質的錯誤，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歷史上空前的大浩劫，把全國老百姓、全體黨員拖入大災難的深淵。

幸虧世界上有良心的學者很多，馮客教授做出了本該中國黨史工作者應完成的工作。中國的歷史，理應有更多的中國學者加以研究，並寫出高水準的信史。我們希望中國民間和官方的黨史工作者，能夠寫出超過馮客專著的中國浩劫史，也希望官方能公佈50年前大躍進和歷次運動的全部檔案（我知道有過燒毀檔案的事實），為共同研究歷史錯誤和防止重犯錯誤創造出必要的條件，這是我寫這篇評論馮客專著的一個真誠期望。

第三章 餓殍遍野：大飢荒的重災區

# 3-1

## 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

文 | 宋永毅

關於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期間（1958-1961年）出現的「人相食」的悲慘現象，目下已經有不少有良知的歷史學家和親歷者開始一一揭示歷史真相。但是，對這一慘絕人寰的民族災難的嚴重性，所有的認識和研究卻還大都停留在控訴和譴責的層面。在不少著述中，作者都引用了劉少奇在1962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邊對毛澤東說的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其實，劉少奇的話從另一面提醒了我們應當做進一步的邏輯推斷：如果「人相食」現象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只是一些個案，劉少奇是否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在中南海向毛諫言。以劉少奇飽讀史書的學識和他直接負責宣傳部門（以掩蓋歷史真相為主要職責）的中共第二號人物的高位，如果他不認識到那個年代的「人相食」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了在歷史上無法掩蓋的程度，又怎麼可能向毛說出這樣的直接得罪他的話來？更發人深思的是，即便是劉少奇在50年前就坦陳的「要上書的」「人相食」現象，至今還在官方的正史中被掩蓋，在年輕人的記憶中被忘卻，這是否又凸現出今天研究它的急迫性呢？

### 1 | 「人相食」現象普遍波及各地

中國歷朝歷代的史書記載中，因饑荒而造成「人相食」現象並不少見。縱覽二十四史，大約最早記載這一現象的是《漢書》和《隋書》。據

班固撰《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在魏徵主編的《隋書》的「五代災變應」中也有如下記載：「九江大饑，人相食十四五。」以後自唐到清的千餘年的正式史書記載，中國和饑荒有關的「人相食」的慘劇，大約有數十起之多。

《隋書》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較好的一部。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親歷了滅隋的戰爭，在執政之後，他經常談論隋朝滅亡的教訓，明確提出「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的看法。汲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導思想。在《隋書》的「志第十五」中，對「人相食」現象的出現，還有過除了天災以外的原因總結：「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也。角而變色動搖，盜賊萌，胡兵起，人相食。」自然，古人把出現「人相食」災難的根本動因歸結為星象的異動並不可取，但它畢竟揭示了大規模天災和個別食人魔以外的另一現實原因——「盜賊萌，胡兵起」，即兩種戰亂的發生：暴民起事，或因政權更迭而生的內戰，或異族入侵。

確實，在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中，有著大量「人相食」的案例。例如，唐末的黃巢起義就創造過一份大概可稱為世界之最的食人紀錄。據《舊唐書》記載：在黃巢攻入長安當了大齊王朝的新科皇帝後，曾「圍陳郡百日，關東仍歲無耕，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砮，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換句話說，黃巢在失敗前夕包圍陳州一百天的時間裡，採用過機械化方式，將活人粉碎，以人肉作軍糧，供應他圍城部隊。以一天殺食一千人計，也至少吃了十萬人！這位農民革命領袖大規模吃人不吐骨頭的行徑，其野蠻、殘酷、恐怖，實在是駭人聽聞。

黃巢的人性淪喪和他的自身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他是文人當中痞子型（農村流氓無產者）的知識分子，由一個不及第的秀才變成了一個殘忍狠毒的私鹽販子。黃巢這樣的流氓無產者式的知識分子，由於他們具有堅定的「革命」性、野蠻性、破壞意識、盲動力量、亡命的痞子

精神，則很容易在鬥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農民革命的領袖。

在中國被蒙古軍入侵後的元朝，也是一個有大規模「人相食」現象的朝代。蒙古軍本身就有食人傳統，以後的歷代元朝統治者又根本不把百姓當人，大規模破壞生產力，造成饑荒遍地，「人相食」連續發生。其後，以劉福通為首的農民起義軍「紅巾軍」，又開創了自黃巢以降的又一次大規模吃人當美味的人性滅絕的屠殺。但是，縱觀這些「人相食」的現象，一是和戰亂（不管是農民起義、內戰或異族入侵）有關，二是這些饑荒都是局部性、地區性的現象。

然而，發生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卻不是處於任何戰亂之中。那時的中國，既沒有內戰又沒有異族入侵。作這一如是觀，對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的產生，當時的執政者就要負更大的責任。如果說中共政權和歷史上的「盜賊萌」有一定的關聯，那就是中共其實也是一個農民起義後建立的政權，其領袖毛澤東也是一個黃巢式的痞子型的知識分子。雖然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展，毛沒有過黃巢、劉福通式的「食人」瘋狂，但是他也從來不把百姓的性命當一回事。1959年3月25日，大饑荒初露端倪之際，毛卻在上海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糧食收購不超過三分之一，農民造不了反。」「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

另外，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現象其實和天災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對此我們更不應當漠視。如同中共當局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大饑荒的造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其實至少是「九分人禍」）。因此它具有蔓延全國的普遍性。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先生在〈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記錄〉一文中指出：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九個縣發生302起，蚌埠專區

十五個縣發生 721 起，蕪湖專區三個縣發生 55 起，六安專區五個縣發生 8 起，安慶專區二個縣發生 2 起，合肥市三個縣發生 201 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宣城縣發生的 30 起特殊案件，有 28 起是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2 月發生的；蚌埠專區的鳳陽縣等十個縣在 1960 年共發生此類案件 619 起，其中發生在第一季度的 512 起，發生在第二季度的 105 起，發生在第三季度的 2 起，第四季度的個別地方雖有發生，但為數極少。今年第一季度只發現肖縣、湯山、嘉山、定遠、肥西、巢縣、泗縣等八個縣共發生 10 起。

他還進一步見證說：

安徽省發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個案？不是的。全國不少省都發生過，只是嚴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 年，我是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1960 年 5 月 13 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了份報告，題目是《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煌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 300 多起。

在讀了尹曙生文章後，一位 1942 年參加抗日，1990 年離休，擔任檢察員 38 年的蕭磊先生也在《炎黃春秋》上撰文作證指出：

1960 年冬，山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因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有「嚴重錯誤」，受到批判。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到山東主持處理。……批判省委負責人會議的最後階段，曾希聖作了總結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山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破壞耕作制度」、「大刮五風」、「大批餓死人」等嚴重錯誤，還特別提到：「據初步發現，全省人吃人事件 70 餘起。」曾的《總結報告》書面材料發至全省各縣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組。省委駐金鄉縣工作組長劉若克（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讀了曾的《總結報告》。看到報告中提到人吃人的問題時，引起了他對金鄉縣是否發生過人吃人事件的注意，為此派工作組員肖錫宜到金鄉縣胡集公社胡集大隊調查摸底。胡集大隊十五個生產隊，有兩千多人。經座談會調查與個別訪問，1959 年冬到 1960 年冬，全大隊發生人吃人事件 9 起，支部書記的四歲男孩餓死後，被煮熟，

全家吃了一天。這9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聖總結報告時未能發現。

三年嚴重災害期間，山東各地都曾發生人吃人的事件，雖然缺少全省的統計，但遠不是曾希聖報告中所提到的70餘起。1961年春，筆者參與省政法工作組檢查萊陽縣檢察院批捕、起訴品質時，閱卷中，發現2起賣人肉案件。2起作案人均是復員軍人。……

據萊陽縣檢察院介紹：1959、1960這兩年，全縣盜挖屍體案件時有發生。已破獲7、8起，還有5、6起未破。有的盜屍體吃了自己死亡了，還有的死亡在盜屍現場。……

為此，蕭磊先生的結論是：「史料記載，各朝各代都有過災荒，有過餓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災害期間餓死人之多，其規模波及全國，人相食事件之驚人，都是絕無僅有的。」最近，另一位親歷者、原國家統計局幹部楊德春的文章〈太和縣饑荒報告的產生〉又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波及」性。該文披露「安徽省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29個自然村中，有26個（約佔89.6%）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如潤南生產隊，七個生產組，組組都有；該隊144戶，共604人，吃過人肉的有37戶，共144人。最嚴重的是韓小寨，全村18戶，共85人，吃過人肉的有13戶，共55人，佔全村人口的65%。又如謝寨生產隊，吃過人肉的約佔40%。」

四川、江蘇等地都是魚米之鄉，在1958-1961年間也根本沒有天災，但是也都發生了規模甚大的「人相食」的慘劇。原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在1959年反右傾時被撤職，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堂弟，在1962年得以復出，任宜賓地委副書記。他回憶大饑荒時當地的「人相食」現象說：「……饑荒越來越嚴重，後來，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謠傳吃人肉能治腫病，於是有腫病的人就從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宜興是江蘇最富饒的地區，誰也不會想到，這裡不僅餓死了人，還有

人吃人的記錄。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1960年12月27日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我和劉耀華同志到和橋公社，聽到有些社員談去冬今春餓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這個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達6-7%。今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人死後連稻草也不包。高樓大隊有一戶人家一天死了兩個人，就用一副擔子把兩個死人挑出去了事。個別公社甚至發生過把丈夫、兒子害死後吃人肉解饑的事。

在一個沒有大規模天災和任何戰亂的和平年代，全國各地的許多地方卻都同時發生相當規模的「人相食」現象，這已經無法用外部的災難來解釋它的成因。這又使人們對「人相食」慘劇的理解，由個別發生的現象，提升到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同時對那一時期「人禍」的鞭撻，也有了新的升級。換言之，只有一種解釋才是合理的。那就是：這是一種全國性的內政所導致的人為饑荒，也是各級領導層的「人禍」所直接逼迫激化出來的人道大災難。

## 2 | 「人相食」現象的幾種主要形態

在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裡，在生存競爭的漫長歷史中，異類和同類之間的殘殺吞噬並不令人奇怪。但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仍然出現「人相食」的現象，這說明人類的人性向獸性的淪喪倒退。由於人類具有高於動物的社會意識，所以「人相食」就比動物相食更顯得野蠻和殘酷。

中國歷史上的「人相食」可大致分為兩類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由於天災或戰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饑荒，人們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類為食。這種現象當然是違背人性的，但在那種每個人都面臨著餓死威脅的情況下，靠吃人肉來活命還能夠使人理解。第二種情況是，食人並非出自生存的掙扎，而是出於某種殘忍的主觀目：或是以食人炫示「革命」暴力；或是聽信左道邪術以食人來養生；或是以人肉為「美味」，等等。這些行為都帶有食人魔偏嗜的野蠻性和殘酷性。

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其動機都比較單純。大都是中國農民在樹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極端絕望的生死線上，被迫做出的一種人性向獸性的沉淪。如果我們把它和文革時期中國農村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做一對比，便不難發現它們有很大不同。文革中，廣西在1968年出現過相當規模的吃人狂潮，這一人道災難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明顯的派性和階級性。吃人者大都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韋國清和廣西軍區支持的「聯指派」（保守派）和黨團員積極分子，被吃者則是反對派「四二二」（造反派）或所謂的「黑五類」及其子女，即「階級敵人」；二、吃人事件一般發生在各級中共領導和軍隊掀起的大規模「鎮壓階級敵人」（實質是亂打亂殺）的浪潮後，受到當局的唆使、縱容和默許；三、吃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心肝，因為據說這可以「壯膽壯身」。第一位揭露這一「萬人吃人運動」的作家鄭義和當年組織吃人者的兇手謝錦文有過一段如下的訪談，很能說明兩者的區別：

他是當時的革委會主任，後又任大隊支書。……見我只問吃人細節，頓時輕鬆起來，主動談起他光榮的吃人歷史。謝參加過中共遊擊隊。1948年，一奸細帶國民黨警察來抓人，他們殺了奸細，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記載：井岡山紅軍亦殺人吃心，尤其是新戰士。理由與謝錦文一般：壯膽壯身）……我突發異想，問道：「過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還是這次煮的好吃？」答：「還是烤得好吃，香，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和生理上的極端厭惡之外，對這位食人者我還有幾分謝意。感謝他點透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吃人是歷史的繼續。既然可以吃奸細的肝，自然就可吃「二十三種人」的肝；可以吃國民黨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對立派和「走資派」的肝；紅軍、遊擊隊可以吃人肝，「革委會」、「貧下中農」、「革命群眾」自然同樣可以吃人肝。只要是

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便可！

很明顯，這種吃人絕非饑荒所迫。至於說到以吃人的心肝來「壯膽壯身」，除了表現人性中遺留的獸性兇殘，更表現出動物式的愚昧。因為用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人肉或人的某些器官同其他動物相比，其

組織成分沒有根本的區別。而且，不少動物及一些蟲類身體內所含的維生素、微量元素或可作藥用的有機物質都優於人體。

應當承認，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現象中，也有一些吃人心肝的案例。貴州省赤水縣是「人禍」的重災區，餓死了超過 10% 的人口。1961 年 5 月 11 日也有過一起案例：「隆興公社馬臨管理區新華大隊第三生產隊於 5 月 11 日貧農婦女王志珍在自己六歲女兒羅三女死後，用刀解剖屍體，取出心肝煎吃，〔並〕企圖將肉體全部吃掉。」很可能，作案者王志珍也受了吃人的心肝可以「壯膽壯身」的異端邪說的影響。但是根據當時中共赤水縣監察委員會的調查，至少和廣西中共幹部謝錦文的吃人有三點不同：一、她吃的是已經死了的女兒，謝剖腹取肝的是活人；二、赤水縣監察委員會的調查指出：「住隊幹部工作不深入，對群眾生活抱著不關心的態度，王志珍在小孩未死之前，曾向住隊幹部羅永聯同志說過因口糧被偷一筒半而沒有糧食，但一直未進行瞭解，致使小孩因斷糧引起病亡，羅三女之死，住隊幹部也有一定責任。」換句話說，王和她的女兒已經到了饑餓致死的生存邊緣，而謝完全沒有饑餓致死的危險，只是覺得人的心肝是一種可食的「美味」。三、王是被權力機構的斷糧所逼迫、為了生存而偷偷吃人，而謝本人就是權力結構的代表，是一種以「革命」名義堂而皇之的食人。

在看了數百份絕密檔案、個人回憶、縣志記載的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現象後，我們可以大概地總結一些當年「人相食」的特點：第一、大都是食「死者」，即並不具有暴力殺人而食的惡性傾向。從中也可看出，中國農民在被迫饑不擇食以及人性淪落前的最後一絲未泯的善良。第二、大都是「食子」，這已經從不具有惡性傾向的「人相食」到具有暴力殺人而食的惡性轉換，但大都還是在家庭的範圍內。第三、不少轉化為「易子而食」。也有暴力殺人而食。

在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發生在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區 17 起「人相食」的個案中，很能說明以上的第一種形態，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因饑饉而

被迫吃死者的屍體。值得注意的的是，出現食死者的前提往往是大面積地餓死人。例如，在1961年的秘密檔案中，四川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涪陵、石柱、西陽縣工作組，向省委書記廖志高報告了石柱縣橋頭區的「人口死亡問題」，具體如下：

橋頭區在59年公社化後共有人口28352人，現在經查對實有人口21018人，其中男的9425人，女的11593人。這裡在59年至60年冬遭受旱災，又加上人禍因而死亡人口竟達7334人，佔原有人口數25.86%。全區有橋頭、三永、三益等六個公社，44個管區，集中人口死亡最多的是橋頭公社，社內蘭木管區原有人口855人，現有404人，死亡451人，死亡率達52.74%。其中死亡絕戶的有51戶。由於蘭木管區人口死亡太多，公社將橋頭街上附近農民遷移48戶167人在管區內，但也遭到嚴重的死亡，現有的僅8戶16人，死亡率佔95.8%。還有洞塘管區第一隊原有61戶244人，現有41戶90人，死亡154人，死亡率63.1%，其中死絕戶的20戶78人。第二隊原有32戶153人，現有26戶76人，死亡77人，死亡率50%，其中死絕戶的5戶30人。這批人口中死亡的大多數是男勞動力，其次是兒童，如蘭木管區原有孩子82人，現剩公社托兒所20人，家中3人，死亡率竟達73.7%。

看了以上這些觸目驚心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會發生「人相食」的慘劇了：大規模的饑饉，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無獨有偶，在大躍進-大饑荒年代擔任安徽亳縣縣委農村生產福利科科長和縣人委辦公室副主任的梁志遠先生，曾經寫過一份《關於「特種案件」的彙報——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的內部報告，見證了當時大規模的食死者的現象：

在農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並不是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從我三年來記下的近百萬字的農村工作筆記中查證和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來看，絕對沒有一個公社沒有發現吃人的事，有的大隊幾乎沒有空白村莊。」這個嚴重問題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達到頂峰。有時路上死人被人埋後，一夜

就不見屍體了。有些地方，農民家裡死了人，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墳多夜，待屍體腐爛發臭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屍的，也有殺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來的，也有從市場上買來的（多為熟肉）。

梁的報告還透露，因為上述食死者的現象純出於極端饑餓的生理原因，連公安機關都無法處理：

1959年春，城關公社渦北派出所抓獲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首流農民，遂將「犯人」和小孩肉送到縣公安局。公安局當時不知如何處理，一位副局長向縣委第一書記趙建華作了彙報（當時梁志遠在場聽了彙報），當即定為「破屍案」，並決定逮捕「犯人」。縣委政法書記李庭芳親自審訊後，認為「犯人」身體瘦弱，無政治目的。於是未經請示縣委，發了兩個饅頭，將「犯人」教育釋放。縣委知道後，李庭芳受到嚴厲批評。李又讓公安局將「犯人」抓回，重新入獄。經過半個月的審訊，確定「犯人」沒有政治目的，縣委批准將其釋放。

因為「人禍」愈演愈烈，饑荒自然就無法停止。死者的屍體又數量有限，農村中的「人相食」現象便出現了第二種形態：「食子」。這已經從不具有惡性傾向的「人相食」到具有暴力殺人而食的惡性轉換，但大都還是在家庭的範圍內。因為農村中男尊女卑的舊風俗的影響，一般年幼的女孩子便成為家庭成員中最常見的受害人。因為自己的孩子下不了手，又出現了「易子而食」或暴力殺人的第三種惡性形態。當時四川省崇慶縣農村工作組副組長鄭大軍就記載和見證了當年發生在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的「人相食」形態的惡性轉換：

19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灶房只供應白開水，而把強制節餘的社員口糧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幹部們半夜需外出巡邏，以確保家家房頂不冒煙，戶戶屋裡不見火。

一天下半夜，全家八口人已餓死了兩口的貧農莫二娃，在半夜殺了自

己的親生么女、三歲的樹才妹。烹煮時屋頂飄煙，被巡邏的生產隊會計王解放和出納、保管見到，遂將其一家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

莫二娃叫冤說：樹才妹生下來就缺奶，連米湯都沒喝飽，好不易熬到三歲，連路都走不穩，命裡只該活這麼大。

支書：曉不曉得隨便殺人，國法難容？

莫二娃：與其餓死，不如讓她提前咽氣救全家。

二娃婆娘磕頭哭訴：我們全家都吞了觀音土，沒油葷過不去嘛，媽心疼的樹才妹啲，下輩子投胎莫變人了。

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釋放了，大隊幹部們再三研究和權衡，決定為了官帽而壓下這起吃人案。

莫二娃一放，大夥私底下奔相走告，以為政府默許這樣做。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非勞動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傢夥在自己家裡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淚與鄰居約定交換著下手。

全隊共 82 戶 491 口，僅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 48 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綫出生女童人數的 90%；83% 的家庭有吃人史。

「人相食」當然是一種人性向獸性的倒退和恥辱。但是，它直接發端於人為製造的極端饑餓，更是人類的雙重恥辱。然而，一方面，參與了「食人」的中國農民，或是出於奴性的軟弱，也保有最後一絲未泯的人性，畢竟大多數並沒有製造惡性的殺人而食案件。在殺而食掉自己的親人後，他們更是無窮無盡的悔恨。例如，在湖南澧縣如東公社，發生一起很有名的劉家遠殺子而食的惡性案件。在一天夜裡，劉殺了自己「躺在鋪上的、餓得就快要斷氣」的兒子，煮了吃了。

劉家遠被捕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說就是不想讓他兒子再

受罪了。還說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兒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劉家遠被槍斃前一天晚上，監獄破天荒給他端來了一碗大米飯。據同號的犯人說，劉家遠竟把米飯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兒子，嘴巴裡不知道唸唸叨叨些什麼，然後幾大口就把一碗飯吃了個精光。

另一方面，處理這些事件的中共幹部有時也表現出一種最低限度的對人性的理解。例如，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裡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裡，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她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慘劇中，當然也有一部分暴力殺人，販賣人肉的惡性案例。但是從比例上來講這畢竟還是少數。我們今天固然可以指責那些食人的中國農民的沉淪、恥辱和奴弱（為什麼不起來反抗呢？），但是我們也同時看到了他們的老實、善良，以及在絕望的沉淪過程中最後一點未泯的人性。

### 3 | 是「階級敵人破壞」？還是饑餓迫使人性淪喪？

儘管今天中共正式的「黨史」和「國史」裡，對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始終諱忌莫深，但在一些個別的縣志裡，卻已經開始繼承了自古以來「秉筆直言」的史官傳統，對此作了一定程度的記載。以下是在數千本「縣志」中的一些鳳毛麟角：

〔甘肅省高台縣〕由於「左」傾思想氾濫，「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猖獗，全縣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加之加大徵購，壓低農村口糧標準，1959年冬，群眾生活已十分困難。1960年元月，宣化公社台子寺大隊發生餓死人問題。在極

度危急的情況下，縣委未能及時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致使事態惡性發展，人員非正常死亡、外流劇增，甚至出現食死屍的嚴重情況。

〔甘肅省通渭縣〕年底（1959年），全縣糧食實產8385萬斤，虛報為1.8億市斤。徵購糧佔實產的45.6%，人均口糧僅70多市斤，致使人口持續大量外流、死亡。……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

〔甘肅省臨夏縣〕1960年，全縣人均口糧在半斤以下，號召「瓜菜代」。入春以來，更趨嚴重，因饑餓，野菜、榆樹皮刨光、剝光，能吃的全部用來延續生命，甚至發生人相食，絕戶現象。

〔甘肅省和政縣〕1959年，徵購量「佔總產量的58%。口糧不落實，不少人以樹皮、草根、野菜、豆衣充饑……浮腫和死亡隨即發生。」1960年1月，「和政縣部分地方連續發生饑民偷食死屍現象。」4月間，「僅和政縣就死亡920人。」三年間該縣非正常死亡數高達人口的21.7%。

在數十年後出版的縣志中，只有極少量的有關「人相食」真相的記載，這並不是修史人員的過錯，相反，乃是中共國家的出版審查制度使然。例如，在今天的《張掖市志·大事記》中記載：張掖縣3.72萬人非正常死亡，佔人口11.6%。但是，這並非實際數字。據參與撰寫該書的張中式披露：「實際上，張掖地區民勤縣餓死了13萬人；張掖縣餓死了7、8萬人，全家死絕98戶，人吃人的58戶；高台縣餓死了5萬多人；全河西14個農業縣餓死超過40萬人。但是在《張掖市志》送審中，後兩個數字，被甘肅人民出版社刪去了……」

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從來沒有被公開報導過。只在新華社《內部參考》（1960年4月14日）——一種中共黨內的機密文件裡——有過唯一的一篇報導。全文如下：

甘肅等地發現「吃人肉」案件17起

本刊訊 據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貴州等地11個縣市的統計，今年以

來，發現「吃人肉」案件 17 起。其中甘肅 11 起，寧夏、貴州各 3 起。在這 17 起案件中，慘遭殺害的有 15 人（內小孩 13 人），掘吃屍體 16 具。從作案的 22 人的身份來看，地富反壞分子 11 人，反動道徒 2 人，中農 2 人，貧農 3 人，小商 1 人，家庭婦女 3 人。

他們為什麼吃人肉？據初步瞭解，原因錯綜複雜。有的是發生在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曾經有過「吃人肉」的野蠻惡習，如寧夏吳忠市吳忠公社丁明禮、丁秀英夫婦，竟將自己的七歲女兒殺了吃肉。在審訊中，丁秀英供認，以前在娘家就吃過人肉，早知「人肉香」。還有的為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長生不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富反壞分子故意趁春荒的機會，煽動吃人肉，製造恐慌，藉以誣譏社會主義制度。貴州赤水縣一個名叫黃金安的地主（曾判過兩次徒刑，釋放後仍不悔改），去冬以來連續偷盜了三具屍體，到處散佈他要吃人肉，其實他並沒有吃。甘肅張掖市壞分子于興發企圖拉攏鄰居祁桂香共同挖屍，並造謠說：「把人肉拿來吃了再說，這個壞年成，是飯堆裡餓死人，火堆裡凍死人，大小娃子都餓死了，你還想活嗎？」

對於這些慘無人道的兇犯，上述地區的政法部門均已及時予以嚴厲懲辦，並採取了措施，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

新華社的這一報導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值得探討的問題：「人相食」的出現是否為階級敵人的有意破壞？或者，這根本就是一個臆造出來的藉口，以此來承擔毛澤東和中共一手製造了大饑荒的責任？我們不妨通過具體的個案分析來解決這些疑問。在編撰《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的過程中，我們意外地發現了四川和甘肅省的两份當年分析人吃人的表格。分別是：（一）四川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涪陵、石柱、西陽縣工作組關於石柱縣橋頭區人吃人的問題報表（1961 年 1 月 21 日）；（二）中央慰問團寧夏分團關於甘肅臨夏市、和政縣和東鄉縣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1961 年 3 月 3 日）。

第一份檔案裡提到：

石柱縣橋頭區人吃人的問題，最嚴重的是橋頭公社的瓦屋管區。據一隊何學珍和兩個吃人者談的，在去年冬月和今年春共計吃掉馬德惠、馬德秀、陳世蘭等 16 個死屍（詳見表一）。冬月二十開頭，開始吃人肉的是羅文修老婆婆，她把一家一個死絕的三歲女孩馬德惠，從地裡挖起，切成片，用海椒面拌來蒸起吃。接著是壞分子何朝必（已逮捕、死亡）把一個 18 歲的男孩袁家林屍體弄來吃了。陳世蘭將兒子五歲男孩袁二頭屍體吃了，結果她死後又被別人吃了。馮厚珍也將兒子七歲男孩袁毛屍體吃了。這個管區共計吃人肉的有 18 人（見附表二），因屍食有毒素，吃後的人身上發黃發腫而死 13 人，剩下五人未死的原因是只吃了一點，其他公社也有吃人的事，如馬六營區何國芳的母親（58 歲），叫劉清淑埋後第二天就被別人將大腿和手臂割去。

表一 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區被吃死者名單

姓名	性別	年齡	備考
馬德惠	女	3 歲	
馬德香	女	10 歲	
向學潤	女	8 歲	
袁家林	男	18 歲	
陳世蘭	女	20 歲	
孫寶成	男	3 歲	兄弟關係
孫寶盧	男	1 歲多	兄弟關係
陳三叔	男	30 多歲	
馬則民	男	30 歲	人心被挖吃
秦興強	男	10 幾歲	兄弟關係
秦毛	男	5 歲	兄弟關係
袁毛	男	7 歲	兄弟關係，被母親馮厚珍吃掉
袁二毛	男	5 歲	兄弟關係
袁二頭	男	5 歲	被母親陳世蘭吃掉
無名	男	12 歲	此二男孩倒斃荒草中無主
無名	男	8 歲多	

表二 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區吃死屍者名單

姓名	性別	年齡	成份	本人 生死	家中原有 人口	家中現 存人口	備註
陳家蘭	女	20 幾歲	老上	死	2	無	
馮厚珍	女	30 幾歲	老上	死	5	無	
吳加志	女	40 幾歲	老上	死	5	1	
袁家才	男	7 歲	老上	死	6	無	
袁家伍	女	12 歲	新上	死	6	1	
陳世蘭	女	20 歲	貧農	死	4	無	
羅文修	女	70 多歲	貧農	死	2	無	母女關係
孫國貞	女	40 幾歲	新上	死	2	無	
羅洪漢	男	12 歲	老上	死	6	無	
馬德祥	男	12 歲多	貧農	死	7	無	兄妹關係
馬德香	女	10 幾歲	貧農	死	7	無	自己也被吃了
汪德貞	女	45 歲	地主	死	2	1	
向朝必	男	30 幾歲	老上	死	6	4	已逮捕，死亡
陳世美	女	32 歲	老上	活	6	4	夫妻關係
向盛梅	女	54 歲	貧農	活	2	2	只嚐了嬰兒肉
石顯培	女	25 歲	貧農	活	2	1	同上
馬培蘭	女	30 多歲	老上	活	4	3	同上
向世身	女	16 歲	地主	活	2	3	同上

任何流覽一下上面的表格的人，便不難發見如下的統計資料：第一、75%的被吃者是1-12歲的體弱的未成年人，他們在饑荒中最容易夭折。這些案件全部是食屍案，即沒有暴力殺人而食的惡性案件。第二、84%的吃人者為成年人。如果我們進一步統計一下他們的「階級成分」，會發現44%為貧下中農成分；38%為中農成分。所以，所謂吃人是「階級敵人破壞」的藉口並不成立。即便兩個為「地主成分」的吃人者，一個女性（汪德貞），45歲，大概是「地主婆」之類。另一個（向世身）也是女性，且年僅16歲。她本人不可能是「地主」，只可能是「家庭

成分」不好而已。第三、大多數（72%）的食人者——不管其階級成分如何——最後也都餓死了；甚至 50% 的食人者整個家庭都死絕。這又充分說明，這裡沒有任何「階級鬥爭」的動機，任何一個食人者只是出於極端饑餓下被激發和異化了的本能求生慾望。

如同我們在本文的第二節中引用的同一份秘密檔案所揭示的，石柱縣橋頭區有著極為嚴重的「人口死亡問題」，即超過 25.86% 的非正常死亡率。明白了這一點，便更不難理解，逼人走向死亡的饑饉其實是不分階級成分的。如果一定要說階級成分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後果，可能黑五類及其家人更容易成為受害者，因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他們都處於農村的最底層，最容易被餓死和吃掉。在河南的信陽事件中，根據中央工作組 1960 年 6 月 18 日的《關於河南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據上述左園大隊統計，該大隊貧農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 13%，地主富農死亡佔其總人數的 31%。」那麼受害最少的是哪些人呢？《調查報告》指出，是中共的「基層幹部及其家屬」。「城郊公社楊波大隊共有 156 戶，沒有死人的 31 戶，其中幹部 13 戶，炊事員 4 戶，磨面的 1 戶。該大隊前店生產隊共 31 戶，沒有死人的 6 戶中就有幹部 3 戶。」毫無疑問，中共的「基層幹部及其家屬」之所以可以在大饑荒中活得好好的，是因為他們利用職權，貪污糧食或多吃多占。鑒於此，新華社《內部參考》的「階級敵人破壞」論不僅不符合事實，反而是殘忍地向受害最深的弱勢群體潑了道德污水。

第二份絕密檔案，即中央慰問團寧夏分團關於甘肅臨夏市、和政縣和東鄉縣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以下是檔案部分文字：

###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甘收（61）2853；1961 年 3 月 3 日

來文機關：慰問團寧夏分團

甘肅省委收文批辦單

本件共收到 19 份，已分發：汪鋒、健君、仲良、世泰、曾固、鵬圖、秉祥、潤華、定單、坤潤、秘書長、辦公廳、秘書辦公室並中央工作組，臨夏州委，存檔

臨夏市

檔案以表格方式統計和分析了人吃人的現象，關於臨夏市的情況如下（見照片），和政縣和東鄉縣的表格，我們此處就不再說明。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發生時間	地點	作案人		被害者		方式	原因	主觀情事	處理結果
		姓名	成份/人數	姓名	與作案人關係/人數				
60.元.24 一起	馬樂公社 鐵峽村	張二個				8	挖吃尸体	生活困難	
60.2.2	紅會公社 觀合及社	楊忠生	貧 1	楊三順	親弟弟	1	杀死吃的	"	
60.3. 一起	隴康公社 子石寶店庄	尹五成	貧			4	挖吃尸体	"	
60.3.	隴康公社 廟灣西 廟灣社	趙半乃			亲生女孩	1	"	"	
60.3.1	紅會公社 紅茶大隊	趙香香				1	杀死小孩	"	處捕
60.3.	大河家 骨紅社	范任秀成			同村人	1	挖吃尸体	"	
60.3.	大河家 大隊大庄人	盟				1	"	"	
60.3.	大河家 石碌 生庄社	石万山				1	"	"	
60.3.	大河家 生庄社	范托紅成			自己父系	1	"	"	
60.3.	大河家 去社	王廷和成				1	"	"	
60.3.	大河家 信坪	范清龍吉				1	"	"	

- 1 -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發生時間	地點	作案人		被害者		方式	原因	主觀情事	處理結果
		姓名	成份/人數	姓名	與作案人關係/人數				
60.11	隴康公社 林武坪生庄	康守朋	貧			1	挖吃尸体	生活困難	處捕
	隊旗子村	朱五十七	貧	王玉成	同村人	1	杀死	"	處捕
60.4		李正月花	貧	賄哈三	外鄉人	1	"	"	處捕
				周拉比強	"	1	"	"	
				雷非牙	"	1	"	"	
				安五十九	"	1	"	"	
				周德勝	同村人	1	"	"	
				趙亞三	"	1	"	"	
				周文和	貧 1	崔由成	"	1	杀死
60.元.18	隴康公社 曹家坡	乔家坪	貧 1	楊永慶	亲生女孩	1	病死 杀死	"	已死亡
60.3	大河家公社 趙通	范存龍	貧 1	丈夫	1	挖吃尸体	"		

發生時間	地點	作案人			被害人			方式	原因	主要情節	處理結果
		姓名	成份	人數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數				
60.3.3	南龍公社 張坪人	邱三德		1			1	吃尸体	生活問題		
60.8	紅台公社 小西門	朱双喜		2	丈夫、妻子		2	吃尸体	*		
60.	尹集公社 高家溝	馬排川		1			1	吃尸体	*		
60.	尹集公社 高家溝	尙物保		1			1	吃尸体	*		
60.	西河公社				流竄人口		1	杀吃	*		
60.2.17	紅台公社 大隊	楊生忠			自己儿子		1	死后煮吃	*		

- 3 -

(照片說明：臨夏市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首先，這份絕密檔案所披露的發生「人相食」案件，發生在甘肅臨夏市與和政縣，如同我們在本節開篇處引用的縣志記載，這都是大饑荒中餓死人最多的地區。「三年間該縣（和政縣）非正常死亡數高達人口的21.7%。」1962年3月6日，「（臨夏）市委（含臨夏縣、永靖縣）給州委的《臨夏市委關於人口死亡問題的報告》載：1959年至1961年9月底，全縣死亡37158人，佔1958年農村人口的8.45%。」由於太多小學生餓死在這場大饑饉中，8月15日，「縣委決定14所小學因無學生，暫時放假，29所小學停辦。」這也提供了我們在此份檔案中看到很多5-13歲的孩子死後被吃的大背景。

其次，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在全部45例食人案中，只有10起是有暴力殺人的惡性案件，佔22%。其餘的78%都是吃死人的案件，理由都是「生活問題」，即在餓死前的求生掙扎。

（二）在全部45例食人案中，64%的食人者（29人）為貧農，只有兩人是「地主」和「富農」。顯而易見，這裡並沒有中共一貫宣傳的「階級報復」等原因。尤其在10起有暴力殺人的惡性案件裡，90%的作案者是貧農。其中林家坪生產隊寨子村的貧農朱五十七和李正月花就連續作案殺人而食七起。（三）24%的食人者和被食者之間還有父子、

兒女、夫妻等家庭關係。

「人相食」已經極其殘忍，可說是人類文化的最高禁忌。但是在人類所經歷的這一苦難中，最大的苦難又莫過於被迫吃掉自己的親人。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政策，就製造了這樣的家庭成員之間互想吞噬的人間慘劇出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不倫的自虐自殘行為，使人性倒退到獸性，從而也徹底地摧毀了農村社會的基本道德體系。

#### 4 | 結論

應當指出的是，本文所引用的有關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人相食」的全部資料，都來自中共體制內的著述。它們或為親歷者的回憶和見證；或為當年各級政府的內部文件案檔；或為今天的縣志記載。每起案例都可列出時間、人物、地點諸要素加以佐證。總之，都具有無可辯駁的可靠性和權威性。現在的網路上，常常有一些善良的年輕人不相信當年有過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禍」。看了本文所列舉的「人相食」的案例，他們應當開始直面這一由白骨和屍體構築的血淋淋的史實了。

設想一下：如果在一個共「82戶491口」的生產隊裡（四川省崇慶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48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綫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如果在一個大隊，如安徽省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的「29個自然村中，有26個（約佔89.6%）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如果在一個公社（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公社）的一年中就發生16起「人相食」的事件並被詳細記錄在案；如果僅一個省（安徽省）就有過因饑餓造成的高達1189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們便不難想像，當時整個中國農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間地獄，數千萬人出現非正常死亡，這絕對不是隨意杜撰出來的「天方夜譚」！

以外，我們還要指出，和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人吃人」慘劇不同，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發生在沒有大規模的天災和全國性戰亂（包括異族入侵）的時期，但卻波及了全國。這足以說明這是一種

全國性的政策，即「人禍」導致的饑饉，進而造成中國農民人性的被迫淪喪。然而，在我們所接觸到的檔案、回憶和縣志記載中可以看到，儘管農民早已經頻臨在樹皮草根全部吃光的死亡線上，儘管饑餓迫使人性淪喪為食人的獸性，但暴力殺人而食的惡性案件還是非常少數。一方面，不論何種原因，食人者都是不可饒恕的。另一方面，在饑餓中的中國農民還畢竟表現出了最後一絲未被泯滅的善良人性。而大量的「人吃人」案件發生在父子、兒女、夫妻之間，更表現了執政者製造的「人禍」對中國社會最基本的人倫道德的摧殘和中國農民的最悲慘的自殘自虐。

在當代中國人所經歷過的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相食」了。而所有發生在「新中國」的這類人間慘劇，又莫過於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了。在中國傳統的修史中，「人相食」時一定要上史書記載的。但是，發生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人相食」現象，至今還被中國的執政者有意掩蓋，千方百計地迫使大眾忘卻。因此，對任何一個中國歷史學者而言，都有責任揭露和記載這一悲慘的歷史真相。

##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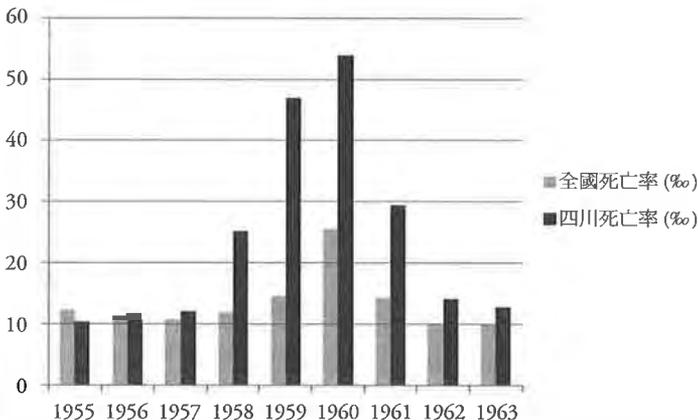
### 1958-1962：四川省大饑荒

文 | 丁抒

#### 一 | 四川的人口死亡率遠遠高於全國平均值

我們先從一張圖表談起。這張表格比較了四川省和全國在大饑荒前後的人口死亡率。如下：

大饑荒前後四川省與全國死亡率比較



資料來源：《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22、523頁。《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1988）第690頁。

人稱「天府之國」的四川，1958年大躍進時人口為7081萬，是中國第一大省。這張圖表是四川省從1954至1962年的人口死亡率。我們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57年，全國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卻是逐年上升的。從1956年起，四川的人口死亡率就高於全國的平均值了。1958至1962年間，四川的人口死亡率為什麼遠遠高於全國的平均值？下面我們來看看原因是什麼。

## 1 | 「統購統銷」

中共從1953年開始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這類似蘇共「餘糧徵集制」，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的購銷，全部由國家壟斷。除了政府規定的「留糧」（含口糧、飼料糧、種子糧等）外，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統一經銷。按毛澤東的說法，「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統購統銷，就是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

每年「統購」的數字是在中南海決定的。地裡糧食還沒長出來時，收購指標就已分配到各省各縣，成為「國家任務」了。明明是強制收購，卻又冠之以「賣餘糧」。至於有沒有餘糧，農民自己說了不算，因為「留糧」該是多少，也是黨決定的。就這樣，僅用一個數字，就「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了。

自執政起，中共就開始實行剝削農民以積累資金發展重工業的方針。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鮮戰爭財政吃緊，在11月15日的中央財委會議上，陳雲曾說：「請農民幫忙。現在還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資產階級找出路，公務人員亦沒有什麼油水……還是多剝削農民。」（1962年，鄧小平也曾承認，「過去剝削農民多了。」）

農民糧食不夠吃，來年青黃不接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先徵後銷」。這「先徵後銷」，往返運輸的浪費且不說，當幹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銷糧時，往往已經餓死了人。

農民反抗，當局便以「反對統購統銷」的罪名加以鎮壓。從1953年冬

到1954年春，四川省處決了512名「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

1953年11月，崇慶縣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全縣統購任務本為1400萬公斤，由於層層加碼，實際徵購了1864萬公斤。1954年農民缺糧，在六月中至七月底的一個半月內，僅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一個村莊裡就餓死了18人。

超額徵購，而「返銷」太遲或太少，這導致了農民餓死。在1958年之前這種現象已經出現，只不過規模沒1958-1961年那麼大而已。

## 2 | 1958年「大躍進」就死亡100萬

1955至1957年，全國的平均死亡率是10.55‰，四川的情況是，1956、1957年死亡率為10.41‰和12.07‰，和全國平均值相差不大，但1958年四川的死亡率陡增至25.17‰，非正常死亡達100萬！

試據幾個縣的死亡率為例來說明。江北縣（今重慶市渝北區），1958年的死亡率比大躍進前的幾年高50%。渠縣，1956、1957年的死亡率為9.37‰和11.84‰，1958年劇升至23.73‰，有1.2萬人非正常死亡。高縣，1958年的死亡率高達34.05‰。水田肥美的灌縣，1958年的死亡率陡增一倍至24‰。萬源縣，1958年死亡率也劇升一倍以上至25.6‰。合川縣，1955至1957年平均每年死亡9822人，而1958年死亡數劇增至18469人。富順縣有1.13萬人非正常死亡。簡陽縣1958年死亡了4.59萬人，死亡率達37.2‰！

## 3 | 1959年：「無米下鍋」

1958年四川實產糧食2250萬噸，可是省委誇大了一倍，接著下達比1957年徵購數增加了50%的「徵購任務」。「徵購入庫（的糧食）佔實際產量三分之一。」據當時擔任中共瀘州地委第一書記的鄧自力說：「人民公社化時，從社員那裡將糧食集中起來，除繳國家徵購糧外，剩餘的糧食被大吃大喝或貪汙盜竊，沒到（1959年）春節已無米

下鍋。」「到春節，許多伙食團就無米下鍋了，只好煮菜當飯吃。」

1959年初，四川各地開始零星餓死人。華陽縣委機關門口就發現了倒地的餓殍，縣委書記馬維政被撤職。五月間，四川主要糧倉溫江地區已有許多公社食堂因糧食告罄而關門，四川省委迫於形勢，一度允許個別堅持退出食堂的人退出，自行開伙。但是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扭轉了形勢。解散公社食堂的鄧自力等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職，此後，收穫的糧食全部歸公社食堂掌握，農民又被迫進食堂吃大鍋飯。

1959年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664萬噸，但是由於反右傾，徵購糧比1958年反而增加了73萬噸，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糧食增加了48萬噸。下面是大躍進前後幾年四川糧食產量和徵購數：

四川徵購及留糧表（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

年份	糧食產量 (萬噸)	收購量 (萬噸)	購後留糧 (萬)	農業人口	農業人口人均 留糧(公斤)	糧食調出省 (萬噸)
1957	2130	498	1632	6188	264	292.2
1958	2246	748	1498	6039	248	198.5
1959	1582	774	808	5814	139	246.5
1960	1340	616	724	5552	130	143.4
1961	1155	448	707	5487	129	20

資料來源：《四川省志·大事紀述》（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當代中國的四川（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當代四川大事輯要》（1991）；《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從上表可以看出，四川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及1957年的74.3%，可是徵購數卻是1957年的1.55倍。以致平均每個農業人口的購後留糧僅及1957年的52.7%，每個農民的留糧減少了125公斤。除去必須的種籽和牲畜飼料糧，無論如何是維持不了生命的。這就是四川大饑饉的根源。

1960年，四川的糧食產量比國民政府在四川的最後一年（1949）的產量還要低10%以上，可是四川省委還在吹牛。據當時擔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書記的廖井丹說：「1960年全國人代會，李大章講四川產量是1260億斤，實際那時只有300多或400億斤。虛報那麼多，農民手中只有那麼些，怎麼能不出問題呢？」

1960年，全省農村人口的平均留糧只有130公斤，除去必須的種籽和牲畜飼料糧，無論如何是維持不了生命的。由於1961年農村人口的人均留糧仍然只有129公斤，故四川的饑荒一直持續到1962年。因此，以大饑荒持續之久而論，四川是全國第一。

#### 4 | 全國最低的口糧標準

四川除成都平原外，多為丘陵山地，人口眾多，生產力低下，農村產糧除農民自食自用外，商品率只在20-30%之間。而1959年四川徵購的糧食竟然佔去了產量的49%。徵購率比全國平均水準將近高十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留糧比全國平均數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959年四川農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256公斤）猛降為278斤（136公斤），1960年又繼續下降到260斤（130公斤），兩年都低於全國農村人均378斤（189公斤）的留糧水準。

農民的口糧完全不足以維持生命。譬如江津縣，「1959年，全縣農村人平分糧83公斤。」平均每人每日僅0.23公斤原糧，折合大米僅170克。南部縣，「口糧標準人平每日二兩原糧……人口死亡率急劇上升。」1960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10.67萬，佔1957年人口的12.8%。

四川省委規定口糧標準：「城市居民是21斤，幹部只有19斤，農村社員一般是16兩老秤（16兩秤合一斤，即500克）的四至五兩原糧。即便就是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只有空指標沒有糧食。」按五兩計，為156克原糧，折合大米不到117克。

117 克大米是維持不了生命的。中共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曾作出一項決議：地委和溫江專區的機關幹部每人每天定量半斤米，即 250 克。這個定量已經高於農民口糧的一倍以上，但實行了沒多久，宋文彬自己就得了浮腫病，上廁所時一頭栽倒在地。

1960 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原糧，合大米 0.18 公斤），這是 1959 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宋文彬爭辯說：「1959 年按這個標準，一個冬春餓死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宋文彬以為中央不瞭解四川的情況，問：「能不能把我們的情況向中央反映一下？」省委書記廖志高解釋說，省委已經向中央反映了，如果多調一億斤糧食，會餓死多少人，「但是中央還是要調。」

1961 年，四川全省「農村人均口糧只有 129 公斤。」中共中央辦公廳財貿組組長蕭風 1962 年赴四川調查後，在調查報告裡說：「1961 年後，規定貿易糧六兩、四兩（16 兩秤，下同），有 600 萬人口的特別嚴重地區，每天只有二到三兩。」四兩貿易糧只有 125 克大米，沒有誰能靠這點米維系生命。

## 二 | 餓殍遍全省

### 1 | 溫江地區：「天府之國」前所未有的大饑荒

所謂「天府之國」，歷史上指的是溫江地區這一片豐饒的川西平原，包括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郫縣、崇慶、金堂、大邑、邛峽等 11 個縣。該地區是四川的糧倉。其中自然條件最好的「上五縣」是溫江縣、郫縣、崇慶縣、新津縣、灌縣（今都江堰市）。

溫江縣，1958 至 1961 年出生 0.92 萬人，比四年正常死亡人數多 0.20 萬，而人口由 1957 年末的 16.78 萬降至 1961 年末的 14.31 萬，下降了 2.47 萬人。即共少了 2.67 萬人。而按《溫江縣志》發表的歷年人口死亡數，非正常死亡為 2.36 萬，佔 1957 年末人口的 14.04%。

郫縣是大躍進運動的發源地所在。1958年3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飛抵成都，住進西郊的金牛壩招待所。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了一個為時近20天的工作會議，毛澤東就是在這裡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會議期間的3月16日，毛澤東參觀了位於金牛壩以西幾公里的郫縣紅光合作社，因此紅光社就成了大躍進運動的樣板。9月12日的《四川日報》曾經在頭版刊出「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產乾穀8.25萬斤」的大新聞！

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郫縣又打頭陣，第一個完成糧食徵購任務。但不久該縣的公社食堂即相繼斷糧、關門，溫江地委決定給他們一些救濟糧。可是郫縣要保持其光榮，拒不接受救濟，農民只有餓死。

毛澤東視察過的郫縣紅光合作社，後來是紅光人民公社紅光管區。一個冬春，全管區死亡800多人，約佔公社成立時人口的20%，其中二生產隊全隊370多人，死去140多人。

根據溫江地委1961年的一份調查材料，該社（即原紅光合作社）1958年有4020人，在慶祝毛主席視察紅光社三周年的日子裡，還剩2775人，淨減1245人，少了三分之一。

紅光管區所在的合興分社……公社成立初，全分社人口為11394人，到1960年底只有8767人，其中死亡2408人，另有2199人「不知去向」。

《郫縣志》載：1961年末比1957年減員5.38萬，佔1957年末人口的19.1%。僅1960年一年內就死亡了43865人。「紅光社，開紅花，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這是全四川的學童們都必須背誦的歌謠，但到底有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的學童餓死已不可考！

## 2 | 崇慶縣的殺子案與「易子而食」

崇慶縣也座落在豐饒的成都平原上。今《崇慶縣志》載：1958至1961年死亡5.78萬人，3.5萬屬非正常死亡，佔1958年人口的8.1%。

地處都江堰自流灌區的崇慶縣何家壩，千百年來都是旱澇保收的豐饒之鄉，當時屬白頭人民公社三大隊一隊。該生產隊 21 戶中的 17 戶中，共死去何祝安夫婦、何學元等 34 人，包括生產隊長何開松，佔人口的 28.3%。四大隊八隊，人口死了一半以上。

1960 年 11 月，崇慶縣委農村工作組副組長鄭大軍率領整風整社工作組一行四人，到東陽公社二大隊蹲點。在當晚的全體社員大會上，大隊黨支書不服，頂撞工作組說：「我沒有搞明顯的等級。餓死的社員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難受麼？可後山的五大隊咋樣？都吃人了……」「我閨女前天逃回娘家來，說她們生產隊幾歲的女娃兒快叫吃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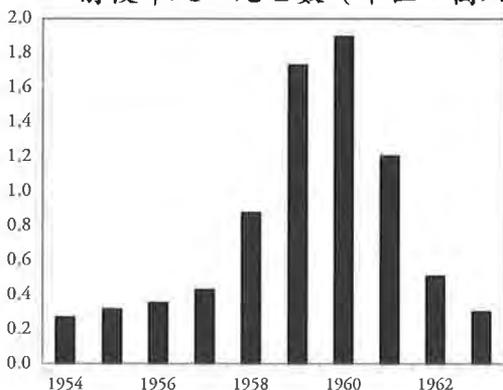
鄭大軍立即派組員連夜回縣委匯報，他則去後山五大隊。通過調查，揭開了東陽五大隊第一生產隊人吃人的內幕：「全隊共 82 戶 491 口，僅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 48 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綫出生女童人數的 90%；83% 的家庭有吃人史。」這段歷史，在 2008 年《往事微痕》第 13 期〈幾樁人吃人的案例〉一文中，鄭有描述。

吃孩子的例子很多。1962 年 4 月，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八機部（即農業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依照副總理譚震林的指示，派出一個以顧大川為首的調查組赴四川調查。該組回京後所寫的《農村調查》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當時全公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達一百多人。嚴重的隊，死了人沒人抬，有的四、五天還沒埋。同時也出現了吃死孩子的現象，如胡麼嫂要活命，曾將自己的四、五歲的小孩（死後）煮吃了……」

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 1961 年在長壽縣渡舟公社也見到了「易子而食」的案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什麼叫『家徒四壁』？什麼叫『野有餓殍』？什麼叫『易子而食』?! 我這才是真正眼見為實。」

拜都江堰所賜，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觀光，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但這個從未有過饑饉的好地方，1958-1962年共死亡6.22萬人，佔1958年人口的16.4%。其中4.4萬屬非正常死亡。從1958年到1960年，灌縣的農業戶少了3036家。具體見下表：

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1958年前後年人口死亡數（單位：萬人）



資歷來源：據《灌縣志》（1991）記載統計製成

原溫江地委黨校幹部王萬澄在1960年11月致信毛澤東說：

主席，這是一篇用血和淚寫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主席，如收到請仔細閱讀。……我知道有一個管區一下就死了一百多人。有的全家九口一齊死完，其中有好幾個還是精強力壯的……

主席，你應該立即從會議中、從汽車中、從辦公室中、從書齋中、從美味的食品中解放出來。你獨自一人悄悄到我們溫江專區來調查一下，直接到食堂中，農民的家中來瞭解一下。

我看見農民因糧食吃不飽而慢慢死去，我很痛心。你是否又在走 53 年匈牙利不顧人民生活需要而片面主觀去無限發展重工業，因而大大影響了農民生活水準（的道路）呢？……

主席，你為啥在農村中犯下了如此殘酷的行為——餓死了（人），你還在越來越把農民引上死亡的道路呢？

在這些事實面前，我對黨非常失望，如果這種餓死人的情形再得不到糾正，我只有要求退黨，退出這使農民餓死的黨……

最後，我高呼，偉大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勞動者農民萬歲！

#### 4 | 溫江專區諸縣

今《廣漢縣志》記載：廣漢縣（今屬德陽市）1959-1961 年死亡 5.15 萬人。但 1958-60 年出生數比三年正常死亡總數多 1.18 萬，1960 年人口應比 1957 年增加 1.18 萬，而實際減少了 4.9 萬，即 6.08 萬人「失蹤」。鑑於「外流失蹤」者存活數極少，非正常死亡至少 5.5 萬，佔人口的 16.1%。

該縣金魚公社，自 1959 年冬到 1960 年 6 月，三至九歲的小孩死了 358 個。1960 年 3 月，省長李大章視察後，將縣委第一書記呂孝先撤職，將死人特別嚴重的新豐公社黨委書記李克淦逮捕判了刑。

邛崃縣道佐公社，1960 年底四川省公安廳、中共邛崃縣委聯合工作組調查的結果是：1958 年 11 月建立公社時有 840 人，出生 19 人，遷入 11 人，應有 870 人。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 262 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 516 人。

人口僅 18.74 萬的新津縣，1960 年一年間就死亡了 1.80 萬人，計有 2.15 萬人非正常死亡，佔 1958 年末人口 11.9%。該縣武陽鎮的居民多屬「農村戶口」，也屬農民。僅 1.46 萬人口的小鎮，在 1960 年一年裡死了 1100 人。

什邡縣（今屬德陽市）：1958至1962年共死亡5.12萬人。其中3.92萬是非正常死亡，佔1958年人口的13.1%。

成都南邊的雙流縣，人口由1957年的53.56萬降至1960年的43.81萬，減少9.75萬。1958至1960年共出生2.92萬，比三年正常死亡數多0.9萬。即有10.65萬人「失蹤」：非正常死亡和少量的「盲流」。設若有一萬人在他鄉存活，則有18%的人口，即9.65萬人非正常死亡。

大邑縣，1956至1962年死亡人數分別為2545、4911、8192、31872、33045、13739、4225。共計有7.16萬人非正常死亡，佔1958年人口的20.6%。

就全省範圍來看，溫江專區算不上死人最嚴重的地區。《當代四川大事輯要》載，四川1960年前後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雅安、樂山、涪陵、江津四專區最為嚴重。」今在此四專區各取數縣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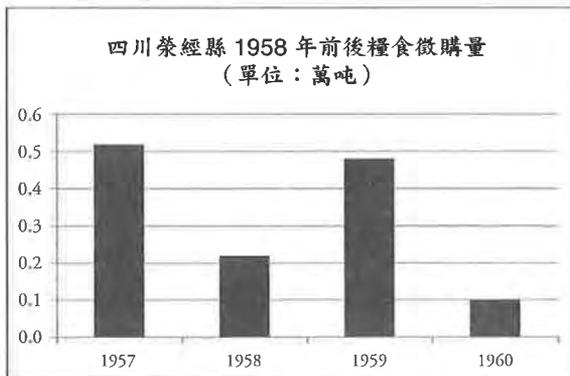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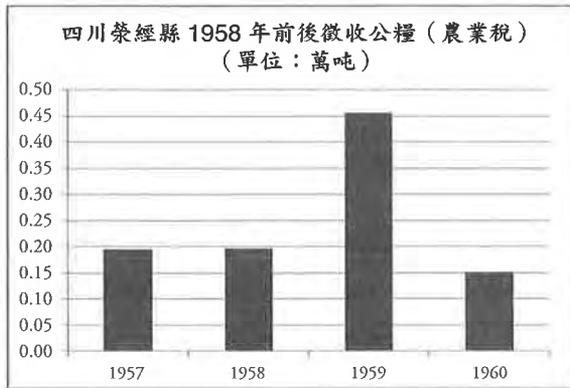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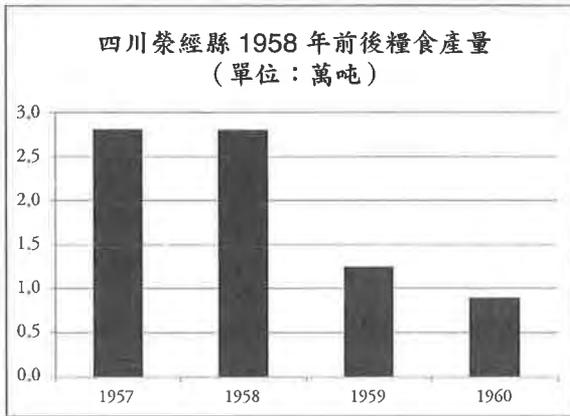
## 5 | 雅安專區：榮經慘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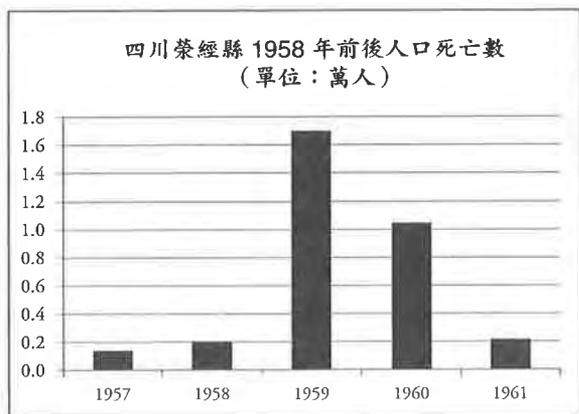
1962年6月，當年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時曾說：「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一個是雅安地區的榮經縣，一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

1959年5月，已出現嚴重非正常死亡。1959年糧食大幅減產，但是「公糧徵收高達457萬公斤，比上年度196.5萬公斤增長132.57%。」「統購糧」也大幅增加。見下頁圖表：

從1959年11月初起，榮經縣60%的食堂粒米不見，全靠紅薯、玉米摻野菜下鍋，沒多久就大面積死人。該縣人口從1958年的12.37萬減少到1962年的6.97萬，少了接近一半。

但按《榮經縣志》的死亡數字計算，非正常死亡僅2.87萬，另有2.7萬人平白「失蹤」。若把「失蹤者」也計入死亡數，榮經縣的非正常





死亡就是 45%，和 1962 年的榮經縣委書記閻桂芳說的「人口死了一半」大致吻合。縣志的編者顯然壓低、杜撰了死亡數。

1960 年 3 月，四川省委派人調查榮經的非正常死亡。這年秋天，李井泉下令將榮經縣委書記姚青逮捕，判刑八年，送簡陽平泉勞改農場勞改。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將 170 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捉去坐牢。

## 6 | 樂山專區：夾江、井研、犍為縣八分之一人口非正常死亡

豐饒富庶的夾江縣，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與岷江會合。會合處就是樂山大佛所在。「1959 年全縣糧食比 1958 年減產 1098 萬公斤，徵購反而增加 750 萬公斤。」縣委規定，「口糧標準按年齡、勞力分為 5 級，吃 16 兩制舊秤 2、4、6、8、10 兩。」2 兩原糧折成大米不到 50 克，只能喂個雞。吃 2 兩的人必死無疑，吃 4 兩的很難活命，吃 6 兩的也不一定熬得過去。夾江縣 1958 年底的人口為 18 萬，今《夾江縣志》記載：1959 至 1961 年三年間，共死亡 30519 人。其中 2.34 萬屬非正常死亡，佔 1958 年末人口的 13%。

井研縣有 13.2% 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井研縣志》載：「人口死亡率

超過歷史最高水準。」犍為縣，有 4.8 萬人非正常死亡，是 1958 年末人口的 13.2%。

1959 年 6 月，仁壽縣有農民餓死的消息傳到了省會成都。省委書記閻紅彥率工作組前去調查後，撥給了仁壽 500 萬斤糧食。但全縣人口近 120 萬，人均不到 5 斤，杯水車薪，遏制不了死亡。九月又搞反瞞產，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被搜走。接著就是大量餓死人。《仁壽縣志》載：1958 年末人口為 106.87 萬，1961 年總人口降至 92.56 萬。1961 年內死亡 4.25 萬人。（1959、60 年死亡人數厥如）

### 7 | 涪陵專區：「鬼城」鄧都

彭水縣，縣公安局 1959 至 1961 年上報的死亡數是：12310 人（上半年 6163 人，下半年 6147 人）、27932 人、22195 人，共 62437 人。

1961 年 9 月，四川省公安廳在瀘州召開戶口工作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人口普查。彭水縣人口普查辦公室 1962 年 3 月 5 日完成《彭水 1954-1961 年人口普查核實增減情況統計表》。將該表和縣公安局上報的死亡數字比照，可以發現公安局在 1959 年少報了 5562 人，1960 年少報 2847 人，而 1961 年沒有少報，與縣人口普查辦公室數字完全一致。因此，彭水縣在三年中死亡了 7.08 萬人，其中的 5.66 萬屬非正常死亡，佔 1958 年末人口 39.31 萬的 14.4%。

墊江縣，8.1 萬人，非正常死亡率為 15%。非正常死亡集中在 1959、1960 年，到 1961 年就恢復正常了。

南川縣人口 1958 年為 40.9 萬，1962 年為 34.6 萬，下降了 15%。僅 1959 和 1960 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已高達 7.6%。非正常死亡佔人口的 10% 以上。

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當時叫鄧都。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豐都。該縣 1958 至 1960 年的死亡人數分別為 1.09、2.86、7.33 萬人，非正常死亡 9.77 萬人，佔 1957 年底人口的 17.1%。鄧都成了名副其實的「鬼

城」。1960年3月，縣委第一書記劉維梓被撤職，5月，劉維梓和縣委書記李志亮、縣委農工部長余家發、公安局長楊坤山等被逮捕判刑。

整個涪陵專區1961年末人口比1959年末減少了88.5萬，佔20.2%。專區所在的涪陵縣由77.26萬減至53.58萬，減少了30.4%。然此數似偏低。

1962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開會後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副部長高蘭戈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說：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萬。」

### 8 | 江津專區主要水稻產地：合川、大足、江津縣

江津地區是四川主要水稻產地之一。由於大躍進浮誇，「從1959年到1961年的糧食徵購數均佔實際糧食總產量的50%左右。剩下的糧食，除去種子、飼料，社員口糧所剩無幾……一天八兩、十兩都無法保證……1961年，新發、復發的腫病患者達百萬以上，非正常死亡40餘萬人。」

從重慶沿嘉陵江上溯約40公里是合川縣（今重慶市合川區）。「合川」是嘉陵江、渠江、涪江匯合處（筆者出生地就在匯合處的東津沱）。該縣1958至1962年分別死亡1.85、3.17、3.25、3.00、2.48萬人，共13.75萬，除去正常死亡5.25萬，計8.5萬人非正常死亡，佔人口的8.2%。

大足縣，14.3%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峰值在1961年。

江津縣聖泉人民公社，1960年人口比1958年減少2471人，佔1958年人口的17.1%。

「非農業人口」（包括拿薪金的幹部、中小學教師、中學生商店職工等）有「定量」保證，無餓死之憂。而種糧食的農業人口是不受保護的。譬如江津縣塘河人民公社，1960年農業人口比1958年減少1454

人，佔 1958 年人口的 12.2%，而該公社的非農業人口僅減少 13 人，佔 2.2%。

### 9 | 內江專區簡陽、榮縣非正常死亡六分之一、四分之一人口

除了上述四個專區，其他專區也有不少縣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

1960 年 1 月 12 日，專供中央領導閱讀的新華社《內部參考》曾經刊登一則報導，稱「內江縣順江人民公社實行基本社有制以來，各項建設事業全面躍進……」實際此時內江縣已被災難籠罩。據三月初的統計，「全縣腫病嚴重，時有 1.7 萬人，以高梁、郭北兩區為多。」「每人每天半斤原糧」，到農民嘴裡的更少。今《內江縣志》部分披露了當時的情況：1959 至 1961 年間，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均處於極不正常狀態。1960 年和 1961 年春，發生嚴重饑荒，人口外流和死亡率增大，人口銳減。1961 年秋後經濟好轉。該縣 1957 年有 13.47 萬戶，62.08 萬人，到 1961 年末僅 13.27 萬戶，51.45 萬人，減少了 2002 戶，10.63 萬人。安嶽縣：1961 年人口比 1957 年減少 13.08 萬，佔 1957 年人口 13.2%。

簡陽縣：1958 至 1962 年分別死亡 4.59、7.19、9.35、4.68、1.60 萬人，共 27.43 萬人。其中 19.88 萬人屬非正常死亡，佔 1957 年人口之 16.3%。

榮縣：1950 至 1957 年平均年死亡 0.66 萬人，而 1958 至 1961 年共死亡 18.95 萬人，年均 4.74 萬。非正常死亡 16.31 萬，幾佔 1957 年底人口的四分之一。

### 10 | 宜賓專區：長寧縣餓死三分之一

宜賓市，1959 年「反瞞產私分」後，該市所屬農村的平均每人年口糧只剩幾十公斤。1958-1961 年共死亡 4.86 萬人，其中 3.81 萬人屬非正

常死亡。就宜賓市整體而言，12.4% 為非正常死亡。若非正常死亡的 95% 發生在該市管轄的郊區農村，則農村 16 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為 22.3%。

原中共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 1959 年反右傾時被撤職。他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堂弟，1962 年得以復出任宜賓地委副書記。他說：

農村腫病橫行，死屍遍野，慘不忍睹。腫病全是營養不足所致。每人一天三兩，又要勞動，入不敷出，長此下去當然生病。……糧食不夠就搞代食品，什麼胡豆葉、芭蕉頭、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來充饑。後來這些東西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觀音土。觀音土吃下去肚子發脹，不能排泄，幾天後就被脹死。……饑荒越來越嚴重，後來，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謠傳吃人肉能治腫病，於是有腫病的人就從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宜賓縣有大約 12.9% 的人口、計 10 萬人餓死。

高縣（含 1960 年 1 月劃入的慶符縣），1958-1962 年分別死亡 0.98、1.25、1.49、1.19、0.56 萬人，共 5.47 萬，其中 3.79 萬屬非正常死亡，佔 1958 年人口的 13%。人死多了，社會良知似乎都被饑餓淹沒。一位朋友告訴筆者：當時高縣小鎮上有人公然用大鍋煮食死難的小孩而被圍觀，但竟無人質疑煮食者是否殺人兇手，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機關。

筠連縣，1961 年人口比 1958 年減少 12807 人，為 1958 年人口的 6.9%。

富順縣，1958 至 1962 年分別死亡 2.27、2.55、6.20、3.82、1.51 萬人，共 16.35 萬。其中 10.86 萬人屬非正常死亡，佔 1957 年人口之 14.1%。1399 名兒童因父母雙亡而成為孤兒。

長寧縣，按《長寧縣志》的數字，1958 至 1961 年共非正常死亡 3.2 萬人，為 1957 年人口的 12.8%。但此數不實。1962 年春，鄧自力被派任長寧縣委副書記。到長寧時，新任縣委書記王健民（原宜賓地委工業部長）

告訴鄧：「長寧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七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了些糧食來，社員又無錢買……」

## 11 | 萬縣專區、達縣專區、綿陽專區

萬縣專區巫山縣，1960年底，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前往調查，在致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廖志高的報告裡說：巫山的大昌區去年春天食堂普遍缺糧，病人很多，幹部搞反瞞產鬥爭，打人、罵人、罰款、扣飯、搜查、沒收相當嚴重，造成人畜大量死亡。有些事情簡直駭人所聞，令人難以置信，全區85000人，死亡18000人，外流3000多。

據《巫山縣志》記載：該縣1958至1960年共死亡了6.8萬人。其中5.72萬屬非正常死亡，佔1957年人口的15.5%。

明朗還到梁平縣調查，並向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和廖志高報告：梁平的問題是嚴重的。我看了八個公社（六個三類社、兩個二類社）、管區和隊，死人最少的是5%，一般都在10%左右，多的達到20-30%，最多的一個區隊，原來是800多人，現在還剩390人……地委估計梁平縣全縣人口死亡約為百分之六。

達縣專區的渠縣，1958至1961年分別死亡2.16、4.63、3.15、2.07萬人，共12.01萬，其中8.5萬為非正常死亡，佔人口的9.4%。

宣漢縣，1958至1961年分別死亡1.05、5.85、4.19、0.8萬人，共11.89萬。其中9.34萬屬非正常死亡。佔1957年全縣71萬人口之13%。

萬源縣，1958至1961年共死亡3.96萬人，其中2.76萬屬非正常死亡，佔1958年人口的8.7%。

綿陽專區成都北邊的綿竹縣，3.6萬人非正常死亡，佔人口的10%。

北川縣，縣委在1961年3月8日發出指示，「各公社要千方百計把住『三八線』（每人一天吃糧三兩八錢稻穀）的關。」即使把住了這條

「三八線」，人們也不一定能活下來。《北川縣志》記載該縣非正常死亡不到5%，另有13.2%的人口在那幾年中遷出。真相如何無法斷定。

## 12 | 甘孜藏族自治州

位於甘孜自治州北部與青海省相連的色達縣，是個牧業縣，轄三區，12鄉，38個村，4141戶，15816人（不包括剛從阿壩自治州劃去的一個區）。1959年7月中旬，部隊進軍「平叛」，11月初開始「民主改革」。1960年2月15日，召開慶祝「民改」勝利大會。接著，開展了三次「鎮反」運動，逮捕200多人，加上集訓營、「平叛」中打死、自殺的，共近千人。而就在慶祝「民主改革」勝利之時，發生了大批人餓死的慘況。

據四川省委派往甘孜的工作組的簡報透露，該縣1960年以來發生的主要問題是人畜死亡嚴重。據縣委的統計：

1、1960年2月起至1961年2月20日止，全縣死亡人口2330人，佔1960年初總人口的14.73%，其中，大章鄉死亡343人，佔該鄉總人口1201人的33.59%。在死亡的人口中，貧中牧佔77.3%；牧主畜牧上層佔22.7%。15歲到50歲青壯年佔三分之一；老弱佔三分之二。

2、該縣1960年初，有各類牲畜134723頭，到1960年底為113416頭，生死相抵淨減21306頭，佔年初總數的15.79%，其中，牛年初為86510頭，年底為64742頭，減少25.16%；馬年初為5540匹，年底為3940匹，減少28.9%。

從死亡的時間看，去年2-6月死亡655人，每月平均死亡131人，7-9月死亡615人，每月平均205人，10-12月死亡661人，每月平均240人。從上述看出，死亡的勞動人民多，老弱多，病死的多，而且從1960年2月以來每月是直線上升的。目前全縣尚有輕重病人1027人，佔現有人口的8%（2月20日的統計）。

階級敵人利用宗教迷信，造謠說什麼1959年是打戰年，1960年是死人

年。從以上情況看，造成死人的原因，主要是從縣委領導到基層幹部不關心群眾疾苦，不顧群眾生活，加之階級敵人的破壞所造成的。……

人畜死亡那麼多，特別是死人從1960年2月以來是直線上升的，一直未認識其嚴重性，泰然處之。既不深入檢查原因，亦不向州委報告，直到去年12月州委工作組到該縣發現後，才向州委作了反映。

甘孜縣大塘壩區，1497戶，5091人。1959年3月開始「平叛」，殺、關、管268人，佔人口5.2%。隨之又有大批人非正常死亡。據1961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委員會的《關於甘孜縣大塘壩區人畜死亡情況簡報》披露：

一年來發生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牲畜減產大，人口死亡多……

人的死亡更為驚人，從1960年初到1961年4月中旬，共死亡747人，佔1960年初全區總人口的12.8%。……區委所在地××部落死亡人口佔總人口的19%，死絕戶佔6.3%。……州委估計，全州牧牲畜減產約佔10%左右。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他牧區亦多少不同的存在，突出的如色達（縣）在1960年死亡人口佔總人口的14.73%。……有一個部落當時因凍餓死了的就有14人，佔總人口的2%。

從以上情況看來，該區病人多、死亡大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即封建統治階級搞叛亂是病人多、死亡大的前因，我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對群眾生活的不夠關心，應該說是主要原因。

### 三 | 結論：非正常死亡一千萬人以上

《四川省志·大事紀述》裡有個統計表〈四川省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960年內，全省173個縣中有161個縣的人口減員超過5%：其中，65個縣超過5%，41個縣超過6%，23個縣超過7%，17個縣超過8%，8個縣超過9%，7個縣超過10%。實際上，多數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10%。

那麼，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

現在可以找到的文獻僅說，從 1958 年到 1962 年，四川省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減少了 779 萬人。按《1985 年中國人口年鑒》的數字計算，四川非正常死亡數是 800 萬。曾經擔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張國華也說過：大躍進期間四川省死人 800 餘萬。而當時的共青團中央委員、重慶市團委書記廖伯康認為，真實的數字在 1000 萬以上。

1962 年 6 月共青團召開三屆七中全會期間，廖伯康先後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也是四川人的楊尚昆匯報了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楊尚昆對廖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 400 萬，實際上四川省民政廳報告的數字，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說是死了 800 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楊問廖：「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答：「1960 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 6236 萬，1957 年的四川人口是 7215.7 萬，少了 1000 萬。」廖又說：「實際上不止這個數字。因為從 1957 年到 1960 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 至 1962 年上半年，全國都好轉了，但四川卻還在死人。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死的人還應加上 250 萬，有文件可查的是 1000 萬，再加 250 萬。」「就是你這個數字！」楊尚昆說，並立即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裡的一個保密櫃打開，拿出一個舊式折疊帳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開看了後說：「就是你這個數字！」

但是，從官方文獻中，是查不出「1000 萬」這個數字的。

在 1962 年 1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有人寫匿名信控告李井泉（當年沒有查出作者，1966 年文化革命中，紅衛兵查出匿名信作者是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不少幹部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還掉了眼淚。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從而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當然，毛澤東不會追究四川的「非正常死亡」，因為一旦追究，就要追到他自己。李井泉懂得法不治眾的道理，他幾次在四川省委的會議上說：「我們四川有些問題，為什麼別的省也有這些問題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個媽養的嘛！」「這幾年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為什麼不檢查呢？主要是為了體貼毛主席的苦衷。」

文革中，李井泉被毛澤東打倒，罪名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因是他與鄧小平、賀龍等人過從甚密，與那 1000 萬非正常死亡是不相干的。

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有兩次銳減。第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搜殺不遺」。全川 600 萬人只剩下不到 10%。另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明朝官軍、入侵清兵之間的爭奪戰又綿延幾十年，人口由 300 多萬銳減至 50 萬。之後，政府不得不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災難雖也屬人禍，但與 1960 年的災難畢竟不同。1960 年前後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麼多人。真是李銳先生所說的「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在餓死了七分之一的子民後，李井泉竟然還官升一級。在 2009 年，中共為李井泉舉行百年冥壽紀念會時甚至讚揚他「始終堅持求真務實」、「始終保持艱苦奮鬥、勤政為民」，「高度重視四川農業發展，滿足群眾和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這更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了。

# 3-3

## 貴州事件始末

文 | 張再興

### 前言

在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之後的短短數月裡，貴州 1700 萬的人口中就慘死了 100 萬以上的農民群眾，他們不是倒在硝煙濃烈的戰場上，更不是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而是因缺糧而被活活地餓死。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極其殘酷的玩笑，並留下恥辱，這就是驚天地、泣鬼神的「貴州事件」。

這一事件的重災區——遵義地區（今遵義市）以及遵義所轄的湄潭縣（當時是由湄潭、鳳崗、余慶三縣合一的大縣）、畢節的金沙縣，則是典型代表地區。根據湄潭、余慶、鳳崗三縣《縣志》合計，湄潭縣死亡 14.58 萬人，佔總人口的 24.10%；金沙縣餓死 6.69 萬人，死亡率 20.32%（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自己認為餓死 4.8 萬人，死亡率 14.6%）。

除了金沙、湄潭嚴重外，遵義專區的遵義縣、桐梓、綏陽、正安；畢節專區的畢節縣、黔西、大方、水城、織金；黔東南的鎮遠、黃平、劍河、麻江、從江、丹寨；銅仁地區的思南、沿河、石阡、德江、江口；黔南的貴定、都勻、三都、甕安、望謨、羅甸都很嚴重，貴陽市郊縣也有，唯獨安順地區好一點。

「貴州事件」在老百姓口中又稱為「五九事件」、「過糧食關」等。由於當時的遵義地區是重災區，又最早在遵義縣的板橋等地發現，後來又被中央點名，故又稱「遵義事件」。在各自的縣裡，又稱「湄潭事件」、「金沙事件」、「思南事件」、「劍河事件」等。

「貴州事件」中的死難者，是一代純樸憨厚、道道地地的農民。在大饑荒的背景下，他們受到了超越生理極限和物質極限的嚴重侵害。在生與死的關頭，他們選擇了做人的尊嚴，守著國倉餓死。很多生產隊（今村民組）餓死了不少人，但裝有糧食的國倉（就在生產隊裡）上的封條卻原封未動，從而顯現出人格的高貴。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講，這種「尊嚴」與「高貴」，正是人民的愚蠢與可悲。

事過 50 年，今天再度重溫那段血淋淋的歷史，並不是有意戳人的傷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總結教訓，是希望我們的國家、民族，在走向未來的歷程中，步伐更加穩健一些。

同時，這也是提醒我們的人民，不要將自己的命運全權交付與「精英」們掌握。我們應該花很大的精力審視那些施之於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政策，是真正有利於國家、民族和人民，還是打著堂而皇之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在建造自己的皇權和萬世豐功偉業，從而構成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災難。

## 一 | 造成大災難的思想、政治基礎

「貴州事件」並不是一個省的、孤立的局部事件，而是全國性的災難事件的一部分。這其中，當然不乏貴州的地方領導人「想表現」而緊跟中央政策，進而火上添油。研究「貴州事件」，當從研究毛澤東的政治歷程開始。

### 1 | 「土改」的造神效應

當國民黨退出大陸後，毛澤東在中國廣大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即沒收地主的田地，並將之分給佔農村人口 70-80% 的無地農民。歷史學

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很是詬病這一政策，說是暴力政治。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置而不論。

土地改革實行的結果，使毛澤東由人變成了神。分了土地的農民將毛澤東、朱德的像供在祖宗牌位上，日日頂禮膜拜。毛澤東成了救世主，農民對他的一切政策信之不疑。所以，當毛要實行農業合作化、要實行公社化、搞大躍進時，農民們雖然不那麼情願，但還是基本跟著走的，並沒有多大的反對。

當毛澤東作為神佔據了農民心理後，人民對毛澤東達到迷信、盲從的地步。直到大片大片地餓死人，他們也沒有懷疑到這是毛澤東的政策錯誤，反而在天天等毛澤東來解救自己於厄難。這是「事物從這一面走向了它的相反面」的哲學命題。人民對領袖的迷信、盲從，是餓死自己的重要根源之一。

## 2

### 「朝戰」的勝利使毛澤東想當新時代「共運」霸主的慾望迅速膨脹

朝鮮戰爭，雖然本質上是戰後兩大陣營之間的矛盾與較量，其實也是史達林想借美國人的力量削弱新中國的花招，卻不料毛澤東竟然勝利了。史達林死後，毛澤東環顧宇內，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老大——美國拚過拳頭的，就只有我老毛了。「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舍我其誰哉？這是毛澤東徹底拋棄「新民主主義憲章」、決心沿著列寧走「共產主義」的老路，使自己真正成為「馬恩列斯」之後的共產主義偉人，這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深層次思想。

寫於1935年10月、發表於1957年1月號《詩刊》的《念奴嬌·昆侖》這首詞，很能代表毛澤東的思想。在詞中，岷山是昆侖山餘脈，1935年紅軍過岷山，嫌它阻擋了紅軍之路，所以要將它劈斷，裁為三截甩開。到了1957年，時過境遷，昆侖山就是毛澤東的化身了，裁為三截就有了「調節世界涼熱」的新意。不妨抄錄如下：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閱。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在這裡，毛澤東把自己比喻為可以調節世界涼熱的昆侖山了。1957年10月，他抵達在莫斯科舉辦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大會時，顯然有準備接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霸主」寶座的目的。但是，赫魯雪夫並不想交出這個權力。因此，「共運霸主」之爭成為中蘇交惡的根本原因。

### 3 | 莫斯科「霸主」之爭

1957年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年。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決定以共產主義運動盟主的身分召開世界共產黨、工人黨首腦會議，檢閱共產主義陣營。毛澤東是帶著當「共運盟主」的目的與會的，而赫魯雪夫並不謙讓，這深深地傷了毛澤東的自尊心。

大家都知道，社會制度再優越，也要用經濟實力來體現。當共產主義的盟主，手裡要有把「逗雞的米」，即對全世界堅持共產主義運動的各方勢力加以支持的經濟實力。在這個會議上，赫魯雪夫提出，15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其實是炫耀「老大哥」的經濟實力。毛澤東則說，你們15年趕上美國，我們也說在15年趕上英國。這是應戰，是暗暗較勁，但其實，毛的宣言是「經濟上率先超過美國、從而真正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盟主」。

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毛就搞「大躍進」了。提出「大躍進」，毛澤東是以強國為理由的。國家不富強就要遭打，中華民族已經積了109年的經驗體會了。因此，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的表態，無疑符合國家和

人民的願望，所以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人民是擁護的，更為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各級領導人所擁護，各級幹部成為「大躍進」高指標的第一製造者。

這裡，毛澤東用第三隻手將自己的私慾巧妙地塞進了國家、民族的急需之中。

#### 4 | 反周恩來的「反冒進」

毛澤東急於走上「共運」霸主的神壇，卻因經濟不濟而飲恨，這就使得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而在經濟建設上，劉少奇、周恩來主張「有計劃按比例」、穩紮穩打的方針，這與迫不及待的毛澤東發生了衝突。

195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第二篇序言中指出，農業集體化運動迅速進展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1956年1月10日到2月7日，國家計委按照反對「右傾保守」的精神，制訂了1956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各項指標都提得很高。高指標顯現了國家各級部門幹部們的積極思想，也不無迎合毛澤東的急於求成之意。

針對這些不切實際的指標，周恩來提出反冒進，將各項經濟計劃指標建立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然而毛澤東反對。從1956年11月開始，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指責不斷升級。說「去年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

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在莫斯科親自修改的題為〈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社論，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把1958

年的各項計劃指標盡可能定得先進些」，實際上是在號召各地區、各部門制訂高指標。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說周恩來與右派的距離「只剩下五十米遠了」。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文，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這在實際上剝奪了周恩來對國家政務的領導權，而由毛澤東親自扮演國家總理的角色。

毛澤東不懂經濟，他管理經濟，就像一個不會駕車的人駕車，車毀人亡是必然的事。

## 5 | 鉗口運動

大家知道，1957年的「引蛇處洞」，將全國的民主黨派精英和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全國的「帶帽右派」多達五十多萬人，差不多將各行各業的有文化、思想敏捷尖銳、有獨立見解的精英消滅殆盡。這給了那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以「殺雞儆猴」的震撼效應。自此，人民再也不敢對政府的政策評頭品足、談論是非了，哪怕是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人民也不敢說半個字。

以上這些政策，已經為「大躍進、大災難」的發生，奠定了政治、思想和人事基礎。

## 二 | 「貴州事件」，從貫徹「農業發展綱要」開始

中國是農業國，直到現在，農業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建國初期，農業就簡直是國家的支柱了。要實現工業化，首先依賴於農業的發展與積累，這是新中國任何一位國家領導人所熟知的。所以，在中國要發展重工業，先從農業做起，也算是做到了「眼」上了。

為急於改變農業的落後面貌，中央於1955年就制訂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黃河以北的糧食產糧由1955年的

畝產 150 斤提高到 1967 年的 400 斤，黃河以南由現在的 208 斤發展到 500 斤；淮河、長江以南由現在的畝產 400 斤發展到 800 斤。這就是所謂的「四、五、八計劃」。

這個計劃出籠後，因 1956 年忙於合作化，1957 年又將初級社轉換為高級社，夏季又是「反右」，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所以出籠兩年多，並沒有成為國家中心工作。直到 1957 年底 1958 年初，政府才將這個規劃提上議事日程。

1957 年 11 月份，貴州省召開有區委書記參加的「四級幹部會」。會上，江口縣提出 1958 年畝產 600 斤的「挑戰書」。當時就有興義縣委書記孫永錫「應戰」，他向大會保證畝產 800 斤，完不成任務可以摘去「烏紗帽」。大躍進的風在會上吹得十分強勁。這個「跨綱要」計劃比河南吳芝圃在成都會議上高調宣佈全省「跨綱」，早了三四個月。

這個熱得發昏的縣委書記，在 1958 年 8 月就餓死了一個鄉的 2000 人，製造了「興義事件」。這是後話。

省委的「熱病」傳染給地委，地委就在省委指標的基礎上加碼。1958 年元月，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到金沙，要金沙縣搞成「千斤縣」。

金沙縣 1957 年有田地 65 萬畝，總產一億七千多萬斤，每畝平均產量 261 斤。而 1958 年要達到畝產千斤，顯然是熱昏了頭。縣委書記趙廣玉以大躍進思維分析了一下，同意 1958 年平均畝產 800 斤。

經地委書記孟子明向省委報告，省委確定金沙縣為貴州省的「樣板縣」，成為省委的「試驗田」。一時間「趕上金沙，躍過江口」的標語刷遍全省城鄉。我當時在讀初中二年級，算是鄉里的文化人了，也曾經在家鄉的岩壁上為合作社寫了這個標語，得到了 20 分工分。這個標語一直存在了 40 年之久，隨時提醒著人們回憶那段瘋狂的歲月。

在成都會議的熱浪鼓動下，全國畝產幾萬、十幾萬的高產衛星漫天飛舞，甚是熱鬧。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麻城早稻畝產36956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畝產中稻13萬零434斤10兩4錢……環江縣的衛星是極大的了，其餘衛星也群星閃耀，此起彼伏，這裡不一一列舉。這些高產衛星是如何製造出來的，也不必去追究它的技術細節了。花樣繁多，總歸一句話，作假。

在放衛星運動中，貴州省卻表現落後。要趕上麻城，搞畝產幾萬斤的高產衛星，卻總不得竅門，連畝產幾千斤的衛星也沒有放上天一顆。

遵義地委欲仿效麻城，在馬家灣放個畝產六萬斤的衛星，「從各生產隊移來26畝田裡已經含苞的秧子，一窩挨一窩地栽在黃泥田裡，共計22萬2千多窩……專門拉電線安八盞一千瓦大燈泡增加光照，還安一台鼓風機日夜通風，結果全部倒伏，只收穀子600斤」。

衛星上不了天，急壞了省委。1958年9月，副省長苗春亭到金沙摸底，跑（調查）了幾個區，對縣委書記趙廣玉說：「你們可以宣佈金沙是千斤縣，叫報上給你們登……我在城關、平壩、岩孔、禹謨瞭解，可以畝產達到1200-1300斤」。顯然是欲以橫向的寬度戰勝縱向的高度。

紅旗縣的畝產千斤，其實是下給全省的威逼令。金沙條件不十分好，能實現畝產千斤，全省的「跨過長江」、實現畝產800斤的《綱要》規劃是不容懷疑的。

1958年風調雨順，糧食豐產。但進入九月後，全省因大煉鋼鐵佔用勞力太多，收割的都是婦女兒童，而且收與不收與收割人的利益關係不大，所以收割甚是粗糙，有些乾脆不收，直到第二年開春，田裡還有沒有收割的穀子。至於紅苕豆子爛在地裡比比皆是。所以1958年是豐產不豐收。儘管如此，全省還是獲得了總產110億斤的空前豐收。

### 三 | 北戴河熱浪滔天，貴州省大幹快上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中央作出了對糧食的樂觀估計，「將使糧食作物的產糧達到6000-10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60-90%」，

而對外宣傳是 7400 億斤。中央一致認為，可以騰出手來搞工業了。

在批判了劉少奇、周恩來的右傾保守之後，國家計委於 1957 年 12 月 7 日制訂了第二個五年計劃（58-62 年），其指標已是非常冒進的了。半年以後，於 1958 年 5 月 5 日，中央又制訂了一個更為躍進的計劃。然而，這個計劃還沒有實施，才過了三個月，到 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會議時，更是熱浪掀天，又制訂了一個「放衛星」的計劃。可見當時中央在國民經濟上的急於求成、草率、失衡到何種程度，已是近乎兒戲了。茲將三個計劃的主要國民經濟指標並列對比如下：

時間地點	鋼（萬噸）	糧（億斤）	煤（億噸）	棉（萬擔）	基本建設 （元、五年總和）
1957.12.7	1200	4800	2.3	4300	
1958.5.5	2500-3000	6000-7000	3.8-4.2	6500-7500	1500-1600
1958.8 北戴河會議	8000-10000	13000-15000	9-11	15000	3850-4300

數字來源：謝春濤《大躍進狂瀾》

表中可見，在北戴河會議上制訂的糧食為 13000 億斤以上，但實際上到了 2002 年，全國糧食產量也還不到 10000 億斤，可見指標之激進。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民經濟計劃是全黨、全國人民政治、經濟活動的綱領性文件。當綱領性文件都不穩，各地自然出現發熱乃至發狂的情況，可想而知，政府的經濟工作是何等混亂。

謝春濤在《大躍進狂瀾》一書中指出，「隨著大躍進運動的發動，趕超時間又一再提前：1958 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 15 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 20 年到 30 年趕上美國；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 7 年超過英國、15 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六月，毛澤東在一個報告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 2 到 3 年，2 年是可能的』；9 月 2 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 5 年接近美國，7 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可見急迫到何了種程度。

要快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經濟上率先超過英國、美國，獲得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話語權，從而真正的成為「共運霸主」。

在北戴河熱浪的鼓動下，貴州也一下子上了許多項目。交通上，川黔、滇黔鐵路線同時上馬，僅川黔線就集中了15萬8千名民工。為大煉鋼鐵，興建了水鋼、貴陽鋼鐵廠、貴州鐵合金廠、鋼繩廠、貴州鋁廠、鈦廠。化工有遵義城廠、貴州化工廠。機械上，有紅星拖拉機廠、軸承廠、鑄造廠、柴油機廠、擴建了貴陽礦山機械廠。水泥有貴州水泥廠。電廠有貴陽電廠，以及各專州的電廠，例如遵義電廠等。要加工增產了的棉花，又建貴陽棉紡廠。煤炭則有六枝煤礦。水利有貓跳河水電廠、湄江水利等。至於專州縣辦的企業、水利工程，更是難以計數。由於廠礦的修建，建築企業也增加了很多，如省建公司、冶金建築公司、遵義專建公司等等。

平心而論，所上的這些項目，30年後已成為貴州的支柱企業，顯然是有必要的。但是，過於急了些，是當時貴州財力所不及的。錢不夠，可以多印鈔票（貨幣貶值）來應付，且不需要貴州省委操勞。但糧食就不能像鈔票一樣，靠攤薄而轉嫁危機。一下子上那麼多項目，增加了許多城鎮人口，需要糧食供應。這是糧食生產上的高指標、高徵購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發生「貴州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 | 1959年的春荒和剝奪專區官員的糧權

1958年是多事之秋。當年7月16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了陳伯達的文章：〈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文章寫到：「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的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單位……」。這是在全國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的理論基礎。

8月2日，河南省委給毛澤東送上了《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情況報告》，說：「……小社併大社，自留地歸集體，大搞公共食堂，廣泛開展社

會主義大協作……」

當年八月初，毛澤東在河南視察三天后，到山東視察。省委書記譚啟龍談到曆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兵學商合在一起，便於領導。」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個消息，於是，在全國立即開始了人民公社化高潮。

人民公社剛開始時，實行糧食供給制，叫「吃飯不要錢」。為顯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號召敞開肚皮吃飯，一天開五餐，吃流水席。那時剛好秋收，倉庫裡還有糧食，所以沒有任何一級幹部覺得有何不妥。當時不但實行吃飯不要錢，還實行古代漢中的張魯一樣的制度，過路人也可以進食堂免費吃飯。當時這確實是令人快感而新鮮的。

才過12天，人民公社運動還在大轟大嗡，還沒有完成建制，接著就是「鋼鐵元帥」上馬。1959年8月25-3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有各省、自治區主管工業的書記參加的會議，號召全民動手，為完成1070萬噸鋼而奮鬥。於是全國9000萬人上陣，大搞鋼鐵。全國各地到處是土高爐，土法上馬煉鐵。

所得的結果，不用贅述了，農民們煉出的「狗兒鐵」「海綿鐵」加起來也沒有1070萬噸，而最大的損失是耽誤了秋收。

秋收時節，貴州省負責糧食財貿的領導人說要搞好秋收，「鐵不能充饑。能充饑，我同意不搞好秋收。」負責鋼鐵生產的副省長趙欲樵說：「為了鋼鐵在所不惜。」當時確實有一種論調充斥官場，說糧食是經濟問題，鋼鐵是政治問題，誰也不願意在鋼鐵生產上犯錯誤。於是各級官員都不重視秋收。

敞開肚皮吃飯大約就是那麼兩三個月，與大煉鋼鐵在時間上剛好重合。敞開肚皮吃飯和大煉鋼鐵的高消耗糧食，兩樣相加，到年底，所收穫的糧食就所剩無幾了。到春天，麥子還沒有成熟，青黃不接時節，公社大食堂就半開半停的了。停火的食堂叫農民回家自找活路去。原來宣傳的是糧食特大豐收，掛起鑊口吃三年的大話，就露了底。

這時，貴州省遵義地區的湄潭縣黃家壩就有農民剮公路邊的梧桐皮用以充饑。發現的僅僅是在黃家壩，而實際上不只這一處，遵義縣的蝦子、南白也有，我家（湄潭縣抄樂鄉）也在那時剮過樹皮。

這時，遵義地委動用一億三千萬斤國庫糧救災，全區人口平均每人 36 斤，基本上避免了餓死人的災難事件發生。

黃家壩農民剮樹皮時，貴州省省委書記周林恰好從銅仁路過湄潭回貴陽，見到了被剮去皮的梧桐樹，就在遵義批評地委書記李蘇波，說：「剮樹皮就是剮我周林的臉皮」。

確實，農民剮樹皮，是剮了大躍進的臉皮，也剮了省委書記周林的臉皮。但周林並沒有調查為何有人剮樹皮。

當得知遵義動用了國倉救災之後，周林說：「今後誰動我的倉就砍誰的爪子。」並要遵義將已經下發的糧食以後歸還國庫。事實上，這就剝奪了地委書記在救災上的糧食支配權，也剝奪了地方黨政要員在救災問題上的主動性。這是發生餓死人事件的重要的行政原因。

## 五 | 都勻會議的高指標

因貴州省大幹快上，如前所述，上馬了許多企業，這是需要經濟和糧食支撐的。經濟上，可以攤薄票子厚度，就是用貨幣貶值來應付，而且也不是貴州省所要考慮的問題，國家在統籌安排。而糧食的消耗卻是具體的、不可攤薄的。量出為入，於是，在都勻會議上安排 1959 年的糧食生產計劃時，省委定了高指標。這對造成貴州大饑荒有絕對的影響。

1959 年春天，貴州省委在都勻召開會議，制訂糧食生產計劃。指標定得高，計劃產量為 160 億，是 1958 年實際產量 110 億的 150%。到會的地委書記專員們都叫困難。周林說：「媽的，產量不能退了，冷水洗雞巴，越洗越縮巴，越說糧食越少，全省 150 億斤定了，你們退，我不退了，我頂著……」。這儼然是毛澤東式的專橫霸道，就這樣定

下了1959年的產糧計劃。

## 六 | 廬山會議恐怖政治，推高徵購指標

1958年5月，中央傳達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精神，號召全黨實事求是，講真話。隨後，各地的真話就鋪天蓋地而來。其中，江西省委黨校80多名縣級幹部的真話很具代表性。如下：

- 「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
- 大煉鋼鐵是勞民傷財，是得不償失；
- 糧食、副食供應緊張，就是農副業沒有大躍進的證明；
- 人民公社違反了客觀必然性，群眾不是自覺地入社，是被風刮進來的；
- 搞人民公社根本沒有條件，公社的缺點大於優點。現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是「左」的思想。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把兩種所有制轉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混淆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理；
- 共產風是上面刮下來的，中央、省、地三級應負有責任。因為決議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統一核算，自負盈虧；武昌會議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比蘇聯容易；北戴河會議提過工資制改供給制等等；
- 公社仍應以農業為主，工業放在從屬地位。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時過早。原料、技術、設備、產品、銷路等環節，問題極多，且影響農業生產，容易造成勞民傷財；
- 公共食堂並非共產主義因素。有三大壞處：排隊、搶食、浪費糧食。現在不要，將來也不要。

於無聲處有驚雷！顯然幹部們不願意跟隨錯誤政策了。

其他還有天津、國務院秘書廳、廣州軍區等單位和個人的意見，與上述意見大同小異。總之一句話，大躍進沒有一樣是對的，錯到底了。

對此，毛澤東卻認為，大躍進的錯誤僅僅是一個指頭的錯誤。

廬山會議於1959年7月2日在廬山舉行。7月10日，在毛澤東發表講話後會議即將結束。但彭德懷認為會議沒有解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根本措施，於是在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到要從思想根本上糾正1958年以來的急躁冒進、浮誇風等問題。毛認為，彭德懷的這封信，顯然是對「一個指頭論」的挑戰，當然就是對自己地位的挑戰，於是他就以這封信為依據，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右傾反黨集團」、「反革命軍事俱樂部」。

這一巴掌震撼全黨，搖動華夏，讓神州陸沉。

身為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毛澤東的老戰友、保衛延安的功臣、開國元勳、讓美國五星上將膽戰心寒的中國元帥，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功勞、能力、感情、地位、黨性值得什麼？

當時在廬山上與會的貴州省委書記周林，是候補中央委員，這種氣勢，將這個北平混混、上海工運小頭目、新四軍文員底牌的書記省長嚇了個半死。

廬山會議的「反右傾」與1957年的「反右」，前後呼應。前者對準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後者對準黨內的精英、高幹；前者是不讓人民對黨的政策評頭品足，後者是不讓黨內的異己對政策提出不同意見；前者是從思想上鉗制反對意見，後者是從組織上鉗制不同意見。

廬山會議期間，貴州接近秋收，省裡由副省長苗春亭在花溪召開地委書記會議，落實秋糧徵購計劃，稱為「花溪會議」。分配的指標都很高，基本就是按夏天的「都勻會議」的估產數為據，分配徵購指標。地委書記、專員們都不接受，情緒十分激動，會開不下去。副省長苗春亭就打電話給還在廬山的省委書記周林。周林說：「現在，我們是『右傾』思想在作怪。」苗春亭就組織反地委書記、專員們的「右傾」。被反「右傾」後，「大家就灰心了，就不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就說：『你分吧。』」。結果就按夏天都勻會議的估產數分配徵購指標。具體如下：

遵義專區：浮誇數 40 億斤，實際產量 17 億斤，分配徵購 10.4-10.6 億斤，實際徵購率 60%；全省：浮誇數 150 億斤，實際產量 90 億斤，徵購 40.2 億斤，實際徵購率 44.67%。

茲將貴州省 1953 年—1961 年糧食徵購流通情況列表如下。

年份	實際產量 (億斤)	全省徵購原糧 (億斤) / 折合貿易糧 (億斤) / 徵購率 %	遵義徵購原糧 (億斤) / 折合貿易糧 (億斤)	全省返銷農村 (億斤)	遵義返銷 (億斤)	全省周轉量 (億斤)	遵義周轉量 (億斤)
1953		20.8/15.74	4.85/3.7				
1954	80	24.13/18.18/30.16%	5.75/4/33				
1955	85	23.16/17.88/27.24%	5.7/4.25	3.49	1.3	1	0.1
1956	97	21.6/17.6/21.02%	5.6/4.2	3.44	0.8	1.05	0.36
1957	107	27.2/21.2/25.42%	6.45/4.98	2.97	0.63	1.5	0.47
1958	110	33.53/27.6/30.48%	8.32/6.63	6	1.74	1.44	0.31
1959	90 多	40.2/31.92/44.67%	9.4/7.4	9.7	2.67	0.55	0.11
1960	80	32.945/21.76/41.18%	5.92/4.78	16	4.37	0.54	0.1
1961	65	19.74/16.4/30.37%	3.79/3.45	7.94	1.42	0.55	0.1

(原注：1958 年報 150 億斤，落實 110 億斤；1959 年報 160-170 億斤，核實 90 多億斤。)

1959 年，貴州的實際徵購率比河南省還高。當年，河南吳芝圃虛報產量為 450 億斤，實際產量 195 億，實際徵購 75 億，實際徵購率為 38.46%。相比之下，可見貴州徵購比例之重。這一年貴州的徵購數量與徵購率比 1956、1957、1958 都高出很多，達到有悖常理的地步。

1959 年 8 月 16 日，廬山會議結束後，周林回到貴陽。8 月底 9 月初，貴州省委在貴陽召集全省（省、地、縣）三級幹部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主要傳達批判彭德懷。

同時，貴州也仿效廬山會議的模式，將常頌（省委副書記，當時已去世。主要抓住他一句話，就是「社會主義改造，條條鞭子都打在農民身上」）、夏德義、李庭桂（省財貿辦主任）打成「右傾反黨集團」。

在「三幹會」上，省委書記周林點名批判開陽縣委：「開陽有個辦公室主任，來了沒有？你膽子不小，寫信到中央告市委。」貴陽市委書記夏頁文說：「朱庚申、尹振環，你們串通起來和市委作對，我到要看看你們是個啥子了不起的人物。」在會議上鬥爭朱庚申、謝光一、尹振環二十餘天，仿照廬山會議樣式，將他們打成「朱謝尹反黨集團」。

在會議的後期，又佈置各縣把縣委班子排排隊，在縣委一級裡找出「右傾反黨集團」。結果，遵義地區的湄潭縣，將縣委副書記王春志打成「右傾反黨分子」。最後，全省一共打了 43 個反黨集團。

「左傾恐怖政治」弄得人人自危，心情十分緊張。在「左傾恐怖政治」氣氛造足後，周林不失時機地佈置「在國慶日前完成徵購任務、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指令。而主管糧食的副省長徐健生則提出：「糧食入倉要邊收邊入，要先下手為強，不要讓糧食留在『富裕農民』手裡」，這起到了很壞的作用。

回到縣裡，各縣級領導就積極組織糧食入倉。國慶日前，大部分縣完成了徵購任務的 80%。高山地區糧食晚熟，國慶日前入不了倉，遵義、畢節等地區，又佈置平壩地區為高山地區代入倉。這樣一來，平壩地區將糧食全部繳了也沒有完成任務。全省總體上完成 80% 後，入倉就慢了，直到餓死了人也沒有完成。

「左傾恐怖政治」使得貴州各級官員在糧食徵購上不敢弄虛作假。而徵購的堅決，就是搜刮的乾淨。誰不能按時完成徵購指標，誰就是否定大躍進、否定「三面紅旗」，誰就是「小彭德懷」。所以各級官員對「入倉」指令執行得非常堅決，沒有半點虛假。高徵購，是貴州餓死人的關鍵因素。

將糧食徵購指標佈置下去以後，周林就到息烽溫泉區「養病」去了。對周省長的「梭邊邊」，副省長趙欲樵非常崇拜，說周省長既會工作又會玩。

## 七 | 捉鬼拿糧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上，中央對糧食產量的樂觀估計是，「將使糧食作物的產糧達到6000-10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60-90%」，而對外宣傳是7400億斤。

結果，話還沒有離口，到年終全國就出現了糧食短缺，糧食調不上來，京城物資供應就緊張。原因到底是沒有生產出那麼多糧食呢？還是有糧食而人民不給呢？如果承認原本就沒有生產出那麼多糧食，顯然就是要否定1958年在糧食上的大躍進，從而就得承認，從黨的領導人到各級政府官員，都在浮誇、吹牛。權衡了一番利弊後，毛澤東選擇了後者。

1959年2月21日，毛澤東親自所擬定的《通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往全國，《通知》說：「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必須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這就是反瞞產運動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總源頭。

被左傾思想熱昏了頭的省、地、縣、公社、管理區的各級官員心領神會，就堅決教育「富裕農民」。於是，一個以農民為對象的反瞞產「教育」運動就開始了。

貴州省在國慶日前完成了徵購指標的80%後（這已經達到了往年的指標數），入倉就慢了，幾乎沒有進展。過了一個月，也是這個狀態，入倉數字停滯不前。

1959年11月初，貴州省委召集地委書記會議，佈置反瞞產，催促入倉。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從省裡開會回來後，馬上召集縣委書記會議，名義上是「人民公社分配會議」，實際是向各縣委書記們追逼徵購任務。會上，李蘇波點了息烽的楊靜山（那時息烽縣屬於遵義專區）、赤水的王臨池等的名，說他們完成徵購任務很差。又點了遵義縣的程耀華、湄潭的王卿臣的名，說，「你們差20%就不得了，等於人家一個縣的

任務。」這就 1959 年貴州省全面反瞞產的開始。

1959 年 11 月 20 日左右，湄潭縣根據地委指示精神，在縣城的湄潭一中等處召開全縣五級幹部會（縣、區、公社、大隊、小隊五級），據蔣明芳《記湄潭事件始末》記載，「會上首先動員號召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和小隊幹部自報糧食產量，比誰先進？報得多的就表揚，准其先回家。報得少的不准回家，留下繼續開會，端正態度，重新報『實』產量。會上窮追猛逼，氣氛十分緊張，一直要等報的產量與縣委事先框套的數字基本吻合了才放過關。（會上）由政法部門把馬山公社的四名反革命分子押送會場鬥爭，又從監獄中提出七名犯人在會上宣判。開會的同志們都捏著一把冷汗，形同受審。宣判後，縣委主要負責人在講話中威脅到會同志說：『誰隱瞞產量不實，與這些罪犯一樣對待』。」

「在這場反瞞產和反盜竊運動中，動用的酷刑就駭人聽聞了。有割手指、縫嘴巴、用鐵絲穿耳朵和穿腳後跟、點天燈、猴子搬樁、打破頭楔、吊鴨兒浮水、拖死豬，火鉗燒紅了烙嘴巴，甚至槍斃活埋等，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群眾背地罵我們有些幹部是「劊子手、殺人犯、活閻王、國民黨、美國佬等，影響十分惡劣。在反瞞產運動中，據統計，全縣被活活打死的 1324 人，被打傷致殘的 175 人」。

緊跟形勢的副縣長、綏陽公社黨委書記容鏡在會上報出反瞞產 1200 萬斤，得到了縣委的表揚。縣委派車將綏陽公社的幹部送回公社，佈置反瞞產現場會。在現場會上，「反」出來的糧食看起來是滿倉滿倉的，但實際只是面上薄薄的一層，下面墊得是穀草。在現場會期間，適逢綏陽趕場（農村集市），那時已經在餓死人了。容鏡將那些來趕場的浮腫病人關在烘烤菸葉的烘房內，免得讓人看見人民的饑餓形態，影響大豐收形象。哪知那些餓飯很久、體質極差的人，一關就死。容鏡就在不經意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湄潭縣如此，貴州全省各地也都差不多如此。

貴陽市的開陽縣是這樣堅決教育的：「為了達到主觀所要求的產量數，在核實產量和反瞞產鬥爭中，全縣普遍出現了捆綁吊打，翻箱倒櫃等違法亂紀現象。去冬縣裡開大會，會上用捆、吊、撬（注：絞緊綁人的繩子）、打等就逼死了三人，全縣共逼死37人（大部分是中貧農）」。  
可見用捆綁吊打的方法反瞞產，是全省的普遍現象。

1959年11月底，副省長徐健生從織金、金沙轉到遵義，推廣織金縣「捉鬼拿糧」的經驗。何謂「捉鬼拿糧」？該事情的起因是，有三個農民藏了一些糧食在山洞內。後來，其中兩人怕第三人告密，就把他殺了。因為被殺的是貧農，事連階級鬥爭，事情敗露後就繳出了糧食。在領導者看來，這一事件正好說明：「沒有糧食就是有人在搗鬼。捉住了鬼就翻出了糧食」。「捉鬼拿糧」是貴州當地對毛澤東「反瞞產」精神的創造性發展。

1959年12月3日，省委召開電話會，全面推廣「捉鬼拿糧」經驗，在全省再一次掀起反瞞產運動。而這時，全省各地餓死人的勢頭已是盛況空前。省、地委官員們堅持一個信念：群眾手頭有糧食，而且不是少，是有很多，只是被「富裕農民」藏起來了。反出了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綽綽有餘。於是，省委由副書記苗春亭出面，規定舊曆年前不開倉供應回銷量（糧食往農村銷售叫回銷），同時規定「以反出來的糧食安排群眾生活」。

但「反」過去，「反」過來，總「反」不出糧食。徵購不能完成，農民的生活也因無糧食無從安排。農民手裡有糧食嗎？拿遵義地區為例子。1959年，實際產量17億斤，徵購任務10.6億斤，完成徵購指標的80%約8.5億斤，剩餘在農民手裡的糧食也是8.5億斤。全區360萬人口，每人平均230斤原糧（帶殼的糧食）。秋收時節邊收邊吃，又在食堂吃了一個月大鍋飯，再留下種子，每人名下不過150斤左右。到12月份時，已經過去了三個月，那點糧食早就吃光了。

對於農民手裡無糧食，各級官員其實是知道的。

1960年1月，舊曆春節以前，西南地區各級幹部在成都開會，討論糧食態勢。這時，雲貴川三省餓死人已是非常嚴重的了。西南局書記李井泉讓各省學習四川辦法：「五五二」渡荒。第一個「五」就是五兩（16兩制，等於156.25克）糧食，第二個「五」代表五兩代食品。「二」就是二斤菜。省委向地委書記傳達，地委又向縣委傳達。畢節地區在傳達時還克扣了政策，改「五五二」為「四四二」。說明西南局和省委、地委的官員們是知道農村缺糧情況的。

至於所謂的「五五二」或「四四二」，其實都是空的。五兩糧食要反瞞產反出來才有。五兩代食品，例如蕨根澱粉，雖是個好東西，但要人有力氣自己去挖才有。人都快餓死了，那裡還有力氣去挖蕨根呢？菜，對於一些人家也是緊缺的。蓬蒿滿地草盈徑，餓殍驚天鴻聲哀。農民只有死路一條了。

## 八 | 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富裕農民」

有一則寓言故事說，將一隻青蛙陡然放進沸水鍋裡，這隻青蛙會跳出鍋子逃生。如果對已經在鍋裡的青蛙慢慢加溫，最後，青蛙會被水煮死，而水溫還遠遠沒到100度。原來，這隻青蛙對環境存在幻想，認為溫度不會再升高了。當它知道溫升不會停止時，它已經沒有跳出鍋子的力氣了，所以被煮死了。

我家的情況就是如此。甲子、乙丑年，就是西元1924年1925年，貴州大旱，餓死人不少。我母親說：「那是餓死了懶漢，勤快人沒有被餓死。」我母親當時14、5歲，我大舅父當時也不過20歲。每天帶領我母親上山挖蕨根，回來再沉澱蕨根澱粉，或連皮帶杆地舂成「蕨沙面」，做「蕨沙粬」，就這樣過了荒年。

而1959年呢，因為「大救星」給農民分了田地，於是農民對「大救星」有了堅定不移的信賴。雖然秋後徵購任務很重，但農民認為是「下面的幾爺子背著毛主席幹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是不會饒恕他幾爺子的，會來解救我們的」。而且，政府收光了糧食，總應該對人民有個

安排，不會丟下人民死活不管，喪盡天良。

於是，農民天天等上面發糧，等「救星」來解救。而且不時傳出「要發糧了」的傳言、謠言或自慰之言，以及昏眩時的幻聽，給人以令人炫目的期盼。可是這次，經驗給農民撒了謊，當他們知道政府不會發糧、想到要去挖蕨根時，已是沒有力氣去挖了。1959年10月底，我從湄潭中學回家要伙食錢，就提議父親去挖蕨根。父親說，我哪有力氣去挖呀！而真正去挖蕨根的，恰恰是略有糧食的人家。如果早知道不可能有「救星」來解救，如甲子、乙丑年那樣，貴州滿山遍野的蕨根，哪里又能餓死那麼多人呢？

而我們的官員諱言救災。說救災，就是對「大躍進」的懷疑與污蔑。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就說：「……生產自救，如是荒年這是個好辦法，但我們不是荒年……有的是個別的有災……」，這就從政策上堵住了自救之路。

1959年10月，我家在開始缺糧的時候，先是吃荒瓜。所謂荒瓜就是南瓜，大約荒年可以用它來渡荒之故，所以貴州人叫南瓜為荒瓜。一家五六口人，三兩百斤荒瓜，能吃幾天呢？沒幾天就吃光了。於是，又到挖了紅苕的土裡去芟（撿收穫之餘）紅苕，開始也能撿幾個紅苕回家，芟的次數多了，連紅苕藤也撿不到了。我親眼見到了我父親提著空籃子回家時的那份失望與悲哀，至今記憶猶新。

10月底，我從中學回家拿伙食錢，早上母親煮了一大鍋芭蕉杆，我心裡覺得奇怪，豬都沒有了，煮豬草做什麼？後來才知道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早飯。芭蕉杆雖然無怪味，可是粗糙不堪，我實在是咽不下去。母親心痛我，只舀芭蕉頭給我吃。

第二天我要回學校，看到鍋裡有高梁粬，拿起來一吃，才知道不是高粱粬，是枇杷樹皮粬。做法是，先將樹皮烤乾後、磨成面，再調和成粬粬，鍋裡烙熟。看起來像高粱粬一樣，其實是哄嘴巴、哄肚皮、哄眼睛的東西而已，哪里能抵餓呢。

1959年11月14日我父親餓死後，我回家一次，母親帶領一家人在挖麻根吃。上世紀50年代，貴州農民家家都有一塊麻土，剝麻絲搓麻繩做鞋子。麻根有大指頭大，五六寸（20公分）長，頭粗尾細。麻根煮熟後，面面的有澱粉質、帶甜味，是那時期最好的食品了。我五歲的侄兒餓了也會自己去麻土裡撬麻根、燒熟後吃。12月份，在他餓死的那天，緊叫要吃麻根。可是，麻土都翻了兩三遍了，哪里還有麻根呢？我五歲的侄兒帶著深深的期盼與失望，結束了短暫的生命。

也有吃菜度日的。住在湄潭縣永興鎮任家橋，湄江河邊、魚米之鄉的陳安科給他在昆明的哥哥寫的信裡，很能說明這一情況。

安民哥，你好

…另外，現在我們當地的糧食確實成問題。從10月1號就沒有米了，每天，大人三斤紅苕。到10月20號左右紅苕也沒有了。政府什麼也不供應，全靠自己的自留地種的菜來吃。現接近有一月光景是吃自己的菜。有些人家菜也吃光，幸而我們種的菜多，每頓能吃飽。現因吃菜而死的就有五六個了。我聽說要明年政府才供應糧食，這問題也不大十分清楚……

你的弟弟陳安科

59（年）11月28號

可見，秋收後沒有幾天，陳安科所在的隊（村民組）每天就只有三斤紅苕了，到十月底，就斷了糧，天天吃青菜「管飽」了。陳安科寫了11月28日的信後，沒過好久，全家七口都被餓死了，胡亂埋於土坎之下。

再回過頭來說我們家，我父親1959年11月14日餓死；過了兩個月，1961年的1月12日，母親也餓死了。母親死後，嫂嫂回了娘家。兩個妹妹沒人管，看到人家園地裡的白蘿蔔好吃，忍不住扯了人家的白蘿蔔，被拉到管理區去，捆在柱頭上示眾。直到下午，周吉開（有臉面

的農民)看不過才解開繩子，我妹妹才摸爬回家。

但她們求生的慾望實在強烈。過了不久，管他強盜不強盜，乘夜深人靜又去扯甘蔗種吃。所謂甘蔗種就是甘蔗顛子上的四五節。貴州保存甘蔗種的方法是在粘土地上挖 80 餘公分深的槽，將甘蔗顛子筍成捆，豎向立在槽內，澆水，上覆蓋甘蔗葉子和土，用以保濕保溫過冬。甘蔗種的前頭兩節糖分足，扯來吃，很是抵餓。她們天天去扯，於是度過了令人恐怖的災荒年。開春後，全隊死亡 36 人，佔總人口的 50%。大片大片的田土都撿荒了，就不種甘蔗了，也沒有人追究我家兩個妹妹偷吃甘蔗種的事了。可惜那兩三槽甘蔗種喲！早知開春不種甘蔗了，全部分發給人的話，全隊（村民組）就不會死那麼多人了。

家家吃菜活命，是否有吃糧食活命的呢？也是有的。我的侄女與我同年，16 歲，侄兒與我大妹同年，13 歲。她爸爸死得早，跟她的叔叔（我表哥）生活。我表哥在公社當幹事，就沒有人管她兩姊妹。全隊的糧食被徵購一空，卻是借小隊的糧倉儲存。小隊的糧倉就在我表哥家的院壩邊。餓飯的人，對尋找吃的是有特異功能的。不知道她看到了什麼線索，晚上也到倉板底下，用小竹棍掏板底縫，穀子就漏到筐籬裡了。然後乘夜深人靜，用小搗鉢（小碓窩）舂米，拿個陶砂罐燉稀飯吃，就一天也沒有餓著。

開春後，公社幹事吳賓周來開倉，發覺糧食落下去帥大一個囡囡，大家推說是我侄女侄兒幹的，他們倆也不敢申辯。吳賓周要將她兩姊妹吊起來打，有人說他是程孟祿的侄女，而程是吳賓周的同事。吳賓周乘勢下台，說：「好棵苕，長在石夾夾裡去了」。避免了更大的追究。

就是這個倉底縫，救活了這個隊 50% 的人。按當時人們的道德底線來看，這是不那麼高尚的。但在特殊環境下，何嘗不是聰明之舉呢？我父親的名言是：「窮得新鮮，餓得明白」，我看他是餓死也沒有明白哩！

還有一個故事也很能說明當時的情況。湄潭縣抄樂鄉有一個老漢叫葉大周，被鄉民叨念了幾十年。他是個道士，識字，熊家寨人。解放時

沒有滿 18 歲，所以沒有劃成地主成份，劃為地主出生。在階級鬥爭至上的年代，其實是把「出生」也當成「分子」來管制的。

1959 年冬天，他在湄江水利上做事，那裡每日有半斤糧食。到 59 年 12 月份左右，村裡來的消息很是不好，說餓死人了。他回家看老婆，發覺隊裡已經餓死了人。他召集全隊的社員，提議開國倉借糧食，等夏收以後歸還國家。有人害怕，他說，有事我頂住，我沒有兒子我不怕，但是你們要承認歸還。於是登記造冊，按手印，按人口各借若干（我忘記問具體數字了），這就制止了死人事件的蔓延。開春後，上級來檢查倉庫，發覺封皮破損，糧食短缺，才知道是葉大周幹的「好事」。

葉大周跑到長嶺崗的山那面去躲了幾天，覺得緊躲不是事，就回來將鋪蓋捲起，到縣公安局自首。這時政府政策已變，正在賑濟災民。公安局的人說，「沒有事，你回去吧。」葉大周怕區、公社的人打他，就叫公安局給他開個條子，轉到區、又轉到公社，事情就算過去了。後來，也沒有歸還所借的糧食。

在政府行為乖謬、人民不能活命的情況下，這才是我們農民兄弟所應選擇的聰明而穩健的道路啊！而這正是中國農民所缺少的。

據說，湄潭還有殺孩子而食的（殺奄奄一息的子女來救能活的幾個子女）。雖然生存的道路原本不應該如此的嚴酷，應有多項選擇，但我們能怪罪這位被糧食逼瘋了的媽媽嗎？道德底線使她沒有掏倉底縫的勇氣；不識字、女流，使她沒有葉大周那樣的膽識與智慧。鍋內無糧，菜地無菜，天不開眼，地不說話，有什麼路留給我們的媽媽呢？所以，我簡直不忍心將這一題材訴諸筆墨，以免擾亂她在天國的安寧。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安寧吧，偉大而艱難的媽媽呀！

在饑餓面前，人民是否也懷疑過「大救星」呢？還是有的。傳聞余慶縣就有人將供於香火上的毛澤東畫像的雙眼摳去，說他枉然長了一雙眼睛；開陽縣的公安局報告說，有人一連撕了十二張毛主席像；省委檢查團到綏陽縣去檢查死人情況時，一個餓得快死的「幹瘦如柴的老

頭訴說：『要毛主席開開恩（放人一把之意）……』。」這些例子都說明，還是有人懷疑，國家的總體政策出了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局部的錯誤。

## 九 | 萬馬齊喑究可哀

1959年10月底，我回家拿11月份的伙食錢，一家人就沒有糧食，吃芭蕉杆。到11月14日，我父親餓死。依此推算，我們隊當在1959年10月15日左右斷炊，解散食堂，讓村民回家自己設法活命。

到1961年2月8日，副省長吳實在遵義縣板橋鎮發現餓死人，將事件捅開，而後省委採取措施為止，缺糧時間長達115天以上。有些較好的隊缺糧時間要短一點，但也不低於60到85天。

就缺糧面而言，根據後來對餓死人資料的大致統計，全省除了安順地區而外，餓死人都很嚴重。而且安順地區也不是一個人都沒有餓死，普定縣也餓死八、九千人。所以，面是寬的，是全省性的。

全省80餘縣市，縣團級以上官員有四、五百人，區級官員四、五千人，居然讓餓死人的消息封鎖了四個月以上，讓人不得其解。我很不相信他們都是「官僚主義」者，對餓死人的事沒有耳聞目睹。畢節的街頭有餓殍，遵義賓館旁有餓殍，貴陽到遵義的公路上有餓殍，遵義至金沙的公路上有餓殍，到處有新墳，沒有看見嗎？

趙廣玉回憶到，「孟子明在電話會上指示說：『畢節街頭死人在那裡放著，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影響不好，要負責掩埋，其他各縣也要注意』。省委農村工作部劉蒼岩部長從四川參觀回省路過金沙，叫我通知遵義縣，在路邊死了兩個人，叫他們趕快埋了……。我可以肯定的說，當時的省委、地委負責人、縣（委）書（記）沒有不見過或聽說過死人的……但省委、地委從來都不認這個賬，非佈置搞反瞞產私分、捉鬼拿糧不可」。

王卿臣回憶說，「省、地、市都知道死人的，賓館外死兩人，周林經

常派人下來，他們沒有看見嗎？他隨時派人到路上來檢查，發現有死人就叫人拖開。他在息烽看見有死人，就去刮楊靜山說：『你們路上死了人為什麼不處理？』我聽說一件事，中央有人到貴州來，他派車去接。他給開車的說，你看見死人，不准停車。一次一個中央部長來，看見死人，叫停車，司機不停，部長發了火，結果後來停下來了。」

以上事例說明，領導幹部都知道餓死了人，但誰也不率先開口說「餓死了人」。分析幹部們的心態，可以說是被歷次運動教育「乖」了的結果，都被整怕了。1957年的反右，凡是思想敏銳、有見解的知識分子、幹部，都被打成了右派，予以專政；廬山會議將彭德懷打成「右傾反黨集團」，貴州也依照廬山會議的樣子打了43個「右傾反黨集團」。這些反黨集團，雖然說是黨內的，實際上也是按專政來對待的。只要與上面的意見不一致，甚至與黨員的意見不一致，就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即令是看見農民缺糧，也不敢說缺糧。說缺糧，就是對人民公社的詆毀，是對「大躍進」、「三面紅旗」的懷疑與污蔑。如果說有農民被餓死了，這不就是說共產黨餓死了人，就該殺頭了嗎？所以，即令是抓住了殺子而食的「罪犯」，權衡再三，也不敢冒「污蔑共產黨」的險，而悄悄釋放了事。

那時官方的流行語言是：餓得快死的人就說是「浮腫病人」；餓死了的是害「烏鴉症」，人人諱言餓字。真實萬馬齊喑究可哀。

但官員們還在隱瞞，說話也令人髮指。赫章縣書劉大當在（畢節）地委會上反映：「春山鄉餓死二百多人，有的光剩一個孤兒，可憐得很。」劉哭了，孟子明就批評說：「哭什麼，我們不是慈善家。」「哪個人不死，人吃五穀雜糧哪年不死，哪年不生病，甲子、乙丑年，貴州死了多少人，生瘟疫一窩一窩地死，全家全戶都死絕，那時候也能怨共產黨嗎？難道也是糧食徵購重了嗎？人還能光生不死？要是光生不死，到現在，世界上就成了人患了，那還有立足的地方？人生老葬死，這是客觀規律……。多少革命先烈死了你不哭，為什麼見到死幾個人，你就哭呢？」

對於浮腫和餓死，畢節地委常委王學臣說：「浮腫病、乾瘦是一種流行性的傳染病，過去舊社會還不是一窩一窩地死，那個時候他總不說是糧食問題吧！現在一死人就說是糧食問題，立場不堅定的人一聽就動搖」。

對於反瞞產，（畢節）主傳謨提出了如下口號：「我們要主動進攻，要堅定立場，批判右傾，就要掌握一條，鬧也捉鬼，不鬧也捉鬼，你不捉鬼，你就是鬼。」並舉了畢節朱昌區委書記趙炳輝的例子，「趙叫喊沒糧食，就向國家伸手，結果餓死了不少人，我看趙本身就是鬼，所以才餓死那樣多人……」

對於糧食，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指示說：「……叫喊糧食吃得少的，是什麼人呢？貧下中農解放前是半年糠菜半年糧，他們不會說糧食少的，叫喊的無非是富裕中農……」；「所有鬧糧的地方，毫無例外，都是壞人當道，……缺糧的地方不一定鬧糧，鬧糧的地方不一定缺糧。整社重點放在鬧糧的地方……機關幹部中不少人在講這個問題，……有的同志在那裡叫得很兇，你們到底代表的是誰呢？死了個把子人你也在那裡叫，死個把子人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呢？今年死人，去年也是死人。哪年不死人，哪個時候不死人，解放前還不是死人，那個時候還沒有解放，共產黨還沒有來，也沒有人民公社，難道死人也怨徵購分重了，也怨共產黨，也怪人民公社？過去在我們當小孩時，北方還不是有浮腫病，叫住王妖娘吃槐，牙腫臉難看，難道這也怪糧食問題？這種病是帶有普遍性的，並不是哪一個地方有，你關心群眾疾苦，並不等於不殺人，不病人，今天看到了死了個人為什麼都歸罪到糧食身上呢？我們要當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促進派……，這才苦戰一年，你就叫起來了，這叫什麼苦戰呢？……你對在那裡不去捉鬼、鬧缺糧的人，要堅決的回擊，他就叫鬼，我們的任務就是捉鬼，……叫你儲備一點糧食你不辦，你與黨中央、毛主席能一條心嗎？」

對於他們這些對農民頗不友好、頗喪良心的講話，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的良心是被狗吃了。我們只能說，他們中「左傾」的流毒太深、「黨

性原則」太強。在選擇是為黨負責還是為人民負責時，選擇了為黨負責，而將人民拋棄。而這個「黨」，這時已淪為了毛澤東推行錯誤政策的工具了。所以「為黨負責」實際就是為毛澤東的皇權專制主義負責，將氣力使到錯誤的地方去了。

## 十 | 莽撞吳實，捅破驚天慘案

條條道路通北京，中南海不會不知道餓死人的事的。因為消息來源是多方面的，既有黨政系統的正式彙報、有新華社的內參，也有毛澤東親信的正反兩方面的資訊收集、有朋友的進言，也有他身邊的來自鄉下的衛士反映的情況。各地餓死人的文件，也如雪片般飛往中南海。

毛澤東實在不明白，「熱熱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何以變為「淒淒慘慘戚戚」的大災難呢？老天何不睜眼？他心煩意亂，不覺信筆走蛇，也不知是何曲調，聊抒胸臆而已。

哭商紂，哭秦皇，而今輪到哭自己。

哭的是（你）太有能力。

爭什麼「共運」之伯，

籌什麼逗雞之米，

萬不諳，輸了老底。

你慢些個也麼哥——，慢些個也麼哥——，

要偷雞也得悄悄地，不要恁急。

哎喲噫唛——

辜負了他，雄文四五卷，威名三十幾。

歎而今，誰為我濃施粉黛，淡掃峨眉？

將那喬裝的戲兒，演、演、演到底！

這則流傳於民間的「仿元曲」是否真為毛澤東所作？查無實據。反正社會流傳的偽作也不是一篇兩篇。這篇文章符合環境，聊以抄錄，大可不必當真。

1960年2月6日下午，貴州省副省長吳實帶領團隊慰問川黔鐵路民工。

經過息烽時，已發現了死人，吳寶此時還認為這不過是一起「興義事件」（即1958年8月，貴州省興義縣的一個鄉餓死2000餘人的局部事件，當時就是吳寶前去處理的），但2月7日，到板橋、泗渡後，他和陪同他的遵義地區副專員何林發現一個大隊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動，才意識到餓死人是全省性的、普遍性的問題。到桐梓後，吳寶就不走了。當時桐梓縣正在開黨代會組織反瞞產，吳寶乘勢召開了桐梓縣委緊急救災會議。

吳寶隨即打電話給周林，陪同何林也掛電話給地委第一書記李蘇波。他們當時估計了一下，遵義、湄潭、桐梓大概死了幾萬人。遵義派人去息烽溫泉療養院，向正在那裡「養病」的周林彙報。息烽溫泉就是貴州的「西子湖春藕齋」。當時周林正在打牌，老是不聽。彙報的人都等得不耐煩了，周林還說要打完這一圈後再說。聽吳寶彙報以後，周林說，「血淋淋的事，還提它幹什麼。」

吳實在板橋視察時，正碰上湄潭縣委書記王卿臣，他剛從北京參觀回來（那時遵義地區到北京都走重慶）。吳寶隨即叫王卿臣趕快回去，「估計你們那裡也有問題」。王回去以後，隨即撥糧到湄江水利工地，一共發了十幾萬斤糧。這次發糧，應該是吳寶掌握的糧食指標，湄江水利是省管工程。至於農村，仍然不敢開周林的倉。要發，十幾萬斤糧食，60萬農民，每人不足二兩。自從周林說「誰動我的倉，就砍誰的爪子」以後，糧權一直在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的手裡。王卿臣沒有那麼大的膽子開倉，這一點是肯定的。

1960年2月8日，貴州省委召開全省電話會，規定每人每天供應半斤（250克）糧食，重病號集中管理。3月為12兩（375克）。加上虛報人口（死了的也說還活著）多領糧食，這就遏制了餓死人事件的惡性延伸。

貴州餓死人的特點是，產糧區比非產糧區餓死得多；平壩比高山餓死得多；中心地區比邊遠地區餓死的人多；「紅旗縣」比「白旗縣」餓死的多；男人比女人餓死得多；青年人比老年人餓死得多；地富、貧

下中農家庭比中農家庭餓死得多。

經此大劫之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湄潭縣城關區蠶桑局的堦上生產隊，全隊僅剩下兩個男勞力。全縣像堦上生產隊的不在少數。

接著，於1960年2月16日以前，遵義地區召開「花園會議」，討論如何遏止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問題。王卿臣報告說湄潭死了三、四萬人（其實是縮小了的數字）。何林聽了以後說：「這怎麼得了啊！」接著在會議室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來來回回的走，似有不知情的樣子。

### 十一 | 不敢統計的死人數字

冤魂滾滾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中南海的舞蹈不跳了，息烽溫泉溫柔之鄉的溫柔夢也醒了。省委書記周林接到副省長吳實的報告後，趕緊回貴陽處理大事。

以前，幹部們怕當「小彭德懷」而將餓死人事件隱瞞著。當吳實甘冒「小彭德懷」的罪名，將這一驚天慘案揭開後，這一切就像打開了閘門的水，洶湧而出。各地競相報告餓死人的資料，一個晚上周林就知道了全省概況，這讓一直處於溫柔之鄉的他大吃一驚。這是即便周林長了十個腦殼，也難以抵罪的大罪啊！遺臭萬年的大罪啊！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和保護「黨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的黨性原則，周林最先想到的是隱瞞和縮小死人數字。

1960年2月16日，遵義地委在花園召開各縣縣委書記會議，統計死人總數，並向省委彙報。周林馬上批評遵義，叫遵義不准統計這樣的資料。說：「不能把死人都記在共產黨帳上，血淋淋的事，統計它幹什麼。」並派地委書記李蘇波專程從貴陽趕回遵義，給副專員何林、地委秘書長李洪濤等人傳達他的指示。李蘇波說：「周省長不准再統計，你們不聽話。」還說：「不能把所有死人都上在共產黨的帳上。」

畢節地區也採取「不統計」政策。但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卻在統計死人情況。趙回憶說：「他一聽我們摸（統計）死人情況，孟（子明）

就非常生氣的批評說：『你們摸（調查）死人數字幹什麼，死人難道光你們金沙有嗎？我就不同意你們的這種說法，人死了不能再活，以後接受教訓就是了，非拿倒狗屎往臉上擦不行，誰還想叫他死人嗎？況卻正常死人年年有，你怎麼能分開呢？你連正常死人都統計成餓死的嗎？』」

周林的這一著相當兇狠，誰統計死人資料誰就是找共產黨算帳，誰還敢統計呢？而這時，周林把肩頭一擡、腦殼一縮，就把自己的罪行都挪到共產黨身上去了。同時，也就定下了對這一事件的基調，就是誰也不准統計這樣的資料。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統計之後，列印材料上報地委、省委，但畢節地委責令他銷毀，「把油印臘紙也要燒掉」。

因害怕統計餓死人資料被定為「找共產黨算賬」，各地、縣就停止了統計。但是，為了應付將來上面算賬、接受懲治時，對自己的定罪有個比較客觀的定案，各地、縣官員還是暗地裡作了較為粗略的統計的。遵義地區到1960年5月，到趙欲樵來取代李蘇波以前，何林等向省委彙報了七、八次死人資料。但這是不合法的，同時也沒有滙總。所以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各級都只有概略的資料供「內部」掌握。

1960年4、5月份，湄潭人吃人的事因封鎖不嚴，漏到中央去了。中央派監委金兆典等人到湄潭檢查，省監委副書記楊用信陪同。檢查結果向周林彙報後，周林不得不承認餓死人這一事實，但不承認那麼多。只承認湄潭死了二萬多人（實際上是14萬多）。於是他又向各專區發指示，統一口徑，（全省）以30萬按比例分配死人資料。

1960年2月份以後，遵義地委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把餓死人的情況、嚴重後果已基本摸清，只待上級來問。1960年5月，周林為統一口徑、瞞報數據，派副省長趙欲樵來遵義主持工作，取代李蘇波、何林。1960年5月，撤銷何林黨內外一切職務。1960年10月，撤銷李蘇波書記、專員職務，後來遣送他到六枝煤礦挖煤三年。這樣一來，待1960年9月份，中央派謝富治來貴州視察時，也就得不到十分真實的情況了。

其實，當時在中央管理日常事務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也是不敢統計這些資料的。直到1962年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期間，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反映四川餓死人情況時，楊尚昆還像做「特工」一樣，偷偷摸摸地瞭解四川死人數字。若當時就統計死人資料，顯然就是找毛澤東算賬，所以不需要，或曰不敢統計；毛澤東呢，顯然也不需要這些難堪的資料的。所以，1960年9月謝富治的「調查」，理所當然是「不了了之」這一結果。

在這樣一些政治措施和組織措施下，貴州到底死了多少人，也就從來沒有弄清楚過。但由於各專區和縣還是做了一些統計，一直到1964年貴州「四清」，省「三幹會」揭發周林問題時，全省的死亡數字做過累加總數，但沒有最終結論。「有的說有一百多萬，有的說有幾十萬，到底多少，吵了幾天沒吵清楚」。何林和大多數人認為「全省不下100萬」。省公安廳幹部晏樂斌根據省公安廳治安處的統計，說全省餓死250萬人。

我們認為，即令是「興義事件」的餓死2000人，也是政策上的嚴重失誤，是執政的恥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惡性事件。因此，到底是餓死100萬還是餓死250萬，其性質都是一樣的。100萬未必罪小。強調250萬，似乎有看輕100萬之嫌。

40年後，貴州省興起修《志》熱潮。《貴州省志·大事記》對餓死人數據一字不提。抑或餓死人的資料在《人口志》上有專述，但貴州省立圖書館、貴州省檔案館並沒有《貴州省志·人口志》或《貴州省志·人口與計劃生育志》的《志書》存在。是否修了？或者修了又秘藏？不得而知。《貴州省志·民政志》則避談死人數字。這就難免讓人感到有人在刻意掩飾了。

查閱縣志，各縣對於餓死人的數字，在統計口徑、表述方法都不十分規則。且因作者受資料來源限制、政治態度局限，資料也不一定十分準確。大體上，凡是對左傾路線深惡痛絕的作者，資料比較真實；凡

是左傾思想沒有完全肅清的作者，其資料就不是那麼準確的了。例如《遵義縣志》、《綏陽縣志》、《仁懷縣志》都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志書》也僅僅是「一家之言」，僅具參考價值而已。茲將部分《志書》資料抄錄如下。

遵義地區《縣志》人口變動表

縣名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減少	1961年/ 減少	1962年	1962年比 1958年少	減少 率%	備註
遵義	698435		661834/ 56665		644390	56665	8.11	1959、1961 年數據
桐梓			/39102			41734 *	12.95	* 前言數據
息烽	130834	132742	115318	121943	113907	16927	12.94	
習水	243005			200381	208633	42624 *	17.44	* 比61年 數據
務川	220781	215755	193052	182163	186986	33592 *	14.22	* 60、61 數據
道真	179845	178157	173189	162943	163059	16786	9.33	
赤水	209819	205810	170813	168452	174029	37800 *	18.01	* 59-61年 淨
仁懷	275521	2/+142 679606	267851 /+12	262579/ 5659	262322	5659 *	2.05	* 1961年 數據
余慶	142649	143584	121695 /-6058	124116 /-24365	128106	30423 *	21.33	* 60、61 年數
湄潭	244200		182000			62200	25.47	
鳳崗	218200	217636	165013	173209	179626	53187 *	24.38	61比58年
正安	495157 315312	478146 299989	462528 291139	① 285800	290460	29512 *	9.36	* 61年比 58年
綏陽	231662	225462	229390	228370	239219	3292 * 6236 *	1.41 2.69	* 61年比 58年； * 59年比 58年
合計	~ 343.2 萬					433345	~ 12.63	

① 1958年道真縣合到正安縣，1961年又分開。上欄為大縣人口數，下欄為減去道真縣數字後的人口數；1957年，正安縣人口為311504人，下欄人口變動資料符合規律。

畢節地區部分《縣志》人口變動表

縣名	1958	1959	1960 / 減少	1961 / 減少	1962	62年比58 年少	減少率	備 注
金沙	329381	330844	248971	252173	262444	66937	20.32	
水城	384001	386341	376563 /-13417	355266 /-5166	357556	18583 *	4.84	* 60年、61年 數字
納雍	306046	311359	310906 /-2897	308069 /-2398	316014	5295	1.73	* 60年、61年 數字
畢節	525415	532246	492439	478456	503852	53990 *	10.28	原注 59-61 數
威寧				-28387			6.18	比 60 年少
黔西	35.28	35.25	34.27	35.01	36.61	11100 *	3.15	* 60 比 58
赫章	262287	265731	263264 /-5747	260136 /4908	263544	10655	4.06	
織金								未見志書
大方	420260	427572	388762	376850	379086	51022 *	11.93	59 比 61 年
合計						217582		

黔東南地區《縣志》人口變動表

縣名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62年比58 年少	減少率	備 注
麻江	119841	108601	97804	98009	100378	19643	16.24	
台江	75315	72235	69237	69613	68705	6610	8.78	
從江	164363	161694	147123	139883	142550	21813	13.27	
黃平	177735	170469	158967	158314	159133	19421 *	10.93	* 61 比 58 年
鎮遠	112927	107040	108429	115523		?		
天柱	190364	184169	178731	179579	186114	10785	5.67	與 61 年比
榕江	137935	137302 /-633	129835 /-7667	129215 /-620	131066	8920 *	6.47	* 59-61 合計
劍河	95632 ①	179561 ①	168964 /-9697	163580 /-1697	88583 ①	① 11394 *	6.35	* 60、61 兩年合 計
凱里								未見志書
施秉								未見志書
丹寨	92410 *				80598	11812	12.78	* 1957 年數
雷山								未見志書
三穗								未見志書
岑鞏								未見志書
黎平								未見志書
合計						110398		

① 1962年5月，台江縣析出，並將劍河縣五河區劃歸台江。

## 其他比較嚴重的縣（未分行政屬區）

縣名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62年比58年	減少率	備注
沿河				236136		35683 *	15.11	* 59-61 三年
石阡	206942	200329 /-214	176542 /-11525	175547 /-284	181726	25216 12023 *	12.19 5.8	* 三年合計
德江	210268	213892	195745	197100	200303	16792 *	7.85	* 61 比 59 年
三都	179131	170167	164313	139144	140082	39049	21.80	
普定	203393	206989	202359	201018	198615	8374 *	4.05	* 62 比 59 年
冊亨	104566	89854	85566	88776	90131	19000 *	18.17	* 60 比 58 年
平塘	15.16	14.62	14.02	13.69	14.56	6000	4.0	
甯安	187822	192390	180524 /-10783	182034 /-1278	190930	12061	6.27	《志書》說明： 60年-10783
思南	353998	336981	315971	295579	296816	58419 *	16.50	61 比 58 年
貴定	155940	141091	144773	139343	139746	16597 *	10.64	61 比 58 年
合計						237191		

四表合計為 998516 人。

根據以上 40 餘縣資料，遵義地區、畢節地區、黔東南地區是餓死人最多的地區，加上其他有資料的縣，已達 100 萬之眾。全省 80 餘縣，尚有一半縣市沒有資料，且未予計及那幾年出生的人口數。由此推斷，「文革」中傳言全省餓死 160 萬人以上是可信的。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成果《大饑荒——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一書中提到，全國死亡「3245.8 萬人」，「貴州（餓死）174.06 萬人，死亡比例 10.23%」，與「文革」傳言不謀而合。

看來，貴州省比較接近實際的數字就是 174.6 萬人了。這比《志書》所記要高得多。看來，數字之爭還要進行下去。這都是當時政府忌諱統計死人資料之過。

1960 年 4 月 30 日，周恩來總理結束對緬甸、印度、尼泊爾等國的訪問回國，由昆明到貴陽視察。周林向總理彙報「（全省）死了八萬人」。

在神州大地滿目瘡痍的情況下，賑災是國家當前大事。如何拯救國家

於危難，是那時的政治局。至於餓死人的事，雖然也是大事，但已經是歷史，就讓歷史來裁決吧。所以，周恩來將這些雜事留給中共中央辦公廳按日常事務處理，勢在情理之中。

對於周林的處理，《周林傳略》說：「1960年5月16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貴州遵義、湄潭、金沙等縣（農村）發生浮腫病及非正常死人情況。並就湄潭、金沙事件作了檢討。省委主動承擔領導責任，認為事件的發生是與省委領導上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不關心群眾疾苦的錯誤分不開，並請中央給予處分。5月21日，中共中央批復貴州省委報告，免予處分。同時，明確處理這一事件的原則與方法。指出：『對發生問題的縣、市，應著重安排人民生活，治療疾病，保證不再發生非正常死人事件；對事件發生的地區，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訓；不要過於追究事件的責任。要教育廣大幹部，處分少數幹部，杜絕重犯此種錯誤』」。《貴州省志·大事記》也有同樣的文字記述，都不說餓死人的數字。

這段話語基本代表周恩來等中共中央務實派對處理餓死人事件的政策立場。大家知道，造成這次驚天慘案，周恩來是沒有份的。在處理慘案的善後事宜時，卻有人在後面用冷眼觀察著每個人的態度。周恩來為避免被打成「觀潮派、幸災樂禍派、秋後算賬派」，採取「將功過留給歷史」的政策，不能不說是周恩來應對政治的機智。所以對貴州省的「免予處分」、「吸取教訓」、「杜絕重犯此種錯誤」的處理，是符合周恩來的政治處境的。

當然，這一政策也是對「不准統計死人數字」政策的一次肯定。

## 十二 | 推諉罪責

當這場驚天慘案發生以後，從中央到地方，誰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包括黨中央主席毛澤東。於是發生了從毛澤東到省、地、縣，互相推諉、逐級推諉的鬧劇。這些推諉手法是：

## 1 | 階級敵人報復論

在階級鬥爭大於一切的時代，階級敵人報復論這個觀點很具有欺騙性。貴州省的湄潭縣槍斃副縣長容鏡的理由是，說他家是鳳岡縣綏陽場的大地主，而他本人則是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在反瞞產現場會期間，他將餓得快死的貧下中農關進烘房、將他們關死，而後又將屍體用進囚子裡集體掩埋、製造「萬人坑」，其犯罪地點也是在鳳岡的綏陽場，這是地主階級實施階級報復的典型事例。不懲處不足以平民憤，應該予以槍斃。

理由充分，亦得人心。我當時是高中學生，在體育場參加了公審容鏡的大會。對槍斃容鏡，我感到是毛主席為我們湄潭人民伸張了正義。我暗暗地罵，「你狗日的也有這一天啦！」可見老百姓感恩戴德之一斑，也可見階級報復論還是能哄騙住一些人的。

而對於湄潭縣委書記王卿臣，由於他底牌（政治出身和革命經歷等）很硬，沒有辦法以「階級報復」定罪，因此就說王卿臣偽造歷史，鑽進黨內。說偽造歷史也經不起推敲，只好輕判，判勞改。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從少年起就幹革命，更是無法以階級報復論處，也只好判勞改。

「階級報復」論有他的致命弱點，這就是：農民不是被地主階級餓死的。在新中國，地主富農並沒有當權，不能控制糧食，怎能製造如此大規模的餓死人事件呢？能製造全縣範圍的、十萬人以上的餓死人事件，一定是掌握糧食權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能量，也就是縣委書記、縣長以上的官員才有這樣的權力和本事。即令是混進黨內的（例如副縣長容鏡），他的身份首先是共產黨員，打起共產黨的牌子，披著共產黨員的皮子。處分他們，也有給共產黨抹黑之嫌。例如，金沙縣委準備將禹謨區委書記楊品良的問題揭開時，孟子明的答復是：「我與你們的觀點就是不一樣，你為什麼要一個勁地揭蓋子呢？死人不光是你們金沙，不管楊品良的錯誤有多大，他過去總是共產黨的第一書記，你

揭他的蓋子叫別人罵他狗血噴頭，對共產黨臉上有什麼光彩呢？」

顯然，「階級報復論」一是不能服眾，且有自己抓狗屎敷臉之嫌。不久即不了了之。

## 2 | 局部事件論

另外一種是將事件限定為局部事件。在貴州，就只能提「金沙事件」、「遵義事件」、「湄潭事件」。這是中央已經掛了號的，因此貴州省委就拿這兩個縣說事，將這兩個縣批判得一塌糊塗，這些地區的官員十惡不赦。以點的批判，掩蓋面（全省）的問題，讓省委過關、中央過關。

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被逮捕後，新任畢節地委書記陳健吾在給趙廣玉「做工作」時，叫趙廣玉將責任一肩擔下，以便掩護大家過關。他說：「事情已經攤到身上了……認倒楣算了，廣玉，你過去寫的一些申訴及信，省委和地委認為都是有道理的。廣玉，過去在部隊時，叫一個班掩護全團撤退，堅持人少完成任務，否則殺頭，結果堅持八小時，全團安全撤退了，這一個班 12 個人全部犧牲了。」

在此原則下，貴州省判死刑的縣團級以上幹部就容鏡一人；勞改的僅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湄潭縣委書記王卿臣；地區級幹部大都是撤職了事，而且僅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副專員何林、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等三人撤職。原因是他們負責的地區出了「湄潭事件」、「金沙事件」，無法推諉；省級則一個人也沒有受到處分。銅仁地區的思南、沿河、石阡，黔東南地區的黃平、劍河、麻江、從江、丹寨，黔南的貴定、三都、羅甸等縣，黔西南的望謨、冊亨，畢節地區的水城、黔西、畢節、織金、大方等縣，餓死人也是嚴重的，但中央似乎沒有發覺，或許中央也不願意擴大事態，所以那些地區和縣的官員就沒有受到處分。

本來應是「貴州事件」，但只說成「遵義事件」，這就是怕暴露全省

的情況。1964年「四清」揭發周林問題時，指出周林曾經說過：「（這件事）要說成『貴州事件』，那我們省委咋辦？」；「遵義地區的事，遵義地委負責，省委不負責任」。可見，犧牲車馬，保存將帥的意圖十分明顯。

### 3 | 上級正確、下級錯誤論

在反瞞產鬥爭中，下級幹部是「捉鬼拿糧」、與「富裕農民」進行鬥爭的前沿陣地。公社、管理區、大隊幹部在實施對「富裕農民」的「堅決教育」時，抄家、搜糧，動手打人、打死人的現象非常普遍。很多縣委書記也都打死過人。副專員何林就說，湄潭縣委書記王卿臣叫人打死過一個幹部。

即令沒有動手，也暗中支持對「富裕農民」進行棍棒教育。例如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大力表揚和提倡黔西縣委書記李如川所彙報的：「王大奶，覺悟高，對於當時攻擊糧食政策的人恨之入骨，她不敢打，發著言就上去扭（揪）被鬥爭的人一把，一扭（揪）就一咧咀……。」孟子明還向各縣委書記說：「這個人很好，出身好，覺悟高，她才對這些被鬥爭的人恨之入骨，沒辦法了，才去扭（揪）他一把，對這樣的行動不能去制止她，不然是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領導如此號召武鬥，下面武鬥的熱情就更高了。

「上級正確、下級錯誤論」一出來，很得農民的支持。因為打人、搜家、搜糧食的是基層幹部，手法殘忍，態度惡劣，農民對他們有肌膚之痛。他們與制訂政策的人隔得遠，根本沒有接觸，對「猛於虎」的政策更沒有直觀的感受，所以非常恨基層幹部。湄潭縣在槍斃副縣長容鏡時，同時槍斃了興隆公社中華管理區大隊支書閔昌華，農民是滿意的，認為理當如此。

在「下級錯誤論」指導下，處理區以下幹部就非常堅決了。「處理區長、公社級幹部，遵義專區光區級扣押入獄的就有120到150人左右，有的判了一年多，有的幾個月。區、公社、大隊級的共400到500人被

撤職，達幹部的 90% 以上，留下的不足 10%」。

但是，蔣明芳在《湄潭事件始末》中指出，在法辦湄潭縣委書記王卿臣時，「他本人不服，拿起筆記本與法庭講理。」金沙縣委書記趙廣玉所記錄的上級指示、包括省委書記周林的指示，就更多、更全面，也翻起本本說理，常常問得審案的人啞口無言。這說明出現如此大的失誤，是縣委書記和下面的區委書記、公社書記的能量所不及的。事情在農村，根子在高層。推諉給下級，也沒有成功。

#### 4 | 天災論

1959 年，貴州大旱 80 天，全國也經受了不同程度的大旱，這是事實。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出現大旱之年，必定要出現大面積的饑荒、餓死人事件，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也發生在這些年份。於是政府就將 1959 年的餓死人推諉給「老天爺」。

我記得，1960 年的《人民日報》聳人聽聞地說，我國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災，並用「乾斷了黃河」來形容災情之嚴重。這對於江南孩子而言，很具震撼力。江南的河水不是大旱是不會斷流的。長江是波濤滾滾，從不斷流。黃河是中國的第二大河，也是世界有名的大河之一。在江南孩子們的想像中，黃河也會如長江一樣白浪滔天。黃河斷流，就是非常嚴重的乾旱了。殊不知，這種說法能哄江南人，卻哄不了河南人、山東人。黃河斷流的段落、機會都是很多的。「1972 年後，經常斷流」。況乎，1959 年全國也不是十分的大旱，收成上也達到了 1958 年的八成，貴州省 1959 年的收成與 1956 年相當。1956 年，無論是全國還是貴州，糧食是有些緊張，但沒有餓死人。

所以，宣傳幾天「乾斷黃河」後，政府也自己沒趣了。責怪老天爺沒有成功，老天爺還是背了「三年自然災害」的罪名。不過，這已經是「大饑荒、大災難」、餓死事件的代名詞了。說「自然災害」總比直接說「餓死人」的自我感覺要良好得多。

這種論調是，從中央到地方都錯了，而大量的錯是下級錯誤，中央少錯誤，毛澤東無錯誤。毛澤東一直在等待地方大員們自覺承擔責任。而地方大員們，卻在眼巴巴地等待中央承擔責任。誰也不敢鬆動半步。

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開會的起因是，各省怕再餓死人，不願意上調糧食給中央，因此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供應全面告急。中央認為這是典型的本位主義、分散主義，於是大會的主旨是「反分散主義」，並順勢將大躍進中的失誤說成是各級政府不執行中央（毛澤東）的正確政策，自行其是，搞「分散主義」的結果。而造成餓死人事件後，又不給中央擔責，自己脫逃，這也是分散主義。

對此，「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說：『幾年來，發生的問題是高指標、左傾蠻幹，是主觀主義。問題出在主觀主義上，不是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不反主觀主義，分散主義也反不了。計劃大，指標高，還能不出分散主義？』」

彭真說：「……毛主席不是什麼錯誤也沒有，三、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和大辦食堂問題都是毛主席批的……」，要拿掉珠穆朗瑪峰（毛澤東）上的幾噸土（錯誤）；鄧小平比較聰明，他引用毛澤東自己的話批評毛澤東：「毛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劉少奇說：「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應該下『罪自詔』，可以考慮在每個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門口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吸取。」至於地委、縣委反對的意見就更多、更為直接了。

1962年2月10日，針對七千人大會上不少人提出讓毛澤東退下的意見，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他誠懇地表示：「願意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結果，朱德、陳雲、鄧小平「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職務」；周恩來說：「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劉少奇是「馴服工具」，要毛留下；林彪反對毛澤東退位。這樣是三票對三票。如果毛澤東真正想退居二線，是有機會的。顯然毛不願意退下，結果，毛澤東投自己一票，以四票對三票保住了主席位子。但他感受到了「高天滾滾寒流急，已是懸崖百丈冰」般的寒冷。

這樣的形勢讓毛澤東先是失望，繼而憤恨，而後是下決心整人。七千人會議過了一年，1963年元旦，《人民日報》副刊刊載郭沫若的《滿江紅》一詞。這篇作品沒有多少內容，實乃拍馬屁之作。毛澤東則另有所感，於是借題發揮，寫下《滿江紅·和郭沫若》詞一首。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  
欲學鯤鵬無大翼，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千萬事，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詞中，顯然是將劉、鄧、彭的講話當成嗡嗡的蒼蠅，吠堯之桀犬；要他退居是蚍蜉撼樹；而他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將他們掃出長安城。方式大約是「四海翻騰，九洲震盪，工農踴躍抽長戟」，時間是「只爭朝夕」。

上面引用的《滿江紅》是毛澤東最早的稿子。在正式發表的版本中，「欲學鯤鵬無大翼」改為「螞蟻緣槐誇大國」，「千萬事」改為「多少事」，而「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則改為「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原版本更能代表毛澤東的原意。

「欲學鯤鵬無大翼」，顯然是指某人志大才疏。這個某人指誰？不妨說就是劉少奇吧。他敢於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卻又不敢叫毛澤東下

台，正是無翼的鯤鵬。「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抽長戟」，更為明白地指出運動的方式是「發動工農，攪翻四海」。所以，「文革」運動是 1963 年設計的。

「1966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毛澤東 1963 年 2 月 5 日手書的《滿江紅·和郭沫若》」。這時，「文革」正以「四海翻騰，九洲震盪，工農踴躍抽長戟」的形勢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全國各省市處於全面奪權的前夕，這篇雄辭就成了鼓動「造反派」衝鋒的號角、奪權令。這是後話。

毛澤東見不能達到「集體背過」的目的，1962 年 1 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期間，毛澤東專門做了「四菜一湯」，找了河南、安徽、山東、甘肅、貴州等省的省委書記在一桌吃飯，詢問農村情況。河南、安徽、甘肅、貴州加山東，剛好「四菜一湯」，我們不妨叫它「四菜一湯宴」。

必須指出，毛澤東所請的，是全國餓死人最為嚴重的幾個省的省委書記。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次宴會當成朋友之間的「派對」看待。它的真實目的是：一、向全黨宣佈，對餓死人事件，中央和省委書記是不能分開的。獨菜不成席，少了菜也不能成席。菜是大家湊的，我有責任，省級也負有重大責任；二、同時也是安撫省委書記們的意思，我對你們是信任的。就像秦穆公照樣信任在崤關全軍覆沒的三個將軍（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一樣，信任你們；三、或許是向省委書記們打「招呼」，你們不能倒向劉少奇、鄧小平一邊去。若你倒過去，就要像吃菜一樣，一盤一盤地吃了你，就要拿你們去向所在省份的人民謝罪。

由於全黨幹部的抵制，推諉下級失敗了，省委書記們就高興了。周林說「毛主席主動承擔了責任」，一時狂妄自滿。那一段時間省委書記們確實好過日子，上有毛澤東擔責，下有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背過，萬事大吉，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什麼責任也沒有，連自我檢討都沒有了。其實是高興得太早了。

### 十三 | 碰到牆後的回頭

鑒於大躍進的全面失敗，黨內在經濟建設上的穩健派政治家又重新走上歷史舞台收拾殘局，這就有1962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出台。這些穩健派是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周恩來、朱德、李先念等。

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下來一個關於「單幹定義」的徵求意見的文件，叫大家討論「單幹是管理問題還是體制問題」。省、地一級幹部的理解是，「文件的意思是說單幹好，是個管理問題。」當時，鄧小平、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想來此事與他們有關。

劉少奇說：「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留地可以到20%」。鄧小平講「社員可借一畝保命地」，李井泉叫貴州也借。毛澤東說「我們的困難已經過去了」，陳雲說：「我們對困難估計不足，已處在非常時期，要採用非常手段。」鄧子恢則公開主張單幹。朱德則說「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陶鑄說：「如果這（指「三自一包」）也叫資本主義，寧願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

貴州的周林呢，在碰了壁後的反思以後則說：「三面紅旗還紅不紅？不那麼紅了，少宣傳些。」想來也轉到了「劉、鄧思維」上去了。於是積極搞包產到戶。

1961年4月21日，中共貴州省委批轉《洪番生產大隊實行糧食按包產定包工的經驗》，要求全面推行「三包一獎」制度，「全面地包工包產」，叫下邊「央倒搞」。「央倒搞」是貴州土話，就是央求著對方實現某種交易的意思。既然是央求，顯然自己在某些方面底氣不足、對別人有歉意、或有求於對方，於是犧牲原則或利益，使事情成功的意思。餓死人事件，貴州省委是對不起人民的，所以現在要央求人民。具體到「包產到戶」問題，「央倒搞」就是糊糊塗塗、默認「包產到戶」的合理。

包產到戶的結果，是全面恢復了被破壞殆盡的經濟元氣。我於1963年春在湄潭抄樂信用社發放生豬貸款，20斤的豬崽價值40元。1964年秋冬，我在茅坪石冷水供銷社收購商品豬，130斤的乙級豬也不過值40多元。市場上已擺起攤子賣肉了。也就是這一年，我們以生豬、花生等農產品，還完了在朝鮮戰爭中所借的蘇聯的債務，布票也從3.1尺增加到15.7尺。這是多麼鼓舞人心的事呢。

所以，周林搞包產到戶，儘管是碰到牆後的回頭，但客觀上對貴州修復創傷、渡過災難還是適時的、有成效的。

#### 十四 | 事件餘韻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快刀斬亂麻，解農民於倒懸，挽大廈之將傾。國家又有了生氣，但同時，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陳雲在「包產到戶」這個問題上的馬列主義原理準備是不足的，所以在各地像小偷一樣地推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這就授予毛澤東以把柄。他們是先將自己置於受審判的地位了，而最終成為「路線鬥爭」的失敗者。

1962年8月6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三年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政策進行了一次反攻倒算。「……農村集體化還要不要？是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為主？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這逼得主張包產到戶的人，「上至陳雲、鄧子恢，下至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紛紛檢討」。於是開始全國性的糾正「包產到戶」政策，貴州也全面糾正「包產到戶」。

正因為周林沒有聽七千人大會時「四菜一湯宴」的政治「招呼」，還說「三面紅旗還紅不紅，不那麼紅了，少宣傳些」，對「包產到戶」全面支持，於是毛澤東拿周林開刀了。

1964年8月發動了貴州「四清」運動。以李大章、錢瑛為首的貴州省委「四清」工作團，按毛澤東的意思要清理周林的「單幹」問題，就是「走資」問題。與1966年「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整黨內那些走資

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政治口號以及實際結果比較來看，「四清」與「文革」是承前啟後的。整周林的「單幹」問題，也就是要整「劉、鄧、陶」等一大批在中央裡主張單幹的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是「試水」，而「文革」是「四清」的繼續。表面是「走社走資」之爭，其實是黨內的權力與地位之爭，是排除異己、打到劉少奇的一次演習。

但是，廣大基層幹部並不知道毛澤東的意圖。在廣大幹部的心裡，提起周林，對他搞「包產到戶」並沒有多大的憤恨，甚至有幾分感激。他們最恨的反而是 1959 年貴州餓死人的事，所以在「四清」運動中提了很多餓死人的事情，火力也很猛。這與毛澤東的初衷是大相徑庭的。可以說，餓死人的事，就是毛澤東的事。在貴州「四清」中，所有的簡報和周林的專案都送主席辦公室，主席是天天能看到的。他看到貴州的「四清」沒有按計劃走，是「形左實右」，故貴州的「四清」就不了了之，周林的事也不了了之，隨即他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去了。

其實，追查餓死人，永遠是毛澤東忌諱的。文化大革命以後，省長李立任貴州省文革領導小組組長。貴州工學院「遵義事件造反團」成立後的七、八天，中央文革小組就指令李立干預，不准調查「遵義事件」。省長李立苦口婆心、比三比四地跟我們說，「不要再去追究這個問題了，這是中央做了結論的歷史問題。要把矛頭對準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拓、吳 就是以這些（餓死人的事）給毛主席抹黑。」

毛澤東發動的貴州的「四清」運動不但沒有整到周林，反而給了人們追查死人事件的合法權利。按照這樣發展下去，顯然是對毛澤東本人不利的，因此他才草草結束貴州「四清」運動，周林因此得以過關。

過關以後，周林就不服氣了，說四川的問題不比貴州輕，遂賴在貴陽不走。賈啟允又缺席批判了他一回，他才離開了貴州，全然沒有自責之心。40 年後的 1999 年，《周林紀念文集》出版，該書仍然極盡上下推諉之能事，以至於為周林立傳的貴州史學家也為之蒙羞，不得不以

「箴元」的筆名代之。對於餓死人，李蘇波、何林、趙廣玉、王卿臣等中下級幹部，尚能從道德良心上自責，周林連這一點也沒有。所以廣大中下級幹部憤恨他，這是很自然的。

毛澤東見局部突破不成，就採取了戰略退卻，暫時停頓與調整了對劉、鄧的鬥爭。但他隨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大手筆。不但整倒了中央的劉、鄧、陶等一大批主張包產到戶的「走資派」，也整倒了包括周林等從省到縣的全部主張包產到戶的「走資派」。這個以毛澤東一人對抗全黨、毀掉既有黨政機構的運動，何以得逞？力源是什麼？這是另一課題，此不贅述。

### 結束語

「貴州事件始末」就算結束了，讓人看了就像「毛澤東製造災難史之貴州卷」。在毛澤東皇權專制主義制度下，省市政府是沒有人不服從毛澤東的權力的，理所當然，毛澤東乃是「貴州事件」的主角。

省委周林、苗春亭、徐建生等人雖然在大潮裹挾下不由自主，但也有「想表現」、想出政績，以便升官的私心，這與毛澤東想當國際「共運」霸主的思想同出一轍。在這一私心控制下，他們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貫徹得很徹底，甚至局部還有創造性貢獻，因此造成的災難也是駭人聽聞的。按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的研究，貴州餓死的絕對數為174.06萬人，居全國第六位，死亡率為10.23%，是全國第三位。那些沒有緊跟毛澤東的全國幾十個省市，災難就輕些。理所當然，當時貴州省委的那些大員們，與毛澤東一起被歷史所指點是不冤枉的。

「貴州事件」已經過去了，但不可抹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將這一慘案作為寶貴的歷史財富加以總結，以便我們的國家、民族在走向未來的行程中更加穩健。如何總結歷史財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裡只將這一事件的歷史如實列出，有心人可以根據這些史實，得出自己的經驗和教訓來。

第四章 回憶與見證：個案研究

# 4-1

## 寒春

### ——我在一九六〇年

口述者 | 李世華

有幸受到勞改基金會和傳統基金會的邀請出席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感到萬分榮幸。我將以大饑荒受難者的身份對大饑荒時代做個人見證。

解放前，我的父親和叔父給地主做長工，他們也都曾被日本鬼子抓去關東挖煤；淮海戰役時，他們也都冒著生命危險推著獨輪車支持解放軍。解放後，我們分得了土地，當家做了主人，在上邊號召「走集體化道路」時，父親第一個報名入了互助組、初級社。由於父親的誠實、能幹，他被選為我們生產隊解放後的第一任隊長。可是，隨著 1957 年的人民公社和 1958 年的大躍進，災難向我們家和中華大地的千家萬戶步步逼近，使數千萬人淪為餓殍，使我家在 1960 年春天的 28 天時間內家破人亡。

#### 1 | 過年

1960 年，我 17 歲，在安徽省碭山中學讀初三。大年三十那天回到家，我一眼看見滿案桌的山芋葉子，這就是大年三十的午飯：一大鍋白水煮的山芋葉子，夾雜著星星點點的幾個黃豆粒。母親告訴我，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光了，村幹部只要看到誰家冒煙，就跑到他家裡來搜糧食。

大年除夕沒有飯吃。天還沒，我們便早早地上床，準備在床上饑腸轆轆地熬過大年夜。這時突然聽見一聲厲叫傳來：「開會了！」接著又是兩聲劃破夜空的厲叫，「開會了！開會了！」

母親說，村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天天晚上開會鬥人逼糧食。這幾天正在鬥爭前院的歐四奶奶，她是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隻手拿一根筷子，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

參加這樣的會議，等於接受一次酷刑。所以一聽見喊開會，社員們就嚇得發抖。父親怕嚇著家裡其他人，逢有人喊開會，誰也不讓去，都是拖著佈滿流血裂口的雙腳自己去。每天會上鬥了誰，怎麼鬥的，父親對家裡人也絕口不談。

大年初一的早晨，我早早地被東屋裡傳來的嬰兒哭聲驚醒。母親歎氣說：「唉，這小閨女是活不成了，餓得從早哭到晚。」這嬰兒便是我的小侄女，她出生在1959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後夭亡，我也不曾見過她一面，家裡也沒有人給她起名字，只聽母親喊她「小閨女」。

聽到食堂喊「開飯了」，二哥便拎著個罐子端著個小饅筐去領飯。

這是大饑荒的第二年，食堂裡早已斷了糧，上面的口號是「低標準，瓜菜代」，食堂的供應標準是每人每天一兩八錢。社員編的順口溜說：一兩八錢，餓不死炊事員。除掉村幹部、積極分子和炊事員多吃多占的外，社員吃到嘴裡的恐怕不足五錢。但這個定量還不是米和麵，而是山芋乾子麵或是用山芋藤子、乾茅草根、乾樹葉磨成的粉。炊事員用這些東西摻和上野菜做成窩窩頭，再用白水煮點野菜，撒上些鹽，算是湯。每天兩頓飯，一人一個小窩窩頭，另加一盞子湯。社員說食堂的窩窩頭「像牛眼一樣大」，把菜湯叫做「四個眼的湯」，意思是湯稀得可以照見人影。

母親又用山芋葉子拌著一點什麼麵做了一鍋丸子，全家算是過了一個

年。

早飯後，我去看爺爺。爺爺那年 82 歲，是村裡德高望重的老者。爺爺雖然年齡大，但沒有任何疾病，前兩年還在晚上跑到十幾里開外的地方聽大戲。以前逢過年，他都是早早起來，洗漱乾淨，迎接成群結隊來給他拜年的晚輩和年輕人。但今年沒有人來給他拜年，他一個人拄著根棍子孤立在他的小屋裡，瑩瑩子立，形影相弔。我到他面前，說了聲：「爺爺，我給您拜年了。」然後恭恭敬敬地給他磕了個頭——這是我給他磕的最後一個頭。

初一的晚上，我們全家人在暗夜裡默默地圍坐著，沒有人說話。我對未來還充滿著幻想，相信英國詩人雪萊的名言：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在內心裡默默地盼望著春天的到來，然而春天給我們家帶來的卻是天塌地陷的災難。

## 2 | 天塌地陷

年初三吃過早飯，我便要啟程返校。父親出去給我借學費，我跟父親出門，母親也隨著送我到了村子中間。父親不知從誰家借來了錢，交給我，我正要動身，母親卻突然放聲哭了起來：「我的乖兒來，你下次回來，不知還能見到你大大（父親）你娘不……」

幾天來我積壓在心裡的痛苦一下子迸發了出來，我「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我邊哭邊用袖子擦著眼淚，一步一回頭看著爹娘，他們也站在村口望著我，直到我再也看不到他們，他們也不再能看見我。

然而母親的話一語成讖，一切竟不幸被母親言中：這一別正是我與父親的訣別。

回到學校，我們便投入了緊張的初三總復習。我們的早餐是蒸熟的山芋片，外加一碗山芋片麵糊糊，中午和晚上是一個山芋粉麵做的窩窩頭和煮的爛白菜之類。每到吃飯的時候，我便想起父母親和爺爺刀削一般的面孔，耳邊響起小侄女的哭聲，我就無法下嚥我的那一份窩窩

頭，便悄悄地掰下一塊放在我的書桌裡。三兩天後，我便自己吃每頓掰下來的有點發霉變質的窩窩頭塊塊，從而省下一個整窩窩頭。這樣，一個星期下來，我就能省出三個窩窩頭來，這樣每兩個星期回家的時候，我就可以帶六個窩窩頭回去。

那年的春天特別寒冷而漫長。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等到麥子成熟，便在饑餓的煎熬中倒下去了。我們的教室最靠近校門和傳達室，同學中不斷有家裡傳來兇信，時常聽見傳達室的校工王煥章喊同學接電話，不時看到哭著回家奔喪的同學從教室門口經過。我們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生怕家裡來人送信或傳達室裡叫接電話。在那個時候，真的如一句英語諺語所說：No news is good news。

然而壞消息還是來了。1960年3月7日，晚飯後，我正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刷牙，聽見傳達室王煥章的聲音：「李世華，電話……」我三步並作兩步跑進傳達室，用哆嗦的手拿起話筒，電話裡傳來大哥低沉而緩慢的聲音：「咱大大沒有了，你回來一趟吧。夜裡十點鐘有一班車。」像是早有了思想準備，我沒有多問，只是邊哽咽邊「嗯、嗯」地答應著。

到李莊車站下車的時候，已近夜裡十一點鐘，天正刮著風下著雨。李莊車站離家還有十八里路，在這漆黑的雨夜裡，我一個人是絕對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我在候車室裡的一條長座椅上坐下來，懷裡抱著我那盛著窩窩頭的小書包，開始了我一生最寒冷最漫長的一夜。當窗玻璃露出一點亮色時，我便揹起書包，迎著風頂著雨上了路。剛到村口，我的眼淚就刷刷地往下淌——這是我的父親勞作了一輩子的地方，這裡的每一塊地方都留著父親的足跡，都浸著父親的汗水。

一進家門，我便放聲哭了起來：「我的大大啊，娘……」

母親從屋裡迎出來，一把鼻子一把淚地說：「我的兒啊，天塌了啊地陷了……你再看不見你大大了……」這時，我看見滿屋子地上鋪滿了麥草，沖著房門放著一口「棺材」。我認出那是母親陪嫁的嫁妝，一

個油漆斑駁的櫥櫃。因為櫃太短，父親的兩隻枯柴般的腳露在外邊。

父親沒給我留下一句話，連一張照片也沒留下。我嗚嗚地哭著，大聲地喊著：「大大，我是三兒，您睜開眼看看我呀……」母親用手撫摸著父親的臉，對著父親問：「我的爹啊我的娘，你睜開眼看看，看看你的兒，看看你的孫，這麼一大家子人，你就忍心這麼走了？你怎麼能合眼的？……」

當時村裡已沒有年輕人，多數「流竄」到外地逃命去了，連能幫助安葬父親的人都找不到了。大哥一家一家地磕頭，央請左鄰右舍幫助把父親送到墓地。

入了人民公社之後，我們再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也沒有力氣把父親送到更遠的地方，就埋在了村口的荒灘高坡。

回來後，我們每人扒了一碗水煮的紅芋葉子，裡邊已經沒有了過年時夾雜的黃豆粒。沒有父親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但，直到這時，我仍然不知道父親是怎麼死的。下午，我問了母親。

「你大大沒害過一天的病啊……我的兒啊，正領家過日子呀……我一輩子的挖屈（遺憾）啊……」母親先自語無倫次地哭訴起來。漸漸地，母親鎮定下來，我才得以知道父親是上吊死的。

原來父親早就不想活了，他曾多次對我們最親近的店裡大嬸說：這樣活著有啥意思？不如死了。每一次聽父親這麼說，店裡大嬸都這樣勸他：「你不能死，你上有八十多歲的老爹沒有送到南門坑裡，下有沒成年的兒子，還有幾個月大的孫女，你怎麼能死？再說，你死也死不起，家裡連個三寸板（薄棺材）也沒有。」聽著大嬸的勸告，父親只是歎氣。最後總是說：「眼一閉，啥也不管了。死了也不用三寸板，用一張箔（席子一樣的東西，高粱秸編成，用以晾曬糧食等）一卷，拉到南門外壩子底下挖個坑埋了就算了。」想不到父親的話也竟成了讖語。

在父親自殺前半個月的樣子，嫂子早上起來，一眼看見父親正站在鍋台上往房樑上掛繩子，她一個箭步跑過去，雙手摟住父親的腿，大聲哭道：「大大，大大，你不能死……大大，你怎麼能捨得我們老少娘們？大大，我的好大大……」

父親從鍋台上下來，嫂子趕忙跪倒在他面前，連聲喊：「大大，我的好大大，求求你，你可不能撇下我們不管……」

嫂子的哭聲把全家都驚起來了，母親、二哥和不懂事的侄兒、侄女，一呼喇跑到鍋屋，全家人一起跪在父親面前哭作一團。最後，父親一個個把孩子們從地上拉起來，泣不成聲地說：「起來吧，我的乖乖，我不死了，我陪著你們……」

嫂子還是不起，把孩子都拉到父親跟前，說：「快，快給爺爺磕頭……」

侄兒侄女又重新一起跪倒在父親腳下，摟住父親的腿，一邊磕頭一邊哭喊：「爺爺，爺爺……」

父親又趕緊彎腰拉起他們，哽咽著說：「快起來，乖孩子，爺爺真的不死了，我帶著你們一起往前熬……」

大家都信了父親的話，都以為他不會尋死了，以為他會帶著全家往前熬。

在那個年頭，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為了活命，家家戶戶都在偷，社員偷地裡的，隊長偷場上的，村長偷倉庫裡的。然而父親、叔父都是極本分的莊稼人，餓死不做賊。二哥畢竟在學校受過多年教育，也不會偷。母親、孀母和嫂子更不是那種「有本事」的人，全家人只有待在家裡餓以待斃。

同村的劉以臣向我回憶說：「我一輩子行好，不做虧心事，但是那幾年我孱了，我偷東西了，天天晚上出去偷，只要是好吃的，什麼都偷——我不能眼看著一家子人餓死。」

在那些日子裡，父親經常被小侄女的哭聲攪得心神不寧。一聽到小侄女的哭聲，他就心如刀絞，在院子裡來回走。小侄女的哭聲常常從天黑持續到天亮，父親也就一夜一夜地在院子裡來回轉。還有八十多歲的爺爺，一天不如一天，父親內心在受著煎熬，在思想上進行著艱難而痛苦的生與死的鬥爭。他不忍心眼睜睜看著自己嗷嗷待哺的孫女和年過八旬奄奄一息的老父親都被活活餓死。家裡實在沒有一口可吃的，而村幹部還在繼續打人、罵人、鬥社員、逼糧食——他實在看不到一點點生的希望。

父親後來不當隊長了，還繼續擔任村裡糧食保管員的要職（在那個缺糧的時代，糧食保管員簡直等於今天的銀行行長）。到了1960年，村裡已沒有了糧食，幹部便讓他看管山芋育苗床。那時看管山芋育苗床比當糧食保管員更難。被饑餓逼瘋了的村民，把山芋育苗床當成最好的目標，冒著挨打、被鬥的風險，想盡一切辦法去偷。用老百姓的土話說：「你拴個老虎也看不住。」所以儘管父親盡心盡意地看管，常常整夜不敢合眼，苗床裡的育種的山芋還是日漸減少。父親想辭掉這個職務，但隊長不准，因為除了父親他實在找不到更放心的人。這在父親是個很大的壓力：山芋在減少，父親又抓不住偷山芋的人，別人就會自然地懷疑是父親自己監守自盜。父親背著沉重的思想負擔。終於有一天，隊長發話了：「要是再抓不住偷山芋的人，就算是你自己偷的！」父親雖然是個農民，卻極在乎尊嚴。他雖不能說出「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豪言，卻一樣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清白的身上潑髒水，所以，這句話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使父親最終作出死的決定。

在父親自殺的前兩天，村裡發生了一件極其悲慘的事。隊長懷疑福雨嬸家藏有糧食，便開會鬥她。福雨嬸正被鬥得焦頭爛額時，突然外邊有人喊「救火」，大家跑出來一看，失火的正是福雨嬸家。人們趕到時，大火已經吞噬了整個房子。當火最後被撲滅的時候，人們發現福雨嬸的兩個孩子和一隻羊全被燒死了。

幾天後的一天晚上，嫂子和孩子都已經睡著，父親在院裡喊道：「小

紅（我的大侄女）的娘，叫孩子們起來，起來吃肉。」

嫂子半信半疑，這年頭哪里來的肉？順便說道：「孩子們都睡著了。」

「叫他們起來，把他們叫起來，起來吃肉！」父親又催促道。

嫂子把幾個孩子喚醒，開開門，見父親雙手捧著一個紙包。

「您福雨孀家的羊給燒死了，我去買了點羊肉，讓孩子們吃吧，吃飽。」父親補充說。

嫂子接過羊肉，喊醒昏睡的孩子，讓孩子們解了饑。

此前，父親已先把一小包羊肉送給了爺爺。這時，父親好像感到了結了一個大心願，一個最終的心願。

當天夜裡天還沒亮，父親對二哥說：「咱家的土地證和合作社股份證放在那個木盒子裡，木盒子藏在堂屋東山的牆洞裡。」二哥醒來，發現不見了父親，很是心慌，找到育苗床，也不見父親，他更加心慌，喊醒嫂子，嫂子急忙跑到鍋屋，一眼看見父親正吊在房樑上。

嫂子慌了神，趕忙大喊：「快來人啊，俺大大上吊了！」

聽到喊聲，近鄰李樂斌沖進鍋屋，跳上鍋台，拿起菜刀，一刀割斷了房樑上的繩子，然後爬到房頂上，用笤帚把敲打著簸箕，大聲喊道：「傳先大爺……回來啊！傳先大爺……回來啊！……回來啊，傳先大爺……」這是農村裡為上吊的人叫魂的方式。

然而父親終究沒有回來，他走了，永久地走了。

### 3 | 生離死別

埋葬了父親的那天晚上，我們聽到叔叔院裡傳來孀子的哭聲。母親立刻起身，順手拿起一把燒紙，領著大哥、嫂子、二哥和我一起去了叔叔家。孀子正在叔叔床前「我的爹啊我的娘」地哭，看見這個情況，

母親也坐到在叔叔床前跟著哭了起來：「我的兄弟啊，我的好兄弟……你咋該走的？……親弟兄兩個啊，一個頭（一）天（走），一個第（二）天（走）……」邊哭便點燃手裡的燒紙。我和大哥、二哥、嫂子一起跪倒在叔叔床前，抱頭痛哭。

叔父只有五十二歲，在飼養組養牛。在篩洗牛飼料的時候，偶爾會淘出麥粒、黃豆來，因而村幹部斷定，這麼多年來一直擔任飼養員的叔父家裡一定藏有糧食，要逼他繳出來。叔父繳不出，就免不了遭批鬥，受到推拉扭打，叔父被人推倒地上，當時就吐了血。像叔父這樣的老實人，尤其受不了這樣的氣。父親的自縊身死對他自然是雪上加霜，促使了他的離世。

第二天早上，我突然想起奄奄一息的爺爺，便拿起一個麵瓢去了伙房。這裡有和我家關係最好的店裡二嬸。我像一個乞討的孩子似的，伸出手裡的瓢，對二嬸說：「俺大大前天死了，俺叔昨夜裡也死了，我爺爺就快不行了。能不能給我爺爺點糝子，給爺爺燒碗糊塗（稀飯）喝？」

二嬸看了看我，挖了一滿碗糝子倒在我的瓢裡。我仿佛領到了可以救爺爺生命的東西，很快地走到爺爺住的小屋裡。

爺爺和衣躺在床上，瘦骨嶙峋，身子倚靠著牆。過年我給他拜年的時候，他也還能拄著棍子在屋裡走動，五個星期的饑餓使得他臥床不起了。

我把糝子放到爺爺床旁邊的小桌子上，然後對嬸子作了交代。

這是我給爺爺盡的最後一次孝，也是我對他老人家盡的唯一一次孝。我當時還未成人，不僅不能用自己力氣掙的錢給他買點吃的，就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來的窩窩頭，我也只能留給母親一個人。

過了中午，扒了一碗山芋葉子，大哥就打發我回校——畢竟學校裡每天還有三頓飯吃，而且我還能從學校省點窩窩頭救母親。臨走我和母親又相擁痛哭了一場。

出門時，我又想到風燭殘年的爺爺。我得給他老人家告個別——我心裡知道，我下次回來，肯定見不到爺爺了。

竭力忍住眼淚，走進爺爺的小屋，喊了聲：「爺爺……」

「是三兒嗎？」爺爺想坐起來，卻沒有挪動他那瘦弱的身軀。

我趕忙扶住他：「爺爺，您別起來了。爺爺……」我突然哽住了。我頓了頓，抹了抹眼裡的淚，努力把我要說的話說完：「我，我得走了……俺叔的事我也不能問了……」淚水又奪眶而出。

我趕緊走出來，一出門就淚如泉湧。剛葬了父親，還沒有圓墳，叔父死了尚未入土，爺爺奄奄一息，還有命運未卜的母親，在這個時候我怎麼能離開？而我又不得不離開，這是人世間真正的生離死別！我的心疼如刀絞。

兩個星期後，大哥告訴我：爺爺不在了，嬸嬸也死了。他說得很平靜，我聽得也很平靜，似乎哥哥告訴我的是一件家常瑣事，因為這都是意料中的事。

後來得知，我離家的第二天，叔父也被安葬在那片荒灘上，睡的是一塊門板，身上蓋著一張蘆席，與父親的墳並排。直到多年後，母親一想起那年的事，就會哽咽著重複那句話：「親弟兄兩個一個頭（一天（走），一個第（二）天（走），一個睡櫥櫃，一個睡門板，我一輩子的挖屈啊……」

埋葬了叔父後，一連六天，爺爺每天上午拄著一根拐杖，一步三晃地走到父親和叔父的墳地上，晃晃悠悠地繞墳數圈，一邊走一邊泣不成聲地說：「兒啊……我的兒啊，往年都是兒埋爹，想不到今天爹哭兒……我的兒啊……」

我至今不明白：我離開爺爺的時候，他分明已臥床不起，只是一息尚存等待著死亡，他哪里來的力氣使他站立起來並來回走一兩里路去哭他的兩個兒子？而且一連六天天天如此！到了第七天，他自知他這一

盞燈的油已經熬乾了，他也要隨兒子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但是他已沒有了自殺的力氣，於是，爺爺用自己紮腰的大帶子套在脖子上，另一頭掛在床幫上，就這樣死去了。第七天的早晨，他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僵在床前地面上。

當年，年輕氣盛的爺爺帶著兩個兒子從山東鄆城來到這兒定居的時候，他是萬萬不會想到，他們爺兒三個會在一個星期內死於非命，然後一起被葬到這片荒灘上。

爺爺死後第十天，三月二十五日，孀母病餓而死。孀母雖然年齡不大，但她失去了叔叔，終於沒有熬過來，孤苦伶仃地死去了。孀母沒有子女，用農村的說法就是：叔叔這一門死絕戶了。

嫂子發現孀母的時候，她已經不知斷氣多長時間了。嫂子趕緊找到村長歐儒存，跪在他面前磕頭哀求道：「儒存叔，我求您了，您行行好吧，您千萬行行好，俺孀子死了幾天了，不能讓她臭在家裡，求求您找幾個人，把她抬到地裡去吧……」嫂子邊說邊磕頭。這樣，歐儒存好歹找來了幾個人，把孀母的屍體原身放進她自己陪嫁的衣櫃裡，仍舊抬到那個高頭荒灘上，埋在叔叔身邊，算是入土為安了，也算是與叔叔合葬了。

孀母去世後的第十一天，西曆四月五日，小侄女終於停止了哭叫——她被活活地餓死了。這天是清明節，是萬物復甦草木芃芃的日子，然而，我的小侄女，這個在錯誤的時間出生的孩子，她的小生命卻在這一天終結了。她在世上僅存活了不到一年。

自父親三月七日懸樑自盡，短短的二十八天內，我們的十二口之家竟有五口人相繼辭世，使我家倏忽間天塌地陷家敗人亡。我的爺爺和父親、叔父一生歷盡患難，但他們沒有死於地主的剝削，沒有死於國民黨中央軍的戰火，也沒有死在日本鬼子的煤窯裡，卻死在了當家做了主人的新中國！時也？命也？

但，悲劇並未就此結束。

四月中旬的一天，二哥從縣看守所裡寫來一張明信片，告訴我他被拘留了，關進了大牢。我便趕回家打聽二哥的事。母親告訴我說，二哥不敢像別人一樣到地裡偷吃的，天天在家裡餓得亂轉。小侄女死後，埋到壩子底下，二哥夜裡偷偷地把她扒了出來，弄回家藏在一個爛缸裡，用麥草蓋上。後來被嫂子發現，大哭大鬧，大喊大叫，鬧得鄰居都知道了，後來村幹部也知道了。沒過幾天，他就被人帶走了。

後來二哥向我解釋說，他當時是想給母親「燒碗湯喝」，但我的鄰居王作軍說，「他把小閨女劈開了。」到底真相如何？實際上，這件事最直接的知情者是我的嫂子，儘管她也健在，但我不敢問她，因為我害怕聽到更加耳不忍聞的細節，雖然我很想知道。

那時候，除了擔心母親以外，我又多了一件事：探監。星期天是探監的日子。每隔兩個星期，我便帶上我一口一口省下來的窩窩頭，用大哥給我的不多的零用錢買點鹹菜，送給監獄裡的二哥。不久，他被判了十年徒刑。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以什麼罪名被判如此重刑？

#### 4 | 哀鴻遍野

在大饑荒時代，受害者絕非我們一家。我的同桌翟素霞是我們那一屆的校花，她聰明又漂亮。1959年4、5月份，我們在城南的農村支農。一天中午，學校裡來了兩個大個子男同學把翟素霞帶走了。後來得知，翟素霞的母親剛剛死了，學校通知她回家奔喪。我們返校後，我悄悄地問她家裡發生的事，她以淚洗面，哽咽著說：「你……你別……別問了……」

她母親死後，大姐帶著姐夫住進了她家。大姐如母，雖然失去了母親，翟素霞還有一個家，還有一位疼她的大姐。1960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上課的時間到了，翟素霞還沒來。我很奇怪，我知道她不會缺課的，便去問團支部書記唐素雲，唐告訴我：翟素霞的大姐死了，她中午就回家了。當翟素霞奔喪歸來，我們又重新坐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看著她，她看著我，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大姐死後，姐夫又回到自己的家裡去了。一個星期六，翟素霞回了家，但家裡已人去房空，再沒有一個親人。面對著空空的院子，她傷心地哭了起來，哭著哭著，自己餓著肚子睡著了。第二天上午，她用學校發給她的一斤糧票到糧站買了一斤紅芋片，自己煮熟吃下，然後又回到學校。我們的校花枯萎了，突然之間變成了孤苦伶仃的孩子。

翟素霞不僅失去了親人，兩個跟她最要好的朋友也先後死去。

1960年的深秋，一個消息像閃電一樣迅速傳遍全校：王秀真死了！有的同學還說，他們親眼見到學校用一輛馬車把裝著王秀真屍體的小棺材送了回家。王秀真和翟素霞一樣，從小學五年級起就與我同班。她是個活潑可愛的女生，沒人敢相信這個消息，我便問翟素霞，翟素霞向我確認了這一殘酷的事實。後來翟素霞又告訴我：她們倆多年來一直睡一個被窩，那天早上起床時，翟素霞見王秀真不動，便動手拉她，發覺王秀真的手冰涼。翟素霞起來一看，王秀真滿嘴都是白沫。翟素霞趕緊報告了學校，校長帶著校醫來了，叫兩個工友抬著送了縣醫院。實際上王秀真夜裡早斷氣了，翟素霞等於是摟著一個死人睡了半夜。王秀真到底是怎麼死的？只有校長和校醫知道，但他們對外都絕口不談。

高二暑假後開學，我的另一個初中的同班同學唐愛華沒有按時來校報到。不久消息傳了出來：唐愛華假期裡死了。同樣，她的死因也沒有人知道。

翟素霞、王秀真和唐愛華是班裡個頭最矮的三個女生，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現在她們三個死了兩個，有人對翟素霞說：「你的兩個好朋友都死了，你恐怕也活不長了。」翟素霞後來對我說，她那時確實以為自己活不長了，隨時等待著死神的召喚。

因為饑餓，同學中間有時會發生偷竊的事。1959年，與我同屆的初二（5）班的學生孫玉璽偷吃了別人的饅，被發現後遭到批鬥。第二天早晨，孫玉璽趁同學們上早操時在宿舍裡上吊自殺。

高中同班同學李鴻儒與我一樣個頭矮小，勞動課時我們倆便經常被派去放羊，成了很要好的牧友。把羊趕到地裡以後，我們倆便開始覓食：在收穫過的莊稼地裡用鞭杆掘花生、山芋、胡蘿蔔吃。他在高中畢業之後不久死了，雖然他不是直接死於饑餓，但我敢說：他的死與饑餓有關。

我的二姑家住在鄰縣（蕭縣）小吳樓村。在1960年春天，她的獨生子鋼蛋隨村裡的幾個年輕人爬火車出去要飯，結果餓死在他鄉。直到2001年姑母去世，她再也沒有見到她的兒子。

我們唐寨公社原書記梁學孔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碭山縣歸屬的蚌埠地區16個縣，死亡150萬人，碭山死亡六萬人。

我家所在的大南門村，原有人口270來人，在1959至1960年春一年多的時間內，死亡的人數竟達70多人，佔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強。

我們的鄰居一個接一個、一家接一家地死去，皮子大爺死了，唐占廷死了，何香林一家弟兄兩個死了，王成賢一家娘倆死了，楊文彬死了，楊文棟死了，唐朝豐7、8歲的兒子也餓死了……

楊文彬臨死的那天晚上，呻吟了一夜，斷斷續續地對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重複著同一個要求：「你……你們能給我燒……燒碗湯喝嗎？給……給我一個糝……糝子窩……窩窩吃吧……」可那個時候，家裡連一棵野菜也沒有。第二天天剛亮，大兒子楊善運端著個麵瓢去了食堂，把老父親在家裡嚎叫了一夜的話對會計王念昌說了，王念昌把糝子、澱粉和野菜幾樣東西搭配著給了他大半瓢。當楊善運高高興興地端著救命的食糧回到家的時候，老父親已經斷氣了。可憐老人家唸了一夜，沒來得及吃上糝子窩窩、喝上湯就匆匆地上了黃泉路。

我縣的黃樓公社餓死了一半多，我們村一些年輕人被派去幫助搞「稻改」，到了那裡，發現無處安身：幾乎每家、每座房子都停放著沒有掩埋的屍體。他們只好自己動手把屍體集中到一個屋子裡堆放。當他們終於騰出一塊地方開始生火做飯時，炊事員突然「呀！」地驚叫起

來。眾人圍過去，原來他在鍋屋口的柴草堆裡發現一具死屍，死者的眼睛、鼻子、耳朵都被老鼠啃掉了，慘不忍睹。

午收季節，學校帶我們到城北的一個生產隊「支農」。在緊靠村邊的地裡割麥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會被眼前發臭的半腐爛的屍體嚇得尖叫起來。

與我縣同屬蚌埠專區的固鎮縣孟廟村，1960年麥子成熟的時候，竟然沒有了勞動力收割。王衢生老師和學生被指派來這裡幫助午收。當他們到了地方，滿村子找不到一個人。最後，他們在村邊莊稼地的麥壟裡，發現一個苟延殘喘的老太太，從她那裡借來一口鍋，可是飯做好了卻沒有人願意吃。原來學生們得知老太太用這口鍋煮過兩個死孩子吃才得以倖存。後來，連死孩子也找不著了，她就鑽到麥壟裡吃麥苗，吃未成熟的麥子。當王老師一周後返校時，那個老太太也斷了氣。至此，這個村子的人已全部死絕。

## 5 | 痛定思痛

大饑荒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由於這場慘劇被故意遮掩，加大饑荒的親歷者或者已經故去，或者已經年老失憶，或者以往事不堪回首為由，不願意回憶這段傷心往事，因此，這場人類歷史上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禍正在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當我想把自己的悲慘經歷告訴下一代時，他們就像聽《天方夜譚》一樣感到匪夷所思。這時，我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以搶救歷史，不讓這段歷史如煙散去。2003年，我退休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村口為我死於大饑荒的祖父、父親、叔父、孀母和後來死於文革的母親豎立了墓碑，在碑文的最後寫道，「家悲國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並昭示後人」；感謝明鏡出版社在2008年底出版了我的回憶錄《共用的墓碑》，讓我在大饑荒時代死去的五位親人又活了起來，活在歷史裡，活在人們的記憶裡；更感謝基金會，讓我有機會在這個場合見證這段悲慘的歷史，讓我死於非命的親人欣慰於九泉。

大饑荒是一場空前的大劫難。尤其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幾千萬人中，絕大部分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默默地屈辱地死去了，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他們沒有自己的代言人，沒有人知道那龐大的數字（數千萬）後面的慘劇，作為一個倖存於大饑荒的農民兒子，我感到有責任為他們代言，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我曾經找到當年我們村的村長歐儒存，問他明明知道家家戶戶沒有糧食，為什麼還要打罵社員追逼，以致造成別人家破人亡，自己也因而獲刑坐牢？不料他說，「以前的事我都忘了，一點也不記得了。」我再進一步地提醒他時，他又說，「你別問我了，我年紀大了，一點不記事，啥都不知道了。」我知道，他是在拒絕記憶、拒絕反思。如果整個民族都拒絕記憶、拒絕反思，再有適當的環境，這種慘劇還會上演。一個不敢正視歷史的民族，不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這是我要見證這段苦難和罪惡的深層原因。

謝謝大家！

## 4-2

---

### 母親

#### ——新中國的叫花子

口述者 | 依娃

「我是個叫花子。」小時候，我常聽母親說這句話，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我想母親的意思是說窮。在 1970 年左右，我當農民的父親一年的收入是一兩塊錢，家裡買不起鹽和煤油，供不起我讀書，連一枝鉛筆都買不起。

「我是個叫花子，不是 1960 年把人餓得招不住，沒活路了，我和你外婆能從甘肅跑到陝西來？」我也聽母親這麼說過，但並沒有多打問。因為 1960 年距離我也很遙遠，那時我還沒有出生呢。甘肅那個叫秦安的地方距離我很遙遠，聽說除了山還是山。當兒女的在一定歲數，總是把父母的話當成耳旁風，嫌羅唆嫌多餘。

後來，因為家境貧困，七歲時我被過繼到城市裡的親戚家。有時候，大人們會在一起聊天，說起過去多年的糧食困難，他們說那時供應緊張，白麵少，雜糧多，什麼東西都買不上。到菜蔬門市部買回來的包心菜沒有心只有皮，就是那種老老的綠皮，放一點城煮爛了，撒點玉米麵吃。也聽大人們說城市有人浮腫，手按一下腿就出現一個坑，會半天起不來。這就是我自己聽到的有關大饑荒的全部資訊。

當然還有課本上和報紙上的「三年自然災害」這句話。記得《創業》這部電影裡，主人公拿著一個蘋果說：「蘇聯人真是混蛋，逼我們還災，蘋果都是一個圈一個圈的套，小的不要。」我當時恨死蘇聯人了，

當地有一種西瓜叫反修瓜。因此，在我們這一代人心目中，大饑荒就是自然災害，就是蘇聯逼迫我們還債。從不知道餓死過人。

所以，幾十年來，我個人對大饑荒的瞭解是一片空白，一無所知。直到2008年在《世界日報》上看到楊繼繩先生《墓碑》的售書廣告，我第一個反應是：真的假的？有人就是喜歡聳人聽聞，喜歡以中國之醜博得外界喝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1958年到1962年大饑荒餓死中國3600萬人的數字，楊繼繩先生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8萬的450倍，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是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這個數字，令我非常震撼和吃驚，難以置信。我隨即郵購了這本書，想瞭解大饑荒的真相。

2009年我回家探親，很無意地打問母親，「外婆你生養了你和舅兩個娃呀？」從小到大，我知道母親就舅舅一個親兄弟，住在我們家不遠的村子，個頭又瘦又小，比兩個鐵桶摞起來高不了多少，還患有胃病貧血。外婆在世時總是說：「你舅這個病殃殃，都是小時候給餓的，餓成那鬼樣子。」舅舅的個頭就到我肩膀上。

「你外婆生養了五個娃，那三個沒成活。那幾年條件不好，娃娃養不活。」

母親的回答讓我非常吃驚，我從來都不知道我還有其他的舅舅和姨姨，其他的親人，聽都沒聽說過。雖然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但是我覺得他們是我的親人。我想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活到多大歲數？怎麼死亡的？

「咋死的？」我刨根問底。

「餓死的，那幾年甘肅情況不好，糟糕得很，人就吃不上，難養娃娃。」

「？？？」我的腦子裡出生了無數的問號。

作為女兒，我很想知道母親家族的歷史，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而不

是僅僅讓老人有一個衣食無憂的晚年。所以從前年冬天到去年春天，我一直嚷嚷著要跟著母親回一趟甘肅省秦安縣老家，可母親一直推脫。最後我發現，她是不願意讓我看到那地方是那麼落後那麼貧窮，覺得在我這個女兒面前沒面子。在我的一再堅持下，去年六月底，我和當年逃荒出來的母親、舅舅，還有同村的一個老姑，一起回到了當年他們逃出來的村子，叫王鋪鄉羅店村。我叫它「逃荒團」，當年是我外婆領著他們出來，這次是我這做女兒的領著回去。我就想弄清楚一個問題，一個我一直想不通的問題：我外婆一個小腳女人，一個大字不識，身上沒有一分錢，沒有食物，被逼迫到什麼程度？她怎麼能帶著兩個孩子出來？當時饑餓到什麼程度了？他們都經歷了些什麼？

另外，我想看看母親的家鄉在哪里？是什麼樣子？因為那裡是母親的來處，也是我的來處。是母親的根，也是我的根。

在秦安縣，我看到修建的富麗堂皇的政府大樓，花費數千萬人民幣，比白宮還要氣派，可是幾十裡外的山區孩子們沒有書讀，全村上百戶人沒有一家新房子。當下我心裡就說：「以前餓死人就不奇怪了。」雖然是題外話，但是我想過去和現在是有必然聯繫的。

那裡的山路很不好走，一天只有一趟班車，到村子就沒有大路了，都是狹窄的小路。我母親中間回去過兩次，我舅舅因為經濟條件所限，是50年後第一次回家，走的時候是懵懂小童，回來已是白髮染鬢的老漢，可謂「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一到村子口，他眼淚就汪在眼圈裡。路上有許多老人，過去的玩伴，一眼就認出他，抓住他的手喊：「你是六十一嗎？你是六十一嗎？」六十一是我舅舅的小名字。「咱們是兄弟呀！」那些老人說：「六十一呀，你記得嗎？你那時候腿只有大拇指粗，成天蹲在人家飼養室門口，在麥秸堆堆裡找麥顆顆子，找一顆趕緊往嘴裡塞一顆，找一顆趕緊往嘴裡塞一顆，孽障得很。（甘肅話，孽障就是可憐的意思）娃娃餓成這個樣子了，還被打罵不讓刨，人家飼養員還想自己篩些麥粒粒出來自己吃。那年月，人哪叫個人？想著再見不上你了。」我在村裡的幾天，多次看到

這樣的畫面，50年了，當年村子裡誰逃出去了，人們都記得。有一個93歲的老太太拉住我母親舅舅就哭，說想不到還能見一面。

「把你經歷過的、見過的、知道的咱家的事情都告訴我。」我這樣對我舅舅說，在富平老家先後和他聊過兩次，一次是在他家，一次是在我家。都是單獨談，這樣可以不受打擾，沒有顧忌。我舅舅叫牛富貴，現在富平務農，現年62歲。我也多次打電話詢問母親。

我問舅舅當時餓到什麼程度，他就給我舉了一個例子：說村裡有個十來歲的小孩，實在是餓得招不住了，頓頓沒啥吃，光吮手指頭。孩子正長身體，不吃啥就不行，成天就思謀著吃，再啥事都不想。看見一個過路人手裡拿著半個菜饅，還不是麥麵饅饅，就是野菜攪了些麵，蒸下的菜疙瘩，黑硬黑硬的。孩子眼紅了，就控制不住，嘴裡咽唾沫，瘋狗一樣撲上去，一把搶了饅饅就跑，一邊跑一邊往嘴裡塞饅饅，害怕被人搶回去了，吃上一口算一口。小孩腿軟得很，身上沒勁，又怕人攆上了，被打一頓倒不怕，就怕到手的饅沒了。這小孩反應很快，看見路邊邊上有一泡牛屎，一把把饅饅戳進牛屎裡。攆的人上來了，看饅饅被塞進牛屎裡了，自己的饅饅吃不成了，非常生氣，抓住小孩就是幾個耳光子，拳打腳踢。小孩不哭，不還嘴，知道自己理虧，就盡著讓人打，讓人出氣。小孩見人一走，趕緊從牛屎裡掏出饅來，身上一抹，三口兩口把那疙瘩菜團團吃了，人餓瘋了，比個狗還不如。1960年就到這程度。

我小時候，有一個外祖父，很疼愛我。但是我不知道我還有另外一個外祖父，因為這個人從來沒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外婆和我母親很少提起過去的事情。很慚愧，我到去年才開始打聽關於我血緣上的外祖父的消息，才知道我的外祖父叫牛志恒，1960年冬天餓死於大饑荒。他去世的時候才42歲，還在壯年。蒙塵的家史在我的詢問中漸漸清晰……

解放前我外祖父的家境還比較好，上過天水師範學院，是當地少有的讀書人。但為了盡孝，為了給曾祖父養老送終，他回到了家鄉，娶我

外婆劉玉梅為妻，先後生育了五個孩子，兩男三女。解放後劃成分的時候，給我外祖父家劃了個地主。沒收了土地、果樹、磨坊、牲畜等私人財產，到最後，還毫無理由地從祖屋裡被趕出來，不讓在自己家住。我這次回去，還看到外祖父過去的房子，草長的比人高，牆倒瓦落。外祖父經常被開大會批鬥，被掛牌子，戴高帽子，挨打受罵。一家七口被趕來攆去，前後住過幾個地方，學校、倉庫、村人家，最後被趕到山上找個土窯洞住，就是以前放羊人住的土洞，很偏僻，離村子比較遠。這個土窯洞這次我也看見了，在半山上。這可不是陝北人住的窯洞，很矮，大個子得低下頭進去。這是猿人野人住的窯洞。猿變人得上萬年，人變猿不需幾天。

我外祖父出進就得低著頭，因為他是個大個子。外祖父找了些土塊石頭重新盤了個炕，一家七口擠在一個炕上。秦安的冬天，天寒地凍，滴水成冰，沒柴火燒炕，燒什麼？外祖父就把自己積攢多年的書籍都燒了，給幾個孩子燒炕，說留著也沒用了，一邊燒一邊流眼淚。據我舅舅回憶，那時每晚他們姊妹五個睡在裡面，大人睡在外面，因為那陣子，山上狼特別多，大人害怕狼半夜把小孩叼走吃了。那土窯根本沒有門，只掛了一個布簾子。全家人睡在一起，也能多少相互取暖。

「吃食堂的時候，給你們吃的什麼？」我問我母親。

「剛開始幾個月還可以，最後就沒糧食了。就是一人給上一碗菜湯，能當鏡子照，誰管你吃飽吃不飽？」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都是以家庭為最小單位，人們都是在家吃飯，可豐可簡。可是到了1958年硬是產生出一個「集體食堂」的新鮮事物，就是秦安縣這樣交通落後、訊息閉塞的地方也不能倖免。在山區的農民得下溝爬山到村對面去打飯，給打飯的一般是隊長或者幹部的親戚，偷、拿、苛、扣是家常便飯，給多給少給稀給稠都是人家說了算。所以農民說，「集體食堂是給農民嘴上套上了驢籠套。」「毛主席萬歲，喝糊糊排隊。」「一頓飯，跑半天，一碗湯，三泡尿。」「幹部吃胖了，社員餓腫了。」這種情況讓我想起魚鷹，被主人綁住脖子的魚鷹。

成日捕魚，卻吃不上一頓飽飯。一天只有兩碗湯喝的外祖父還得下地幹活。

有一次，我舅舅跟上我外祖父提個瓦罐去食堂打湯，人天天吃不飽，腳底下發軟，走不動路，一不小心，就把罐子給摔破了，湯頓時流了一地，我外祖父就趕緊趴下，對著地唏里呼嚕吸那湯，也拉我舅舅吸，因為不趕緊吸，那湯就滲到地下去了，這一頓就沒啥吃的了。

村裡人說的順口溜，我舅舅還記得，我當時用筆記錄下來：「偷一斗，紅旗手，偷一擔，當模範。」這是說那些幹部會計，越偷越先進越當官。還有，「不偷不摸，餓死活該。」當時的確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越老實越規矩的人越挨餓。但是我外祖父死活不讓幾個孩子去偷，主要是害怕被抓住了把孩子打殘或者打死。那些積極分子，一巴掌就能把人耳朵打聾，幾腳就能把孩子腿踢斷。我這次回去聽老人們講，我的外祖父，好多天沒有吃飯，餓得招不住了，到隊裡偷了一顆白菜，又吃不到嘴裡，就在地裡燒了些草，想燒熟了吃。地裡一冒煙，就叫人看著了，把外祖父逮住，胳膊往後面一扭，麻繩一捆，白菜掛在胸膛上，算是藏物，開社員大會批鬥。外祖父就站不住，歪歪斜斜跪了幾個鐘頭，你上來一腳，我過來一捶，連小孩都上來給外祖父臉上吐唾沫，叫人拿鞋底子搨耳光，搨得哭爹叫娘的。因為挨餓受辱，外祖父一下就瘋瘋癲癲的了，到處找吃的，埋了幾個月的死牲畜也挖出來吃，一病不起。那時候是不讓煙筒裡冒煙，一冒煙就有人上門查，看你家有沒有糧食，翻箱倒櫃，挖地撬牆，找到點糧食就搶走了。種地的農民成了顆粒無存的饑民。

舅舅說，食堂停開後，社員家裡又沒有糧食，只要想到能吃的東西就吃，1959年村子裡就開始餓死人了。村裡最先死的是小孩和壯年男人，因為小孩吃不上奶，大人餓得沒有奶水，找不上牛奶羊奶，又沒有麵能打些糊糊喂給孩子。另外，小孩抵抗力弱，容易生病。

我們家餓死的最小的孩子，我應該叫她小姨，當時只有一歲多，如果她還活著，應該有五十多歲了，也應該做了母親，甚至是做了祖母。

我問孩子叫什麼名字，我舅舅說，那陣子人餓的，顧不上給孩子起名字。吃不上，娃娃就不哭不鬧，成天睡在炕上，從來就沒有坐起來過，沒爬過，脖子都是軟的，支撐不住頭。我外婆把乳頭遞給孩子，可是什麼都吸不出來，孩子氣得亂咬。有時候，我舅舅撿一點麥粒，外婆在嘴裡嚼一嚼，嘴對嘴喂給孩子，讓孩子吃一點麵漿。野菜粗糧大人能吃，嬰兒吃不成，怎麼都不能挽留她小小的生命。孩子死了，就抱出去扔到山溝溝裡。那裡的習慣，說小孩還沒有成人，老天爺不收。

「那你們吃什麼呢？」我問舅舅。

「啥都吃過，牲口不吃的東西我都吃過，為了活命嘛。榆樹皮，玉米杆，玉米芯，蕎麥皮，吃的人拉不出屎，乾燥的像石頭，自己用手掏，有些老人讓家裡人給掏，疼得像上刑一樣。有好幾天，一口吃的都沒有，就唆些冰柱子，在太陽坡下一蹲就是一上午。餓的滋味，的確不好受，生不如死。」

我外祖父那些年本來就是過著膽顫心驚的日子，幹部們想鬥就鬥，有時候還被抓去陪鬥。後來又沒收了他的全部家產，他像野人一樣住在土窯洞裡，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個壯年男人沒有能力給孩子掙來溫飽，連他自己都吃不上，別說飽。由於長期饑餓，吃不上飯，打罵批鬥，他已經病在炕上不能動彈。先是浮腫，人頭很大，眼睛都看不見人了，皮膚是黃的透明的，一碰就要流水，幾個孩子嚇得不敢接近父親。浮腫後，一下子乾瘦成了一把柴火，走路都要扶著牆慢慢挪，要拄著根棍子。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了，叮囑我外婆等他咽氣了，領孩子出去逃命去。

「不知道你外爺是什麼時候咽氣的，早晨起來就硬棒棒的了，可能半夜就沒人了。」

舅舅這麼說，就是說，我外祖父是睡在我外婆、我母親和幾個舅舅姨姨身邊去世的，饑餓導致心臟衰竭死亡。

「爺爺死了，你哭了嗎？」我問舅舅。

「那時候就不知道哭，餓得人都不知道啥了，瓜了（就是傻了），沒力氣哭。」舅舅這樣回答。那時他已經是十歲的孩子了，父親死了，他餓得不知道哭，也沒有力氣哭，餓到沒有感情沒有悲痛，餓到麻木。

那時候，村裡的壯年人死的死，不死的也沒有力氣，半死不活，沒有人來給我外祖父挖墓，沒有力氣挖，人走路都是搖搖晃晃的。最後，是村裡一個叫牛志斌的爺爺去給我外祖父挖來一個淺淺的坑，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只給他蓋了一件他平時穿的舊皮襖，就把他埋葬了。那歲月，一個人的生命不如一棵白菜。

「那天，下了些薄薄的雪。」舅舅記得外祖父去世那天下了些雪，我想，這是老天為這不幸的人來送葬吧，是天的哭泣之聲吧。這次回去，我們專門給外祖父上了墳，燒紙燃香。這墳是後來母親回去請人重埋過的，就是一個黃土堆而已。上面長滿了苜蓿花。這是我第一次和外祖父見面，以這種方式。但是我知道他等了我50年，等他的孫輩回來，要告訴我他的冤屈。我跪在外祖父的墳前，磕了三個頭，告訴爺爺：「爺爺，我們回來了，我們回來看你。」我知道他是死不瞑目的，爺爺聽見了我的呼喚。但是我的外婆已經過世在他鄉，回不來了。

關於我母親下面的一個妹妹，我小姨的死，我舅舅 述的比較詳細。她的名字叫牛佛黛，當時14歲。我舅舅說，她是個很懂事的孩子，那時候沒有什麼東西吃，只要挖點草根，找到點乾果子，她都是先拿回來給我外婆吃，給我舅舅吃。知道家裡沒東西吃，也從不叫喚，怕我外婆難過。

這孩子最後餓得下不了炕，頭髮都快掉光了，皮包骨頭，蓋著被子就像蓋著紙，如果眼睛不動，就和死人一樣。那天，佛黛姨說口渴得很，想喝水。我外婆和我母親就去泉上抬水，因為那裡是山區，人又沒有力氣，水不是一下子就能抬回來。我兩個舅舅坐在炕上等他們回來。佛黛姨嘴乾得很，就往炕邊邊上爬，因為炕邊上有一個水缸。孩子爬呀爬呀，剛爬到炕邊上，就一下子栽下去了，眼睛閉上了，嘴裡吐著白沫子。等我外婆和母親回來，把孩子抱上炕，給灌水就怎麼都灌不

進去了。沒有一會兒，就咽氣了。她也沒有棺材，沒有墳墓，抬出去草草掩埋。一個 14 歲的女孩就這樣被活活餓死，是我母親和舅舅親眼看著死的。

我舅舅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叫牛祥娃，當時八歲，餓得頭很大，脖子很細，四肢就像麻杆，成天就會說一句話：「媽，肚子餓得貼住了，媽，給吃上些。」連被子裡的棉花都往嘴裡吃。孩子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對我外婆說：「媽，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外婆也知道孩子快不行了，沒得救了，沒糧食拿什麼救呢。就安慰孩子：「你不得死，你長大了還要養活媽呢。」我外婆求爺爺告奶奶，從村裡人那裡借了一碗雜糧麵，說給孩子做上一碗湯喝，那怕吃上一口。可是飯做好了，孩子已經吃不下去，咽不下去了。從醫學角度怎麼講我不知道，據我舅舅說，是孩子的腸子和胃壁已經消耗得薄得經不起任何東西了，喉管也失去嚥咽功能。幼小的生命，被饑餓的無情摧殘而夭折。

「從 1960 年冬天到 1961 年春天，我們一家七口沒有了四口。那時候還有一個詞叫『十戶五空』，就是一家子人都沒有了，關門畢戶了。這些話，我以前根本不敢對人說。」這是我舅舅的原話。

當時甘肅人口 1000 多萬，餓死 120 多萬，佔 10%。據楊繼繩先生《墓碑》統計，全國死亡人口佔 6%，六億人死了 3600 萬。但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家庭死亡率是 60%，超額十倍完成。

「那麼，你的母親和舅舅就是大饑荒的倖存者？」有一天，我和朋友探討起此事，朋友這麼說。這讓我沉思很久，我從來沒有想過倖存者這個詞。但是有一點，如果我外婆不帶著我母親和舅舅逃荒出來，十有八九，就會被餓死在那裡。因為那時就是有一點救濟糧，也是幹部會計先拿。我看到一篇文章，還說不給地主富農發救濟糧，不把他們當人看待。我覺得外婆很了不起，一個瘦弱單薄的女人，挽救了兩個孩子的生命，支撐她的信念就是要讓孩子活下來，也許還有要為我外祖父留下一個後人的想法。

雖然說我外婆當時只有 40 出頭，但她是舊社會過來的小腳女人，三寸金蓮下不了地，不走只有等死，一個寡婦兩個孩子就沒出路。所以她是有人領上來陝西的，也就是叫人販子從甘肅販運到陝西。當時有很多人從事這種營生，從中謀些微利。我外婆一個女人家，小腳，身體單薄，死了男人，領上兩個孩子，還都沒成人，所以找個男人是唯一的出路。

「你們走的時候，帶了些啥東西？」我這樣問舅舅。

「沒有什麼，就是幾件爛衣服，還背了一個鐵鍋。」

我聽著笑了，隨之心酸，還有對卑微生命深深的崇敬。就是一個道理，人到那裡都要吃飯，那也是他們唯一的貴重財產。記得汶川大地震時期，有一個老農背著一口大鍋逃出來的照片，一樣的令我難過和垂淚。我也問過我的母親，母親說，半路上把那口鍋賣了，換了一點吃的。因為他們身無分文。

從秦安鄉下到火車站，一路乞食，上百里山路都是走著去的，對我們這樣的人都不容易，我外婆不知道需要怎樣的毅力和辛苦。我小時候見過我外婆的小腳，指頭都彎在腳心裡，已經殘疾。就是這樣的母親，這樣的雙腳，為了孩子，為了活命，硬是走了出來。他們不知道中國有多大，不知道東南西北，一輩子第一次坐火車就是逃荒，目的只有一個：活命。

「你們路上吃什麼？」

「人家人販子給一點點，反正不讓你餓死。」我舅舅這麼說。

「有兩天就什麼都沒有吃，光喝點水，硬挨著。我幾乎要餓死在半路上了。」我母親這麼說。

母子三個人，衣衫襤褸，饑腸轆轆，沒有一點家當，沒有一點盤纏，就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息的甘肅秦安，背井離鄉，跟著人販子來到陝西。因為陝西是隔壁省，自然條件好一些。當時從甘肅來陝西的人特別多，

尤其是女人。有年輕的姑娘，也有帶著孩子的，有些是死了男人，有些是家裡還有丈夫，就先找個人跟上，先活命要緊。

饑荒過後，有些甘肅丈夫就帶著孩子來陝西找女人，女人在陝西這邊又生了孩子，有了感情，骨肉無法分離。也有搶孩子媽，帶人過來打架的，無數悲劇。全陝西有多少甘肅逃荒女人？統計資料上寫著「未知」。我查了有關資料，他們知道，但不公開，寫著「未知」兩個字。我相信，有一天，會公佈出來。就我們這一個家，就有四個逃荒女人。其中一個老姨失蹤了。還有一個老姑，叫牛俊娣，早一年被人販子帶到陝西耀縣，嫁給一個貧苦的農民。農民起初不理她，恐怕是被騙來的，害怕人財兩空，所謂財，就是幾十斤麥子。那男人特別善良，說要送我老姑回去，老姑不回去，知道回去也是沒有活路，就留下來，生了幾個孩子。過去 50 年了，老姑的丈夫都過世了，老姑提起來這段經歷都是充滿感激，她說：「吃穀不忘種穀人，人家是救過咱的命的。」這就是善良中國農民的樸素感情，她還活著，生活在山區，趕牛種地，什麼都幹，已經 74 高齡了。她是大饑荒的倖存者，是逃荒者的見證人。

在逃荒的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意外。我外婆母親舅舅又累又餓，停留在西安火車站，火車站人多雜亂，突然人販子就說要上車了，要帶他們去咸陽，幾個人提著行李就在人群裡擠著上了車。可是到了咸陽，才發現我舅舅不見了。我們能不能想像一個母親沒有兒子的悲痛欲絕？想像一個出門要飯、孤苦無助的母親的感受？兒子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唯一的希望。我外婆頓時覺得天塌地陷，當時坐在地上就嚎啕大哭，喊著：「天爺呀！天爺呀！你不叫人活了嗎？」她覺得這一輩子都見不得我舅舅了，那麼大地方，就是不被人拐走，也是再找不到了。我外婆後來說，如果我舅舅找不到了，她就跳井自殺，沒法再活了，心被剝去了。

三個人又匆匆坐車回到西安，到處找，到處喊。最後在座位下面找到我舅舅，因為孩子太疲倦了，加上餓，迷迷糊糊睡著了。我外婆和母親摟住我舅舅抱頭痛哭，悲喜交集，都說以為再也見不到了。

這個逃荒路上的細節，讓我傷心痛肺，因為我也是一個母親。饑荒帶給一貧如洗的婦女、母親們怎樣的創傷和血淚？從來沒有人來撫平和慰藉，甚至沒有人問，沒有人聽。甘肅省的省長甚至說：「要飯是甘肅人的習慣。」為了面子，拒絕陝西省的援助。他自己吃的飯，則每頓從蘭州飯店專車運送。

我外婆領著我母親和舅舅到陝西後，先後住過好幾個地方，東家要一點，西家要一點，不是紅薯，就是玉米湯，以乞為生。因為外婆帶著兩個孩子，我母親雖然已經十六、七歲，但是身體非常虛弱，幹不成重活，人家都不想收留，怕負擔過重。因為沒有戶口分不下口糧。

最後，她們落腳在富平縣流曲鄉。我的繼外祖父叫黃喜聯，是個老光棍，太窮，娶不起婆娘，又有人販子熱心牽線，就收留下從甘肅來陝西要飯的外婆、母親和舅舅。那人販子和我外婆說好的，來陝西了跟上個男人，有個地方落腳，有個地方吃飯，還能把兩個孩子拉扯著長大。我外婆說咱是叫花子，沒啥挑揀的，只要不是癱子，只要人家要咱，只要人家給上口吃的，只要人家願意收留下倆個娃。在我舅舅同村，像我外婆這樣從甘肅來要飯再沒回去的就有四五家。嫁人養子，姑且稱之為「民間自救」方式吧。

對這個外祖父，我是有記憶的，但我不知道他不是我的親外祖父。他很疼愛我，對我外婆、母親和舅舅都非常好，是個善心人，雖然不識字，但懂道理，說饑荒年，誰也沒辦法。老人很愛孩子，從來也不說是不是親生的，愛我舅舅，愛我母親，從不說一句啥不滿的話。就是剛開始兩個孩子不叫父親，他也沒有抱怨過，把他們視如己出。

據我的舅舅回憶，有時候過會（趕集）從街上回來，外祖父會從懷裡掏出來一個白麵饅，叫他吃，自己都捨不得吃。那時候白麵饅貴得很，一個白麵饅一塊錢，一個農民從哪裡弄來的錢？是我這外祖父偷偷地到街道上買上個羊，拉到另一個公社的會上，出了手，能掙上一塊兩塊，其實就是「投機倒把」，給我舅舅買上個白麵饅，叫舅舅一個人吃上，說舅舅是男娃，長身體。

說起來不是親生父親，比個親生父親還好。外祖父還把舅舅供上了個高中，那陣一個村子也沒兩個高中生。所以村上人既叫我舅舅「牛富貴」，也叫「黃富貴」。是眾多的像我繼外祖父黃喜聯這樣的善良百姓搭救了逃荒者，收留了逃荒者，分吃自己很少的口糧，讓他們活下來。我對他老人家充滿了愛和敬意，他是我的爺爺。

到陝西時外婆只有四十出頭，但再沒有生養，因為長期的饑餓導致婦女閉經，不可能受孕了。我聽母親說，她自己到十七八歲，發育弛緩，還沒有來過月經，沒有乳房。我的舅舅，餓了幾年，個子再也長不高了，落下了終生的胃病和體弱。

「當時咱家還是有些糧食呢，你爺爺早埋起來準備饑荒年吃的，可是拿不出來，不敢回家挖，挖了也吃不到嘴裡，人家會以為你還藏著糧食，會把人吊起來拷打逼供，所以有糧也吃不上，到最後把人餓死了。」

聽舅舅這麼說，我非常震驚，難以置信。地下有糧食，地上餓死人，悲劇中的悲劇，荒唐中的荒唐，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後來我到通渭拜訪《金橋路漫》作者，研究大饑荒二十年的張大發先生，證明此事，當時的確是有不少糧食和洋芋埋在地底下漚爛發霉，地上卻餓殍遍野，老幼饑亡。就是不讓你吃，讓你活活餓死。讓種糧食的人沒有飯吃，讓種莊稼的人活活餓死。縱觀中國歷史兩千年，哪朝哪代，有哪個皇帝會不讓百姓吃飯？不讓饑民逃荒要飯？會剝奪人之最基本的權力呢？沒有。

我以為不讓人吃飯就是殺人，大饑餓就是大屠殺，是不可饒恕之罪行，是不可忘記之人禍。甚至，這比大屠殺還要令人憤慨和悲傷，因為不見血不見刀，甚至老百姓還不知道誰是屠夫。

到今天，我愚昧的不識字的母親都認為，這都是命，都是天爺安排的。他們絲毫不知道，全國的大饑荒餓死了多少人，更不知道誰是飢荒的製造者。因為大饑荒基本發生在中國的農村，當時農村許多人都是文盲，加上政府的隱瞞和謊言，對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記錄研究的

文字依然很少，就是《墓碑》這樣的作品，也不能在國內發行。盜版的書被當做黃色（色情）讀物收繳上去。大饑荒的真相從來就沒有批露過，卻幾乎被封塵了。

當我和 1950 年代出生的人談起此事，問他知道不知道，他的回答是：「餓，還能餓到我們這種人？」他父親是總政高幹。當我和同齡人談起此事，他們也問：「真的假的？編的吧？」別再說八零後九零後了。

「我是個叫花子。」這句話我母親到今天都常掛在嘴後。大饑荒過去 50 年了，他們來陝西也 50 年了，可是我依然從母親和舅舅的眼睛裡，看見驚恐、淒苦、自卑、不安，叫花子的烙印將一輩子烙在他們心上，烙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永遠隱隱做疼。只是他們不會表達，不知道表達，逆來順受，默默承負。

如今，叫花子後代的烙印也烙在我的身上和心上。因為，我的母親是中國大饑荒中的一個叫花子，我是一個叫花子的女兒，這是永遠褪不掉的烙印。農民子女，多少年來，對我而言是一個羞辱的身份，我不敢、也不好意思承認我的父母是農民，因為它代表著貧窮、低賤、沒有文化、沒有社會地位，受歧視和不公平對待，甚至任人欺壓、任人宰割，以至於到了沒有吃飯的權力。農民既是國家的奴隸，也是國家的牲畜。

作為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人，我心哀傷，為那些無辜的卑微的無名的冤屈的生命。人饑我饑，他們是我們血肉相連的同胞，他們的靈魂至今得不到安撫和慰藉。

作為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人，我心憤慨，因為造成這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殺人惡魔還被供奉在天安門城樓上，執政者從來沒有承認過、道歉過、懺悔過，反而繼續逼迫下一代人唱紅歌頌揚。

今天，我們還不能為餓鬼冤魂在那片國土上修建紀念碑紀念館，那麼我們的文字交匯在一起，就是永恆的紀念碑紀念館。留給後人，以史為鑒。作家余杰說的好：寫作既是記憶，寫作也是見證；寫作既是控訴，

寫作也是反抗。我還要補充，寫作更是責任、是自贖、是拯救。

最後，請允許我說一句：爺爺、兩位姨姨，舅舅，希望我的文字對你們的亡靈略有慰藉，我知道這是不夠的。我也要對經受饑餓、逃荒乞討過的外婆和母親說一句：外婆、母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苦難。

# 4-3

##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 ——我母親所親歷的河南信陽大饑荒

口述者 | 張大軍

### 1 | 引子

我的母親 1947 年出生於河南省信陽地區息縣烏龍集（後來，由於行政區劃的調整，在 50 年代初改為淮濱縣固城鄉）老莊大隊蔡莊村。在她童年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給她的花季人生投下沉重的陰影，雖然她最終得以死裡逃生，但卻失去了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這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雖然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相關歷史事件卻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記錄、總結和反思，以至於我們作為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代對那段歷史都已經有點模糊了。

對於一個以歷史記錄見勝於世界文明史的國家，無論是從道義上來說，還是從以史為鑒的實用主義角度來看，這種對歷史的遺忘和輕忽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個人非常願意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去發掘並記錄那一段讓人揪心的歷史。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在今年夏天，我斷斷續續與我的母親就其在大饑荒時期的親身經歷作了幾次對話，下面就是這些對話的簡要記錄。

我要說明的是，在整理的時候，我修正了母親的過於俚語化的表述，以便所有的中文讀者都能完全明白對話的含義。而我也保留了那些比較容易理解的口語化表述，以便體現該記錄的對話特色。另外，文中

的日期一般是指陰曆，因為這是她們的紀年習慣。括號裡的文字是我的解釋說明。

## 2 | 對話記錄

兒子：大躍進前我們家（指我母親的家）裡有幾口人？

母親：58年的時候家裡有六個人：你的姥爺、姥姥、二個姨，一個舅，家裡四個孩子中我最大，你舅舅最小。當時你太姥（指我母親的奶奶）是一個人單過。

兒子：大躍進前家裡的生活狀況如何？

母親：58年以前，自己家耕種分給自己的地，各家的地基本都差不多。主要是因為家裡的人比較勤快，所以咱家裡的生活水準在當地算中上等。那時候吃的大部分是細糧，有時候吃粗糧，但溫飽沒問題，58年以後吃的主要就是粗糧了。

兒子：當時為什麼要搞大集體？人們不是還過得去嗎？

母親：都是動員的結果。當時說加入集體就象投資一樣，58年的時候還有宣傳遊行。剛開始，一般人都不想繳，大部分人都藏著糧食。村幹部就開會動員，說大隊大集體多麼美好，一般人就都把糧食繳出來。

兒子：加入大集體後有什麼變化？

母親：大躍進後社員都集體幹活，也開始吃食堂。伙食是論勞力發飯票，各個家裡不用做飯，也沒法做飯，因為家裡所有的糧食都要繳出去。58年的時候村裡還有糧食，有飯吃，可以吃飽，但沒有自己家吃得好，吃的大部分都是粗糧。

兒子：生活水準下降後，社員有沒有意見？村幹部沒有反映情況？

母親：有意見，但沒人敢提，主要是因為大鳴大放後的反右效果。當

時有一個人，叫簡金，編了一個順口溜，表示對當時形勢的不滿，順口溜前面的兩句是：吃的是豬糠，使的是牛力。後面的我記不起來了。後來，簡金遭到村裡的大批鬥。有了這事以後，社員就不太敢提意見。還有，當時的社員還能吃飽，所以他們都忍著，沒有人提意見。

村幹部也知道情況沒有以前好，但是強調這是政策，必須要執行，所以也沒有幹部向上提意見。

兒子：59年發生什麼了？怎麼情況一下子就變得那麼差？

母親：59年虛誇更厲害，上級檢查糧倉的時候，下邊的幹部都做了手腳，糧倉裡面堆放著其他的各種各樣的東西，只在上面放一層糧食。社員大部分人都知道浮誇，但沒有人敢於舉報，同時覺悟也比較低。

59年下半年天旱少雨，減產一半，稻稈死一部分，但仍有一定的收成。紅薯和豆子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基本沒受太大的影響。小麥是上半年收的，沒有天災的影響。59年上半年還能吃飽。59年下半年的時候，食堂沒了糧食，吃的基本上全是野菜，只在野菜湯裡放很少的豆麵（指用大豆磨成的麵）。有時吃紅薯和紅薯片湯，但再也沒有吃過細糧。

59年底60年初，中間有兩三個月，公共食堂幾天（三、四天或者七、八天）才開一次火，因為能吃的東西非常少了，吃的東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腫、臉色蠟黃。

當時去食堂打飯是按家的，一般家裡負責打飯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飯回來的路上，就已經將盆裡的稠的東西吃光了，等到家裡的時候，盆裡只剩下湯了。家裡其他人只好不吃。餓得人只知道各顧各了。

還有的人家，在家裡有人餓死的時候也瞞著不報，因為如果瞞

著的話，那個死去的人在打飯的時候還占著一個名額，可以多打點飯。你小姨餓死的時候就隱瞞了好幾天，她就躺在家裡。

兒子：當時姥爺、姥姥、姨和舅都是怎麼死的？

母親：年紀最小的一個姨（六歲）和舅舅（三歲）是在 59 年秋天先後死的，他們是直接餓死的。你二姨 60 年被送到信陽你二姥爺家（我母親的二叔，當時在信陽市的一個幹校當主任），因為餓得有病，身體又弱，過了兩三個月也死在了信陽。

你姥爺是在 59 年冬天去世的，那時是因為受不了折磨，他出去到你二姥爺那裡避難時在路上死的。當時村裡的幹部要洋錢，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要洋錢。幾乎所有家庭情況好一點的人，都會逼著交出洋錢。如果說沒有，就會遭到村幹部的拳打腳踢。姥爺挨打以後，交了一部分，村裡幹部說還有，所以就繼續用鞭打，甚至被吊起打。當時，你姥爺挨打受不了，他就去信陽找你二姥爺，想去躲一躲，連帶著去找點吃的東西。由於身體虛弱，到羅山（信陽的一個縣）的時候就病倒，隨即死去，並被埋在那裡。

你姥姥瞭解到我姥爺去世的消息後，就一直哭，心情悲傷再加上沒有東西吃，身體很差，兩、三個月後也跟著去世。

兒子：當時二姥爺和三姥爺作為幹部沒有提供什麼幫助嗎？也沒有什麼反應嗎？

母親：當時你三姥爺（指我母親的三叔）是大隊（現在叫村）的一個小官，大隊隊部一直都起火，我當時偷偷去吃，還很害怕被人發現。偶爾去吃一下，回來後也不敢給別人講。所以當時大隊幹部沒有餓死的，他們的家屬也很少有餓死的。

你二姥爺有時會寄錢回來，59 年秋天的時候還可以買到東西。到 59 年底以後，就買不到了，不知道是沒有糧食了，還是不讓

賣了。那時有錢也沒用了。有人把衣服、洋錢和其他家什都拿出來換東西吃。59年過後，拿這些東西再也換不到任何吃的了。

兒子：我們臨近的安徽情況如何？你們沒有去安徽找親戚幫忙？（我們老家與安徽省阜陽地區的阜南縣接界，我們家有一些親戚就是安徽人。包括我的姥姥也是安徽阜南縣王營村人）

母親：安徽比河南稍微好一點，59年我去俺二姨那裡拾豆子，後來那裡也不行了。當時的親戚也都顧不了別人。我當時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時河裡沒有人擺船，我就一個人擺船，有一次船一下子被沖到河的中間，給我嚇得夠戩。

兒子：當時整個村餓死人的情況如何？

母親：那時，有人幾天不吃飯，直接就餓死了。還有的人吃野菜和野草，身體極度虛弱，也自然就慢慢死去。當時整個村死了100多人，佔全部村裡的人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兒子：你見過或聽過人吃人的事嗎？還有整個地方餓死人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母親：咱們那裡有人吃人的事。咱那有一個鄰居，是蔡加軒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時候，她正跨著一個籃子，籃子裡放著死人肉，籃子下還在不停地滴血水。你們村（我父親所在的村，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個本家大娘以及你乾爸的母親，也都吃過死人肉。吃過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樣，看人的時候都直直地盯著。

當時固城街上的野草長得比人都高，因為那時根本沒人去趕集，整個街上全是空蕩蕩的。人也走不動路，有時有人在路上走著走著，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顯著比較胖（因為浮腫的緣故），在路上可能會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餓極了的人給吃了。

兒子：到這種時候了，還沒有人提意見嗎？村民沒有其他的救助措施

嗎？

母親：59年那個時候還是沒有人提意見，如果有人提意見，村幹部就會打他們。即使餓成這樣，就是沒有人提意見，還是因為害怕。

只有一個人能說，他叫簡瘋子，也有人說他是神仙，因為他有時預測的事很準確。他就經常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但因為他被人看作瘋子，當時在固城街上公開說，也沒人管。

另外，59年的政策很嚴，如果有人不把糧食和吃的東西交給公家的話，就挖地三尺，59年不讓單個社員家裡冒煙和燒鍋，野菜也不讓吃。有人偷偷的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幹部發現家裡有野菜，就會打藏野菜的人。如果發現誰家冒煙了，村幹部就會把那家人的鍋給砸了。村幹部曾去人到咱家裡找糧食與野菜，用大鐵棍在院子裡到處擻地。有的人家藏在土灶中的糧食都被發現了，然後就被拿走沒收了。少數人家因為餓，自己家裡起火熬菜湯，結果鍋被砸，熬的菜湯當然就吃不成了。

兒子：當時的幹部也沒人向上反映嗎？

母親：當時的人都不准提意見、不准亂講、也不准人員亂走動。你太姥去信陽市看你二姥爺，你二姥爺就不讓你太姥講餓死人的事。因為他也害怕。你三姥爺在59年時是大隊幹部，他也知道，也不能講。

兒子：那時還有人幹農活嗎？

母親：59年冬天和60年春天都沒人幹活，那時的人餓得都走不動路，更沒法幹活了。

兒子：從什麼時候開始，才開始有糧食吃？

母親：60年3、4月份的時候，陸續有救濟糧到生產隊，生產隊就開始

重新起火，那時還是公共食堂，雖然仍舊吃不飽，但已經好了很多。

到 60 年麥收過後，社員還是吃公共食堂，但由於有了收成，社員差不多能吃飽了。到了 60 年秋天，村裡開始分自留地，自己家可以種，不用繳公糧，從那以後，公共食堂可能就散夥了，以後就論工分發公糧。

兒子：當時餓死了這麼多的人，沒有處理幹部嗎？

母親：在 60 年秋天或者 61 年春天，政府進行民主補課，對村幹部在大饑荒過程中的行為（如打人、不給社員吃飯和虛誇）開展教育和批鬥。負有最主要責任的幹部要「坐大倉」（當地的一種俚語，好象是指坐黑屋和關禁閉的意思），但沒有做牢和被槍斃的。

兒子：您成為孤兒後怎麼辦？

母親：那時你太姥已經從信陽市回來，我就和她在一起生活，一直到與你爹結婚。你太姥一直活到你出生的那一年。

# 4-4

## 毛澤東一生最大恐懼和敗筆 ——追憶親歷大躍進大饑荒的歲月

文 | 茆家昇

### 一 | 毛澤東是災難的總根源

大躍進大饑荒，如果以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27 日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召開為轉捩點，至今整整 50 年了。之所以說轉捩點而不說結束，是因為 1962 年之後，全國災情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中國最大的省，也是餓死人數最多的四川省，由於省委書記李井泉深受毛澤東的寵愛，有恃無恐，繼續向農民瘋狂逼糧，因此死亡一直在繼續，直至餓死了近一千萬人！安徽省作為全國重災區之一，雖然在大量餓死人之後，曾希聖推廣了責任田，部分地區出現了一線生機，但是在安徽廣大農村，從農業合作化以來，特別是在大躍進中，被共產風肆虐，連續徹底地搜刮，已是十室十空，全省百姓都掙扎在死亡線上，責任田帶來的生機，一時難以阻擋死亡的腳步，死亡也一直還在延續，只是死亡的人數、死亡者增加的速度，套用當今房地產業的行話，環比的速度呈下降的趨勢而已。

儘管如此，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從很多方面來說，畢竟是一個轉捩點。其中最大的成果，依我看，還不是全國大批餓死人的事件被批露，而是毛澤東神話的破滅。毛頭上的光環在逐漸消退，他暴虐而猙獰的流氓面目終於暴露。什麼英明的偉大的領袖，什麼人民的大救星，原來都是蒙蔽全國老百姓的天大謊言，其本質就是十惡不赦的暴君！

當時一些良心未泯的官員開始認識到，毛澤東才是中國 1949 年之後一切災難的總根源！中國要認真為老百姓辦的事很多，比如廢除一黨專政，實行言論自由等等，但當務之急還是結束毛澤東的專政！可以這麼說，從大躍進大饑荒開始，毛澤東不僅失掉民心，也失掉了大部分的官心。只是很多官員和毛澤東一樣，也幹了很多殘害百姓的惡事，知道毛澤東大旗一倒，他們都罪責難逃。所以還不得不與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其實已有貳心。對此，毛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後來他經常說，在各級領導之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大權已經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了。換言之，毛的這句話說明了，當時中國大部分領導，已經看破了什麼馬列主義毛思想的真面目，瞭解到，什麼階級鬥爭，什麼消滅私有制，什麼社會主義改造，原來都是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

當然七千人大會最直接的成果，還是共產黨的各級主要領導人必須面對他們犯下的滔天大罪。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就是反人類罪。該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說各級領導都犯了罪，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黨中央主席毛澤東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說的。

毛澤東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到，「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而劉少奇則在大會上說，「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己詔。可以考慮在各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門前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

所不同的是，毛只說是缺點、錯誤；劉則說到了是血的教訓。那麼餓死數千萬中國老百姓，究竟是一些缺點、錯誤？只是一些血的教訓？還是反人類的滔天大罪呢？歷史會做出結論的。

民間對中央七千人大會在今日現代史上的意義，也十分重視。安徽省無為縣退休中學教師楊金聲先生，是大躍進大饑荒的直接受害者，那幾年

僅他一家，就餓死了六口人。他也是研究大饑荒重災區「無為事件」的開拓者之一。前不久，他告訴我，他已經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炎黃春秋》編輯部寫信，建議將七千人大會開幕時間，即每年的元月十一日，定為中國災難紀念日。每年到這一天，全國下半旗誌哀，停止各項娛樂一天。同時在天安門廣場上建立「大饑荒災難紀念碑」，使中華民族子孫，世世代代，毋忘國恥！當然，除了《炎黃春秋》雜誌回了信，權力部門皆無音訊，而一個雜誌社無法做成這件事。儘管如此，我也衷心希望楊老師的宿願有實現的那一天。因為那不僅是他個人的心願，也代表了在那場人禍大災難中，三千多萬枉死死亡靈的心願，告誡後人們勿忘國殤，勿忘國恥。

大躍進大饑荒這場大災難，乃是始作俑者毛澤東，效法史達林實行的竭澤而漁的農業政策的結果。他把偌大的中國變成他的主義試驗場，把苦難的中國拖進人間地獄。這是在和平時期，在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發生的大災難。期間，共產風肆虐，政府對農民施行徹底地掠奪，這包括毛澤東親自下令的、最殘酷的所謂反瞞產私分，和苦難與罪惡的淵藪——人民公社食堂制！百姓家中有糧成為「非法」，各級領導與專政機關，可以明目張膽地「合法」地到處翻箱倒櫃，挖地三尺搜刮餘糧！更有勝者，如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路憲文、安徽省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等惡吏，公然嚴令所轄地的農民不准灶台冒煙、不准逃荒要飯、不准上告上訪！把善良的農民活活餓死在家中。一雷天下響，亙古以來人世間最嚴密的政治組織，控制了窮鄉僻壤的每一個角落。毛領袖的權威無遠弗屆，專政的鐵拳無往不至，強大的輿論攻勢足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這才造成 3700 多萬百姓，主要是農民被餓死的亙古未有的大災難！這個數字超過了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死亡的總數，也超過了 1949 年以前的災害死亡總數——據《大自然探索》1984 年第十期記載，之前二千多年，共發生 203 次死亡萬人大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共死亡 2991 萬人。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甚至是沒有炊煙的戰爭，也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當時毛澤東似乎大獲全勝了，為了他的主義，他不停地發起各種

政治運動，每場運動他都擊倒了無數他治下的百姓。僅三面紅旗一役，就有三千多萬民眾伏屍在他腳下。作為戰無不勝的大獨裁者，他癡笑了，在全國大建行宮，盡情享受美食美女了，吟詩作賦讚賞天生一個仙人洞了。如明末大儒黃宗羲所言，這是舉天下以奉一人了！他能不偷著樂嗎？

## 二 | 毛澤東如何蒙蔽真相

但是，毛澤東最終還是恐懼了！他應該知道他殘害了如此巨量的中國老百姓，該受到怎樣的歷史審判？所以他必須掩蓋歷史，蒙蔽真相。但是，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向一個人隱瞞所有的事，也可以向所有的人隱瞞一件事，但不可能向所有的人隱瞞所有的事。大饑荒中全國遍地是災，哀鴻遍野，處處是白骨新墳，毛澤東能捂得住嗎？捂不住也得捂，怎麼捂？毛澤東有毛澤東的招，毛澤東有哪些高招瞞天過海呢？我想不外乎如下幾點：

### 1 | 強化意識形態灌輸，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

這是執政者的獨門絕技。如毛澤東一再說的，凡要推翻一個政權，也包括施行各項政治運動，都必須先做好輿論準備。兵馬未動，輿論先行。他獲得政權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大搞一言堂。毛澤東 1958 年 5 月 8 月在八屆二中會議上揚言，「你們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我們一直承認。」毛氏的大獨裁，就包括輿論獨裁，決不允許一點異樣聲音，否則輕者牢獄伺候，重者人頭落地。這一點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是一浪高過一浪，在大躍進中更是甚囂塵上，無孔不入。時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後來反思說，「大躍進大災難，人民日報要負一定的責任。我是那個時代的親身經歷者，每當看到人民日報上，大字標題報導各地大放糧食高產的衛星，沒臉沒皮沒羞沒恥地鼓噪，什麼畝產三萬、五萬、直至廣西環江縣的畝產十三萬多斤的消息，再看看身邊農村隨時可見倒地的餓殍時，心想那一張張造謠的報紙，不就是一道道催命符嗎？！」

出來混總要付出代價，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都一樣。再厚的牛皮，無限量地吹，總有吹破的一天。真相總有敗露的一天，真相敗露了怎麼辦？還能怎麼辦？繼續吹唄！1959年的報紙，還在鼓吹更大的躍進，躍進形勢越來越好！等到了1960年，就突然冒出來「全國連續三年遭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說法，不再說糧食多了怎麼辦？而是改口說，要低標準、瓜菜代、忙時吃乾、閒時吃稀了。58年59年的報紙白紙黑字還在，有說全國受災的事嗎？真是大權在握，話語權牢牢控制在手裡。而一旦到了無法狡辯的時候，比如在七千人大會上，大量餓死人的事實已經突顯了之時，那又怎麼辦呢？辦法就是竭力封鎖消息，一鎖五十年，等到知情人、親身經歷者都死光了，看看還有誰在說幾千萬人被餓死的事，你不說我不說他也不說，不就等於餓死人的事沒有發生過，執政者不是依然光榮偉大正確嗎？

應該承認，這一招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現在50歲以下的人，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僅僅在半個世紀之前，在那個並不遙遠的年代，中國曾發生過人類史上的空前大劫難了。有人見到，網路上在討論大躍進時期究竟餓死多少人時，竟然說這是類人猿在說話。比如有個網名叫「江西李建軍二先生」就說，人怎麼可能被餓死？世上可以吃的東西很多嘛。這幾乎就像晉惠帝所說的「何不食肉糜了」。這位二先生還說，誰再說餓死人了，就要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後來《中共黨史二卷》出版了，承認1960年比1959年人口減少一千萬！這位二先生未再說要追究誰的刑事責任了，但卻繼續說，這樣的黨史一出版，就標誌著中國茉莉花革命的開始。讀到這樣的帖子，我是五味雜陳，心情十分糾結，可悲的中華民族啊！

## 2

**毛澤東綁架全黨，發動群官，一起投入到封閉歷史真相的行動中去**

這一招也算管用，歷史的真相至今還在雲山霧罩之中，不能不承認，這是執政者上下合圍、全面封鎖的結果。君不見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怎麼說的？上至中央最高層，下到公社黨委，在這場人禍大災難

中，人人有責，誰也脫不了干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要政權還在，諸位仍可稱霸一方。別問是誰捅了漏子，也別問漏子捅了多大，只要上下一心，輿論一致，步伐統一，上面都有人幫你兜著。即使像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那樣，餓死了近千萬人，還可以榮升為西南王和國家領導人；吳芝圃在河南餓死了幾百萬人，「信陽事件」臭名遠揚，他還不是毫髮未損？改革開放之後吳芝圃死了，悼詞裡還說，要去掉強加於他頭上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詞。啊！原來河南省、特別是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都是污蔑不實之詞？！相反的，你要主持正義，為蒼生百姓說話，那不問你是身居要職的彭黃張周，或是地方官員，如安徽的張愷帆，河北的胡開明，後果又如何呢？一正一反，一榮一辱，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全黨和各級官員，該怎麼想和怎麼做嗎？

毛澤東這一招真的很高，黨和政府的官員們，沒有人不知道，毛澤東是一切災難的總禍首。如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在一次討論會上所言，毛澤東一生幹了那麼多壞事，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暴君！從暴力土改到農業合作化，特別是大躍進共產風，毛澤東都是始作俑者。儘管一開始有鄧子恢、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反冒進，廬山會議上有彭黃張周的仗義執言，後又有劉少奇的幡然悔悟，但都改變不了毛澤東的一意孤行和一言九鼎。等到紕漏鬧大了，民怨沸騰，官怨也沸騰了。毛澤東輕輕巧巧地說幾句話，聽起來像在做檢查，實際上就把罪責全推出去了。下面的官員們能怎麼辦？緊跟中央部署唄，還能怎麼樣？有幾位地方官員能像山東省昌樂縣委書記王永成那樣，大躍進中全縣未餓死一個人？既然你們身後都跟著無數餓殍的冤魂，你還能正義起來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跟著毛澤東一起掩蓋歷史真相了。

### 3 | 發動更強勢的政治運動，以遮掩原先的罪惡

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所說的：「在極權統治下，往往是最壞者當政。……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先前的錯誤，用更大的罪惡去保護先前的罪惡。」這不，另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什麼文化

大革命的烈火，說燒不就燒起來了？對此，說的人已經很多，不再贅述了。

#### 4 | 毛澤東企圖通過所謂欽定接班人，實行家天下，以長久蒙蔽真相

單少傑先生曾當面問過李銳老，毛澤東害不害怕歷史？李銳說，他怎麼不怕，他怕得很！你看毛澤東晚年那個忙的喲，真叫人「感動」，還剩下也就幾個月時間了，還一會指定江青當主席，張玉鳳進常委，是什麼后黨；一會又指定毛遠新當主席，是什麼太子黨。李銳的話說明了，毛澤東忙來忙去忙什麼？不就是想自家人接班，不會揭他的老底嗎？他犯下的反人類滔天大罪，能永遠隱瞞下去嗎？結果如何呢？屍骨未寒，什麼后黨太子黨，那間灰飛煙滅。

毛澤東做過了頭，接班人之舉，是他人生最大敗筆！他得罪了所有的上層官員，他太不把他們當人看了，他真的把他們當成毛式家奴了！活著的時候，想整誰就整誰，要咽氣了，還想把他們交給老婆侄子繼續整！想過他們的感受嗎？能怪他們拍案而起嗎？設想一下，如果毛不幹這種赤裸裸的醜事，如果不是張玉鳳女士那麼早就捅出來，可能歷史的進程會慢一些。而歷史常常只按自己的步伐行走，有時像太極圖那樣，首尾相咬。

### 三 | 大饑荒重災區安徽省的情況

下面，我說一下大饑荒時的重災區，我的家鄉安徽省的一些情況，以及作為反右和大躍進劫難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我個人的一些經歷和調查研究的所見、所聞、所思。

安徽省是大饑荒的重災區，這是有史可查的。根據《張愷帆回憶錄》記載，安徽省總人口在1958年年末為3394萬人（農村人口2997萬），1961年末為2987.7萬（農村人口2548萬）。與1958年比較，1961年末共減少406.3萬（農村減少449萬）。而據安徽省統計局編的《安徽四十年》，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省共出生人口為141.7萬人。

那麼與 1958 年相比，全省 1959 年至 1961 年實際死亡人數，應該是 406.3 萬加上 141.7 萬，即 548 萬人。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失蹤人數等，張愷帆所說的「安徽餓死約 500 萬人」是接近事實的，這應該稱得上是信史了。

為了證實這一時期的歷史，還可以舉出下述較為可靠的資料，相互印證。第一、發表在《炎黃春秋》2011 年 5 月號的文章〈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一文裡面有一張表，名為「1958-1962 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災前，全國人口為 63474.9 萬人，非正常死亡人口 3245.8 萬人，死亡率為 5.11%。表上第一位的就是安徽省，災前人口為 3446 萬，非正常死亡 633 萬，死亡率 18.37%。四川省非正常死亡 940.2 萬，絕對值全國第一，死亡率是 13.07%，位列第二。就安徽省而言，此表中記述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於《張愷帆回憶錄》中記述的數字，此乃因為計算時間不同，一個是三年，一個是五年。事實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確是從 1958 年開始而綿延至 1962 年的。

數字是冰冷的，但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鮮活的生命。我們不能像沒有人性的惡魔史達林那樣，說什麼死亡幾百人幾千人，那是人命；而幾十萬、幾百萬人的死亡，那就只是數字了。當然更不能像政治流氓毛澤東所說的，中國有幾億人口，死幾千萬有什麼要緊，讓婦女開肚子生，幾年不就回來了。這種拿中國人不當人，一付無恥的嘴臉，真該下十八層地獄！

下面再說說另一個可以參照的資料，這是公安部三局王維志研究員的研究成果。他說那幾年安徽省有 11 個縣，死亡率超過 10% 的縣，依序排列，前六位是無為縣（18.23%）、太和縣（17.479%）、宣城縣（16.31%）、亳縣（16.238%）、宿縣（14.432%）、鳳陽縣（13.604%）。這個數字未查到起訖年月，雖然較上述兩家數字稍低，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全省共在四百萬左右，是有根據的。

我為什麼要引用這一資料呢？因為它和我個人的經歷密切相關。從上述數字看，安徽餓死人數排在第一位的無為縣和排在第三位的宣城縣，

正是大饑荒年代裡我生活過的地區，最為熟悉。

先說說無為縣。如果說安徽省是大躍進大饑荒的重災區，那無為縣就是重中之重！僅 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1961 年之後未統計）就餓死了 320422 人，佔全縣 1957 年底人口總數 982979 人的 34.8%！

無為縣位於長江北岸，境內水網縱橫，是江北的大糧倉，也是對岸全國四大米市之首蕪湖市稻米主要供應地之一。大躍進中三年，為何在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一個魚米之鄉竟會有數十萬農民被餓死？這是誰之罪？對此，已故的無為縣農委幹部丁人卜先生和楊金聲先生，作為研究「無為事件」的開拓者，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結論，那就是人禍！

這裡要說一說已故的丁人卜先生。他作為縣委農村政策研究的負責人，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就冒著風險開始調查無為縣大批餓死人的驚天大案。經過多年走村串戶和查閱縣公安局、統計局等政府職能部門的檔案資料，終於編成《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跡》一書。隨即送各主管部門審閱，也呈送給無為事件當事人張愷帆副省長過目，均無異議。以後丁人卜先生又個人出資，打字印刷、裝訂成冊，廣泛徵求意見，均未聽到質疑的聲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本資料是一部當代人寫當代事的信史，是真正來自大躍進大饑荒重災區的第一手可信資料，彌足珍貴！

2008 年，我在無為縣採訪時，蒙楊金聲老師將此列印稿相贈。後來，丁人卜之子丁華林夫婦、楊金聲老師和五七難友方後高先生，一齊到我家。丁華林先生親口授權我可以發表及引用其中資料。

我在認真讀過丁人卜先生遺著之後，首先是受到極大的震撼，繼之也感到有責任將它推向媒體，讓更多的後來人知道，在半個世紀前的中國，究竟發生過怎樣的人間地獄式的悲慘事件，有多少我們的骨肉同胞枉死在大躍進共產風的狂潮中。為此，我一面將它們一字一句錄入電腦，一面開始寫一些解讀性的文章。諸如〈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

〈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讀張愷帆回憶錄〉、〈一場肢解中國農民家庭的前哨戰——人民公社食堂 苦難與罪惡的淵藪〉等等，散發於《炎黃春秋》及共識網、五柳村、觀察等中外網站。

拙文發表後，曾引起過較廣泛的關注。在世界各地的無為人，特別是大饑荒中死難者的家屬，有來函來電表示無限哀傷的；有來函希望幫助尋找大躍進災難中失散親人的；有來函索取拙文並希望轉載和出版的；有對一些史實疑點希望能進一步說明和澄清的（如光明日報社一社 89 歲的老先生來函詢問，丁人卜先生為何不對 1961 年之後的無為農村做調查統計？）這些，我都根據自己所瞭解的情況一一回覆了。

當然，也會有反對者的聲音，大概是拙文及引用的史實，觸到了包括官二代們在內的一些人的痛處。我曾連續兩年收到過恐嚇短信和電郵，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境內的，也有境外的，有說我要遭到報應的，也有乾脆發來連續 14 個 4 的。4 者，死也。我都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我歷來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所有文章皆實名實姓。你們罵也好，恐嚇也好，為何不敢報上名來？我一個 70 多歲的老頭，尚無畏懼，你們怕什麼呢？記得是名報人林白水先生，面對恐嚇信說過一句話，他說生為庸人，死作鬼雄！林先生果然以後求仁得仁了。林先生此言，我心有戚戚也。

話說遠了。無為大饑荒事件披露之後，受到更多關注的還是學界和大躍進大饑荒的研究者們。我曾接到過多封函件，索要丁人卜先生的遺著，其中有境內外的專家學者，也有像陽光衛視這樣的媒體，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庫這樣的學術機構。我都一一即時贈送，並在回函中表述：我們只有一個共同責任，那就是哀悼在大躍進大饑荒中枉死的中國數千萬亡靈時，不能忘了為他們討回公道，要對那些犯下反人類罪的罪魁，尤其是首惡毛澤東進行歷史的審判！

丁人卜先生這本遺著，究竟寫了些什麼，這裡不能一一介紹了。只能說它是介紹從共產烏托邦到人間地獄這一史實的一份極好的標本。它通過翔實的資料調查、可貴的細部描述、真人真事的記載，真真切切

地告訴人們，一個百萬人口的大縣、一個比鄰長江的魚米之鄉、一個大糧倉，經過大躍進共產風肆虐之後，如何變得一無所有，顆粒如珠，以至於後來連黃豆杆子、花生藤殼、高粱杆子、玉米葉皮芯都充口糧，到最後草根樹皮都被吃光。接下來便是哀鴻遍野，餓殍遍地，家家有新墳，處處有屍臭的人間地獄！它告訴人們，所謂大躍進期間，無為的糧食總產量，遠不是什麼高產再高產，翻番再翻番。而是用鐵的事實告訴你，實情是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 1958 年到 1960 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 1957 年為 6.7 億斤，1958 年為 6.2 億斤，1959 年為 4.4 億斤，1960 年為 4 億斤，與 1957 年比減少了 36.5%。而 1958 年糧食外調任務竟然是 2.3 億斤！

它還告訴人們，什麼叫反瞞產私分。那就是逼糧，也就是逼命！當地民謠說：「見偷吃的打嘴巴，下圩遲的開口罵，叫不來的繩子拿，若強調就樑上掛。」

書中寫道，「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壇生產隊長、支部書記丁家法，打罵群眾，克扣伙食，無所不為。1959 年 3 月，小飼養員丁玉全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塊肉，丁玉全當場流血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半月後死去。」

「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 100 天內，打了 35 人，達 153 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約五斤稻，傅將倪華拖來吊打，用燒紅的大底針在她的鼻樑上烙了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組長將該女社員頭髮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明文因病不能參加生產，遭他一頓毒打，因傷重而死。」

「58、59、60 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應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兩、三兩；有的地方斷炊。以致外流、浮腫病、餓死人的現象普遍發生，還要搞反瞞產私分。59 年 12 月 18 日，無為縣委第一書記惡吏姚奎甲，到紅廟公社召開黨委會，批判該公社為什麼只報單產 360 斤，說紅廟公社有特務，有瞞產私分行為，立即將黨委書記吳定誠撤掉，指出當前工作要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隨即召開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 13 天會

議，用嚴刑威逼報糧。在會議期間及會後，閘北大隊原有 4944 人，死去 2260 人，佔該大隊總人口的 49%。該大隊的西林、大季兩個生產隊，在 13 天會議期間就死去 395 人；新屋生產隊原有 112 人，死去 78 人，佔 66%，全家死光的 7 戶，共 33 人。正崗大隊王村原有 590 人，死去 310 多人，佔 52.5%。徐崗大隊原有 3625 人，死去 2023 人，佔 55.8%。」

「59 年 12 月 31 日，姚奎甲到關河公社。該公社有六個大隊斷炊，其中雙泉大隊已有一個多月未有供應，每天死六、七人；石崗大隊一天即死 16 個人，公社拿出 4000 斤糧食安排生活。姚知道後，拍桌大發公社書記徐明理的脾氣說：『你如果不把 4000 斤糧食收回來，就是瞞產私分的頭子。』並在第二天召開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上嘻皮笑臉地說：『我今天來，給大家帶來三個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雙空手；要糧食一粒沒有。』」

這樣的惡吏，還有一點人性嗎？

大量餓死人，還與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有緊密的關係。據我的一位本家，當年在無為縣高溝公社草埂生產隊當過小隊會計的堂兄對我說，他們的小隊食堂管 147 人的伙食，有時一餐飯竟然只有兩斤米下鍋！人均不到 10 克。農民作家王有任先生曾對我說，有些基層幹部和炊事員，居然在熬大鍋糊糊湯時，用紗布把米包起來，這樣他們就能吃到半乾的飯，而農民們只能喝大鍋清水湯了。所以當時當地有民謠：「一兩二兩，餓不死生產隊長，一錢二錢，餓不死炊事員。」

毛澤東、曾希聖、姚奎甲，這一夥暴徒，如此殘害中國的善良百姓，心腸之狠毒、手段之毒辣、後果之嚴重，古今未有，真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雖萬死也難贖其罪！

說過排名第一的無為縣，再說說排名第三的宣城縣。如果說長江之北的無為是江北大糧倉，則宣城縣則是江南錦繡之地，更是自古以來就物產豐富、五業興旺的膏腴之地。誰能想到，就是這塊毗鄰人間天堂

蘇杭的沃土上，在大躍進共產風肆虐期間，竟也是白骨遍於野，百里無雞啼，死難者枕藉的悲慘世界！2011年夏，我和余習廣先生去宣城調查，原宣州市政協委員，某醫院放射科主任胡醫生告訴我，大躍進大饑荒期間，宣城縣餓死人的比較可靠的數字應該是18萬人，而不是過去流傳的17萬人。當時宣城全縣人口約為60萬，死亡率在25%以上。

宣城，以及和它鄰近的蕪湖、當塗，都是安徽省長江以南的精華所在。它的美麗富饒，一部分是大自然的恩賜，一部分卻是得益於我們祖先的辛勞開掘。三國以後，長江以南一直物產豐富、經濟富裕，不僅自身衣食無憂，而且也是中國穩定的一股強大的物質基礎。明顯的例子就是西晉永嘉年間的八王之亂時，生靈塗炭，唯獨江南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災，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以後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口大遷徙，文化大交流。

2011年7月我與余習廣先生一起，租車去宣城養賢鄉，登上始建於1700多年前的金寶圩大堤，緬懷先賢，再想到共產風期間執政者的惡劣行徑，感慨系之，久久不能釋懷。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塊風水寶地，一千多年來都是水旱無憂，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文人輩出，到了所謂大躍進期間，竟然也餓死了那麼多人，我們對得起祖先嗎？三國時期，丁奉將軍在開發宣城期間，吳王孫權下詔：「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其年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想想古人，比比今人，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想起我們多年唱的所謂紅歌，什麼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萬里江山披錦繡。舊世界真的就那麼萬惡嗎？新世界真的就萬里江山披錦繡了嗎！1700年前吳王孫權，能造福百姓，使中華兒女安居樂業，休養生息，衣食無憂。而可惡的毛澤東，只會對億萬生靈作徹底地掠奪。為了去

爭奪什麼國際共產主義領袖地位，竟然迫使中國老百姓成千萬地被餓死！他還有什麼臉面去面對中華民族的百姓與先人！

可惜，宣城縣在大躍進大饑荒中，發生過如此慘烈的大批餓死人事件，至今能讀到的材料極少，遠不能和安徽省的無為縣、太和縣、鳳陽縣、巢縣、全椒縣等縣相比。我們只知道當時的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一位名曰徐應欽的，為了反映宣城大批人餓死的實情，為了衝破當局對郵政的控制，曾步行去鄰省江蘇高淳縣郵局去投遞。但該信還是被宣城縣委截獲了。聽說徐後來被關進大牢，不知所終。

當時縣委主任負責人，是田楊夫妻店。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曾希聖垮台了。作為曾的手下紅人，這對夫妻也一度失勢，田楊閒賦在地區的商業局時，我還見過他。不久，他就晉升到一個地級市當副書記，又升官了。而宣城死掉的十八萬人，死了也就死了。

#### 四 | 我個人在大饑荒中的經歷

我1958年21歲時被劃為右派，發配到廣德縣一個叫門口塘的農場，接受監督改造。接下來就趕上了大躍進大饑荒，我年幼體弱，又鐵帽壓頂，備受饑餓、勞役、批鬥等多重磨難，能活下來也是九死一生。我還親眼見到一些右派難友，受盡欺凌，活生生地死在我的面前。我至今難以釋懷的，是一位叫周志銀的無為藉的小學教師。他在工地上撿到半截小山芋，便私自吃下去了。作業區虎狼一般的主任趙德隆，在檢查廁所時，發現了有吃生山芋的大便，順藤摸瓜，查到了周志銀頭上，於是馬上召開全作業區的批鬥大會！趙德隆人高馬大，破口大罵多時仍不解恨，對著已經彎腰認罪的周志銀的胸口，連踢帶踹兩大腳。周饑餓多日，已衰弱不堪，那裡能經得起這重重的兩腳，只聽到周慘叫一聲，在地上掙扎了一會兒，就氣絕身亡了。人都已經死了，趙還大發淫威，先說他裝死，後又說死個把右派還不像死了條狗一樣，誰叫他偷山芋吃！

這裡說一下驗大便是怎麼回事。那是1960年的早春，生活最為困難的

時期，主要的食品就是我們自己種植的山芋。山芋有多種吃法，整個煮著吃的機會很少，經常是切成片後，再摻和一些山芋藤、山芋葉，再加少量大米熬成糊吃，這樣大便也成粘糊狀。有時吃的是山芋洗過澱粉之後的山芋渣，那大便也呈渣狀。而吃生山芋的大便，則是一種不粘不散的特殊形狀。我們右派只能在食堂就餐，因此廁所裡決不可能出現吃過生山芋的大便。趙德隆扛過長工，這些他都懂，不然一位為人師表的教師，怎麼會因為半截生山芋就丟掉了性命。

我見到過更多的死亡還是農民，特別是在離我們農場不遠，一個叫新杭公社的水庫工地上。因為挑水庫的人多，人多糞便就多，我們是去拾野糞的。挑水庫是個硬活，不像下地幹活還能磨磨洋工。挑擔子少走一步是到不了位的。把經年挨餓已是氣息奄奄的農民趕上水庫工地去幹這個硬活，無疑是迫使農民早死！實也是如此，大饑荒時期餓死農民最多的地方，就是水庫工地！我不只一次看到過一些農民，歪歪倒倒地挑著半筐泥，走著走著，往地上一倒就永遠起不來了。也許是見多不怪，有人死了，卻很少見到有人在呼天喊地地痛哭。人們是麻木了？想到說不定下一個倒下的就是自己？還是餓昏了，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我是見過一次死人，就在心靈上刻上一刀；死人見多了，心上的刀疤也刻多了。因此心也就硬了，也忘記了什麼叫悲傷和怨恨了，就這麼懵懵懂懂地活過了古稀之年，近年來才有一些醒悟。

第五章 大饑荒問題在中國研究中的缺席

# 5-1

## 意識形態高於真相

### ——中國研究中對大饑荒問題的迴避

文 | 郭建 / 翻譯 | 張大軍

在這裡，我並非要對整個中國研究領域中的相關主題來做一番通盤考察，我只想討論下國外研究中國的極左翼學者中，他們有一個現象：即主要因為囿於意識形態，在分析毛時代的中國時，一般會迴避大饑荒這一棘手問題。

早在 1983 年，隨著中國官方人口統計資料的發佈，大躍進期間幾千萬中國農民餓死的事實開始為學者們所瞭解。自那時起，許多有關大饑荒的重要學術研究已經發表，包括傑斯珀·貝克、丁抒、楊繼繩和馮客的作品。就連最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官方歷史，都承認 1960 年的中國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的事實。無需很多想像力，人們就能瞭解從 1958 到 1962 年這段時期的悲劇的全貌。但不管怎樣，大饑荒這一主題，在西方一些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那裡，卻幾乎不見蹤跡。雖然他們已經知道中國革命給人帶來的巨大苦難，卻也不願放棄他們對中國革命遺產的迷信。在意識形態和真相之間，他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不否認大饑荒的巨大災難（由於已經披露的無法辯駁的證據，否認它是不可能的），而是選擇將真相擱置起來、迴避這一主題、假裝沒看見。即便他們在評估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成敗時，也是如此。儘管每個人規避的程度不一樣，但趨勢則大體一致。

下面，我將引證中國研究領域中的三位著名學者：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和伊莉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我會先簡短地討論一下前兩位學者，然後重點討論伊莉莎白·佩里在 2008 年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是〈中國人的『權利』觀：從孟子到毛澤東到現在〉。文中談到，她認為中國人關於權利有其獨特的觀念：生存權和謀生權。

莫里斯·邁斯納的作品《毛時代及之後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多年前就已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為了公平起見，我想先表明，他在本書的第二和第三版中確實承認了大饑荒的悲劇。可是，在一本 500 多頁的書中，只有兩頁是討論大饑荒問題的。同時，邁斯納卻花費更多的篇幅列舉了中國在毛時代的經濟成就，包括 1950 到 1977 年間年均 13.5% 的工業產值增長率。他最後得出的概括性結論是：「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推動者，毛澤東所取得的成就，遠遠大於他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所取得的成就。」

不用說，在很多方面，這一判斷與我們的生活經歷相互抵觸。毛時代的中國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這一判斷不就是無視和掩飾大躍進的慘敗嗎？即便從他所謂的毛時代工業革命的角度看，如真有所謂的經濟成功，那麼對於被殘酷剝削的中國大多數農村人口以及幾千萬因此消失的無辜生命而言，難道不是巨大的不公義嗎？另一方面，他所說的「毛作為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失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在毛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位激進的革命者，有意識地抵制「去激進化」的力量，而從歷史上看，這些力量在革命者掌權後都曾困擾過他們。同時，他還遺憾地看到，毛一次又一次地從繼續革命中倒退。比如，最有希望的時刻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可是毛卻沒有堅持他自己的激進主義，而是求助於黨，來控制他自己發動的群眾運動；「毛主義最後的失敗為一直受抑制的去激進化力量開啟了大門，讓其掌握了全部的權力。」當然，他這句話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後的改革。不過，這些改革措施難道不是有利於民眾的生活嗎？其中一項改革措施，就是放棄人民公社的激進政策，該項政策正是導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邁

斯納教授卻說並非這樣，因為它們「只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觀念」。

意識形態高於真相的問題，在阿里夫·德里克身上表現得更為極端。像毛本人一樣，德里克教授認為，在其生命的最後 20 年，毛所發展的理论是毛主義的精華。他稱之為「文革式毛主義」。在他看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於 1956 年，當年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上批判史達林。也在此時，毛由於害怕他所謂的「蘇聯修正主義」，開始訴諸不同的文化手段，以閃電般的速度推動中國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前進，並阻止中國恢復資本主義。針對毛晚年的慘敗，德里克給出策略性的辯護：「文革的基本意圖是一致的，革命實踐則並非如此。」既然德里克認為文革持續了 20 年，大躍進就是文革的一部分，那麼，德里克的書中卻沒有一處提到大饑荒期間民眾受苦和大量傷亡的真相。雖然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但對於德里克來說，導致這一災難的激進政策的理論基礎，即他擁抱的理論基礎，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革命性的意識形態」。

伊莉莎白·佩里是哈佛大學的中國專家。在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期間，她費了很多周折，才把中國革命的主題納入該機構的大會議程之中，並試圖讓中國問題專家對毛主義的遺產產生興趣。在亞洲研究協會 2008 年的年度會議上，佩里教授發表的主席演講的題目是「重申中國革命」。她還用圖畫表情達意：那年年會會議日程表的封面上，是劉春華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該雜誌十一月那期裡，有她的主席演講一文，封面則是一張文革的招貼畫：前面是京劇樣板戲中的人物，遠處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紅旗，夾在中間的是上面的那幅油畫。

接著，享有盛譽的哈佛燕京學社安排中國新左派的領軍學者汪暉作為 2010 年度亞洲研究協會大會的主講人，並邀請他參加同年在哈佛舉行的主題為「中國的紅色遺產」的大會。在這場大會上，佩里教授和汪暉談論的幾乎是同一主題：在動員大眾時對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是中國革命不同於蘇聯革命的特點。汪暉很快又為紅色遺產作進一步的辯護，稱中國的政治體制別具一格，具有內在的糾錯機制。（如果真的

如此的話，周恩來、陳雲和鄧子恢在大躍進前試圖放慢集體化進程的努力，以及彭德懷報告農村大躍進時期形勢的那封信，可能就算了，但讓損失大大減少了嗎？)

與迴避大饑荒問題更為相關的是，佩里教授於2008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名字簡明有力：〈中國人的『權利』觀：從孟子到毛澤東到現在〉。它是佩里教授2006年在上海的一次談話的修訂版。文章前面的摘要，很好地解釋了該文的背景，值得在此照錄下來：

民眾抗議最近在中國有了爆炸式增長，博得了廣泛的關注；它們也常常被看作是要求兌現「權利」的努力。有些觀察家將這些抗議解讀為「道德真空」的表現，其他人則認為這些騷動標誌著新的強有力的「權利意識」。不管如何，這些抗議都常常被視為對政治體制穩定性的嚴重挑戰。本文探討體現在哲學家、政治領袖和抗議者的倫理表達中的中國人的「權利」觀（這與美國人對權利的理解形成對比），並就此提出理論根據，以質疑廣為流行的有關中國政治秩序脆弱性的假設。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思想、政策和抗議都將實現社會經濟安全作為最核心的優先目標。因此，在中國人的政治話語裡，「權利」的含義大大不同於英美傳統。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當代的「維權」抗議似乎更少政治威脅。中國的政體既沒有人們有時設想得那麼虛浮，也沒有那麼脆弱。

這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佩里試圖區分出一些概念，她所認為的中國人對「社會經濟安全」之「權利」的獨特觀念是與「英美」的「權利」觀念不同的。她在文本中明確指出，前者更具體地是指生存權和發展權；後者則指向個人的公民權利，或者更普遍的說法——人權。這好像是說，中國人特別實際，以至於主要關心食品、住宿和其他物質上的基本需要。這種看法，反映了作者對中國人的某種歧視態度嗎？也許，雖然她的本意可能非常謙卑並富含自我批評。她將「權利」一詞加引號似乎表明自己對「權利」這一概念本身的懷疑態度，同時，她對自己所處的社會也持批評態度。因為在她自己的社會中，

儘管貧困和無家可歸的問題持續存在，但很少有社會運動會重點呼籲經濟正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人對謀生的強調，是在關注更為根本性的問題。

其次，不管佩里的意圖如何，她有關中國人最為關注的是實現經濟安全的假設，以及因此而來的對中國政治秩序之穩定性的推論，都與中國當前統治者的思維非常合拍。這些話對他們會非常舒心，因為他們正依靠政府填飽民眾肚皮的能力，作為當局合法性的基礎。

在該文有關毛澤東遺產的部分，佩里以極大的熱情（但卻少有批評性反思）寫到窮苦農民在1950年代狂熱支持農業集體化，以及毛澤東對窮苦農民的支持。佩里寫道，「農民而不是幹部，再次自然而然地與革命進步的要求協調起來。這次，又是貧困給他們帶來了洞見和熱情……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那些物質上優裕的人，沒能認識到民眾中潛藏的力量。換句話說，他們沒能抓住『天命』。」她接著引用了毛澤東有關雞毛飛上天的名言：

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飛上天去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

對於那些持更為懷疑和務實態度的幹部，毛警告他們：「如果要滿足農民不斷提高的願望，一定要停止象小腳女人那樣，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

在一篇關於中國人之生存權和發展權觀念（包括對作為歷史轉折事件的中國集體化運動的評估）的文章中，人們有理由期待作者對這一運動的實際效果進行評估。不過，佩里教授卻對這一極其重要的問題沉默不語，或避重就輕：「我們確實質疑，集體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對中國農民有利，不過，不管我們如何評價中國農業集體化的實際果效，這一努力背後的政治邏輯，都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在她關於中國人權利觀的討論中，將「農業集體化的實際果效」問題

輕描淡寫，反去推崇其中的「政治邏輯」，這非常清楚地體現了她的意識形態偏好。不過分地說，她的毛澤東情節非常強烈，才導致其突出「政治邏輯」，反而罔顧基本的事實：戶口登記（它將農民綁在土地上，使他們變成二等公民）、強制集體化、強迫性的集體就餐、以及讓國家統購統銷糧食的殘酷命令，正是這些政策，導致了中國農村史無前例的食品短缺。農業的全盤集體化，徹底剝奪了中國農民的食品來源，即他們的救命手段。正如楊繼繩所言，「每個人的胃都被無產階級專政。」農民的生存權在哪里呢？那些雞毛都跑哪里去了？最終，卻有 3600 萬人餓死。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佩里回應了中國學者于建嶸關於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取決於經濟管理上的成就這一問題，她說：「沒有『經濟合法性』這個詞。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即使不好，人家還會支持它……重要的是政治文化……中國革命做出了貢獻，把尊嚴還給中國人民和這個國家，大家非常驕傲，認為革命有合法性，認為革命拯救了中國。」

她貶低經濟發展對於現政府合法性的作用，似乎與我所討論的那篇文章的主題相衝突。該主題就是，既然政府領導人和抗議者們象他們自孟子以來的前輩那樣，主要關心的都是社會經濟安全，而且政府確實也重點關注經濟發展，那麼，廣泛的抗議就不可能對「政治體制的穩定構成強有力的挑戰」，並且「中國的政體既沒有人們有時設想得那麼虛浮，也沒有那麼脆弱」。我的用詞是「似乎」，因為佩里對意識形態的強調是一貫的，不管這是指「政治邏輯」，還是「政治文化」。

在佩里看來，對「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是中國革命最具特色的特徵。她發明了「文化置換 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 cultural patronage」這兩個詞，用以描述毛及其同夥或自下而上地「動員民眾」以發動革命，或「自上而下地動員，以支持國家的力量。」如果將上述採訪及其內容發表的背景考慮進來，那麼這些辭彙在當代的意涵可能會更加清晰：採訪是在 2011 年 4 月 15 日進行的，其內容發表在 2011 年 6 月 16 日那期《南方周末》上，標題是〈紅色文化與中國革命

傳統)。背景是，中共中央在中共成立 90 周年之前發動了唱紅歌運動。中國的每一個單位都必須有演唱會，參與者可以獲得金錢和服裝的獎賞。為了強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佩里指出，對「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讓中國革命真的不同於俄羅斯革命，「這一點，史達林和列寧，比不上毛澤東和李立三等人。」這讓人想起喬治·奧維爾對政治和英語語言之間關係的評論；人們會想，「宣傳」一詞可能會比「文化置換」更為直接有力。無論如何，「宣傳群眾」正是毛本人所選用的辭彙；而且，「強制」、「洗腦」或「對大腦的全面控制」可能比「文化操控」更能傳達出毛澤東的意思，他在確保民眾支持國家權力方面比史達林更有能耐。

在 2008 年在亞洲研究協會會議上，佩里結束其題目為「重申中國革命」的主席演講時，說道：「儘管學者們可能不象前衛藝術家那樣具有創造性，但我們也有責任發揮想像力，憧憬一下：過去的歷史如何可能會沿著不同軌跡前進，而且還將繼續如此。由於受到大有希望的前景的激勵，中國人為他們的革命付出了非常高的代價，必須要重啟和重申革命。」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以及中國人而言，這種鼓勵讓人感到迷惑。作為學者，我們的職責並非藝術創造，我們怎麼會去假想什麼沒有發生，而什麼又可能會發生呢？中國人遭受了巨大災難（這一點在佩里教授的作品中尚未得到承認），也為革命所期待的遠景而付出很大代價，他們為何必須要重申革命、而不是否定革命呢？在重申中國革命的呼求背後，除了個人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念外，別無其他理由。像大饑荒那樣的人間慘劇，是如此明確而讓人悲痛的事實，在此面前，我們難道不應該謙卑地放下我們的個人信念嗎？

在我看來，不應當有爭議的是，作為學者的首要責任便是確認事實，追求真相，並盡可能客觀地做出有根據的結論，在此過程中糾正各種偏見，包括我們自己的偏見，因為它們總是會扭曲真相。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政府有效地壓制對毛時代中國的集體記憶，並讓人們忘記歷史之時，當下，不斷加劇的腐敗、不平等和不公義問題，越發激起民眾的怒氣。這已經到了臨界點，以至於有人以相關記憶被扭曲的文革的

名義發出抗爭的號召。在此時，我們更應當承認並擔負這一責任。

按照許紀霖的描述，隨著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極端民族主義或威權式國家主義力量又正在壯大。鑒於這整個的形勢，我們更希望珍視記憶、拒絕遺忘。真相將給人以拯救，而從單一觀念的邏輯推演出來的意識形態，如果與歷史事實和當代現實脫節，則可能會產生殺人的效果。

# 5-2

---

## 民主抑或獨裁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共產黨

文 | 艾利·史密斯 (Arieh Smith) / 翻譯 | 張大軍

### 前言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事實證明，二十世紀最為反民主的組織之一的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曾被美國的某些人推崇為民主典範。正如我在本文將要證明的那樣，在二十世紀的兩段時期內，即革命之前的時代以及毛澤東統治時代的後期，中國共產黨被西方知識分子廣泛視為是民主的，並因此而受推崇。

不過，我撰寫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說明有多少人被說服去相信共產黨人是「農業自由派人士」——正如《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 (Theodore White) 在 1940 年代所習慣稱呼他們的那樣，至少主要目的並非如此。相反，我的主要目的是闡明並證實下述二種說法。其一，中共是真正的共產黨，延安時代的「農業民主」模式並不會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其二，大躍進是失敗的——儘管他們看起來很天真（無論這是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外國友人」協調一致的努力的結果，還是因為「西方知識分子的異化」和「左翼傾向」）。另一方面，負責中國問題的官員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必定在某種程度上知悉這種情況。

為了證明我的觀點，我將考察兩段歷史時期：延安時代以及大躍進時期。當然，忽視其他時期會讓我的考察樣本有些偏頗，我承認這種聚焦兩個時代的做法有其局限性。我是有意選擇考察這兩個時期的，因

為在我看來，它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我的觀點並非是說西方知識分子一直將中國共產黨視為比其本來面目要更為仁慈——這既不可能在這樣單薄的一篇論文中得到證明，也不符合事實。我的觀點是，知識分子在 1940 年代對中共的浪漫化想像在 1970 年代又再度出現，雖然有類似的偽裝，但其中的原因卻不同。

## 一 | 革命之前時代的中國共產黨

### 1 | 引言

我們先來考察內戰之前的時期。哪怕是對這一時期浮光掠影的考察就能看出，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徵感到迷惑不解（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詞，所以才用迷惑不解一詞）。被羅斯福總統派遣到中國幫助史迪威（Stilwell）將軍的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將軍「從一開始就得出結論，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國務院中的有些人也如此認為。至少三位訪問過延安的記者都認為，那裡實行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農業民主。正如深入研究過這一問題的芝加哥大學著名政治學者鄒讜在 1962 年所說，「廣泛存在著」這麼一種觀點：「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是『開倒車者』、『農業改革者』以及美國式民主的提倡者。」記者們直言不諱地將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人稱為農業民主主義者。一位記者寫道：「延安的那些男男女女的開拓者們真正是精神、思想和行動上的新人……一個嶄新的合一的社會，是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的。」

當時負責中國問題的美國官員對延安的共產黨存在浪漫的想像，因而一位作家批評說：「中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清洗、處決，所有這些都是在公眾的目光之外進行的。」一般人沒有機會「揭穿中國共產黨圍繞在它自身周圍的神秘面紗」。

### 2 | 共產黨在 1920 和 1930 年代的歷史

可是，下述說法到底有多可信：這些負責中國問題的官員和記者對中

共的真實面目一無所知？鑒於國民黨糟糕的人道記錄，這讓很多西方記者對共產黨產生好感。記者們和公眾本應一開始就明白，共產黨人也不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如果翻看報紙，很快就能發現，早在 1920 年代末，中國共產黨人就「犯下一些惡劣的罪行，這讓他們迅即登上全世界媒體的頭版報導」。事實上，至少就西方報紙而言，中國共產主義的早期歷史只不過是一系列的殘忍殺戮而已。早在 1920 年代末，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官方政策就是——以他們自己的話說——「在對付農村地主時，要燒殺……」要求處決盡可能多的「反革命分子」的壓力也存在，一個地方分部提議不要「有一個漏網之魚，即使錯殺也在所不惜」。顯然，這一模式被普遍採納。比如，武漢在 1928 年經歷了「共產黨主導的全面的恐怖、搶掠和殺戮統治」。廣東的共產黨人據說處死了一萬人。《紐約時報》的記者描述了這一「慘烈的殘忍景象」：

這不僅僅是殺戮，而是帶著殘忍的快樂的殺戮，對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感到幸災樂禍……

那些被快速射死或砍頭的人被認為是幸運的，不過，在允許死去之前，許多不幸的人要先經歷肢體裂解的痛苦，這是歷史上著名的凌遲處死，但現在那些處死手段有了新的改進或更加殘忍。

在設想共產黨人在最終奪取中國的政權後會如何作為時，這位記者寫道：

本地民眾被迫參加那些會議。在會議上，殘酷的行徑與對共產主義光輝前程的高談闊論交織在一起。即便看客們不流露出同情，但只是顯出任何恐懼或憎惡的跡象，就足以讓他們也成為受害人。演講者發表演說的講台上，裝飾有會議期間砍下的人頭。

鄉鎮與村莊必須完成各自的人頭配額，如果他們完不成任務，就會被敦促或威脅採取更有力的行動。如果缺乏一定的熱情，他們就會在適當的時機遭到報復。恐怖報復的對象有資本家、大地主、商人、村裡

的名人、被懷疑對共產黨的事業缺乏同情的任何人、以及某些共產黨人出於私人恩怨想要摧毀的對頭。

這發生在 1928 年，而不是 1950 年。幾天之後，匿名的「消息來源」說，共產黨人在同一地區「殺死了 1500 位男人、女人和兒童」。接下來是「對地主和商人的大規模屠殺」，砍下的頭顱被掛在杆子上。其他文章報導了線人提供的資訊：「40 多歲的男人們如何被屠殺、婦女如何受毀謗、以及嬰兒如何被燒死。」中國的消息來源描述道，在一個城市中，「看起來像是富人的所有人，都被共產黨殺掉……通常，受害者先是被施以酷刑，他們的眼睛被挖掉，耳朵被割掉。父母被強迫著去看他們的孩子被傷害致殘，孩子們被迫看他們的父母受酷刑。」儘管後面的這個報導似乎不合情理，但對於當時的西方讀者來說，它聽起來可能要合理得多。同理，儘管很難判定共產黨人是否真的像國民黨的信使向《紐約時報》所聲稱的那樣，但像「村民都是皈依的天主教徒，但將整個村莊被全部毀掉」這樣的訊息無疑會在美國人中留下印象。

共產黨人在進入江西時展開更多的殺戮：「600 名平民在大街上被殺死，襲擊者用亂刀砍死受害者，而沒有用槍將他們殺死。天主教堂被劫掠一空。」顯然，這不僅僅是國民黨給西方記者的宣傳材料——常住附近的日本人因恐懼而逃離長沙市兩個月之後，傳教士和中國的消息來源說，由於國民黨的軍隊拒絕進行干預（「士兵不打士兵」），吉安城遭到類似的「洗劫」，「在燒殺搶掠的狂歡中，紅軍……在一天之內無情地殺害了 2000 名居民」。據報導，14 名傳教士被綁架，要求的贖金達 350 萬美元。根據中國救災委員會的說法，當他們於 1930 年夏向湖南的岳陽挺近時，「九千五百間房屋被摧毀，一萬五千名居民被紅軍土匪屠殺。」一個月之前，湖南省首府長沙也被「一群共產黨分子洗劫並部分燒毀，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而根據長江上的外國船隻的報告，湖南省的另兩座城市的民眾也被「紅軍慘烈地屠戮」。被殺害的人數不斷增多；一篇文章報導說，兩年前江西的共產黨人殺死了「一萬七千名平民」，這一數字來自「省級部門」。《紐約時報》

更為詳細地解說道：「由於共產黨人在江西西部的反叛，一萬七千名平民被殺，六百個民居被燒毀，八萬人流離失所。」結果是「無法無天的混亂，伴隨著大規模的暴行、殺戮和搶劫」。1930年的另外一篇文章有一個潑辣的標題：〈土匪殺死一千名中國人並屠城。〉它形象地描述了「紅軍領導人如何在流氓地痞的幫助下發動攻勢，掃蕩一百多平方英里的肥沃的農業地區，劫掠那些抵抗者的房屋和村莊，並歡迎所有人加入共產黨」；「為了顯示他們恨國民黨人，共產黨人最近一個鄉村的主要街道上，將一位效忠南京的人用一桶油炸了，並邀請整個鄉村的人都來鎮上觀看。」根據傳教士的描述，「紅軍蹂躪了中國的三個省份，殺死成千上萬的當地居民，受到恐嚇的民眾聲稱效忠共產主義，以避免被殺。」——鑒於共產黨人對抵抗的平民採取的毫不留情的報復措施，聲稱效忠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消息傳播得很快。一位村裡的老人在河北省一個小城裡對一位教士說，「當共產黨人回到江西時，他們藉口民眾『背叛』了他們，並歡迎國民黨軍隊歸來，而對民眾大開殺戒。」共產黨人日益被看作是威脅國家生存的力量，正如《紐約時報》一篇頭條報導所明確指出的那樣：「共和國時期的中國處於最危險的狀態；紅軍是真正的威脅」。類似地，《紐約時報》在1930年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及廣東省土匪的活動造成了非常混亂的局面……以至於嘉應的美國女傳教士們被要求立即轉移到汕頭」。事實上，到1933年時，屠殺已經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對它們的描述通常就是一兩句話；一篇文章漫不經心地報導說，「共產黨人殺戮了廣東新風的200名居民」。《紐約時報》的一篇特別報導直截了當地指出，四川的共產黨人「據說最近在奪取四個鄉鎮時殺死了兩萬人」。

對平民隨意使用暴力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在長征之後，這一特徵並沒有消失。正如《紐約時報》記者比林漢（Anthony Billingham）在1937年報導的那樣，在中國的西北地方，共產黨人「將所有不願治療的吸鴉片者槍決」。

儘管報導中沒有直接指明這些大規模槍決和殺戮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受命於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但對西方人來說，共產黨人及其中央領導人的目標一開始就是清楚的。美聯社 1929 年的一篇報導描述了由毛澤東本人在江西領導的一場叛亂導致「外國傳教士被迫逃命」，幾個地區被燒毀，那個地區國民黨的將軍「也承認其無力保護生命和財產」——電話線被隔斷，人們擔心那裡的局勢「很嚴重」。緊接著下面提到的就是共產黨人自己宣稱的目標。共產黨人由「朱德和毛澤東領導，前者任命自己為第四方面軍的司令，後者是第四方面軍的黨代表」。他們的目標被描述為「打倒帝國主義和抵抗文化侵略。」他們如何看待美國呢？「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給國民黨很多貸款，供他們壓迫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他們如何看待傳教士呢？「資本家的先鋒隊和帝國主義者的間諜。」

同樣難以避免的結論是，即便那些屠殺是「沒有預謀的」（即它們是由中共僱傭的流氓地痞幹的），也表明共產黨的領導人對人的生命的極端冷漠，因為這些領導人肯定知道那些「地痞流氓」幹的事。在一場有幾千人被殺害的共產黨的反基督教屠殺中，一位傳教士曾被俘獲。他說道，「紅軍顯然有完整的組織體系，他們的領導人就是中國共產黨分部的傑出長官」。上海的一份英文出版物這樣寫道：

江蘇、湖北、湖南以及現在的安徽的紅軍通常被認為是土匪、反叛的農民或者其他被冠以誤導人的名稱，事實上，他們是擁有現代武器甚至飛機的貨真價實的軍隊。他們征服了哪里，就會根據莫斯科的指令在那裡建立行政管理體系。

另外，正如受人尊重的《北美評論》雜誌在 1930 年所講的那樣，儘管他們戴著土匪的面具，「這些揮舞著紅旗並狂熱地訴諸於殺戮、酷刑、縱火和姦淫的野蠻人……與俄國的共產黨人有直接關係。」這些看似缺乏組織的土匪部隊，實際上極有組織性：

他們有編號，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長官所簽發的通行證，都被非常邊遠地區的其他部隊所認可。他們從未像野心勃勃的土匪那樣集結為一種

非常強大的力量，並試圖佔領和盤剝某個區域，與正規軍做激烈的戰鬥。可是，在他們瘋狂的野蠻行徑中包含有一種路徑，顯示他們是在非常高明的指導下展開行動的。他們嫻熟地展開軍事調動，非常技巧地避免遭遇戰，合宜地以獨立部隊的面目出現，並在內戰中時，被他們吸引而來的士兵可從很多不同方向集結到某一特定的城市。諸多現象都說明，他們是在一位高明的戰略家的命令下行動的。

實際上，官方文件提到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對土匪部隊的利用。

西方記者對流血殺戮的悲慘故事孜孜以求。這些報導中肯定有國民黨提供給他們的宣傳材料，儘管如此，我猜想，這些大量報導多多少少都是真實的。其中的一個理由是，許多報導源自逃難的難民或記者的描述，而非政府部門。比如，廈門「在共產黨到來之前，為逃離的幾十名美國和英國傳教士提供了避風港和避難所。他們說起過那些最為慘烈的暴行」。

另外，美國的媒體絕不會上國民黨的當，國民黨的大規模殺戮行徑，也被報導過。《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描述了廣東發生的「無情的屠殺」，「特別是在鎮壓該城的共產黨人叛亂的過程中」——「據估計，兩三千人被張發奎將軍的部隊所殺。」亨利·盧斯（Henry Luce）的發行量很大的《生活》雜誌發表了「冷酷的」國民黨人在1936年末處決共產黨人的血淋淋的照片。

到處都充斥著這樣的猜測：國民黨「故意鼓勵對傳教士的攻擊，沒收傳教士的財產，並依此創建無神論的和反基督教的學校」，甚至策劃「煽動屠殺外國人」。確實發生了這樣的事。《紐約時報》憑藉它所獲取的文件材料證明說：「1927年，外國人在南京所受到的攻擊是由國民軍的程潛將軍故意策劃和實施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以及「外國人滾出去」，據說是國民黨的新口號。《華盛頓郵報》披露，莫斯科會命令國民黨這樣做，以促成世界革命。資深中國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報導過很多共產黨的屠殺故事。在1927年的一篇報導中，他猛烈抨擊國民黨人（包括蔣介石和孫中山的兒子）通過

欺詐謀利，並聲稱美國公眾「在對中國民族主義品性和特質的理解方面受到了愚弄」。最為重要（以及最為明顯）的是，這些報導合情合理，因為中國共產黨繼續屠殺人民，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毫不掩飾地屠殺「反革命分子」。因此，即使是在 1930 年代，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就已清楚地表現：暴力的共產主義革命。

### 3 | 美國人的觀點

沒有將中共視為共產黨人的不只是記者。愛德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因其對中共的正面描畫而臭名昭著。杜福思（R. L. Duffus）在 1938 年為《紐約時報》所寫的該書評論中接受了下述說法：「紅色中國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是紅色的，而在於它是中國人的。」此類觀點在別處也有表露。陸軍中校埃文斯·卡爾森「喜愛引用《聖經》，是承續了美國清教徒傳統的新英格蘭人」，他是那種「基督徒社會主義者」，其「最高理想」是「人人平等的民主和無私的犧牲精神」。顯然，他還認為自己是位學者，在 1938 年從中國歸國後撰寫書籍和文章，並發表演講。卡爾森已經完全倒向共產黨人的懷抱，以「神魂顛倒的言辭描述紅色的烏托邦」。而且許多因《紅星照耀中國》（卡爾森讀過此書）而被催眠的美國人相信他的話。《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的一位書評作者將費正清與像斯諾和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這樣的其他「左翼作家」歸為一類，毫無疑問，費正清受到他們的影響。費正清於 1948 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在《美國政治學評論》雜誌上受到極高的評價。它在指出國民黨失敗的同時，強調了「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的性質」。這本書被幾代學者閱讀和專研。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也有類似的想法。他於 1945 年出版了《亞洲的決策》一書，有的吹捧文章中寫道：「拉鐵摩爾傾向於支持的那些美國報人會報導說，中國唯一真正的民主只能在共產黨統治區域裡找到。」1949 年，拉鐵摩爾和費正清的認知是如此奇特，以至於連當時的參議員約翰·甘迺迪都要對他們評頭論足：

我們的外交官及其顧問們——他們都是拉鐵摩爾派和費正清派人

士——對經歷了20年戰爭之後的中國外交體系的缺陷以及高官們的腐敗傳聞是如此擔憂，以至於罔視一個非共產主義的中國對我們的巨大價值。

記者和學者將延安缺少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錯認為毛澤東及中共的中央領導人並沒有建立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願望。現在，這些認知也許能夠被人原諒。赫爾利回憶道：

我瞭解存在於俄羅斯的那種共產主義。除非通過蘇聯政府，我在任何地方都無法買到一分錢的東西。當我去到中國的共產黨統治區域時……卻發現商店開門營業，股票市場開張，出價最高者買到物品，金錢在流通交換，人們做事是出於盈利的動機。如果那時有任何人對我說，這就是共產主義，我知道他們肯定錯了。

然而，一位學者指出，「那裡有嚴酷的現實，就存在於毛澤東的著作裡。」就此而言，毛澤東的理論相當清晰——先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此階段，資本家的生產力會得到容忍，此後才是社會主義革命。那些記者、學者和國務院的官員們，不管認識不認識中文，他們關注的只是用英文寫的、文獻上的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巨大的意識形態鴻溝」的討論。而顯然忽視了共產黨人的直接聲明。這些聲明恰恰具有上面所說的意義，並專門為西方人翻譯了出來。正如「當時在重慶的中共高級將領王若飛」對赫爾利將軍所說的那樣，「共產黨現在贊成民主原則，但只是將它們作為通向未來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墊腳石。」對於記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們「絲毫都沒有迴避他們意識形態上的確信」——「當被問及他們為何稱自己為共產黨人，而不是如『農業自由派人士』這樣更合理的名稱時，共產黨的領導人們通常會直截了當地回答：『我們是共產黨人……並將永遠保持這樣的身份。』」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記者們也敏銳地意識到這一現實：

我們記者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人並非農業民主人士了嗎？是的，我們完全明白這一點。當我在共產黨邊境地區的首府喀拉干時，對我這樣一位報人而言，有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事實：在共產黨人統治的中國，

除了中共自己的機關報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報紙，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媒體相對自由。那裡有《大公報》以及許多其他報紙，所以，你會覺得那裡存在著反對國民黨的力量。一位新聞人不可能認識不到這一點：如果你不允許新聞自由，那你就不能是一位農業民主人士。

《生活》在 1945 年的一篇引人入勝的社論這麼說：

在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他們不是去傳播理念並從事政治鬥爭，而是要殺人並實施控制……他們還推進土地和社會改革，這讓他們的政權看起來比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權更為進步，至少對於剛脫離戰時重慶的惡濁氛圍的記者來說是這樣的。不過，這些共產黨人為何覺得一定要以大炮保護這些改革，對於這一問題，從來沒有人好好地解釋過。

另一個從未得到很好解釋的問題是，對於知識分子、作家和學者來說，這些最為熟知共產黨人暴行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為何沒能看到共產黨人希望建立一個極權國家？下面會對這一點展開更多的討論。

## 二、大躍進

### 1 | 引言

現在，我們飛越到大躍進時期。這一時期在共產黨的編年史中佔據著不尋常的地位。相較於更為著名的關聯事件——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很少被人研究，很少有回憶錄談及它，知識分子對它的反思更少。不過，這短短四年時間裡所發生的人間慘劇在程度上遠遠超過文化大革命。可是，只是到最近，它才廣為人知。對於一個引發了有史以來最為慘痛的饑荒的事件，這一情況顯得奇怪。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這一事件本身的性質——知識分子基本上不會餓死。同樣重要的原因是有關它的學術研究。

直到最近，許多學者和知識分子相信的大躍進中死亡的人數遠低於實際數值，儘管這再次與現有的證據不相吻合。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

代初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席捲過美國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平等主義特性的吸引力又死灰復燃了，體現這一點的是 1960 和 1970 年代對大躍進的異乎尋常的正面評價。為了獲得進行比較的適當基礎，我會簡要地回顧一下這一運動的歷史。

## 2 | 一開始西方對大躍進的報導和學術研究

在當時的文章裡，大躍進常常被稱為「躍進」。西方報紙最初對它的討論開始於 1958 年初，對它的最早描述儘管不一定是讚譽性的，卻肯定也不是批評性的。於是，我們看到的報導都是有關工農業不尋常增長的表面化報導——中國正「快速進步」，如果維持這種進步速度的話，中國將「比以往任何時期生產出更多的食物、農業原料以及工業材料」。據說，許多專家懷疑被注水的資料，可是由於所有人都相信 1958 年是「不同尋常的農業收成年」，就有了這種可能：「後面的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將更能證明北京農產品報告的可信性。」包括幾位日本農業專家在內的其他人則認為，1958 年「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產量……兩倍於 1957 年的產量」。不管如何，這些官方數字被廣泛報導，據報導，就連印度的尼赫魯也對此「著迷」——「著迷」一詞可能概括了那時的情緒。一篇文章寫道：「經驗顯示，共產黨中國的統計資料與其描述的狀況高度相關。」然而也存在著擔心，很奇怪，這讓人想到當下人們對中國變得日益強大和桀驁不馴的擔憂。新

中國的成就甚至得到其最嚴厲的批評者的讚揚，並且有西方人將此記錄下來。1958 年 12 月的那期《時代》雜誌封面將兩位辛勤耕作的農民放到毛澤東的臉上，畫面的上面是手執黃旗的拿破崙大膽地宣稱：「讓中國沉睡吧。當她醒來時，世界將會震驚。」亞洲鄰國顯然對中國可能的快速轉變「感到震驚」，就更不用說蘇聯了。根據最近解密的文件，遲至 1959 年 2 月，甚至中央情報局都相信，「1958 年的產量真的有了大幅增長」，而且當年「的總產量也幾乎肯定會大幅增長」——如果大躍進成功的話，它「可能會讓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強權國家。」（這同一份報告也認為，「諸如鋼、煤和機床這些部門的工業產量」

在 1957 到 1958 年間也可能實現了翻倍。儘管 1958 和 1959 年的工業產出確實增加了，其原因卻基本與大躍進無關——政府對重工業的大規模投資是沒有生產效率的。）即使到了那年的七月份，中央情報局依舊認為中國 1959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會增長 12-15%（其實從 1958 到 1961 年下降了大約 15%），而且農業產出到 1962 年會增長 20-30%（足以維繫經濟擴張）。

毫無疑問，其中的有些樂觀情緒是有道理的。在 1950 年代，農業產出不時會有增加，而且 1958 年確實是好年景。然而，除了 1950 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這基本上都是在克服毛澤東計劃的問題時實現的，毛澤東的計劃並非這些成績的原因——田畝的增加，統計資料收集情況的改善，以及偶爾對合作化運動的放鬆都是可能的原因。當集體化被認真推行時，結果常常是饑餓甚或饑荒。可是電視評論員約翰·克羅斯比（John Crosby）卻認為，公共食堂「讓成百上千萬的婦女得到到田間勞動，這就是中國於 1958 年實現歷史上最高的小麥產量的原因」。集體化能夠達成這種成果似乎是當時的共識。

然而，這不應當讓我們覺得奇怪：在 1950 年代，「幾乎所有留下文字記錄的外國參觀者都長篇大論地歌頌中國的經濟進步和前景」。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大躍進似乎只是另一系列的運動，目的是催生中國人的「新的無可估量的活力」。而那些中國人「就像藍色的螞蟻，成群地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共同的巢穴中，並讓他們的個性隱沒在集體意志之中」。外國人出版的有關中國政治組織和運動的文章有助於強化此種想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個特別節目展示了「孩童如何被一刻不停地塑造成順服的小共產黨員。其他畫面顯示他們不停地排練用於宣傳的歌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喜歡這樣做」。

不過，隨著日子向 1958 年推移，對中國人的公社化生活帶有諸如下述標題的報導開始流傳：〈六億五千萬中國人像牛一樣勞作〉，〈準備要超越西方的紅色中國內部的悲慘生活〉，以及〈新公社實施比蘇聯更為嚴格的強制措施〉。一篇文章這樣寫道：「這裡的有些農業專家

傾向於認為，北京目前對自然災害影響的強調可能是為以後解釋該國糧食產量無法達標作準備。」（在大躍進開始前，毛澤東本人實際上一度說過，「天氣在中國不再重要」。）不過，多數人仍認為農業上的進展非常好。一篇報導這樣寫道：「上海的海上貿易幾乎回到『解放』前的水準。『大躍進』讓農產量翻倍，而且大豆和花生有很多（甚至些許小麥）可運到國外。」鑒於我們現在知道黨的領導人將 1958 年的穀物供給量高估了約 17500 萬噸，穀物的出口肯定加劇了饑荒。1959 年的穀物淨出口有 159 萬噸——而 1961 年卻淨進口 221 萬噸，因為「在一個貧窮的國家，幾百萬噸穀物就是生與死的界限」。張戎和約翰·郝里德（John Holliday）確證了這些想法：「在關鍵的 1958 和 1959 年，僅僅穀物出口就幾乎達 700 萬噸，這本可為 3800 萬人每天提供超過 840 卡路里的熱量——這就是生與死的界限。」

然而，儘管 1958 年極高的產量事實上已在它們公佈後一年被證明為「假的」，有關大躍進獲得經濟上的成功的看法依舊很普遍。特別是歐洲人和外交人員常常認為沒有饑荒（甚至沒有普遍的營養不良。）既然諸如「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能夠迅速地減緩或阻止充斥著中國歷史的地方性饑荒」之類的言論出自像哈佛經濟學講師亞歷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這樣的人，他們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嗎？從法國社會主義者密特朗到保守派議員約翰·坦普（John Temple）的政治人物都訪問過中國，一致認為中國不僅沒有饑荒，而且該國正在快速地現代化。針對這些人，牟復生在 1961 年寫道：「如果一個中國人不能閱讀或說英文，只是在導遊的帶領下在英國遊歷了兩天，會有人相信他寫的關於英國的報告嗎？」

學術界人士同樣不明就裡。希歐多爾·沙巴德（Theodore Shabad）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和《紐約時報》的記者及編輯，他在 1959 年為大躍進辯護說，其內涵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建設一個工業強國的奮鬥」，並在 1959 年 7 月說它「在農產品產出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那年 10 月，在他立論所憑藉的統計資料被證明為不準確之後一個多月，他宣稱「最近的修正並不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所有統計資料都是假

的。仔細研究八月份公佈的統計文件就能發現，修正的幾乎全是收獲之前對農業產量的過高估計」。另外，他論證說那些數字不是「騙人的」，而且它們仍然「顯著高於 1957 年的 18500 萬噸的產量」。有關公社體系的出版物很多——其獨特性很早就被注意到並加以考察。著名漢學家李約瑟是最為推崇它的西方人之一，他宣稱大餐廳是「今天中國的驕傲，且沒有強制性和組織性」。1959 年 7 月，阿爾伯特·拉文霍爾特（Albert Ravenholt）在《外交事務》雜誌上談論公社能夠取得的「巨大成就」。

無論如何，到 1961 年時，大多數人都明白躍進失敗了。那年的一月份，「有關糧食短缺的消息流傳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美國農業部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它是「災難性的」。1961 年初的一篇文章所做的概述大體上是準確的：

出錯的並不是被廣為宣傳的系列「自然災害」——儘管公報哀痛地談及水災和旱災，而是毛主席自己的計劃。兩年多以前，毛澤東開始大力推動這一計劃。所有農民都被編入公社。他命令減少 10% 的田畝，同時進行精耕細作，以為工業騰出更多的人力。

那篇文章指出，這導致了饑荒，儘管對饑荒的程度瞭解得很少。而且它遺漏了另一因素：浮誇風以及由此導致的對農民的敲骨吸髓。這一因素連同不合時宜的工業化是導致大饑荒的最重要原因。到 1961 年末時，整個情況已相當清楚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上出現面帶絕望的李富春——他當時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一個空空的飯碗，以及一大片焦土。這時，幾乎所有的主要原因都清楚了——「毛澤東武斷地命令讓 10% 的可耕地休耕」、農作物要「深耕密植」、「大規模捕殺麻雀導致農業害蟲急劇增多」、由於「瘋狂地強調工業，北京幾乎毀掉中國的農業——同時也沒能實現其工業目標」、「恐慌的幹部們隨意地根據黨的要求確定數字」。香港的耶穌會教士拉薩路·拉達尼（Laszlo Ladany）的已被人遺忘的出版物《中國新聞分析》顯然被中國問題專家們長篇累牘地抄襲，因為它連續幾個月都在討論農業問題，

並於 1962 年 8 月 10 日提到，「死於饑餓或者營養不良疾病的人數每年達數百萬人」。資訊來源呢？——「中國大陸來信以及難民的報告。」可是，「這一估計數字就像掉入一個真正的黑洞那樣消失了」。

自 1951 年以來，美國的媒體報導就一直在討論「紅色中國」的饑荒問題。它們肯定想急切地對中國共產主義的失敗表示高興，雖然它們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因此我們看到諸如此類的標題：〈被披露的紅色中國的挨餓問題激起強烈反對〉——它把情況描述為「接近於饑荒」，以及〈中國內幕：饑餓與貧窮〉（「兩位遊客描述了悲傷的氛圍」。台灣的情報部門確認了這些猜測。據之前披露「共產黨中國的饑荒正達到令人驚恐的程度」的合眾社的報導，1962 年，「國民黨的情報來源報告說，共產黨中國的食品短缺變得非常嚴重，以至於據說整個家庭都被餓死」。然而，中央情報局的另一份極其不準確的《國家情報評估》卻於 1961 年 4 月得出結論說，「目前並不存在普遍的饑荒」（儘管公平地說，美國政府內部存在著非常不同的觀點）。1961 年對愛德格·斯諾（我下面對他有更多的討論）所引用過的兩份中國研究報告的評估發現，直到 1959 年 6 月，卡路里的攝入量都是充足的。就是到了 1962 年 6 月，人們似乎普遍接受的想法是，「所有人，或者幾乎所有人都挨餓。但是，如果有的話，也很少人餓死」。

最早到 1962 或 1963 年，發生了饑荒才似乎成為人們的普遍看法，因為當時《紐約時報》報導說，「美國政府公佈的中國共產黨的機密文件」顯示，「共產黨中國的人民在 1960 年代初經歷了恐怖的饑餓的折磨，由於餓死和營養不良所導致的疾病，這一折磨讓無數人失去了生命。」到這時，中央情報局才最終瞭解了真相，在 1964 年 7 月的一份《國家情報評估》中指出，「發生了嚴重的食品短缺——在中國東部和北部的災區達到饑荒的程度……毛澤東自己不經意地說，1960-1961 年『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超過 500 萬。」同時，美國農業部在 1964 年估計，從 1959 到 1961 年，平均每個中國人每天只消耗 1790 卡路里的熱量，就當時而言，這一數字是全世界最低的。

可是在學術界，有關中國確實情況很糟糕的想法，依然是富有爭議的。儘管所有人都同意存在營養不良的問題，到了1964年，仍有人爭論說，「有關糧食危機確實程度的可靠信息仍無法得到」。就連像約瑟夫·索普（Joseph Alsop）這樣的自稱為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最多也只能說「可能有緩慢蔓延的餓死人問題」，同時，這一問題在《中國季刊》卻成為長時間爭論的問題，而且普遍餓死人的現象被否認，奧索普的言論被指責為違反了「當時的主導觀念」。有人說，「配給制讓很多人免於餓死」。

因此，雖然就連1960年代初可獲得的證據已清楚地指出了大躍進失敗的事實，但很多漢學家和政客們顯然急於認為：如果不能視大躍進為成功的話，那至少也不是一場災難性的失敗。「紅色中國」是貨真價實的極權國家，這一看法肯定能在中國人寫的各種「秘密日記」和披露文章中獲得支持，因為它們直言不諱地將中國的領導人描述為「獨裁者……試圖摧毀人性的尊嚴以及個體的自由存在」。可是，對大躍進的這種認知大體上被反共情緒所淹沒，而且正如我們下面將會看到的，這一認知也與1970年代對大躍進的看法有質的不同。

### 3 | 後來對大躍進的學術研究

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我們看到很多學術界人士為大躍進辯護。小約翰·道爾（John J. Dall, Jr）說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八字憲法」（尤其是「深耕」）「很睿智」並且「從農業上講非常有道理」。大躍進期間的衛生政策似乎對很多人特別有吸引力。沃斯（R. M. Worth）在《美國衛生期刊》（以及後來在《中國季刊》）上寫道，「中國在向艱巨的衛生問題作鬥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大躍進期間很少有人餓死」。而大衛·蘭普頓在《中國季刊》的另一篇討論大躍進時期衛生政策的文章中寫道，「大躍進的『激進』調子更多地是媒體報導塑造出來的，而不是實際政策所具有的特徵」，而且「大躍進『失敗』的原因是其領導及計劃的不一致——許多政策制訂過程都具有這一特點」。維克多·里皮特（Victor D. Lippit）在1974年評

論道，大躍進是一項理性人可能會選擇實施的發展戰略，而且最重要的是，大躍進不應被理解為喪失了十年的發展時間，而應被理解為中國可能選擇的各種政策方案中的一次要實現十年發展的機會。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1974年的一篇很長的分析文章中呼應了此類情緒；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更為一般的辯護在學術界很普遍。正如斯蒂芬·莫舍爾（Stephen Mosher）所論到的那樣：

中國歷史學家菲茨傑拉德（C. P. Fitzgerald）教授聲稱，在那些艱難歲月中，「公社體制……挽救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只是因為資源由中央控制，配給制得以遂行。」同一領域的教授莫里斯·邁斯納說：「由於建立了非常高效的配給體制並從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大量採購小麥，大規模的饑荒才（但也是非常僥倖地）得以避免。」

在整個1960和197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漢學家們益發願意為大躍進以及中國的整個革命歷史辯護，儘管這特別發生在與中國的關係升溫之後（那時，諸如拉鐵摩爾這樣的學者以及諸如斯諾這樣的記者在麥卡錫時代受到批評並偶爾被迫離職後，「又恢復了元氣」）。參議員詹姆斯·威廉·富布萊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於1971年對「原有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官員表示出的歡迎」為此鋪平了道路：「命運真會發生奇怪的轉折，你們這些誠實地報告情況的正人君子卻因你們的誠實受到如此的迫害。在一個所謂的文明國家，發生這樣的事確實奇怪。」對饑荒的懷疑普遍存在。1972年，在談到大躍進時，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對記者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說：「如果你認為那是饑荒，那你不明白中國歷史上的饑荒是什麼樣子。」許許多多受人尊重的教授都同意此說，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認為由於有效的馬克思主義政策，饑荒在現代中國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約翰·格里（John Gurley）說道：「沒有餓死幾百萬人」，正如政治學家威廉·約瑟夫（William A. Joseph）最近所指出的那樣：

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毛澤東的模式受到大力吹捧。那時，

中國被視為下述各領域的開拓者：為幾乎所有公眾提供預防性衛生保健以及至少基本的教育，關注農村發展並限制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對城市的偏向」，提倡性別平等，創造讓工人參與管理的機制，將政策抉擇奠基於對全民共同利益的承諾之上，以及通過提倡自力更生來打破對國際經濟體系的依賴。在付出巨大慘重的生命代價以及毛澤東試驗的欠佳的經濟表現廣為人知之前，這一模式得到許多人的支援，包括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國問題專家。

實際上，這一點當時就有人指出來了。在 1978 年的一篇非常尖銳的文章中，比利時漢學家皮埃爾·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筆名為 Simon Leys）說道：

在時髦的政治學家，尤其是當代的中國問題學者那裡，「極權主義」一詞成了禁忌；他們普遍努力在描述和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時避免使用「極權主義」一詞——這可不是小事。這就像在描述北極時不使用「冰雪」一詞，或者描述撒哈拉時不使用「沙子」一詞。

他接著指出：在未來的日子裡，文件、書籍和證人證言多到可以佔去整個研究團隊的所有時間。當然，肯定還會有更多的材料出現；不過，當中國的索爾仁尼琴們開始有系統地揭露毛澤東時代的所有細節時，那些大聲驚訝叫道「天哪！我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的人都是偽君子和說謊者。我們已經知道大體的梗概；基本上不可能再披露新的東西，只能是補充更多的細節。自從中共建政以來，基本資訊就已可獲得，而且所有對中國事務稍有瞭解的人都瞭解這些資訊。中國一直並且仍在宣稱其毫不動搖地忠於史達林以及史達林主義的原則。

即使毛時代中國的史達林主義根源不足以說服學術界人士，大躍進很可能是一場慘烈的失敗，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希歐多爾·沙巴德這樣的人的調子的轉變應當能起到這種作用（我們在上面提到，早在 1959 年，沙巴德就為中國政府的大躍進時期農業產出統計資料辯護）。沙巴德在 1972 年評論說：

本書作者似乎沒有直面中國當局在被稱為大躍進的冒進發展計劃失敗之後所實施的對經濟資訊的保密措施。事實是，在壓制人口和經濟方面的最為基本的資訊方面，當代中國遠遠走在其他主要國家的前面。

這是怎麼發生的呢？我們來深入細緻地考察一位重量級人物：費正清。他是一位西方世界研究中國問題的領軍人物。廣為人知的是：費正清在1972年稱頌毛澤東的革命是，「總體來說，中國人許多世紀以來所遇到的最好的事情」，其對中國農村的影響不亞於一場「奇跡」，並宣稱，「『解放以來』光明便取代了黑暗」，而且「中國人的經驗中有很多與馬克思主義合拍的地方」。1991年的費正清會說這篇文章「體現了對中國的情感偏好」，雖然他對革命時代的中國的正面評價還包括將對「警察國家」和「個人主義」的批評混為一談，以及對常常導致盲目效忠於中國共產黨命令的「自我批評」的正面描述（有關這方面的更深入的批評，費正清本來可以參閱心理醫生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1961年的作品《思想改造和全能主義的心理學：對中國「洗腦術」的研究》，該書戳破有關自我批評無害的所有幻想。）費正清在1975年寫道，「按人頭算，毛澤東是歷史上最大的解放者」。甚至到了1983年，那時美國和中國的人口學家已經基本上將大躍進饑荒看成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饑荒，但對費正清來說，這只是「幾年嚴重的經濟失調」，導致「普遍的營養不良」，只有「一些餓死人的現象」。

如果不討論1960年被允許進入中國的那三位外國人，對相關文獻的考察就是不全面的。我當然指的是菲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斯諾和韓素音。他們在1960年代受到中國政府的熱情歡迎。格林這位以讚揚共產主義國家而為人所知的英籍美國記者在1964年寫道：「我在1960年去中國的一些地區旅行，不過沒有看到任何嚴重營養不良的跡象。」1970年，斯諾引用上述《中國季刊》上的那篇研究營養問題的文章作為沒有饑荒的證據，甚至否認周恩來對他說的話：那場饑荒是「自十九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系列災難」。他聲稱，他已經「非常努力地試圖尋找正挨餓的人或乞丐，以便給他們拍照，但卻沒找到

人」。於是，他得出結論說，「沒有跡象顯示發生了過去的那種饑荒」，以及「中國沒有饑荒」。媽媽是比利時人、爸爸是中國人的韓素音在1976高度讚揚大躍進的成就，甚至沒有提及大饑荒的情況，連否認它都懶得做。

這些作家值得一提，因為儘管他們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受到相當冷淡的對待，並且在中國內戰之後對美國公共輿論幾乎沒有影響（雖然斯諾在讓美國人相信延安時代的共產黨人有著更高尚的道德這一點上無疑發揮了特別重大的作用），他們都為共產黨政權提供了合法性論證，並被外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廣泛引用。不過，很快他們的想法就重新獲得了認同，政府、學者和媒體爭先恐後地試圖在美國重新塑造毛時代中國的形象。就像之前那樣，周恩來這時走到了這些努力的前台。

可是，大量的學術研究對早期的那些假設提出嚴重的質疑。正如下面取自1968年出版的《中國大陸經濟概況》一書（這是由美國聯合經濟委員會完成的一系列研究報告）的這段話所清楚表明的那樣，這些假設與當時經濟學家們有關大躍進的主流觀點形成對比：

經濟大躍進確實成功地為後來的大災難打下了基礎。整個經濟出現嚴重的大倒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經濟喪失了整整七年的時間，沒有任何增長。

這些研究以極其慘澹的筆調描述大躍進，認為它沒有「任何經濟上的道理」，並說「很多人可能直接死於饑餓」。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簡·普利比拉（Jan S. Prybyla）在1970年按時間順序記錄了食品短缺方面的證據，指出「在1960至1961年間的冬季，營養不良問題變得普遍，疾病在中國的很多地區肆虐」。他所依靠的資料來源可能會向讀者提示，現實狀況不僅僅是營養不良，就連給毛澤東寫聖徒傳的里奧·古德斯塔特（Leo Goodstadt）都說情況「令人絕望」。不過，「大部分專家沒有將經濟政策與活動的這些劇烈波動與人民福利的嚴重縮水或者商品、服務和物質資本的減少聯繫在一起。」1971年，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專家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Klein）認為，

毛澤東政權所導致的死亡總數達兩百萬（鑒於勞改營以及 1949-1951 年和 1966-1969 年的政治運動中的大規模殺戮，這一定意味著大饑荒時期只死了很少的人）。就連堅定的反共人士羅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都認為，大躍進期間只有一兩百萬人餓死。不過，大多數漢學家據說再次對如此「高」的數值表示懷疑。其中一個最早估算死亡人數的西方人是德國學者尤根·多麥斯（Jürgen Domes），他於 1971 年提出：「由於食品短缺，至少一千萬人餓死。」他在討論食品短缺原因時同樣強調自然和人為因素。多麥斯這位很受尊重的學者在「堅持學術標準」時受到「那些輕易就被《人民日報》的宣傳所俘獲之人的」攻擊，但其結論的依據是對逃到香港的難民的卡路里攝入量的研究，以及中國大陸公開的資料來源（其中提到整個村莊的民眾都被根除）。與拉斯洛·拉達尼（Laszlo Ladany）一樣，他在論證時也依賴於過硬的官方資訊來源。上面已經提及，毛本人早就暗示，大躍進導致了至少五百人死亡。可是，「西方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們幾乎一致忽略這樣的評估。」我們一定要記得，直到 1980 年代，學者們對大饑荒的共識還是「農民在政治壓力之下被匆忙納入人民公社組織，導致了不平衡，而且在遇到連續的自然災害之後，又導致生產上的失誤」，以及只有「人口中的某些人處於接近挨餓的水準」。

#### 4 | 當代的研究

轉而討論一下當代的大躍進研究，應當有助於理解以前學者的看法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以及學術界之前看法影響力的減弱。由於中國政府既不允許有關大饑荒之性質的學術研究，也不發佈大躍進時期的人口資訊，在 1983 年之前，人們能夠獲得和分析的只有基本上被西方人忽略的零碎資料。1983 年，大批以前加密的統計資料開始在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上披露。從 1980 年代初開始，有關大躍進期間有無饑荒及其原因的問題開始在中國有了更公開的討論。最初研究這一問題的中國人有朱正直和孫冶方，前者指出並提供相關資料證明，1958 到 1961 年間「死亡率顯著提高」，而後者非常直率地將大躍進看做基本

上是浮誇以及後來的統計造假的結果。儘管也許是因為該主題的政治敏感性，這些研究人員沒有直接給出死亡人數，人們通過推理能夠得知，大約 1500 萬人非正常死亡。（事實上，孫冶方顯然早在 1961 年就討論了「巨大的血的代價」，連同其他原因，這也導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捕入獄。）

1980 年代，尤其是 1984 年之後，西方對大躍進的研究也有了爆發式增長。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1983 年出版的《1958 到 1960 年的大躍進》對於那些試圖瞭解運動政治的人一直是標準讀物，而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對糧食的過度收購——則是伯恩斯坦 1984 年具有獨創性的分析的主題，這一主題在肯尼斯·沃克出版於 1984 年的一本書中也被深入探討過。也就在這一年，中國政府在同樣強調「人為因素」和「嚴重的自然災害」時，公開承認有 1000 萬人在饑荒期間死於「非正常」原因，儘管中央領導人至少從 1960 年開始就瞭解到諸如 3000 萬之類的數字。

最近，西方的大眾和學術讀物有很多關於共產黨中國的討論，特別是關於大饑荒的主題。首先是傑斯珀·貝克於 1996 年出版了《餓鬼》一書，最近，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是饑荒研究方面的傑作。張戎和約翰·郝里德的非常受人歡迎的《鮮為人知的毛澤東》一書涉及的範圍很寬廣，不過它也雄辯地談及饑荒問題。與楊繼繩一樣，這些作者的寫作對象是普羅大眾，卻也並不缺乏學術含量。楊大利 1996 年出版的《中國的災難與改革》一書被稱為「第一本研究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之一的 1959-1961 年大躍進之政治原因和後果的專著」，它有助於為後來的學術研究定下基調，其中的分析依然是第一流的。

隨著對饑荒問題的重新關注，死亡人數也不斷被向上修正。首次在西方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估算是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做出的：1650 萬。這一數字基於官方統計資料公佈之前由中國學者整理的人口資訊。一年之後的 1982 年，約翰·埃爾德（John Aird）得出 2300 萬的死亡數字，儘管他對自己所利用的那些統計資料提出了疑問。1984

年，巴希爾·阿斯頓（Basil Ashton）等人利用新的資料發現，1958-1961年間有2950萬的人非正常死亡。彭希哲1987年提出了2300萬的死亡總數，儘管他再次質疑這些估值所依賴的統計資料的可靠性。也是在1987年，人口學家裘蒂絲·巴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得出截止那時最高的（西方的）估算數值：3000萬。多年以來，它是在西方被引用得最多的數字，這一問題好像被解決了（儘管姚樹潔在1999年得出1848萬的數值）。可是就算到了這個時候，一些漢學家們仍舊沒有理解那人命關天的四年所發生的事件的可怕程度。公眾也沒有。約翰·方特（John Fonte）和安德列·里爾森（André Ryerson）1994年在研究教材時發現：

在28種教科書和指南中，只有一種給出了死亡2000萬到3000萬的估算值，另一本說「幾百萬人死去」，第三本說有「饑餓」問題。其他教材則對這一大饑荒隻字不提。（一本出現嚴重事實錯誤的教科書——《世界文化探索》——聲稱：「自共產黨人掌權以來，中國沒有發生過饑荒。」）

費正清在其權威性的1992年版教科書《中國新史》中宣稱，「沒人看到餓殍滿地的饑荒地區」，並且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營養不良」，這「讓幾百萬人更易於染上疾病」。可是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完全缺乏食物，直接導致很多人餓死：

中國的農村並沒有遭遇通常與饑荒相連的嚴重的流行病。人們確實死於饑餓——這一點與許多其他饑荒不同，因為在後者，疾病是死亡的主因。在達到致命性的饑餓程度之前，為何沒有更多的村民感染上傳染病呢？最合理的解釋是，鄉村裡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餓死得更快，從而減少了免疫機能下降時病菌的入侵機會。

費正清說的不對，大規模的屍體確實被人看到過。不過，該表揚時還是要表揚——費正清非常爽快地承認：「大約2000萬到3000萬的人死去。」

最近的許多著作提出了一些更高的數字。基於「中國人口學家」的研究，張戎和郝里德在 2005 年認為這一數字是 3800 萬。中國歷史學家曹樹基專研了成千上萬的縣志，確定死亡人數不少於 3250 萬。楊繼繩估算大約 3600 萬人死去。馮客認為最少有 4500 萬，雖然他沒有自己得出這一結論：

算出另一套死亡總數是很難的，而且由於很多關鍵的檔案統計資料仍被牢牢地封鎖著，遠離歷史學家探求的目光，這就更難了。不過，從足夠多的各個黨的部門收集的檔案證據足以確證，陳一諮提出的 4300 萬到 4600 萬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是非常可靠的估算（陳本人是一個 1980 年前後閱覽過黨內文件的大型工作組的高級成員）。

下述事實也支援這一數字：與文化大革命不同，大躍進在 1980 年代並不是徹底妖魔化的對象；因此也就不存在誇大它的傾向。事實上，「在共產黨高官的內部會議上，更高的 5000 萬和 6000 萬的死亡數字都引用過」，而且中國大陸公開的資料也常常引用相對更高的數值，儘管事實上蔣正華發表於《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的一份 1989 年的研究報告公佈的官方死亡總數只有 1700 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叢進教授在 1987 年寫道，因為大躍進，4000 萬人死去或者沒能出生。1993 年，在分別計算的基礎上，上海的著名雜誌《社會》中的一篇文章寫道：「在大躍進期間至少有多達 4000 萬人非正常死亡」，而且它甚至配發了營養不良的赤貧農民的照片，儘管它並沒有指明這些照片是否出自這一時期。「文聿」是幾位地位崇高的匿名學者的假名字，他的文章激烈地抨擊左傾主義，以致於在 1993 年出版後很快就被禁；它也得出一個 4000 萬的死亡總數，而且包括了由於饑荒沒能出生的人口。這一數字顯然廣為人知，在 2000 年被一位富有影響力的著名共產黨員廖蓋隆在很有影響的黨內改革派月刊《炎黃春秋》上引用。當然，許多這類資料來源是有傾向的，它們有理由誇大其詞；3000 萬到 3500 萬可能是更準確的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

最後，我想談一下《墓碑》一書，該書是新華社前記者楊繼繩的傑作。

我認為它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說明中國人以及西方人有關大躍進的看法是如何因時而變的。（一開始，我計劃將這本巨著的前言的英文翻譯作為本文的基礎，可是，當我就要翻譯完 30 頁前言的最後一頁時，《當代中國》雜誌發表了另一個翻譯文本。）《墓碑》一書在西方的銷量有限，但得到很高的評價。在其於 2008 年出版時，西方大報上只有兩篇相關的書評。不過，看看書評的內容：其中一篇討論楊繼繩如何「冒著危險向新一代的人講述大躍進的事」，另一篇討論他如何「毫無瑕疵地證明了中國的被引入歧途的工業化運動——也即毛澤東的大躍進——是場徹頭徹尾的災難」。2011 年初，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紐約書評》上稱讚此書「為整個事件進行了全面的描繪並增添了無數權威的細節」。（同一份雜誌在 1971 年發表了一篇約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的文章，其中將大躍進的目的描述為「肅清官僚舞台」，並認為它是「中國 1949 年以來的社會革命的進展，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中國農民對發展革命的積極態度」。）與此類似，《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的作者馮客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他的作品被媒體廣泛報導，漢學家們也為此書寫書評。麥克法誇爾是當今世界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也在《紐約書評》寫了一個熱情洋溢的評論。

## 結論

隨著中國的自由化，對毛時代的研究的重心自然地從西方轉移到中國。因此，關於被官方委婉地稱作「三年自然災害」的研究，最近有兩本書都是用中文寫的。也許，鑒於西方對中國誤解的程度，這一進展值得歡迎。在 1970 年代末之前，雖然可能沒有足夠的資料讓西方的學術界人士得以非常有理有據地證明有幾千萬人死於大躍進，但確實存在一些合理的理由去懷疑真的死了幾百萬人。與內戰之前的時期很相似，證據就在那裡。拉斯洛·拉達尼曾經評論說，即使是最虛假的宣傳，也必須與真相建立起某種形式的聯繫：

拉達尼的出版物《中國新聞分析》之所以如此不可或缺，原因是它建

基於其上的非常單純和富有創見的準則：它所選取和考察的所有資料，都只取自中國官方來源的出版物或廣播。較之於那些比較非正統的消息來源，這一嚴格準則有時讓《中國新聞分析》不那麼具有活力和色彩，不過，那些讓人心碎的結論正是建立在無可指責的基礎之上的。

這些結論就是——也是我在本文中已討論過的——大躍進期間餓死了幾千萬人。基於此理，中共在其早期並非民主政黨，這一事實就不難證明了。1979年的一篇非常具有反思性的論文值得詳細地引述：

多年來，在對中國人對其國內狀況的描述表示不同意見之前，我們學會了三思而行。過去，我們的中國朋友對外國人的批評過於敏感。當他們不接受中國官方對事件的解釋時，有些人被貼上「反華」的標籤，因此，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表示意見時都十分小心謹慎。除其他原因外，我們也不想讓自己在申請中國簽證時受影響。

過去，很少有外國人敢於使用諸如「法西斯專政」之類的語言。我們之所以接受官方的說法，要麼是因為我們相信官方的宣傳，要麼只是因為我們不瞭解真實情況。就個人來說，我應當承認，我過去每年閱讀有關五四及延安座談會周年紀念的社論，如果從毛澤東文藝理論的角度看，我感到它們非常有道理。顯然，我沒有機會直接問中國藝術家們在這一體制下的實際經驗。就在我1975年開始在北京工作之後，我所遇到的少數幾位藝術家和作家也不敢就局勢說出他們的真實看法。將中國的體制與我們自己的體制加以比較後，我得出結論：像我們這樣的、被中國人描述為「為藝術而藝術」的、比較自由的體制是中國不可能提供的奢侈品。我還意識到，中國有一個儒家文學傳統，所有的歷史和思想性寫作都服務於清晰的政治目的。中國人的體制與我們的不同，而且不遵從常規的批評準則。

我們終於能夠討論這其中的原因了。我發現有說服力的另一個解釋（尤其是關於延安時期）是鄒讜提供的：

美國人生活中的道德一律性讓所有人都更加傾向於以他們自己的形象

來看待外國問題，並以他們沒有言明的假設來判斷外國人的生活。既然美國價值觀的「確定性」遮蔽了對作為美國信念的自由主義的普遍的內在認同於美國政治的重要性，美國人一般會鄙視政治教條或意識形態在其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對他們自己社會更深層的哲學問題缺乏興趣的同時，他們對外國的政治教條和意識形態也非常無知。因此，當美國對其政治勢力和影響力深感自信之際，美國人與革命運動和政權的接觸並沒有警示美國人注意革命者目的的嚴肅性與美國人自己對國家目標缺乏認知之間的差距。

可是到 1970 年代時，美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再避而不承認一個被稱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存在及其獨特性。正如前面提到的論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樣，另外尚有至少四個原因：「相信官方的宣傳」（政治性的）、「需要為中國的體制提供合法性證明」（正如費正清所敏銳地指出的那樣，「對中國的情感偏好」）、對「真實的情況缺乏瞭解」（由於中共對資訊的控制）、以及不願「在將來申請中國簽證時受到不利影響」（現實的理由）。我相信本文所援引的證據也給出了同樣的結論。

當然，我們在此必須區分不同時期的情況。比如，對強大中國的恐懼刺激了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的很多有關大躍進的正面報導，而這種恐懼感明顯不同於促使菲利克斯·格林在大約同一時間歌頌大躍進的誘因。正如希歐多爾·沙巴德的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樣，1960 年代初對大躍進的「辯護」在性質上也不一定與以後的那些辯護類似。不過，在考察過 1940 年代和 1960 年代末與 1970 年代的情況之後，我們會發現，西方知識分子的那些讚揚中共民主傾向及大躍進成就的說辭不僅不準確，而且還與當時可獲得的證據相抵觸。

普通美國人怎麼想？資料直接給出了三個解釋。首先，美國人有點漠不關心。根據蓋洛普的一項調查，在 1937 年，只有 45% 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在中日戰爭中會支持其中的一方（實際上，在 1942 年，只有 61% 的美國人能夠在地圖上找到中國的位置）。其次是美國人壓倒性地支持中國，反對日本——在 1937 年表示會選邊站的 45% 美國人中，

95% 支持中國，只有 5% 表示支持日本。第三是美國人甚至以更大的壓倒性優勢支持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當 1946 年被問及美國應支持內戰中的哪一方時，只有不到 0.5% 的人想要支持共產黨。在國內外受到審查的外國記者的報導也沒對這些數字產生任何影響。僅舉一例，「發自延安的所有報導都被國民黨政府審查；因此，任何過多批評國民黨人的報導都被刪去。」就連宣稱這些報導「延遲並削減了美國對國民黨援助，並改善了中共的處境」的斯蒂芬·莫舍爾（Steven Mosher）也小心翼翼地指出，美國國內對他們的報導也有審查。其中的一個例證是，維特克爾·張伯倫（Whittaker Chambers）大幅改寫發來的報導，「以扭轉他在其中看到的反國民黨、親共產黨的言論。」在遮掩記者觀點方面，也許比審查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報紙上出現的情況：「這些報導常常被更為重要的新聞所遮蔽，發表的日期也不規則，通常會出現在報紙的第七或第八版，同時發行也局限在記者所服務的那家出版物。」當被問及來自中國的媒體報導對美國政策有無影響時，中國內戰時期的軍方新聞官員唐·卡特（Don Kight）說，他「懷疑這些報導是否到了政策決策者那裡」，更遑論公眾了：

我也在經驗中獲知，一般公眾對此缺乏興趣。回國後，我去看望一個小城鎮上的親戚。我被禮節性地問到一些帶有數衍的問題，隨後話題就轉向昨晚的撲克遊戲、穀物的價格或者某則小道消息。

另兩位記者認同這一說法，其中的一位還為此添油加醋：

對於是否會對美國的政策產生影響，我從未有多大的信心。在我回到美國後，沒有人會來敲我的門，問中國發生的事，我對此既不吃驚，也沒有任何不安之處。

我曾經請探親假回家，當時我的媽媽正在一位鄰居家串門。她得知我到家後，就邀請那位鄰居一起過來。我當時穿戴整齊，有晒黑的皮膚，一切都像模像樣。那位鄰家女士是紐約人，並且我肯定她也是《紐約時報》的讀者。我媽媽說：「他剛從中國回來。」她答曰：「啊，太好了。你開車回來的麼？」這種事會讓你謙卑下來。

不對！是什麼導致美國人普遍不願意支持國民黨政府？在 1946 年，只有 6% 的人說他們願意「幫助蔣介石對抗共產黨」，甚至到了 1949 年，當共產黨顯然正贏得勝利之時，只有大約 20% 的人支持從物質上援助國民黨。很可能，原因就是史迪威將軍在 1944 年被從中國召回，「就美國公眾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理解而言，這是一個分水嶺」。正如《華爾街日報》事後的評論所說，「宣傳和審查」造就了蔣介石與現實疏離的形象——確實，「中國的軍事形勢讓人扼腕，在陰謀詭計、愚蠢顛覆和自私自利中糜爛」，而蔣介石則「像所有地方的人一樣，非常專注於維持已經到手的權力，甚至因此而讓他的人民付出代價」。「蔣介石不比希特勒更民主」，史迪威將軍下屬的一位軍事觀察員如此宣告。事實上，有些持進步主義立場的記者恰恰認為自己是抵抗共產主義的壁壘，因為在公眾和政府持續的冷漠面前，共產主義在中國已是勢不可擋：

共產黨的勝利是讓人悲哀的沉重消息。這對包括《生活》雜誌編輯在內的人是悲哀的消息。我們知道，我們對中國的興趣和信心並沒有獲得大部分美國人或美國政府的認同。我們確信，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的話，中共及其莫斯科的主人這時就正失去亞洲，而不是贏得它……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這一長期的生存之戰之前和期間，將自己的生命和心力獻給一個進步開明的中國的建設之中。這對他們尤其是悲劇。

甚至就美國的反共力量來說，「中國問題也從來沒有引起大眾真正的關心。」公眾從來沒有大規模地發出反對「紅色中國」的聲言。事實上，1964 年密西根大學的一份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民眾仍沒有意識到中國大陸是由共產黨統治的，與此同時，被調查的人中有 39% 沒有聽說過除北京的共產黨之外的任何其他中國政府。

因此，造成有史以來最嚴重饑荒的這一事件在當代中國的編年史中應該佔據核心地位，不過它在過去並沒有取得這種地位。該事件本身的性質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知識分子大概不會餓死，同樣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對它的報導和學術研究。

我在本文中描述了對大躍進的歷史記錄，儘管這肯定沒有包括進所有的相關歷史記錄。我發現了一些文件，包括最近解密的中央情報局的情報評估，這些文件比之前更為全面細緻地呈現出西方人（包括精英和民眾）對大躍進的看法。再加上當代的新聞報導，這能夠極大地提高我們對這一極具歷史意義的插曲的理解。

首先，我們來考察共產黨在大躍進之前的那段時期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摩爾·古德曼（Merle Goldman）已經非常出色地為這一時期做了編年記錄，不過，考察一下學者們是怎麼看待大躍進的標誌性政策——激進的農業集體化——可能還是有意義的。批評偶爾會受到鼓勵，甚至會要求這麼做，可是，一旦超出了毛澤東認為必須要維護但從未清楚定義的界限，鎮壓就隨之而來。個人常常會成為鎮壓的目標，因為他們對黨的原則缺乏足夠的忠誠或者拒絕以足夠大的聲調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美國，而並非因為他們直接批判中共。可是，當出現真正的批評時（它也確曾出現過，比如在大鳴大放運動中時），它集中於諸如知識分子和學術自由之類的問題，而非諸如集體化之類的經濟和農業問題，這常常是因為社會學家們「在共產黨統治下變得如此沮喪，以至於許多人決定放棄他們的學術生涯」。學者們極其痛切地感受到了政治對他們工作的侵入，同時，教育工作者們抵制共產黨對他們機構的控制。然而，無論如何，總是有一些關於「資產階級」經濟問題的討論，比如關於人口過多以及導致長期短缺的國家計劃失誤問題。並非意外的是，鑒於它是共產黨政權下「很可能引發民眾反抗的變革」之一，農業集體化肯定受到了很多批評，大多數來自農民和不指名的「右派分子」——無疑他們有很多不滿。知識分子和學生也打抱不平。

1957年6月10日，瀋陽師範大學的一位教授黃晨露（音譯）提出與中共的宣傳相反的看法：大多數農民是被逼迫加入合作社的。他詳盡地講述了集體經營農場以及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失敗。福州的一個學生組織「稱農業合作社運動是針對農民的『壓迫政策』，因為農民們『被逼迫要順從，否則他們將無田可耕』」。官方的新華通訊社報

導說，一位高級幹部「扭曲了統購統銷的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可能導致了大部分的不滿情緒」。這些帶有先見之明的批評到 1957 年就消失了。

事實上，即便在大饑荒的最後創傷已經不再困擾中國之後，儘管知識分子先前的榮光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恢復，那時所有的批評也只剩下了個外殼，並沒有給認真反思大躍進留下空間。中國在 1980 年前後才開始了對大躍進的認真反省。所以，我們必須暫時將目光轉向西方，儘管事實上中文中最早提及這一詞的是發表於 1957 年 11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

「中國人本性傾向於服從權威，避免衝突」，《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這樣說道。《芝加哥論壇報》在 1960 年報導說，政府對 1950 年代初拘押於中國的朝鮮戰爭戰俘的一份研究報告詳細地描述了共產黨成功的「洗腦術」，與公眾的想法相反，洗腦的目的不是要將被俘的士兵爭取到中共一方，而是要削弱他們的愛國情緒、摧毀他們的意志，並讓他們提供軍事情報。

西方媒體對這一事實歡欣雀躍：「上周他們屈辱地承認，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竟然是對的，而共產黨人自己則撒了一個彌天大謊。」比如，大躍進被描述為「從中央政府的專門部門到活動在基層的人民公社政府的權力下放」。在我們的觀念中，極權主義是與權力的集中聯繫在一起的，可實際上，導致大躍進惡行的可能恰恰是相反的事實。（那段時間出版了幾本關於這一主題的書籍，顯然它們都沒有任何特別的洞見。）

雖然沒有真正的突破，過去 20 年間也還有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對大躍進期間寫作（「粗製濫造」也許更為準確）的詩歌有一個並非完全正面的研究。《亞洲研究》有討論「又紅又專」現象的文章。

實際上，學術界在美國與中國關係解凍之後出現親中國情緒是如此強烈，足以推翻費正清之前認定中國為極權國家的判斷，以及斯諾是中

國政府的辯護士的想法。

楊繼繩在序言的開頭就講述他在中共政府手下可能會遭逢的厄運。這一擔心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這也體現出當今時代的特點：

楊繼繩為《墓碑》出版後可能遭到的官方打擊做了心理準備。他肯定有危險。他依舊住在由新華社提供的一個公寓裡，而且每月從政府那裡領養老金。不過到目前為止，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甚至在2009年中在北京的一家書店裡發表公開演講，且沒有受到官方的干擾。類似地，他的合作者們也沒有被中共騷擾。「政府沒有以前那麼蠢了」，楊繼繩說，「如果這事攔在過去，我已經沒命了，而且我的家人也會受到毀滅性打擊。可我現在依然在寫書、發表演講。我沒有被捕入獄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已經有了一些改變。」

西方人對中國（尤其是中共）的誤讀和誤解已經有幾十年了。本文為了考察過去一百年間這是怎麼發生的，研究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歷史上的兩個事件：中共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以及大躍進。我要論證的是，美國和歐洲的學者、記者和政治人物們是如何一直地將中共的意圖看得比其本來面目更為仁慈，而將他們行動的結果的破壞性看得比實際情況要低。另外，在試圖回答「為何這樣」的問題時，我試圖證明，這其中的原因更多地是對已有的資訊視而不見，而不是資訊的缺乏，正如西蒙·雷斯（Simon Leys）在1978年所說的那樣，「我們已經知道大體的梗概；基本上不可能再披露新的東西，只能是補充更多的細節。自從中共建政以來，基本資訊就已可獲得，而且所有對中國事務稍有瞭解的人都瞭解這些資訊。」

## 是大饑荒，也是大屠殺

文 | 丹·薩瑟蘭德 (Dan Southerland)

翻譯 | 張大軍

人們為何在乎中國 50 多年前所發生的一場饑荒？這對於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巨大轉變的中國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這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因為共產黨的合法性部分地基於將毛澤東描述為一位偉大的領袖。官方的立場是：毛澤東犯了一些錯誤，但功大於過。直到最近若干年，公眾才獲知許多與這一結論相抵觸的內部文件。

其次，這場饑荒不是地方性的小事件。最近披露的文件顯示，事件中的死亡人數遠遠高於人們最初的想像。毛澤東於 1958-1960 年的大躍進運動旨在將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並增加產量，結果卻造成了世界歷史上最為慘重的饑荒。

第三，共產黨的審查機器有效地將這一黑暗年代以及毛澤東在其中的作用從許多中國人的記憶中抹去。即便網路時代，中國的訊息有時能夠通過微博以閃電般的速度傳播，但中國的年輕一代，甚至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城市中年人，似乎都對那場饑荒或者毛澤東製造的其他災難知之甚少。

中國的教科書避重就輕地將這場饑荒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現在，在一個研討會上，那場饑荒的倖存者以及中國和外國專家們詳盡地披

露了事件的真相。

由勞改基金會的執行主任暨前政治犯吳弘達先生組織的這場研討會於2012年2月15-16號舉行。它有助於消除人們對這一事實的任何疑慮：這場饑荒是人為的，而且毛澤東要為此負主要責任。

### 毛澤東瞭解實情

正如荷蘭歷史學家馮客在研討會上所說的那樣，那些有關毛澤東的大饑荒的最為敏感的資訊，在中國依然被嚴格封鎖。可是，馮客卻研究了來自中國各地的一千多份文件。他的結論是：毛澤東瞭解農村裡正在發生的事，他清楚饑荒中的死亡情況。他也知道地方官員常常對抵制集體化或者沒能完成糧食產量指標的農民展開暴力攻擊。

不過毛澤東依舊施加壓力，要從農民那裡榨取更多的糧食。據新華社前記者、研討會上的發言人楊繼繩說，毛命令將大量的糧食出口，「同時卻剝奪了農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楊繼繩有文件支持他的說法。

我應當承認，自己對這一事件懷有興趣，因為我曾在1994年為《華盛頓郵報》作了一個連續兩期的調查報導。此一報導顯示，在1950至1976年之間的十幾場毛澤東人為製造的、常常是暴力性的政治鎮壓運動中，死亡人數比最初認為的數字高出幾百萬。毛澤東致死的人數，顯然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後兩者常常與二十世紀的大規模人口滅絕聯繫在一起。

在他1996年出版的《餓鬼》一書中，來自英國的資深中國記者貝克記載道，在那些饑荒歲月中，許多西方專家和知名外國人卻沒能在當時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的巨大災難。

中國前所未有的人為災難發生於1958-1962年間的饑荒時期。可是，在此之後的幾十年裡，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卻否認或無法相信曾發生過饑荒。許多人傾向於認為，毛澤東的政策用意是好的，只不過地方執行得很差罷了，或者這些政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中

國政府引導下的旅行觀察也矇騙了一些外國人。

後來，更多的資訊流露出來。1990年代，美國人口調查局的人口學家巴尼斯特（Judith Bannister）計算出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在3000萬左右。中國政府前官員陳一諮用了多年時間研究這一問題，他給出了一個更高的數字：4300萬。貝克和我都認為這一數字可靠。

然而，在很多年時間裡，許多西方以及中國學術界人士都一直迴避這一主題，甚或否認可能發生過普遍性的饑荒。中國國內也沒有用來紀念此事的場所——沒有獻給幾千萬遇難者的紀念館或紀念碑。

### 遮掩在繼續

中國的教科書一直都很簡單地提到「三年自然災害。」然而，這絕不是由於自然災害而導致的。按照貝克的說法，中國中央氣象台的資料顯示，在1960和1961年，中國的洪災和旱災都比之前許多年份要少。

新出版的共產黨新的官方史書涵蓋了1949-1978年這個時期。該書聲稱，毛澤東認識到了大躍進有問題，而且他「努力要糾正這些問題」。馮客說，這完全是說謊。他的結論是，在1958到1962年間，4500萬人「不必要地死去」。他做出這一結論的依據是從中國各地幾十個共產黨、政府和公安部門的檔案中收集的官方文件。

### 不僅僅是饑荒

他還指出，「饑荒」一詞也許遮蔽了導致饑荒的集體化運動中的大規模暴力問題。馮客說：「對『饑荒』一詞漫不經心地採用……可能會支持這一廣為流傳的觀點：這些死亡現象是未經深思熟慮且執行得不好的政策的意想不到的後果。」

「通常，大規模殺戮不會與毛澤東和大饑荒聯繫在一起，而且在與柬埔寨和蘇聯的災難相比較時，中國總是受益於它的比較正面的形象。」

「不過，正如新的檔案材料證據所顯明的那樣，強制、恐怖和系統的

暴力是大躍進的基石……人們由於許多人為的原因而過早地死去，這些原因包括酷刑、隨意的處決，以及故意的餓死。

研討會的許多參與者是中國人。其中的一些大饑荒倖存者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發言。相比於檔案文件，他們的令人揪心的個人遭遇也許更能彰顯最終的真相。

##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

文 | 尹曙生

最近十幾年來，在一些書籍、報刊、網路上，時不時披露出上個世紀「大躍進」年代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大多數作者由於沒有確鑿的資料和例證，文章說服力不強，善良的人們不太相信，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還是用事實說話吧。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

「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筆者）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9個縣發生302起，蚌埠專區15個縣發生721起，蕪湖專區3個縣發生55起，六安專區5個縣發生8起，安慶專區2個縣發生2起，合肥市3個縣發生201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縣發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發生的；蚌埠專區的鳳陽縣等10個縣1960年共發生此類案件619起，其中發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發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發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個別地方雖有發生，但為數極少。今年第一季度只發現肖縣、碭山、嘉山、定遠、肥西、巢縣、泗縣等8

個縣共發生 10 起。這類案件約有 50% 以上發生在三類（即壞人掌握領導權——筆者）社隊，作案成員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壞分子。據蚌埠專區對 819 名作案成員調查，地富分子和歷史上當過土匪的 59 人，敵偽人員、兵痞等 49 人，學生 19 人，農民 764 人。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 1144 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 36 起，其餘 1108 起都是留作自食的。發生這類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一些地方生產沒有搞好，口糧安排不落實，群眾生活極度困難，特別是壞人當道的三類社隊，幹部為非作歹、停伙扣飯，群眾出於生活所迫所致，個別的搞出去賣也是為了買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對此類案件，一般都當成政治破壞案件處理，由黨委責成公安部門領導直接掌握，確定專人辦理。從處理情況看，面寬、過嚴、絕大多數是逮捕、勞教、拘留起來，把很多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成敵我矛盾處理，擴大了打擊面。全省 1289 名作案成員中，就逮捕 136 名，勞教 153 名，拘留 881 名，判處死緩 2 名，合計佔 90.9%。這些人被逮捕、拘留後，由於他們本來身體就弱，有的還患有多種疾病。在投入勞改、勞教後，因生活管理不好，勞動過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達 70% 以上。省公安廳已責成有關公安機關，對此類案件進行一次認真檢查處理。處理的原則是：對地富反壞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響以及殺人犯和搞這種東西出賣的，應從嚴處理，其餘都教育釋放。」

安徽省公安廳的這份報告，總的來說，是實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過多解釋，因為寫得清楚明白。由於時代限制，個別觀點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壞有意破壞政治影響」等語，不是餓的沒辦法，誰願意吃包括自己親人在內的屍體呢？需要補充的是，報告沒有說明這裡面有多少是殺害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親人而食肉，就是報告上說的「殺人犯」（提醒大家注意：是「快要死」而不是「已經死了的」，是活人而不是死人）。這種情況少，據我們在寫公安史時的典型調查，這部分約佔 5% 至 8%。

下面用一個縣的例子，來論證省公安廳的報告。

安徽省鳳陽縣，改革開放後很出名，因為全國包產到戶就是這個縣的小崗村 18 戶農民立下生死狀搞起來的。這一做法得到當時的黨委書記萬里的默許，然後在全省推廣、全國推廣，很快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萬里也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風雲人物，「要吃米，找萬里」的口號傳遍全國。江澤民、胡錦濤等很多中央領導人都到鳳陽縣小崗村視察、參觀過。可是，這個縣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的悲慘狀況卻鮮為人知，說它是人間地獄一點也不過分。

先看看人口統計數字。1958 年鳳陽縣全縣人口 402700 人，到 1961 年，人口下降到 245262 人，淨減少 157438 人，和 1958 年相比，人口減少 39%。全縣死絕的戶有 2404 戶，消失村莊 27 個，孤寡老人 1580 人，孤兒 3304 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這個縣的縣委書記趙玉書為了「大躍進」，不顧人民死活，盲目蠻幹造成的。為了「大躍進」，他動用專政工具殘酷鎮壓人民群眾。一個 40 萬人口的縣，他就下令公安機關逮捕、拘留 3154 人，管制 1400 多人，批鬥 2000 多人，打擊所謂反革命 366 人。1960 年 4 月，正是該縣餓死人最多的時候，趙玉書在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鳳陽本來就不是個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有什麼了不起！」會後他到武店公社瞭解浮腫病情況，問公社衛生院院長王善良：「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缺什麼藥？」王善良如實回答說：「少一味藥，那就是糧食！」趙玉書大怒，馬上組織人對他進行批鬥，批鬥後宣佈逮捕。

由於餓死人的情況得不到控制，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趙玉書知道後，對公安局領導說：「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關死為算，嚴格保密，不得外傳。」結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當事人 63 人，關死在監獄裡的 33 人。

安徽省公安廳的報告送到省委以後，省委書記曾希聖只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幸好這份報告還保存著，筆者在主編《安徽省志·公安志》時發現這

份報告。這份報告的發現使得這一歷史慘案沒有石沉大海。

安徽省發生的人相食案件是不是個案？不是的。全國不少省都發生過，只是嚴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了份報告，題目是《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這說明，人相食的情況在全國是較為普遍地存在的。

（本文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 人相食的年代

編 著 / 勞改基金會

主 編 / 任翔識

責任編輯 / 古書宇

執行企劃 / 凌宇社 Globehaus Literary Agency

封面設計 / 生形設計 Innate Design

排 版 / 宸遠彩藝

出版 勞改基金會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 1734 20th St. Washington, DC 20009. U.S.A.

網址 [www.laogai.org](http://www.laogai.org)

電話 001-202-408-8300

總經銷：

台灣金馬地區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 (886) 02-8227.5988 傳真 (886) 02-8227.5989

香港地區 香港田園書屋

網址 [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美國華盛頓 2013 年 2 月初版

印刷 台灣

定價 N.T.\$360 (H.K.\$120/ U.S.\$18)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勞改基金會擁有中文發行權。  
非經作者及勞改基金會同意，不得翻印、複製或轉載文字與圖片。

Copyright ©2013 by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中國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飢荒，死亡三千到四千多萬人口，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劇。

這是天災，還是人禍？中國官方歷史只是輕描淡寫地冠之以「三年自然災害」。然而研究表明，這幾年並無大的災情，而且當農民餓死的時候，國家的糧庫裡還有大量糧食；當農民餓死的時候，中國卻還大量出口食品。飢荒也同時伴隨著暴力。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殺戮。」

「人性在這場由國家發動的暴力中淪喪了。」——馮客

不僅僅文革是中國「史無前例的浩劫」，大饑荒也是一場真正空前的浩劫。兩次浩劫都源於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和政策——土改、鎮反、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和四清運動——既違反人類進步的普世規律，又消滅異己，最後造成全體中國人的悲劇。極左路線之因，造成大饑荒之果；大饑荒又成為因，釀成文革大浩劫之果。

然而，過去五十多年，中共一直試圖掩蓋罪行，並遮蔽它血淋淋的歷史。本書披露真相、分析深刻，並讓倖存者現身口述，從而使大饑荒在歷史上不再缺席。

ISBN 978-1-931550-01-7



NT\$360 H.K.\$120 U.S.\$18